

拉丁美洲研究 (双月刊)

2022 年第 4 期 (第 44 卷 总第 255 期)

2022 年 8 月 10 日出版

理论与思潮

- 拉美本土国际关系理论：自主理论及其评价 赵 晖 (1)
- 西方自由国际主义思想传统的源流、逻辑及困境 付文广 (22)
- 拉美区域主义的特点及影响因素 李德鹏 思特格奇 (47)

习近平新时代大国外交思想研究

- 中美美竞争背景下中拉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 黄乐平 (77)
- 正确义利观视角下的中拉绿色合作：进展、挑战及前 邢 伟 (95)
- 能源转型背景下中国与拉美清洁能源合作探析
..... 焦玉平 蔡 宇 (117)

拉美社会

- 巴西黑人奴隶家庭的组织模式及其特点 焦 健 (136)
- 英文摘要 (154)

JOURNAL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

(Bimonthly)

Vol. 44 No. 4 2022

Indigenou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 Latin America :	
Review of the Autonomy Theories	Zhao Hui (1)
The Traditional Western Liberal Internationalism: Its Origin,	
Logic and Dilemma	Fu Wenguang (22)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atin American Regionalism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Li Depeng, Sitegeqi (47)
The China –U. S. Competi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 –Latin	
Americ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through the IPE Perspective	Huang Leping (77)
China –Latin America Green Cooper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ight Approach to Justice and Pursuit of Interests:	
Progresses, Challenges and Prospects	Xing Wei (95)
China –Latin America Clean Energy Cooper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Energy Transition	Jiao Yuping, Cai Yu (117)
On the Organizational Model and Characteristics	
of Black Slave Families in Brazil	Jiao Jian (136)
Abstracts	(154)

拉美本土国际关系理论： 自主理论及其评价

赵 晖

内容提要：拉美自主理论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早期代表人物是巴西学者雅瓜里贝和阿根廷学者普伊格，两人曾分别担任巴西科技部长和阿根廷外交部长。自主理论以拉美发展主义和依附论为思想源泉，突破了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既定框架，将外国国家视为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主体”而非“客体”，围绕拉美国家的核心关切——自主来构建理论。自主理论认为，主权平等掩盖了国际权力的不平等，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秩序掩盖了由自主程度不一的国家构成的等级秩序，并强调外围国家国内精英集团对维护或改变依附状态至关重要。针对外围国家的出路问题，自主理论提出，在依附和革命的选项之外，外围国家还有第三条道路——自主，可以通过创造性地利用国际体系提供的回旋空间，制定和实施符合自身利益的战略目标，最终摆脱对中心国家的依附，实现自主发展。作为一条可行路径，自主理论将自主与一体化联系起来，提倡志同道合的外围国家一起实施共同的一体化战略，形成一个贯通的、有凝聚力的系统，扩大资源和市场基础，提高生产规模，促进内生性发展，提高在国际层面的集体议价能力。

关键词：自主理论 外围国家 发展主义 依附论 一体化

作者简介：赵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拉美系博士研究生，新华社高级编辑。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649(2022)04-0001-21

国际关系学带有突出的西方中心主义“烙印”，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等西方主流理论一直占据主导地位，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更是将国际关系学称为“美国的社会科学”。^①然而，随着第三世界的经济崛起和思想觉醒，包括拉美发展主义和依附论等在内的拉美本土理论在全球国际关系研究中崭露头角，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在学科话语体系中的霸权地位发起一定挑战。形成于东西冲突和南北冲突共生时代的自主理论^②，深受拉美发展主义和依附论影响，自成一派，被视为是拉美学界对国际关系学的第三大理论贡献。

一 自主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

拉美国际关系研究对“自主”概念的大讨论，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冷战中期。当时，由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过度的向外扩张中实力有所滑坡，东西方阵营内部出现了分化，导致美苏关系出现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一度得到缓解。与此同时，曾处于中间地带的第三世界国家为维护共同利益团结起来，形成一股合力，以成立七十七国集团等实际行动来推动世界格局向多极化发展，力图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在第三世界力量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中，拉美国家逐步成为国际舞台上反对霸权主义的一支重要力量，经历了从东西视角到南北视角、从自动结盟到不结盟、从泛美主义到拉美主义、从重安全到重发展、从对美依赖到对外

^① Stanley Hoffmann, “An American Social Scienc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International Theory*,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1995, pp. 212–241.

^② 在以“自主”为核心概念的论著、论文中，不同学者按照自己的认识和判断，将雅瓜里贝（Hélio Jaguaribe）和普伊格（Juan Carlos Puig）等人关于自主的学术研究成果统称为“自主主义”（doctrina de la autonomía）或“自主理论”（teoría de la autonomía）。比如，贝纳尔—梅萨（Raúl Bernal—Meza）等学者习惯使用“自主主义”这一表述，而博洛尼亚（Alfredo Bruno Bologna）等大多数学者则将其称为“自主理论”。在布里塞尼奥—鲁伊斯（José Briceño Ruiz）和西蒙诺夫（Alejandro Simonoff）看来，不同于卡尔沃主义（doctrina Calvo）、德拉戈主义（doctrina Drago）、埃斯特拉达主义（doctrina Estrada）等外交主张，普伊格和雅瓜里贝的研究以“自主”为出发点，系统地探讨了国际体系的结构和运作，并根据不同类型进行分类，概括性地阐明变化条件，因而符合“理论”对高度抽象和普遍适用的要求。参见 José Briceño Ruiz y Alejandro Simonoff, “La Escuela de la Autonomía, América Latina y la Teoría de las Relaciones Internacionales”, en *Estudios Internacionales* (Santiago), Vol. 49 No. 186, 2017, pp. 57–58. 在实践层面，罗梅罗（Pedro Romero）指出，虽然自主理论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但时至今日仍是很有价值的分析外交政策的工具。参见 Pedro Romero, “Hacia una Nueva Construcción Discursiva de la Autonomía”, en Gladys Lechini de Alvarez et al. (eds.), *Argentina e Brasil. Vencendo os Preconceitos. As Varias Arestas de uma Concepcao Estratégica*, Rio de Janeiro: Editora Revan, 2009, p. 53.

多元的五大转变。

第一，从东西视角到南北视角。受长期沦为欧洲殖民地等历史原因的深刻影响，拉美国家在意识形态、社会制度、文化传统、民族构成等方面与西方有着天然的联系，因而拉美精英阶层在自我认知上将自己认同为是西方体系的一部分。二战后，拉美作为美国势力范围的这一事实在雅尔塔会议上得到了包括苏联在内的世界各国的默认。杜鲁门推行反苏、反共的冷战政策时，拉美更是被强行纳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战略体系。^①

到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由于深陷越战泥潭、国内种族矛盾白热化，美国国家实力受到削弱。与此同时，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石油危机的爆发、原材料生产国的出口红利以及美苏关系和美中关系的缓和，预示着国际权力关系的调整和重塑。这些事件导致拉美国家的统治集团开始对美国 and 西方国家的能力产生怀疑，并看到了第一世界没落式微、第三世界发展壮大进而发展中国家在重构国际经济秩序中施加更大影响力的可能性。基于这样的预判，拉美国家在考虑自身在未来世界格局的地位和作用时，将立足点转向南方，更多地关注南北关系，而不是传统的东西关系，对第三世界的身份认同也不断加深。这一时期，以墨西哥总统埃切维里亚、委内瑞拉佩雷斯总统、阿根廷庇隆总统、巴西盖泽尔总统等为首的拉美国家领导人都积极发展与区外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

第二，从自动结盟到不结盟。二战后，美国为加强对“后院”的控制，力主推动拉美国家与美国在政治上、军事上结盟。1947年，拉美国家被拉入美国一手炮制的《美洲国家间互助条约》。1948年，美国主导的美洲国家组织成立，成为美国干涉拉美事务的重要工具。战后初期，先后有13个拉美国家同美国签订了双边军事互助条约，美国在拉美建立了400多个军事基地。在联合国和美洲国家组织等国际机构中，大多数拉美国家成了美国操纵的“表决机器”。^②一些拉美大国甚至将与美国“自动结盟”奉为对外政策的圭臬。

但随着冷战中期国际形势的变化，特别是两极格局的削弱、欧洲和日本等“第二世界”的复兴、一大批政治独立的新兴国家的涌现，在全球范围内推高了不结盟运动的浪潮，不少拉美国家也开始从“结盟”转向“不结盟”。

^① 安建国：《战后拉美国际关系的发展》，载《拉丁美洲研究》，1987年第3期，第21页。

^② 肖枫：《论战后拉美国家外交理论和政策的发展（上）》，载《拉丁美洲研究》，1989年第2期，第9页。

1961年9月，古巴成为当时拉美国家中唯一一个不结盟运动成员国。1972年8月，不结盟运动外长会议首次在拉丁美洲召开，掀起了拉美国家加入不结盟运动的一个高潮。1974年，基辛格对拉丁美洲“滑入不结盟集团并使我们在世界各地的问题更加复杂”的前景感到严重困扰。^①到1979年9月第六次不结盟运动首脑会议在古巴哈瓦那召开时，拉美已有11个国家成为正式成员国，另有11个国家为观察员国。拉美国家成为了不结盟运动中一支重要力量，尤其在捍卫200海里海洋权的斗争中，为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捍卫海洋权益、反对超级大国的海洋霸权主义发挥了带头作用，最终推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就“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做出了明确规定。

第三，从泛美主义到拉美主义。泛美主义最早由玻利瓦尔等人在拉美独立战争期间提出，目的是联合拉美国家抗击西班牙，谋求独立，摆脱殖民地位，巩固和维护自身主权。19世纪末，随着美国从大陆扩张阶段进入海外扩张阶段，泛美主义开始被美国利用，成为美国加速对外扩张的一面“大旗”。通过频繁使用“大棒政策”和“金元外交”，美国对拉美国家进行武力干涉和经济扩张。一方面，在军事上将一些拉美国家变为自己的保护国，另一方面，在经济上排挤欧洲列强在拉美的影响力，使该地区逐渐沦为美国的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与此同时，拉美各国的对外政策受到美国的蛮横干涉。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后，美国以古巴意识形态与泛美体系不相容、导致西半球团结处于危险之中为由，对古巴实行孤立政策，推动美洲国家组织通过了驱逐古巴的决议。到1964年年底，拉美国家中只有墨西哥与古巴保持外交关系。

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随着拉美国家经济实力逐步增强、民族主义不断高涨，要求改革泛美体系、以拉美主义取代泛美主义的呼声便越来越高。1975年10月，在墨西哥和委内瑞拉的倡议下，拉美23国政府代表签署《巴拿马协议》，宣告拉丁美洲经济体系成立，以协调拉美国家在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共同立场，提高拉美国家在国际对话中的地位。这是继1948年成立联合国拉美经委会、1949年成立拉美大学联盟、1960年成立拉美自由贸易协会、1964年成立拉美议会、1969年成立拉美特别协调委员会之后，拉美国家成立的又一个代表“拉美主义”的地区性组织。所有这些机构都有助于在国际法

^① Hal Brands, “Third World Politics in an Age of Global Turmoil: The Latin American Challenge to US and Western Hegemony, 1965–1975”, in *Diplomatic History*, Vol. 32, No. 1, 2008, p. 123.

层面强化拉美这一概念，有意识地与美国以及其倡导的泛美主义拉开距离。

第四，从重安全到重发展。战后初期，美国为了遏制共产主义在西半球的发展，积极编织反共防务安全体系，在拉美培植大量亲美反共的右翼军人上台执政，并提升对亲美政府的军事援助力度，巩固双方的军事合作，一致反共，维护集体安全。这一时期，拉美在东西方冲突中旗帜鲜明地站在美国一边，许多拉美国家的对外政策都被打上了反苏、反共的印记，将防止共产主义渗透这一安全问题置于首要位置。

随着世界格局从战后初期的美国独霸演变为美苏均势，冷战开始进入缓和阶段，拉美国家的对外关系开始从单纯战略安全利益转向社会经济发展问题。许多拉美国家公开拒绝“拉美与美国之间有特殊的和排他性的关系”这一说法，不再“谈共色变”，加强了同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等的关系，同中国的友好合作关系也取得突破性发展。20世纪70年代，共有11个拉美国家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此外，拉美经济民族主义呈现出十分强劲的势头，对内坚持发展民族经济，以进口替代工业化为发展路径，摆脱外国控制；对外维护经济主权和独立，强烈谴责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剥削和不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而美国对拉美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忽视和回避，让一些曾寄希望通过美国援助和双边合作来改变落后问题的拉美政府抛弃了幻想。1969年5月，21个拉美国家在智利的比尼亚德尔马召开会议，讨论拉美与美国之间不平等的经贸关系问题，公开表达对美国的强烈不满，并强调各国自由支配其自然资源主权以及经济合作不能附带政治和军事条件等原则。

第五，从对美依赖到对外多元。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中，拉美国家纷纷摆脱了西方殖民统治，赢得了政治独立，但经济上仍被英国、德国等西方垄断资本牢牢控制。二战期间，英国的势力显著下降，拉美国家与欧洲的经济联系基本中断，美国垄断集团实现了排挤竞争对手、夺取该地区统治地位的目的，从而确立了在拉美的经济霸权。^①70代中期，仅美国跨国公司就控制了拉美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1/5、工业生产的1/3、出口的2/5、银行资产的1/2。^②

随着拉美民族资产阶级力量的壮大，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不少拉

^① 韩琦：《论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拉丁美洲的影响》，载《世界近现代史研究》，2016年第13辑，第198页。

^② 焦震衡：《战后拉美国家的国有化运动》，载《拉丁美洲研究》，1987年第4期，第31页。

美国掀起了大规模国有化运动，将以美国企业为主的大批外资企业收归国有。1960—1976年间，拉美国家将约200家外国企业收归国有，其中美资企业158家、英资企业8家、其他国家企业34家。^①与此同时，美国在拉美对外贸易中的比重也不断下滑，从二战后初期的50%下降到20世纪60年代初的40%左右。到了1979年，美国仅占拉美进口的34.9%、出口的38%。^②美国对拉美直接投资占其对外投资总额也从1950年的38.8%下降至1980年的17.9%。^③与此同时，西欧、日本在拉美的贸易和投资显著增长，同苏联、东欧等经互会成员国之间的经贸交往明显增多，与亚非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往来也日益频繁。

在美国霸权相对衰落、拉美自主实践兴起的现实背景下，拉美学界，特别是南锥体国家的国际关系研究开始密集关注和探讨通过自主外交实现国家利益的可能性和制约条件，由此产生了以“自主”为核心概念的学术共同体。巴西学者雅瓜里贝和阿根廷学者普伊格是其中的佼佼者。

二 雅瓜里贝的主要观点

出生于1923年的雅瓜里贝是巴西知名学者，曾在多所美国大学任教，同时也是一名政治家，参与组建了巴西社会民主党，并曾出任巴西科技部长一职。早在青年时期，雅瓜里贝就曾参与创立巴西高等研究院，宣扬带有强烈发展主义色彩的思想。

在1969年发表的《拉美的依附和自主》一文中，雅瓜里贝采纳了拉美发展主义的一些“诊断”结果，指出拉美国家存在依附性的三个结构性趋势：停滞、边缘化和去国家化。首先，贸易条件恶化、进口替代不彻底和外部融资不可持续，导致了经济停滞，并由此带来了政治、文化、社会的停滞。其次，随着越来越多的失业农民转移到城市，中心城区的贫困带越来越庞大。这部分人群在经济、政治、教育等领域都处于被边缘化地位，无法融入到工业化进程，只能从事低端第三产业，导致社会边缘化问题突出。再次，在战

^① 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再论世界发展中的跨国公司》，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284页。

^② 张森根、齐海燕：《拉美的对外贸易特点和当前调整措施》，载《拉丁美洲丛刊》，1984年第3期，第14页。

^③ 陈才兴：《战后外国对拉美直接投资的发展变化》，载《拉丁美洲研究》，1990年第2期，第27页。

略性经济部门、文化层面和政治军事层面都出现了去国家化现象。由于跨国公司、外资企业的比重不断增加，拉美国家失去了对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战略性行业的控制权。外资企业在做决策时考虑的是中心国家的利益，与拉美国家谋求内生性自主发展的设想南辕北辙。与此同时，拉美科技创新能力弱，不具备推动和促进科技发展的机制性保障。而在国外大学深造的拉美年轻人回国后，只想充当外来知识的“传送带”，没有致力于建立研发中心以推动本国的科技进步，导致科技依附不断延续，形成了文化层面的去国家化。此外，借抵御共产主义威胁之名，拉美军队加强了对美国国防系统的依附，不仅从美国大量引进武器和战备物资，还有大批拉美高级军官接受了美国方面的培训。通过政变上台的军政府，以及由军队与保守派结盟组成的威权政府，也在政治上不断巩固与美国的依附关系，造成政治和军事层面的去国家化。^①

1979年发表的《外围自主和中心霸权》一文是雅瓜里贝全面阐释自主理论的代表作品。在文中，雅瓜里贝运用历史—结构分析法，在宏大的历史视角下，将国际体系作为自主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在他看来，当时主导世界格局的主要是两种秩序。第一种秩序是两个超级大国所代表的两种帝国系统之间体现出来的复杂的竞合关系，第二种秩序是帝国系统内部存在的中心国家和外围国家的关系。虽然两种帝国系统具有鲜明的差异性，但也有相同点，即内部结构的不对称性以及由此产生的系统内部的对立紧张。^②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指出，“国际上存在着新的等级制度，根据自我决断能力的高低，大致可以分为四类”。^③第一类是全面支配型（*primacía general*）。二战后的20年里，美国是唯一的全面支配型国家，主要体现在本国领土的不可征服性，以及具备全球统治权和实施核反击以摧毁进犯者的军事能力。苏联则依靠20世纪60年代末科技军事实力的稳步提升，日益接近全面支配型的标准。第二类是地区支配型（*primacía regional*）。苏联是地区支配型的典型代表，拥有对某些特定地区而非所有地区的统治权。当时正在实施“联美抗苏”政策的中国较有希望晋级到这一类别。第三类是自主型（*autonomía*），包括西欧国家、中国、日本。其特点是，虽然本国领土不具备不可征服性，但可以对可能的侵

^① Hélio Jaguaribe, “Dependencia y Autonomía en América Latina”, en Hélio Jaguaribe et al., *La Dependencia Político-económica en América Latina*, Consejo Latinoamericano de Ciencias Sociales, 2017, pp. 25 - 38.

^{②③} Hélio Jaguaribe, “Autonomía Periférica y Hegemonía Céntrica”, en *Estudios Internacionales*, Vol. 12, No. 46, 1979, p. 94, p. 91.

略者实施物质上或道德上的惩罚。此外，在本国内部事务和国际事务上具有较大的自我决策空间。相对于严格意义上的全面自主型，还有地区自主型，比如中东的伊朗、南美的巴西等，以及行业自主型，比如沙特阿拉伯等。第四个类别是依附型（dependencia），涵盖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这些国家往往受制于具有全面支配或者地区支配能力的外来国家，有的还受制于具有自主能力的中等强国。

雅瓜里贝认为，在以美国为中心的帝国系统内部所存在的支配和依附的关系，既是社会客观现实的反映，也是中心国家和外围国家两厢情愿的结果。换言之，那些处于依附状态的国家并非是被强制要求依附的，而是本国的精英集团出于自身利益考量而所做的对外政策选择。^①在这一帝国系统内部，发挥居间作用的是那些具有全面自主能力的中等强国。但是，自主能力不是一成不变的，比如已经具备地区自主或者行业自主能力的国家有可能“升级”为具有全面自主能力的国家，而以前具备全面自主能力的国家也有可能“降级”。

在自主还是依附的问题上，雅瓜里贝认为，只有同时满足两个静态结构性条件和两个动态功能性条件的国家，才有可能成为自主型而非依附型国家。^②

第一个结构性条件是“国内可行性”（viabilidad nacional）。国内可行性取决于一国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逐步摆脱依附状态而掌握和支配的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和国际交换能力的程度，包括自然资源、战略资源、工业、原材料、农产品、能源、科技以及接轨国际贸易的公共政策等一系列内部条件，同时也与一国的科技发展状况、社会文化融合程度、民众道德教育水平等因素密切相关。如果社会文化融合程度或者社会集体道德水平较高，实现自主的物质要求就会相应降低。雅瓜里贝根据国内可行性的高低，将全世界分为三类国家。第一类国家具备实现自主发展条件的充足条件，包括美国、苏联、中国、日本、欧共体、英国和英联邦国家。第二类国家具备在经济上建立自主发展计划的最低条件，包括印度、拉美的大国和中等国家、阿拉伯国家、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等等。第三类国家则不具备自主发展条件，比如中美洲和加勒比小国、非洲国家和部分亚洲国家等等。^③

^{①②} Hélio Jaguaribe, “Autonomía Periférica y Hegemonía Céntrica”, en *Estudios Internacionales*, Vol. 12, No. 46, 1979, p. 94, p. 98.

^③ Hélio Jaguaribe, “Dependencia y Autonomía en América Latina”, en Hélio Jaguaribe et al., *La Dependencia Político-económica en América Latina*, Consejo Latinoamericano de Ciencias Sociales, 2017, pp. 44 - 45.

第二个结构性条件是“国际宽容度”（*permissibilidad internacional*）。国际宽容度的概念更加抽象，是指一国在地缘政治和国际关系层面所拥有的对冲他国发动实质威胁的条件。这些条件既可以是内部的，比如一国的经济、军事实力，也可以是外部的，比如与他国建立防守联盟。以墨西哥、巴西和阿根廷这三个拉美大国为例。巴西和阿根廷的国际宽容度比墨西哥要高，更容易增强自主性，这是因为美国对墨西哥进行直接干涉的能力要比巴西和阿根廷高得多。^①与此同时，国际宽容度并非是常量，会随着国际大环境趋于紧张或趋于缓和而发生变化。比如，同在冷战时期的两极格局下，国际宽容度会根据两极之间对抗的激烈程度而有明显变化。

此外，自主还有两个功能性条件，分别是“技术—企业独立”和“种族—文化相近”。技术—企业独立的典型代表是欧共体和日本。在欧共体内部，尽管法国比西德更多拥有政治和军事上的独立，但西德的自主性要明显高于法国。雅瓜里贝认为，这是因为由于西德在技术和企业层面更加独立，更具有内生发展动力。而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等国，虽然无论在政治、军事上，还是在技术、企业上，都不具备充分的自主条件，但由于这些国家在种族和文化上与美国非常接近，与美国保持着良好关系，因此在帝国系统内部也享有较高自主权。

雅瓜里贝指出，结构性条件属于赋权型条件，与一个国家采取的对外政策关联甚小，却与社会文化融合程度、民众道德教育水平密切相关。而功能性条件属于操作型条件，可能会因外围国家的自身努力或者中心国家的行为改变而发生变化。^②

通过考察国际格局从两极向多极发展的趋势，雅瓜里贝对拉美政治的未来走向提出了三种假设：继续保持卫星式依附、革命、自主。与依附模式或革命模式的“内在不稳定性”不同，自主模式具有“相对稳定性”。^③鉴于以美国为中心的帝国体系内部为符合美国基本利益和价值观的外围国家提供了

① María Elena Lorenzini, “Pensando desde el Sur: Ideas, Aportes y Contribuciones Teórico - conceptuales de Hélio Jaguaribe”, en Alejandro Simonoff (Comp.), *Pensadores del Cono Sur. Los Aportes de Jaguaribe, Mathol Ferré, Puig y Tomassini a las Relaciones Internacionales*, La Plata: Instituto de Relaciones Internacionales, 2014, p. 23.

② Hélio Jaguaribe, “Autonomía Periférica y Hegemonía Céntrica”, en *Estudios Internacionales*, Vol. 12, No. 46, 1979, p. 98.

③ Hélio Jaguaribe, “Dependencia y Autonomía en América Latina”, en Hélio Jaguaribe et al., *La Dependencia Político - económica en América Latina*, Consejo Latinoamericano de Ciencias Sociales, 2017, p. 39.

相当大的自主空间，他认为拉美国家可以选择“发展和一体化的自主模式”。这一模式的自主体现在两个层面。第一是决策过程的自主。自主发展和自主一体化运动，意味着拉美国家根据自身利益，自由地做出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领域的重大决策。第二是发展模式上的自主。“发展和一体化的自主模式”不是简单地复制新自由主义模式或共产主义模式这两种存在着严重意识形态冲突的发展模式，而是有别于它们的第三条道路。^① 这一融合国家发展和地区一体化的发展模式，一方面是拉美国家作为自主行为体在文化、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上的结合，另一方面是在不损害其身份和社会最佳发展条件的情况下，通过地区一体化，形成一个贯通的、有凝聚力的系统，扩大成员国的资源和市场基础，提高其生产规模和生产力，确保整个地区的内生性发展。^②

雅瓜里贝认为，一体化进程是对拉美国家自主发展进程的再保险，也是从地区层面改善拉美国家国内可行性的工具。与此同时，拉美一体化进程的核心价值体现在政治上，而非经济上。因为这一进程一方面关乎拉美国家的自主，另一方面也代表着拉美为建立一个更公平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所做出的努力和贡献。^③ 根据拉美的实际情况，他指出，拉美一体化应该是开放的和渐进的，而“同心圆”式一体化是比较理想的一体化模型。他力主建立阿根廷—巴西联盟，通过双方强烈的政治意愿来推动实施共同产业政策，并以这一战略联盟为基础，打造和引领南方共同市场。

雅瓜里贝是南方共同市场的坚定捍卫者。他认为，南方共同市场不仅有效提高了成员国的国际竞争力，同时也维护了成员国在国际层面的自主权。这一双重优势非常重要，因为无论未来是美国独霸天下还是多极世界相互制衡，能否在国际舞台上实现自主决策，将决定南方共同市场成员国能否以最佳方式融入国际新秩序。^④ 而在南方共同市场这一圈层之外，还有涵盖更多国家的南美洲国家联盟。他期待，在“同心圆”式一体化进程的推动下，南美

^{①②} Hélio Jaguaribe, “Dependencia y Autonomía en América Latina”, en Hélio Jaguaribe et al., *La Dependencia Político-económica en América Latina*, Consejo Latinoamericano de Ciencias Sociales, 2017, p. 24, pp. 65 - 66.

^③ Hélio Jaguaribe, “América Latina y los Procesos de Integración”, en Alberto Acosta y Aduardo Gudynas (comp.), *Libre Comercio Mitos y Realidades. Nuevos Desafíos para la Economía Política de la Integración Latinoamericana*, Quito: Editorial Abya-Yala, 2001, p. 75.

^④ Hélio Jaguaribe, “Brasil e América do Sul no Horizonte 2006”, en *Parcerias Estratégicas*, Vol. 2, No. 4, 1997, p. 200.

国家相互抱团，通过自由贸易和地区合作，从整体上提升成员国的国内可行性和国际宽容度，从而实现自主。^①

三 普伊格的主要观点

出生于1928年的普伊格是阿根廷国际关系研究的奠基人之一，曾于1973年短暂出任过两个月的阿根廷外长，期间筹备了与英国就马尔维纳斯岛主权问题的谈判，后因坎波拉总统辞职而告别政坛。1976年，为躲避军政府迫害，流亡到委内瑞拉的一所大学任教，并在那里撰写了大量有关自主理论的书籍和文章。

对普伊格来说，提供真正自主方案的唯一途径是“放弃那些基于我们自己以外的现实建立起来的理论框架”。^② 普伊格的自主理论建立在对阿根廷和拉美进行历史政治分析的基础之上，将自主作为拉美国家外交政策的核心范畴，同时也作为民众需求和历史斗争的表达内容。其代表作品有1980年出版的《国际学说和拉美自主》、1983年出版的《马尔维纳斯和国际制度》、1984年出版的《拉美：外交政策比较》等。

国际体系中存在的无政府状态与等级制度之间的紧张关系，是普伊格构建自主理论的出发点。普伊格认为，国际体系与人类社群一样，都具有明确的职能分工，都被一套具有最高效力的分配制度所支配和管理，有人做出决策，有人遵照执行，有人服从决策。他将国际社会“原子化”，大体分为三类群体：最高分配者、低级分配者和接受者。拥有核武器等超大威慑力的美国和苏联统治者是最高分配者，其他国家元首以及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和跨国公司的掌门人是低级分配者，而除此以外的其他所有人都是接受者。^③

通过综合分析全球性大国传统优势衰减、帝国体系稳定性出现松动、欧佩克等新的国际行为体不断涌现等国际形势新特点对国际体系的冲击，普伊格做出了“集团间不可渗透性”“集团内部自主化”等判断。他认为，二战结

^① Alejandro Simonoff y María Elena Lorenzini, “Autonomía e Integración en las Teorías del Sur: Desentrañando el Pensamiento de Hélio Jaguaribe y Juan Carlos Puig”, en *Iberoamericana – Nordic Journal of Latin American and Caribbean Studies*, Vol. 48, No. 1, 2019, p. 100.

^② Juan Carlos Puig, *América Latina: Políticas Exteriores Comparadas*, Buenos Aires: Grupo Editor Latinoamericano, 1984, p. 39.

^③ Juan Carlos Puig, *Doctrinas Internacionales y Autonomía Latinoamericana*, Caracas: Universidad Simón Bolívar, 1980, pp. 141 – 142.

束后形成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东方社会主义阵营将世界分割为两个不同的集团，相互之间存在着互不干涉的默契，导致两个集团之间“不可渗透”。这也决定了集团内部的相对稳定性，即一个集团的中心国家无法通过对另一集团的外围国家实施大规模的经济和军事援助来削弱集团内部的支配和依附关系，也就不可能推动外围国家从现有的集团中脱离出来。与此同时，集团内部的中心国家可以运用足够多的政策工具来保证对外围国家的支配和主导，一旦有个别外围国家有“异心”，中心国家还可以争取集团内大多数其他国家的声援来进行压制。^①然而，真正的变化却可能来自于内部。外围国家的精英集团在充分认清国际社会现实和本国自主决策潜在空间的前提下，通过渐进式自主化，借助高超的危机管理艺术，有可能最终实现与中心国家的战略性切割。

普伊格反对依附论给出的“令人沮丧的和虚无主义的答案”，不认为“依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引起的结构不对称的自然结果”。^②他指出，“拥有最高分配者的国际制度与各国人民渐进式自主化之间并非是不相容的”。^③在不采取革命的情况下，外围国家并非只有依附这条路可以选择。相反，外围国家通过实施自主外交政策，可以参与修改旧规则、制定新规则，为本国国家利益服务，甚至对中心国家形成一定制约，并最终摆脱依附地位。他将“自主”定义为，在现实世界的客观条件下，一国可以拥有的最大的自我决策能力。^④他认为，追求自主意味着“扩大自己的决策空间，这通常意味着减少其他人享有的决策空间。实现更大的自主权意味着预先发生战略性零和游戏，其中一个人赢得另一个人失去的东西”“无论好坏，对抗都是不可避免的”。^⑤

普伊格认为，外围国家在依附和自主之间拥有四种外交政策选项：类殖民性依附，即外围国家的统治阶层沦为国际体系的附庸；国家性依附，即外围国家的统治集团将依附视为国家发展的理性选择，将中心国家的利益纳入本国的国家计划，通过依附寻求在未来获得更大的自主空间；非正统性自主，即外围国家的统治集团制定不同于中心国家的国家计划，追求不同于中心国家的国家利益，但不挑战中心国家的核心战略利益；脱钩性自主，即外围国

^① Juan Carlos Puig, *Malvinas y Régimen Internacional*, Buenos Aires: Ediciones Depalma, 1983, pp. 57 - 59.

^{②③④⑤} Juan Carlos Puig, *América Latina: Políticas Exteriores Comparadas*, Buenos Aires: Grupo Editor Latinoamericano, 1984, p. 34, p. 60, p. 149, pp. 44 - 45.

家从中心国家主导的集团里脱离出来，挑战其全球权力。^① 这代表了外围国家从殖民地似的原始历史依附到最终实现最大程度自我决策的不同形态。但这些形态之间的逻辑并不是单向线性发展的，而是会根据特定的国际环境发生变化，或前进或后退。

在类殖民性依附模型中，外围国家虽然享有主权，但在参与国际政治经济活动时与殖民地并无二致，其政府充其量只不过是中心国家权力结构下的附属品，完全听命于中心国家的最高分配者。受制于来自外部的政治统治，这些国家经济完全丧失自主权，以中心国家的利益为导向，大力发展资源开采活动，向中心国家提供其工业发展所需的初级产品和原材料，且绝大部分利润被转移到国外，而不是再投资并促进本土经济发展。与此同时，本国市场成为外国工业制成品的倾销市场，令本土手工业和制造业生存艰难、濒临崩溃。在中心国家的默许下，这些国家的少数群体享有超高特权，维持着与现代经济不相容的统治形式。1821年独立后很长一段时间仍处于政治经济“半殖民”状态的秘鲁属于这一类型。

在国家性依附模型中，外围国家的决策者部分行使国内最高分配者的职责，制度化的国家决策系统虽独立于外部干涉，但却受到外部影响力的高度制约。统治集团接受依附状态，并试图从对外依附中获取最大的国家利益，争取未来取得更大自主权。他们将依附“合理化”，根据依附情况制定本国的发展目标和国家政策，谋求依附双方利益的一致性，同时为国际体系中的高级分配者划定不可逾越的“底线”。一旦触碰底线，外围国家将会做出反应，甚至是激烈反抗。比如19世纪的阿根廷，在面对欧洲列强向拉美国家强加治外法权、运用武力讨债等触碰底线的行为时，阿根廷表现出典型的国家性依附特点，相继提出卡尔沃主义和德拉戈主义，得到了拉美各国的支持，阻止了欧洲列强以外交保护为名、行干涉他国内政之实以及用武力向他国索取契约债务的行为，维护了本国和其他拉美国家的正当权益。

在非正统性自主模型中，外围国家在接受中心国家领导的前提下，其决策者较为充分地行使国内最高分配者的职责，在涉及本国发展模式、对外交往战略等国家决策层面享有较高自主权，不接受中心国家机械地、教条地将以自身利益为根本出发点的政治和战略考量强加在他们身上。同时，可以最

^① Juan Carlos Puig, *Doctrinas Internacionales y Autonomía Latinoamericana*, Caracas: Universidad Simón Bolívar, 1980, pp. 149 - 154.

大限度地利用中心国家的弱点和错误，来拓展本国的国际回旋空间。而中心国家也允许外围国家自主制定本国的几乎所有政策，并在一些涉及非核心利益的一般性议题中存有分歧。但对于中心国家的核心诉求，外围国家必须做出积极回应，否则，中心国家会动用包括武力在内的所有力量来迫使外围国家就范。实施非正统性自主外交政策，有时如同“在刀锋上行走”，尤其需要准确判断中心国家的一般利益在特定条件下“升级”为核心利益的临界状态，并及时调整，与其保持一致，以维护中心国家在集团内部的领导地位。19世纪绝大多数时间都在追随英国的美国是这一模型的突出代表。

在脱钩性自主模型中，外围国家决定切断与中心国家的关系，从既有的集团内部脱离出来，完全独立自主，国内最高分配者也不必再顾及中心国家的战略利益。19世纪末的美国就成功实施了脱钩性自主外交政策。当时的美国决策者决定在全球范围内明确挑战英国至高无上的地位，其结果是两国达成了“19世纪的雅尔塔协议”，英国承认美国在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政治主导地位，而美国则承诺不干涉英国在南美洲的利益。然而，实施这一外交政策的风险系数较高，不仅会穷尽国家资源，还可能导致完全有违预期的结果。因为一旦国家缺乏在国际体系中足够的生存能力，极有可能还会回到以前的依附状态。比如，古巴在脱离以美国为主导的集团后，并没有实现完全自主，而是加入到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国家性依附和非正统性自主间摇摆。

对于外围国家从依附到自主的“进阶”条件，普伊格特别强调国内精英集团奉行自主战略的决心和在集团内部建立反对中心国家的联盟。他认同雅瓜里贝有关“国内可行性”和“国际宽容度”的表述，认为外围国家具备“国内可行性”是实现自主的重要内因。在“国内可行性”的构成方面，他指出，除了拥有足够的物资基础外，存在坚决走自主化道路的功能性精英集团（*élites funcionales*）也是必不可少的要素之一。这是因为，“依附性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为决定的，而不是物质决定的”。^①精英集团所采取的行为至关重要，如果他们以功能失调的方式行事，不服务于本国国家利益，那么，他们将成为中心国家主导部门的权力“传送带”，促进和巩固依附现象，但如果发挥积极的功能性作用，也可以推动实现依附的最小化，逐步达到自主。而在外

^① Juan Carlos Puig, *Doctrinas Internacionales y Autonomía Latinoamericana*, Caracas: Universidad Simón Bolívar, 1980, p. 148.

因上，他主张外围国家要走出孤立状态，与集团内的其他外围国家结成联盟，汇聚成共同的权力性资源，以反抗中心国家的统治。但他同时也指出，一体化本身并不是自主导向的，而是工具性的，即推动一体化进程并不必然导致自主的发生。只有将一体化的目标设定为是实现自主，只有成员国通过一体化进程完成国内国际战略的协同发展，实现自主的条件才有可能得到加强和完善。^①

普伊格认为，拉美国家的自主，比如庇隆主义的“第三条道路”，属于非正统性自主，主要是在两极格局中美国影响力下降的背景下发生的。非正统性自主的一个典型特点是，依附国家虽然接受中心国家的战略性领导并维护中心国家的核心利益，但至少可在三个重大问题上公开与中心国家公开“唱反调”：第一，自主确定本国发展模式，而不必过多考虑中心国家的需求；第二，自主发展不具有国际战略性的对外关系；第三，区别对待中心国家作为单独国家的国家利益和作为帝国系统领导者的国家利益。^② 基于第三点，普伊格认为外围国家在系统内部可以通过联合自强，以集体的方式对抗中心国家向其强加的仅符合自身利益而不符合系统利益的目标。于是，他提出了“休戚相关的一体化”（*integración solidaria*）的概念，主张超越以往仅仅从贸易和经济角度考虑一体化功能的做法，加入更多政治和文化等内容，建立“包括自主在内的地区共享的价值观”，^③ 从而实现整个地区的逐步自主。此外，一体化不应局限在谋求自主的功能性精英集团上，而应该着眼于民间社会，从国家的宏观层面到个人的微观层面都达成对“民族区域”而非“民族国家”的共同认知，推动具有自主意愿的区内国家开展涵盖广泛的多领域战略合作，摒弃只考虑经济收益的模式，结成休戚相关的利益共同体，以集体的方式寻找更大的国际活动空间，进而调整与中心国家之间的不对称关系。

四 对早期自主理论的评价

尽管雅瓜里贝和普伊格的观点并非完全一致，但仍有很多共通点，都是

^① Juan Carlos Puig, *Doctrinas Internacionales y Autonomía Latinoamericana*, Caracas: Universidad Simón Bolívar, 1980, pp. 154 - 155.

^② Juan Carlos Puig, *América Latina: Políticas Exteriores Comparadas*, Buenos Aires: Grupo Editor Latinoamericano, 1984, p. 78.

^③ Juan Carlos Puig, “Integración y Autonomía de América Latina en las Postrimerías del Siglo XX”, en *Integración Latinoamericana*, Vol. 11, No. 109, 1986, pp. 59 - 60.

在借鉴拉美发展主义和依附论核心观点的基础上，以更符合外围国家现实需要的“自主”概念替代经典现实主义的“权力”概念，作为捍卫国家主权和发展、约束跨国行为者行为、增强国际谈判能力、与国际体系中更为强大的行为体博弈并维护自身利益的工具。

在蒂克纳（Arlene B. Tickner）看来，拉美发展主义和依附论对拉美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重要贡献在于解释了在全球分工和资本主义运作机制由外向内的作用下，外围国家的发展潜能是如何被压制、国家主权是如何被否定的。而继承了拉美发展主义和依附论“中心—外围”结构分析方法的自主理论，其中心任务是界定政治自主和经济自主在对内、对外两个维度上的潜能，并设计出行之有效地、最大化地激发这些潜能的战略。^①

布里塞尼奥—鲁伊斯和西蒙诺夫则认为，拉美虽然是发达地区国际关系理论的被动接受者，但仍基于其外围视角发展出了一些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本土理论。其中，拉美发展主义和依附论最为突出。而以普伊格和雅瓜里贝为代表人物的自主理论，尽管其影响程度较低，但“仍可称得上是拉美对国际关系学的第三大理论贡献”。^②科拉克莱（Miryam Colacrai）也认为，自主理论为弱小国家寻找减少脆弱性方案的努力，超越了具有虚无主义色彩的依附论，也超越了现实主义对弱国自主行动能力所持的悲观结论。^③

第一，突破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既定框架，围绕拉美国家的核心关切——自主来构建理论。在现实主义的语境中，权力界定利益。权力斗争在个人层面和国家层面的作用机制是一致的，都是为了控制对方，使对方屈服。通过外交政策实现国家利益的过程，就是保持、扩大和展现权力的过程。与权力相比，自主从来不是中心国家需要关心的问题。作为国际体系的塑造者和国际制度的制定者，中心国家拥有足够大的操作空间，可以在有利的国际体系和国际制度环境下自主开展对外行动，最大限度地追求本国的国家利益。沃尔兹（Kenneth Waltz）指出，“权力是面对外部力量仍保持自主的能力”。^④

^① Arlene B. Tickner, “Latin American IR and the Primacy of lo Práctico”,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10, No. 4, 2008, p. 741.

^② José Briceño Ruiz y Alejandro Simonoff, “La Escuela de la Autonomía, América Latina y la Teoría de las Relaciones Internacionales”, en *Estudios Internacionales (Santiago)*, Vol. 49, No. 186, 2017, p. 41.

^③ Miryam Colacrai, “Pensar la Política Exterior desde una Lectura Renovada de la Autonomía”, en Alfredo Bruno Bologna, *La Política Exterior del Gobierno de Kirchner: Tomo IV Volumen 1*, Rosario: UNR Editora, 2006, p. 16.

^④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ueva York: Random House, 1979, p. 96.

换言之，自主是相伴权力而生的，由具备巨大权力属性的行为体来行使。中心国家因为拥有巨大权力，几乎享有完全自主，而外围国家的自主则是先天不足的，甚至是缺失的。

对于权力概念在分析国际行为体互动方面的重要作用，雅瓜里贝和普伊格都不否认，但同时也提出权力并不能涵盖所有内容，尤其是被中心国家所忽视的自主问题。自主理论认为，不同于中心国家在国际权力争斗中产生的战争与和平问题，居于外围的发展中国家更关心的是经济社会的欠发达问题和不公正的国际秩序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是自主。这是因为，在与国际体系的互动中，自主程度的高低直接决定了外围国家能否有效抵挡来自中心国家和跨国行为体的制约和影响，以及国内精英集团能否自由地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不同领域做出符合国家利益的重大决策。自主理论转换视角，将外围国家视为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主体”而非“客体”^①，提出了以自主作为替代方案来提高国际回旋空间、减少或终结依附现象的一系列主张，符合外围国家的核心关切和利益诉求。其思想原创性是发展中国家对国际关系学科的重要贡献，为思考外交政策和国际政治提供了不同于已有的国际关系主流派别的视角。^②

第二，批判性地吸收拉美发展主义和依附论的核心观点，理性分析依附的内外成因。自主理论继承了拉美发展主义有关“中心—外围”结构的论断，进一步提出国际体系存在等级制度。雅瓜里贝根据自主程度的差异，将国际体系分为全面支配性、地区支配性、自主型和依附型四类国家。普伊格则将国际社会“原子化”，突出被主权国家的表象所掩盖的国际权力的不平等，并根据命令—实施—接受的传导过程，分为最高分配者、低级分配者和接受者三类群体。虽然对等级的具体表述不同，但传达了一个相同信息，即极少数拥有核武器这一独有的、排他性物质条件的国家居于国际体系的中心地位，通过制定国际规则，对外围国家实行不同程度的控制。然而，对于拉美发展主义仅从经济角度探寻欠发展原因、通过进口替代工业化和地区一体化来改

^① Miryam Colacrai, “Los Aportes de la Teoría de la Autonomía, Genuina Contribución Sudamericana. ¿ La Autonomía es Hoy una Categoría en Desuso o se Enfrenta al Desafío de una Renovación en un Contexto Interdependiente y más Complejo?”, en Gladys Lechini de Alvarez et al. (eds.), *Argentina e Brasil. Vencendo os Preconceitos. As Varias Arestas de uma Concepcao Estratégica*, Rio de Janeiro: Editora Revan, 2009, p. 35.

^② José Briceño Ruiz y Alejandro Simonoff, “La Escuela de la Autonomía, América Latina y la Teoría de las Relaciones Internacionales”, en *Estudios Internacionales (Santiago)*, Vol. 49. No. 186, 2017, p. 43.

变外围国家贸易条件恶化的主张，普伊格认为存在方向性错误，因为“没有对不公正的根源，即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提出质疑”。^①

对于依附论强调除了经济依附以外还存在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多领域依附的判断，自主理论表示认同，但明确反对依附论将外因扩大化。雅瓜里贝认为，拉美国家长期处于依附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内精英充当了中心国家统治的“传送带”，有意或无意地压制了社会变革和技术创新，导致自主能力的匮乏和缺失。“外围国家的依附与其说是中心国家强加的，不如说是国内精英为换取阶级好处的一种选择”。^②普伊格则强调，必须了解清楚国际制度的结构和运作是如何制约外围国家的，而不是简单地归咎于外部因素。^③他赞同“依附论将问题推给外部而不自省是逃避现实”^④的说法，并指出内部因素的影响也至关重要，尤其是国内的功能性精英，既可以推动和巩固依附，也可以争取依附最小化。因此，他认为，依附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行为层面的，而不是物质层面的。换言之，自主理论相信，国内精英的意愿、决心和信念对一个国家的自主程度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第三，为外围国家指明出路，提倡建立共享价值观的全面地区一体化。针对外围国家的出路问题，自主理论提出，在依附和革命的选项之外，外围国家还有第三条道路——自主。这是因为，中心国家的统治与外围国家的自主之间并非是不可兼容的，相反，依附国家可以在满足国内一系列必备条件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利用国际体系提供的回旋空间，制定和实施符合自身利益的战略目标。其中，作为实现自主的主要路径，地区性的经济联合和政策协调必不可少。自主理论主张将自主与一体化联合起来，认为在资本主义体系中，面对来自中心国家的统治，外围国家只有通过与志同道合的国家一起实施共同的一体化战略，才有可能从整体上加强成员国的“国内可行性”和“国际宽容度”，促进内生性发展，提高在国际层面的议价能力。

对此，雅瓜里贝提出“发展和一体化的自主模式”的概念，提倡建立

① Juan Carlos Puig, *América Latina: Políticas Exteriores Comparadas*, Buenos Aires: Grupo Editor Latinoamericano, 1984, p. 15.

② Hélio Jaguaribe, “Autonomía Periférica y Hegemonía Céntrica”, en *Estudios Internacionales*, Vol. 12 No. 46, 1979, p. 94.

③ Juan Carlos Puig, *América Latina: Políticas Exteriores Comparadas*, Buenos Aires: Grupo Editor Latinoamericano, 1984, p. 43.

④ José Luis de Imaz, “¿Adiós a la Teoría de la Dependencia? Una Perspectiva desde la Argentina”, en *Estudios Internacionales*, Vol. 7, No. 28, 1974, p. 50.

“同心圆”式一体化，以阿根廷—巴西联盟为基础，开放地、渐进地吸收本地区更多国家参与一体化进程，帮助成员国以最佳方式融入国际新秩序，为成员国的自主发展提供保障。普伊格则对唯经济论的一体化模式提出质疑，建议用“休戚相关的一体化”来代替“相互依存的一体化”，在以经济和贸易为主要内容的传统一体化议程中加入更多政治和文化等内容，建立地区共享的价值观，包括对自主的共同认知。他特别强调一体化的工具属性，认为一体化本身并不能保证成员国实现自主，前提是所有成员国都要将一体化的目标设定为实现自主。自主理论将一体化作为实现自主的工具，并不是刻意贬低一体化，而是将其置于实现自主的中心位置。^①

从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初期，雅瓜里贝和普伊格的自主理论曾有过短暂辉煌，但之后随着拉美国家普遍陷入债务危机、地区一体化努力受挫，自主理论开始陷入沉寂。借助推销新自由主义药方，美国扭转了冷战中期在拉美地区重要性有所下降的趋势，开始“强势回归”，对拉美事务的干涉也不断增多。在新自由主义以及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冲击下，政府作用被削弱，市场力量抬头，促使拉美国家纷纷转向低姿态的对外战略，强调自主显得有些不合时宜。

尤其是冷战结束导致国际格局发生根本性转变，使得形成于东西冲突和南北冲突共生时代的自主理论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一方面，柏林墙的倒塌和苏联的解体宣告了东西冲突的终结，另一方面，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崛起也改变了南北冲突的固有形态。这让自主理论的解释力遭遇了危机。有批评认为，自主理论被用来强化国家机器，是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并最终会伤害到普通民众的实际利益。此外，实施自主外交政策的拉美国家也会因与美国对抗而遭“秋后算账”，给国家实力造成负面影响。^②

埃斯库德（Carlos Escudé）在梳理1889—1989年这100年间的阿根廷外交政策时发现，从反对美国“门罗主义”，到两次世界大战中保持中立，再到冷战时期奉行“第三立场”、加入了不结盟运动、拒绝签署核不扩散条约、冒险发展中程弹道导弹“秃鹰II号”计划等，阿根廷对美国一贯采取对抗态度，

^① Alejandro Simonoff y María Elena Lorenzini, “Autonomía e Integración en las Teorías del Sur: Desentrañando el Pensamiento de Hélio Jaguaribe y Juan Carlos Puig”, en *Iberoamericana – Nordic Journal of Latin American and Caribbean Studies*, Vol. 48 No. 1, 2019, p. 104.

^② Arlene B. Tickner, “Latin American IR and the Primacy of lo Práctico”,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10, No. 4, 2008, p. 743.

但由于力量对比悬殊，美国一有机会就对阿根廷进行经济、政治等多方位打压，损害阿根廷的国家利益。与此相反，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的历史经验以及德国、日本、意大利等国在二战后的复苏表现，足以说明与霸权国家保持战略协同、避免对抗的重要性。

基于以上这些判断，埃斯库德提出“外围现实主义”，提倡对自主进行再定义。在他看来，自主不再意味着行动自由，因为“几乎所有中等国家都拥有巨大的行动自由，甚至可以达到自我毁灭的程度”。他在有关自主的辩论中引入了成本概念，提出以实现行动自由的相对成本来定义和衡量自主，采用审慎态度、战略视角以及功利主义的成本—收益计算来决定自主实践的广度和内涵。同时，“有必要区分自主本身和自主的使用。当使用自主是为了巩固国家的权力和（或）福利基础，可以视为是自主的投资，而如果仅仅是为了证明本国不受任何其他国家监护，则是自主的消耗”。^①此外，他反对为了所谓的“荣誉”“尊严”“骄傲”等象征性目标去实施对抗性自主外交政策，认为这只是满足了精英集团的虚荣心，最后承担成本的还是下层民众。他认为，自主必须从消除外部政治对抗开始，不能被浪费在具有挑战性或象征性的态度上，而必须通过提高国家权力属性和改善人民物质基础的决策和行动来维持，并在有可能的情况下加以强化。

埃斯库德力主外围国家的对外政策保持尽可能低的姿态，使其政治目标与所在地区占主导地位的超级大国的政治目标相匹配，并在有可能的情况下，谋求与中心国家结盟，建立良好的“宏观关系”，为外围国家的国际交换、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为民众争取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而在地区一体化议题上，外围现实主义与普伊格提出的“休戚相关的一体化”划清界限，不再将增强地区自主能力设定为是一体化的目标，而希望在接受现行国际秩序的前提下，通过地区一体化来最大化地激发外围国家融入全球化进程的潜能。

针对埃斯库德“唱衰”自主理论的做法，一些拉美学者表达了异议。如托卡特里安（Juan Gabriel Tokatlian）和卡瓦哈尔（Leonardo Carvajal）认为仅仅从物质利益来定义外交政策、确定政策目标是非常片面的。^②在以结构不对

^① Carlos Escudé, “La Política Exterior de Menem y su Sustento Teórico Implícito”, en *América Latina Internacional*, Vol. 8, No. 27, 1991, pp. 396 – 397.

^② Juan Gabriel Tokatlian y Leonardo Carvajal H, “Autonomía y Política Exterior: un Debate Abierto, un Futuro Incierto”, en *Revista CIDOB d’afers Internacionals*, No. 28, 1995, p. 22.

称为主要特征的国际体系中，争取自决和主权的斗争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也是外围国家生存的必要条件。“自主”本身不是“消费品”，而是为增强外围国家的行动能力、以务实方式融入世界体系服务。西蒙诺夫也认为，虽然东西冲突已经终结，但自主理论并没有因此丧失它的解释力。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南北对抗不但没有消失，反而得到增强，甚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特别是中心国家加大了对国际组织的控制，并继续保持对外围国家的绝对科技优势，从而进一步强化了统治—依附关系。^①

进入 21 世纪初，随着美国霸权受到新的挑战并威胁到已有的均势结构，加之一些拉美国家重拾自主战略中的政治协调功能，自主理论迎来了新的发展。^② 不同学者先后提出了“关联性自主”、“疏离性自主”和“参与性自主”、“孤立性自主”和“融入式自主”、“多元化自主”及“区域性自主”等。这些新的理论范式在延承雅瓜里贝和普伊格主要理论观点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了补充和扩展，在分析框架上表现出与时代特征相符的异质性，代表了研究自主问题的新视角，同时也反映出自主理论具有超越特定历史时期的解释力。

(责任编辑 黄念)

^① Alejandro Simonoff, “La Vigencia del Pensamiento Autonomico de Juan Carlos Puig”, en *Ciclos en la Historia, la Economía y la Sociedad*, Vol. 22, No. 42/43, 2014, p. 191.

^② Carla Morasso, “La Orientación Autonomista de la Política Exterior Argentina”, en *Cuadernos de Política Exterior Argentina (Nueva Época)*, No. 123, 2016, p. 5.

国际关系

西方自由国际主义思想传统的源流、 逻辑及困境

付文广

内容提要：作为主流的西方思想传统，自由国际主义历来是影响和塑造现代国际秩序的重要意识形态因素。纵览历史，自由国际主义思想传统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在启蒙时代，以格老秀斯、克略西和康德等为代表的思想家系统地提出了“国际法治和平”“商业贸易和平”及“共和主义和平”命题，自由国际主义思想的理论框架初步形成；19世纪，随着自由主义思想与英国霸权结合，由此催生了国际政治领域的古典自由国际主义；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以两次海牙国际和平会议召开特别是对“一战”爆发的反思为契机，古典（道德）自由国际主义加快向现代（制度）自由国际主义转变，西方自由国际主义思想的基本格局趋于定型。自由国际主义思想传统蕴含理性、合作、集体安全与多边主义等合理要素，其在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制度化和维持国际体系的开放性方面具有进步意义；同时，在关于主权与人权价值的权衡，美西方中心主义与普适性多边主义缠结，国际关系中普世主义、理性主义、和平诉求及精英取向与民族主义、帝国主义、战争冲突及大众政治因素的调和方面也存在难以化解的悖论性困境。

关键词：自由国际主义 国际安全 多边主义 意识形态
道德 制度

作者简介：付文广，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D0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649 (2022) 04-0022-25

作为一种具有自身思想价值、实践意涵和发展谱系的主流国际关系思想传统，由于顺应、契合乃至引领了近代以来国际关系理性化、组织化和制度化进程，并为国际政治演化赋予目的感和方向感，西方学术语境中的“国际主义”及作为其主流形态的“自由国际主义”不仅与主权—民族国家体系本身一样古老，而且对近现代世界政治和国际秩序的演变进程打上了深刻的思想烙印。^① 鉴于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自由主义国家在近现代国际体系中占据核心和优势地位，自由国际主义的思想传统不可避免地成为现代政治生活中一股强大的意识形态力量；在这样的意义上，梳理和辨析其历史渊源、发展脉络与现实影响，也就等同于触及世界历史和国际政治进程的核心。^②

尽管“自由国际主义”在西方学术语境中已成为被广泛使用的概念术语，遗憾的是迄今并不存在学界公认的权威定义。这是由于，自由国际主义既可被视为（作为政治经济哲学的）“自由主义”的一个专门部分，也可被看作是（作为外交思想的）“国际主义”的一个特殊分支；此外，学者们在使用“自由国际主义”与“国际主义”等概念时并无严格区分，而后者更难界定。^③ 在宽泛的意义上，“国际主义”可被理解为以超越单一主权国家政治方式处理对外关系的一种理念型态；换言之，其与严格的“国家理由”（*raison d'état*）逻辑是互不相容的。作为一种源远流长的国际关系思想传统，“国际主义”自身又包含“保守国际主义”“自由国际主义”与“社会国际主

① 本文中，除非有所特指，所谓“国际主义”即指“自由国际主义”并可互换使用。

② 本质上，由于自由国际主义捕捉到国内和国际领域之间的紧张关系，并提供了将二者置于同一背景之下的思维框架，因而构成了一种超越现实主义逻辑的可能解决方案：其假定国际政治中存在的无政府状态、权力竞争、不安全感可以通过在国际领域植入一套国家间的制度安排来缓解。参见 Theodore Christov, “Liberal Internationalism Revisited: Grotius, Vattel, and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of States”, in *The European Legacy*, Vol. 10, No. 6, 2005, pp. 561–562; [美]亨利·基辛格著，胡利平等译：《世界秩序》，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年，第16–18页。尽管如此，“自由国际主义”概念进入学界视野却是相对晚近的事。一般认为，国外特别是美国学界对自由国际主义秩序及其思想体系的系统性研究浪潮大致发端于20世纪90年代“冷战”终结之后，当时学者们发展了“自由国际主义”概念，以描述一种强调国际制度和网络而不是主要主权国家作用的对外关系方法。参见 David Petrucci, “The Crisis of Liberal Internationalism: The Legacies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 Reconsidered”, in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Vol. 31, No. 1, March 2020, p. 113.

③ 有人认为，“国际主义”概念总是充满争议，任何试图穷尽其意义范围和广度的主张都是一项艰巨的智力任务。参见 Theodore Christov, “Liberal Internationalism Revisited: Grotius, Vattel, and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of States”, in *The European Legacy*, Vol. 10, No. 6, 2005, p. 562.

义”等次属类型。^①因此,在这样的意义上“自由国际主义”可视为“国际主义”的下级概念。但是,“自由国际主义”也可视作“自由主义”的一个专门部分,系由自由主义原则集合中具有国际向度或对国际事务产生影响的若干政治概念组成。^②更进一步,设若“国际主义”可视作国际关系学中为数不多的联结分析性与规范性范畴的“大理论”,“自由国际主义”也可从分析性和规范性向度进行交叉透视:分析性向度系指国家通过制度化多边合作方式实施对外关系议程的一种理念型态;规范性向度植根于欧洲启蒙运动提出的个人自然权利学说,核心是由共同价值观、共同利益和制度纽带维系并具有某种自由开明(liberal)取向之国际社会的“理想”化抱负。^③

一 自由国际主义的历史渊源、演化脉络与生成逻辑

历史上,作为自由主义在国际关系领域的延伸和运用,自由国际主义思想传统通过因应不同的历史条件,呈现出高度适应性并发育出多样化的内涵。不过,也应当看到,尽管自由国际主义的具体内涵从来都是丰富多元与因时而异的,其作为一种具有独特话语特征的主流国际关系思想传统总是具有一脉相承的精神本质。

(一) 早期渊源:思想准备

在西方精神史上,追求“人类大同”理想和建立国家联邦维护和平的朴素国际主义思想可追溯到古希腊和罗马时期。例如,古希腊斯多葛派哲学家提出:“人是理性的动物,并具有作为‘世界之邦’公民的普世主义权利”;还从人的理性与自然法角度探究“人的权利”“平等”以及“世界公民”等概念,并就如何构建统一的“人类共同体”命题展开了讨论。中世纪,由于基督教神学占据统治地位,因此建立一个包容全人类的“基督教共和国”以

^① Carsten Holbraad, *Internationalism and Nationalism in European Political Thought*,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pp. 13-37; Tim Dunne and Matt McDonald, “The Politics of Liberal Internationalism”,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50, No. 1, 2013, p. 7.

^② Leonie Holthaus, “L. T. Hobhouse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Liberal Internationalism”, i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40, No. 4, 2014, p. 707.

^③ Fred Halliday, “Three Concepts of Internationalism”,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64, No. 2, 1988.

维系世界和平的观念同样强劲有力。^① 文艺复兴时代以降，对国家间“和平联盟”计划的支持逐渐增加，但这种想法在当时更多地被视为乌托邦或怀旧情结而遭到排斥。^② 总之，受时代与物质条件限制，这些零星的早期探讨大多停留在哲学家的思辨和玄想阶段，没有也不可能形成现代意义上的“国际主义”思想体系。

自中世纪后期开始，欧洲的社会思想领域出现了一些值得重视的动向。一方面，伴随中世纪大一统神权政治解体的是欧洲世俗王权的崛起，并连带催生了各民族意识的觉醒，以马基雅维利和让·博丹等为代表的思想家超越了中世纪统治者对国家的想象，促进了国家作为一个合法实体和一种非个人化“公共事物”（*res publica*）的认知——国家最能代表作为“主权者”而统一的政府和人民的领土联盟，并致力在“国家间框架”内实现其目标；由此，国家的具体利益超越了自然法和神授法的普遍概念，成为行动的标准和指南。^③ 另一方面，一些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强调从人的理性自然法则中探寻国家间秩序的构建，现代自由国际主义的思想传统由此迎来了真正的萌芽时期。^④

一般认为，现代自由国际主义思潮的起源可以从中世纪后期基督教世界的解体、欧洲商人和新兴资产阶级追求世俗利益空间的开放中找到。最初，这样一种共同话语在欧洲的法哲学家撰写的“国法”（*Law of Nations*）文本中找到了表达方式。他们认为，个人可以通过贸易、发现和获得法律所有权等世俗途径追求自己的理性利益，进而促进和平与和谐。在 17 世纪欧洲持久而残酷的宗教圣战（“30 年战争”）背景下，那个时代建构欧洲新体系规则和制度的任务是规范合作与竞争模式，以便新兴的主权国家能够独立于外部政治

① Thomas L. Pangle and Peter J. Ahrensdorf, *Justice Among Nations: On the Moral Basis of Power and Pea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1999, pp. 55–72; Masters Roger D., “The Lockean Tradition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January 1967, p. 254.

② A. Mansfield, “Émeric Crucé’s ‘Nouveau Cynée’ (1623), Universal Peace and Free Trade”, in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of Ideas*, Vol. 2, No. 4, 2013, p. 2.

③ A. Mansfield, “Émeric Crucé’s ‘Nouveau Cynée’ (1623), Universal Peace and Free Trade”, in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of Ideas*, Vol. 2, No. 4, 2013, p. 3; [加] 考克斯著，林华译：《生产、权力和世界秩序：社会力量在缔造历史中的作用》，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 年，第 77 页。

④ 近代早期，文明世界作为相互联系整体的观念已被欧洲智识界直接或隐约地加以讨论。16 世纪西班牙新经院神学家苏亚雷斯认为，尽管每个国家均是独立完整的政治单元，但它们都需要别国提供物质上的扶助与道义上的友爱，因此国家仅仅是“具有准政治和道德属性的普世性社会”一分子，正是它构成国际法赖以成立的基础。参见 Martin Wight, *International Theory: The Three Traditions*, New York: Holmes & Meier, 1992, p. 39.

权威（罗马天主教会和哈布斯堡帝国）进行组织。^① 尽管有这些思想上的准备，但是，只有当欧洲工业革命发生以及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形成等社会条件具备之后，自由国际主义的核心命题才由启蒙哲学家系统地提出。

（二）启蒙时代：辉煌创生

启蒙运动大致起源于17世纪80年代的英国，兴盛于18世纪的法国，核心主题是高扬人的理性。这一时期国际政治领域的总体特征是：其一，《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的现代主权国家体系标志着中世纪统治欧洲的罗马帝国和教皇制全面衰落，而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和新航路的开辟、早期殖民掠夺的进行以及跨大西洋贸易迅速发展，世界市场的雏形已见端倪^②；其二，作为历史发展的自然结果，出现了一个触角和利益跨越国界并以“全民利益代表”自居的中产阶级（bourgeoisie）——“由于中产阶级意识到自己是一个世界性的阶级，从一开始其自由主义政治蓝图就涵盖了整个世界。”^③

启蒙时代是以牛顿经典力学为代表的近代自然科学取得巨大成就的时期。启蒙运动的特点是极大地相信人类有能力理解世界，把握其规律和基本原理，预测其未来，以及为了人类的利益而操控其力量。^④ 正是看到了理性的力量和人的无限潜力，启蒙思想家大都乐观地相信：“理性”可以使人们认识到国家长远利益的实现无须凭借武力威胁和战争，而是依靠国际合作；倘若人类学会运用自己的理智，以“和平”“进步”为标志的、理性和科学的国际秩序就会到来。此外，即便约翰·洛克和格老秀斯等思想家承认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但他们并不把它看作是霍布斯笔下那种绝望恐怖的战争状态，而是相信理性可以导致契约和法律的创制，进而建立一个具有规则和秩序的国际社会。

^① Micheline R. Ishay, *Internationalism and Its Betrayal*,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5, pp. 1-69; Tim Dunne and Matt McDonald, “The Politics of Liberal Internationalism”,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50, No. 1, 2013, p. 6.

^② 沈汉主编：《资本主义史：从世界体系形成到经济全球化》，上海：学林出版社，2008年，第25-26页。

^③ [美]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著，罗荣渠等译：《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466-477页；[奥] 路德维希·冯·米瑟斯著，韩光明等译：《自由与繁荣的国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35页。

^④ Jeremy Waldron,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of Liberalism”, in *The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Vol. 37, No. 147, April 1987, p. 134. 法国思想家卢梭是这种思想的主要代言人，他相信人类有能力充分理解社会现实，在运用理性把握社会结构以及自我本性基本规律的基础上，继而掌握自身和周围环境的命运。参见[挪] 克努成著，余万里译：《国际关系理论史导论》，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32页。

在国际主义的思想史上，启蒙时代是重要而辉煌的创生阶段。具体地说，这一时期特别是进入18世纪，随着主权国家地位已经非常巩固以及超越领土国家之上的国际公共领域开始出现，作为处于贵族和王权压制下新兴资本家中产阶级在理论上的代言人，一些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思想家开始把目光投向相对无序的国际关系，并试图为无政府的国家体系引入一定程度的秩序。^①正是在这样的条件和背景下，自由国际主义思想传统的生成和发展迎来了黄金时期，以格老秀斯、克略西和康德等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对人类事务中的战争与和平问题进行了富有深度的思考，并在理性主义基础上系统地提出了“国际法治和平”“商业贸易和平”以及“共和主义和平”理论命题。

1. 国际法治和平论。现代国际法之父、荷兰法哲学家格老秀斯是这一思想传统的集大成者，其学说以自然法为基础，而自然法被认为是普遍的，体现了正确的理性要求和正义，既约束个人也约束国家。^②一般认为，统领格老秀斯国际政治思想主线的是理性主义“二元论”：一方面，他承认17世纪的国际体系是以国家为主导的体系，国家之间的关系处于无政府状态；另一方面，他也认可国家的理性特征，并且认为国际法和国际规范可以帮助造就一个有序的国际社会。总体上，格老秀斯的学说是关于自然权利和战争的道德理论：承认人类普遍存在的社会性，其通过实证法可以适用于个人和国家^③；此外，它抓住了历史的“进步性”在于用独立国家共同体的社会性取代中世纪关于世界的统一性，并设想所有国家都在以契约和正义为基础的国际法范围内运作，其将在即便不保证和平的情况下规范战争。^④格老秀斯的历史贡献主要在道德和规范领域：“经由国际法治实现和平”的思想意味着在国际关系中可以基于权利而非武力解决国家间的纷争与冲突，这种通过法律实现和平

^① Alan Cassels, *Ideolog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Modern World*, Routledge, 1996, p. 13.

^② [美] 肯尼思·W·汤普森著，谢峰译：《国际思想之父：政治理论的遗产》，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84-87页。此外，格老秀斯也是西方思想界试图在先例和自然法基础上提出系统国际行为准则的第一人，参见 Alan Cassels, *Ideolog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Modern World*, Routledge, 1996, p. 10.

^③ A. Mansfield, “Émeric Crucé’s ‘Nouveau Cynée’ (1623), Universal Peace and Free Trade”, in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of Ideas*, Vol. 2, No. 4, 2013, p. 13.

^④ F. H. Hinsley, *Power and the Pursuit of Peace: Theory and Practice in the History of Relations between Stat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7, pp. 23-24.

的想法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正式提出。^①

2. 商业贸易和平论。同样在17世纪,随着时间推移,人们对经年累月的战争感到厌倦并越来越认识到和平对商业的潜在好处,由此催生了新的和平计划:以自由贸易为媒介,通过培育和巩固国家间的相互依存来抑制战争倾向。在这方面,法国思想家埃默里克·克略西不仅是第一个从自由主义角度思考国际关系的人,也是最早提倡两个国家间贸易相互依存导致和平的现代例子。^② 根据克略西和其他人的观点:自由贸易是人类进步的关键;重商主义和领土扩张在此过程中被摒弃,因为其构成对商业合作、人类进步与永久和平的阻碍。于是,经由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基于物质主义考量来实现国际合作,这就为解决那个时代的问题提供了一种超越宗教的先进而新颖的方法。^③ 质言之,商业贸易和平论的核心是:经济交往作为一种互动手段,不仅可以改变国家好战的行为倾向;还能创造相互依存与共同利益,其反过来又对国家间的和平状态进行“锁定”,最终实现和平之于繁荣的良性循环与正向激励。这标志着一个巨大的思想进步:在传统的经济观点中,土地是财富的基本来源,财富通过权力积累;而新的开明观点中,贸易促进了繁荣,鼓励了“礼貌和学习的兴起”,消除了“破坏性偏见”,产生了“文雅的习俗”。^④

3. 共和主义和平论。与同时代其他思想家相比,康德更深入地阐发了自由国际主义的理念,即各国在对世界主义权利的呼吁中形成一个“和平联盟”。^⑤ 这样一个理性形成联盟的目标不仅仅是结束战争或建立和平条约,也

^① Warren F. Kuehl, *Seeking World Order: the United States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to 1920*, Nashville: Vanderbilt University Press, 1969, p. 7.

^② 在1623年出版的《新西尼》一书中,克略西拒绝把对“无神论”或“异端”的传统神学关注作为立论起点,而是主张根除“非人道”,这是所有罪恶的根源。战争作为“非人道”的极端表现使他提倡一种新颖、积极的人类行动方式——由物质利益驱动的和平,这与依赖均势和条约的传统路径形成了对比。参见 A. Mansfield, “Émeric Crucé’s ‘Nouveau Cynée’ (1623), Universal Peace and Free Trade”, in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of Ideas*, Vol. 2, No. 4, 2013, pp. 9-15.

^③ A. Mansfield, “Émeric Crucé’s ‘Nouveau Cynée’ (1623), Universal Peace and Free Trade”, in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of Ideas*, Vol. 2, No. 4, 2013, pp. 10-22.

^④ Frank Ninkovich, *The Global Republic: America’s Inadvertent Rise to World Power*,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4, p. 20.

^⑤ 实际上,共和主义和平论在康德的时代成为十分普遍的理论主张。例如,孟德斯鸠宣称战争与政权类型相关,他写道:“君主制的精神是战争和扩张,共和制的精神是和平与节制。”英国人威廉·古德温则提出“当民主变得简单而牢不可破时,战争将越来越远离人民的习性”,并且当两个民主国家共享一条边界的时候,民主的和平特性就表现得十分明显。参见[挪]克努成著,余万里译:《国际关系理论史导论》,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26-127页。

是为了建立一个“国际国家”（*civitas gentium*）以消除未来战争的条件^①；而在共和制国家组成的和平联盟中，国家之所以不得不将自身利益置于国际法准则之下，根源在于其理性洞察力以及公民对于人类共同体的道德承诺。^②本质上，与专制政体相比，共和制国家具有天然的和平倾向。这是由于，在共和体制下，政府有效地代表人民，人民自身是立法或主权者，因而人民的利益与国家利益高度重合——“共和体制下如果要发动战争，那就必须征询全体公民的意见；最自然的情况是，他们在宣布开始一场灾难性的战争时，将会异常谨慎，因为贸然决定参加一场战争将不得不承担战争引发的所有后果”。^③然而，尽管共和制国家更倾向和平，但在当时毕竟是少数，这就提出一个问题：世界的永久和平如何可能？对此，他给出的论证是：首先，共和制国家在政府形式上实行代议民主制，政府管理过程实行分权制衡，且公民在法律上绝对平等，因此共和制国家之间更可能倾向于和平共处^④；其次，“如果一个强大开明的民族有幸能形成共和国（其天然倾向于追求永久和平）……这将为其他国家中的联盟团体树立一个典型。这些联盟将与前者联合起来，从而根据国际权利确保其中每个国家的自由，然后这个整体会通过一系列类似的结盟不断扩大”^⑤；最后，自然法则决定了人类最终会通过理性思考“逐渐走向一个权力联合体系，一个世界性的政治安全体系”和“一个完美的人类公民联盟”。^⑥

① Theodore Christov, “Liberal Internationalism Revisited: Grotius, Vattel, and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of States”, in *The European Legacy*, Vol. 10, No. 6, 2005, p. 562. 康德的国际主义思想复杂而精微，他承认霍布斯关于“自然状态”的描述是正确的，即那是一种每一个体均依靠自己的力量并且强者权利占优的“无法律状态”——本质上是一种战争状态，即便事实上并没有真正的战争和持续不断的实际攻击（敌对行动）；但又认为这种“所有人对所有人战争”的自然状态缺乏正当性，人与国家的道德责任是超越自然状态而进入由“权利”和“公共法律”界定的公民社会。参见 [美] 理查德·塔克著，罗炯等译：《战争与和平的权利：从格老秀斯到康德的政治思想与国际秩序》，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年，第248-251页。

② 李少军等著：《国际体系：理论解释、经验事实与战略启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88页。

③ Hans Reiss (ed.), *Kant's Political Writing*,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99-100.

④ Roland Paris, “Peacebuilding and the Limits of Liberal Internationalism”,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2, No. 2, Fall 1997, p. 59.

⑤ Hans Reiss (ed.), *Kant's Political Writing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104; [美] 理查德·塔克著，罗炯等译：《战争与和平的权利：从格老秀斯到康德的政治思想与国际秩序》，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年，第265页。

⑥ [美] 亨利·基辛格著，胡利平等译：《世界秩序》，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年，第25-26页。

在国际主义思想发展史上，启蒙哲学家的影响极为深远：一是给国际关系理论带来研究焦点的转移，从以往注重单个国家转向整个国际体系；二是从进化的角度研究历史和社会。^① 基于对人性、政治和历史的乐观预设，启蒙思想家对国际社会的结构和过程具有高度理想主义的观点。他们认为，虽然特定的对外政策可能在国家间激发矛盾和冲突，但从理性角度看，各国深层次的根本利益仍然是和谐的。

（三）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实践转向

影响这一时期国际思想演化的总体背景是：首先，随着启蒙世界观和大众政治的兴起等现代力量的逐渐侵蚀，以教会权威、君主政体和贵族统治为基础的旧制度结构秩序在一场最终导致美国独立、法国大革命以及拉美革命的过程中崩溃了；其次，19世纪早期以降，伴随一种将工业化、理性国家建设和进步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的新格局以及前所未有的全球现代性环境出现，某些具有实践品质及现实关怀的国际主义思想要素开始生成；再次，由于自由主义国家和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在时间上是一起出现的，因此，随着英国在国际体系中崛起并在世界经济中登上霸主地位，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开始酝酿并发育出早期雏形^②；最后，尤其启迪意义的是，18世纪开始的欧洲思想领域中出现了一种世俗的大同精神，其向传统的“势力均衡”概念提出了挑战——“势力均衡”依靠各国相互冲突的利益维持，而这种新的精神却设想建立一个由国家支持、受规则管理的、理性的世界秩序。^③

差不多同时，开工业革命风气之先的英国发展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并建构起以自由贸易、海外殖民地和（经由“欧洲协调”）操控欧洲（大陆）均势为三大支柱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不列颠治下的和平”（Pax Britannica）。而在其引领的“精神世界”革命中，一是受越来越成为社会思想主流的进化论和科学理性的影响，进步主义哲学在19世纪逐步获得了压倒性优势；二是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潮在英国得到了最充分发展，并取得了民族哲学和国家政策的地位；三是与欧洲殖民帝国在全球的扩张一致，自由主义也出现了向帝国转向的微妙趋势：支持暴力征服和专制统治非欧洲人的思想倾向偏离了自由主义前辈的观点，使得自由主义传统在历史的这一

^① [挪] 克努成著，余万里译：《国际关系理论史导论》，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47-148页。

^{②③} [加] 考克斯著，林华译：《生产、权力和世界秩序：社会力量在缔造历史中的作用》，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第85页，第81页。

时刻被卷入一种不平等和明显非人道的国际政治之中。^① 总之，通过与英国自由主义霸权更紧密结合，这一时期自由国际主义思想的基本面貌和精神实质与往昔相比已大不相同。

在实践层面，18世纪后期特别是19世纪上半叶西方国际主义思想发展的基本内容有：超越18世纪均势政治逻辑、体现“集体安全”原则雏形的“欧洲协调”机制开始生成并在大国外交实践中初露锋芒^②；具有“商业—经济国际主义”意涵的开放性自由贸易体制取代传统的排他性重商主义经济政策并逐渐占据优势地位；作为首要的自由主义国家，19世纪的英国开始推动金本位、海上航行自由等国际制度，这些设计与安排构成早期自由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③；作为国际主义思想的社会载体与推动力量，国际和平运动逐渐登上历史舞台，等等。

作为古典自由主义国际政治思想发展的顶峰和最为典型的体现，19世纪自由国际主义思想的基本特征是：其假定国际无政府状态的消极意义是有限的，国家间的交往纽带（包括各国的共同利益、共同价值观和共同规范）不仅可以确保国际关系的稳定，也确保了国际社会的和谐本质。此外，与古典

^① [美] 珍妮弗·皮茨著，金毅等译：《转向帝国：英法帝国主义自由主义的兴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页，第30页，第357页。

^② “欧洲协调”是“世界历史上史无前例的现象”。确实，1815年维也纳和会创立的“欧洲协调”与18世纪的势力均衡在精神实质和运作模式上均截然不同，通过一种新的法律—制度安排和道德原则的约束，在实质上超越了旧的欧洲均势政治的逻辑，因而构成了国际关系结构层面的“体系性变迁”。不仅如此，“欧洲协调”还可以“实质性地缓解安全困境”，从而为“无政府状态下的平衡提供了一种有吸引力的替代方法”。参见 Paul W. Schroeder, “The 19th – Century International System: Changes in the Structure”, in *World Politics*, Vol. 39, No. 1, October 1986, pp. 1 – 26; Charles A. Kupchan and Clifford A. Kupchan, “Concerts, Collective Security, and the Future of Europe”,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6, No. 1, Summer 1991, pp. 130 – 143; F. H. Hinsley, *Power and the Pursuit of Peace: Theory and Practice in the History of Relations between Stat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7, pp. 13 – 106; [英] 马佐尔著，胡晓姣等译：《谁将主宰世界：支配世界的思想和权力》，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年，第4页。此外，欧洲协调也是更成熟国际组织的先驱：“大国会议的机制是执行、立法和调解。它采取了行政行动，有时命令武装部队产生某些结果；它是立法的，因为它对国际法的一般问题发表了声明；有时是自己的成员或其他国家之间利益冲突的法官。在所有这些职能中，它都预示着成为国际联盟机制的一部分。”总之，“欧洲协调”事实上承担了对（欧洲）国家间关系进行全方位规制的职能。然而，其实际运转主要通过大国不定期召开会议的形式进行，但会议本身往往是对重大事件的被动反应而非提前预防，这表明它的组织化和会议外交的制度化程度严重不足，并且缺乏一以贯之的行动原则和明确的方向感。参见 David Kennedy, “The Move to Institutions”, in *Cardozo Law Review*, Vol. 8, 1987, p. 858; Lorimer James, *The Institutes of the Law of Nations: A Treatise of the Jural Relations of Separate Political Communities*, Edinburgh: William Blackwood and Sons, 1884, pp. 175 – 275.

^③ 达巍：《“自由国际秩序”的前路与中国的战略机遇期》，载《全球秩序》，2018年第1期，第93页。

自由主义思想所承载的时代特征相一致，19世纪自由国际主义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以自由放任主义为基本理念，并且特别强调这样一种倾向：受到最少干预或不被干预的世界本身就会走向秩序。^①

此外，在社会的深层思想倾向方面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变化。首先，18世纪那种静态的世界观（机械论的空间对称理念）被19世纪动态的世界观（有机的、存在于时间之中的进步秩序观）所取代。^②其次，19世纪开始兴起并蔚为大观的自由主义不再像早期共和主义那样吁求公共精神和美德，而是转向依靠机制作为获取自由和幸福的途径，这必然对未来国际秩序的演进方向产生深远影响。^③再次，国际主义思潮在这一时期经历了一次重要的“实践转向”：启蒙时代思想家的理论使命在于论证国家行为体之间利益的天然和谐，作为主体的人的任务仅仅是运用天赋理性去“发现”这种天然的和谐关系，而19世纪早期的国际主义思想家更注重通过主体意识的完善和提升去“实现”这种和谐。最后，在追求国际和平的具体途径和手段上，与启蒙思想家主要诉诸人类理性与共和主义等先验和静态的因素不同，19世纪的理论家更强调自由贸易、普遍裁军、国际仲裁及国际司法等现实的能动因素。^④

（四）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格局定型

在国际思想发展史上，这是古典“道德”自由国际主义向现代“制度”自由国际主义过渡和转型最具有决定意义的阶段，至此，自由国际主义作为一种国际关系思想传统的基本格局已大致定型。影响这一时期国际主义思想发展与转型的总体背景和基本轮廓是：以国际分工的完成、世界市场和世界

^① 沈秋欢著：《格莱斯顿自由主义国际政治思想及实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206-207页。

^② [挪]克努成著，余万里译：《国际关系理论史导论》，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48页。

^③ 刘慧：《共和自由主义》，载秦亚青主编：《理性与国际合作：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年，第114页。

^④ 边沁功利主义哲学的提出是这种思潮转型的重要标志：其不仅强调国家行为体之间天然的利益和谐关系，更强调通过高超的制度（立法）对国际行为体的行为进行控制和指导以增进这种和谐。边沁的卓越之处还在于首次从功利主义角度系统地提出了以国际组织和集体安全原则全面改造国际体系的理论构想。此外，大致从边沁的时代开始，西方特别是英国的自由国际主义思想逐渐摆脱以往那种形而上的理论思辨色彩，而是更多地强调积极介入和参与现实的国际政治生活。参见 F. H. Hinsley, *Power and the Pursuit of Peace: Theory and Practice in the History of Relations between Stat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7, p. 82; 沈秋欢著：《格莱斯顿自由主义国际政治思想及实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55-56页；[挪]克努成著，余万里译：《国际关系理论史导论》，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55-157页。

货币体系的出现以及殖民体系的建立为标志的世界政治经济体系基本形成^①；随着强调个体行动和信仰自由放任哲学的“旧”自由主义向着眼于集体行动和主张政府干预实现积极自由的“新”自由主义蜕变，相应地自由国际主义也从主张自由放任和不干预原则的古典“道德”国际主义向创建普遍性国际组织为核心的现代“制度”国际主义转变。^②

国际关系实践领域的变迁同样影响深远：从19世纪中期开始，受现代化进程特别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影响，国家间的联系与相互依存进一步增强，全球化的内生动力和强化机制加速形成，滥觞于17世纪的近代威斯特伐利亚“共存型国际体系”开始向现代“合作型国际体系”转变。^③这就创造了由一

① 潘忠歧著：《世界秩序：结构、机制与模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1页。

② “一战”爆发后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用最简洁的语言表达了这一思想：新的和平必须是“有组织的和平”，用当时年轻而有才华的作家沃尔特·李普曼的话来说就是以“控制”取代“随波逐流”。1917年，美国社会学家库利在《国际关系中的社会控制》一文中指出：“世界正成为一个更宏大和更高级的组织，它现在要求在国际领域中表现出来……”总之，和平必须人为“建立”，而不可能“自然地”实现。从西方思想发展的总体智识背景看，随着先前那种带有决定论意涵的古典理性主义哲学渐趋没落，强调主体意志及其能动性的（现代）后理性主义哲学取得优势地位；相应地，古典“道德”国际主义也加快向现代“制度”国际主义转变。古典的“道德”国际主义者对人性持相对乐观的看法，强调道德或理性等国际意识能成为向积极方向改造国际关系最关键的媒介或动力，这种意识本身即能保证国际关系的进步、秩序和连续性；在认识论层面，则依据形而上学的自然法传统，强调绝对伦理原则超越具体时空条件的普遍适用性。相反，现代“制度”国际主义思想对人性的看法相对中立和客观——在理性和制度约束下，人性的良善面能够得到培育和展现，与此同时，其对国际关系的进步不再单纯寄托在人类道德和理性的有机提升之上，而是更注重通过国际制度的构建引导和塑造国家行为；思想方法上，更强调凭藉“历史—社会”的情景分析视角，针对特定时空条件下的具体议题寻求治理之道。“一战”的爆发迫使国际主义者直面国际无政府状态的客观现实和人性本身的不可靠，从而加快了西方国际主义思想从以往主要关注“人性”和“道德”提升向侧重“制度”与“功能”领域转移的趋势，现代自由国际主义政治思想的基本理论特质由此得以确立。J. W. Burrow, *The Crisis of Reason: European Thought, 1848 - 1914*,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52 - 67; Ian Hacking, "Nineteenth Century Cracks in the Concept of Determinism", i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Vol. 44, No. 3, 1983, pp. 455 - 475; Casper Sylvest,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British Liberal Internationalism, c. 1900 - 1930", i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31, No. 2, April 2005, pp. 263 - 283; Cornelia Navari, "The Great Illusion Revisited: The International Theory of Norman Angell", i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15, No. 4, October 1989, p. 342; Walter Lippmann, *Drift and Mastery: An Attempt to Diagnose the Current Unrest*, New York: Mitchell Kennerley, 1914; Charles Horton Cooley, "Social Control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Publications of the American Sociological Society*, Vol. 12, 1917, pp. 207 - 216; 沈秋欢著：《格莱斯顿自由主义国际政治思想及实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208 - 209页；李少军等著：《国际体系：理论解释、经验事实与战略启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94页。

③ 例如，在国际联盟之前，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每个国家都认为是自己行为唯一和主权的法官，不效忠于任何更高的权威，有权对其他国家的批评甚至质疑表示不满。但这种概念永远消失了：国际社会有讨论和判断其每一成员国际行为的道德和法律权利，这一点毫无疑问，也不会再被怀疑。参见 F. P. Walters, *A History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2, pp. 1 - 2.

个跨国家的全球性治理机构管理全球社会新力量与国际相互依存关系的现实需求，国际关系特别是大国政治的某种制度化势在必行。更深刻的转变是：随着19世纪英国自由主义国际性霸权被20世纪美国的体系性霸权所取代，在此过程中国家本身也被“国际化”了。质言之，“国家的国际化”是一个全球性进程，通过这一进程，民族国家成为一个更大、更复杂的政治结构的一部分。^①根本上，自由国际主义思想在这一阶段的发展演化进程也可被视为中产阶级和自由派知识分子对现代性及其在国际领域内不断积聚的矛盾、张力与挑战的正面回应。^②

概言之，新自由主义者广泛地认可了通过政府间国际组织管理国际关系的需要，以及对国际生活进行制度化组织的重要性，一种强调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的现代国际主义思想得以发展起来；同时，他们也更了解冲突的客观存在和权力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这些思想上的进展与早期的自由主义先辈们形成了鲜明对比：大多数19世纪的国际主义者认为国际组织是没有必要的，有时甚至是危险的；在处理国际冲突时，他们宁愿依靠仲裁或其他特别程序。此外，从19世纪中叶的理查德·科布登到20世纪初的诺曼·安吉尔，传统的自由主义思想都拒绝对经济力量施加政治控制。但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头脑与观念更新的自由主义者逐渐认同需要一些更持久的（多边）机制来管理国家间的关系和冲突。^③出于对卷入大国总体性战争的恐惧和对理想国际秩序的渴望，在“一战”前几十年里，西方特别是英美等国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政治家和学者开始为建立国际组织进行辩护。^④

① [加]考克斯著，林华译：《生产、权力和世界秩序：社会力量在缔造历史中的作用》，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第181-182页。

② “现代性”是另一个涵义难以准确界定的概念。根据巴里·布赞和劳森的定义，它指的是“工业化、理性国家建设和进步意识形态相互交织的配置”，或者借用吉登斯的说法是“内在的全球化”。参见John Macmillan, “Intervention and the Ordering of the Modern World”, i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39, No. 5, 2013, p. 1043.

③ Carsten Holbraad, *Internationalism and Nationalism in European Political Thought*,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pp. 42-44.

④ 例如，英国人布莱斯福德和拉姆塞·缪尔受到19世纪“欧洲协调”的启发，认为其代表了从完全无政府状态到国际关系组织化进程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历史过渡阶段。参见F. H. Hinsley, *Power and the Pursuit of Peace: Theory and Practice in the History of Relations between Stat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7, p. 1; Carsten Holbraad, *Internationalism and Nationalism in European Political Thought*,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p. 42; Carsten Holbraad, *The Concert of Europe: A Study in German and British International Theory, 1815-1914*, New York: Barnes and Noble, 1971, pp. 176-184.

与此同时，作为推动国际主义思想向前发展的重要社会力量，在英美乃至整个欧洲大陆，随着知识分子、商人、律师和国会议员等精英群体加入，国际和平运动获得了新动力，“世界和平大会”与“各国议会联盟”组织在成员规模和影响力上不断扩大；其关注焦点不再像以福音派和贵格会教徒为主体的早期和平运动那样，仅仅基于宗教立场对战争进行抽象的道义谴责，而是更强调通过仲裁、国际法编纂与普遍裁军等相对“实际的”途径推动国际合作的现实目标。^①很大程度上，正是在和平团体的引领和推动下，特别是以1899年和1907年召开的两次海牙国际和平会议以及对“一战”的反思为契机，关于改革旧式国际关系体系的呼声在以欧洲和北美为主体的西方社会迅速高涨。^②世纪之交，滥觞于启蒙时代并经由边沁等系统阐述过的“国际议会”思想重新受到重视，呼吁建立体现集体安全原则的“和平联盟”构想自由派知识分子中渐成声势，而鼓吹国际生活组织化和制度化的书籍、文章和小册子更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③

^① 关于这一时期西方特别是美国和平运动的一般情况及其“务实”转向，参见 Michael A. Lutzker, “Themes and Contradictions in the American Peace Movement, 1895 – 1917”, in Harvey L. Dyck (ed.), *The Pacifist Impulse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6, pp. 320 – 340; David S. Patterson,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American Peace Movement, 1898 – 1914”, in *American Studies*, Vol. 13, No. 1, spring 1972, pp. 31 – 49.

^② 1899年与1907年两次海牙国际和平会议召开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及其反思在这一时期西方自由国际主义思想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海牙体系可视为西方文明有意识地迈向国际政治生活组织化和远离战争混乱的第一步。有学者指出：“海牙体系的主要特点是它的普遍性。”但这只是第一步，并注定会失败。即便如此，海牙体系仍被看作作为一个更新、更好的体系奠定了基础；海牙会议是国际思想史上的重大事件，与其说是凭借它的实际成就，不如说是由于它所表达的概念、被夸大的希望、基本上未能实施的建议以及未能解决但却暴露出来的深层问题。参见 David Kennedy, “The Move to Institutions”, in *Cardozo Law Review*, Vol. 8, 1987, pp. 845 – 847.

^③ 1898年，美国人埃德温·米德在《新英格兰杂志》发表了《把世界组织起来》的文章，正式提出了通过建立普遍性国际组织实现世界和平的倡议；1899年，本杰明·特鲁布拉德出版了《世界联邦》一书，1903年又提出召开“经常性国际咨议大会”的倡议；1899年，雷蒙德·布瑞吉曼在《新英格兰杂志》发表题为“人类政体”的文章，此后他对自己的观点进行深化并于1905年出版了《世界政府》一书；1903年，在总部位于波士顿的“美国和平协会”推动下，马赛诸萨州议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请求国会授权美国总统邀请世界各国政府首脑共同建立世界议会，商议解决涉及各国共同利益的问题；1904年，各国议会联盟在美国圣路易斯城召开会议，会议向国际社会发出公开呼吁，一是适时召开第二次海牙和平会议，二是继续谈判国际仲裁条约，三是建议成立“国际议会”并定期举行会议讨论重大国际问题。参见 Edwin D. Mead, “Organize the World”, in *The New England Magazine*, New Series, Vol. XIX, No. 4, December 1898, pp. 514 – 520; Benjamin F. Trueblood, *The Federation of the World*,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 Co., 1899; Raymond L. Bridgman, “The Body Politic of Mankind”, in *The New England Magazine*, New Series, Vol. XXI, No. 1, September 1899, pp. 23 – 31; *World Organization*, Boston: Ginn & Co., 1905; Andrew Carnegie, *A League of Peace; A Rectorial Address Delivered to the Students in the University of St. Andrews*, Boston: Ginn Company, 1906, p. 30.

由于国际制度是对一个无组织世界必要和可取的反应，这使得前制度化的国际秩序与制度化的国际秩序以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普遍性国际组织——国际联盟——在1919年的创立而区别开来。大国通过国际联盟对国际关系特别是国际相互依存体系进行管理和控制的思想，得到了强调大国权力和保持国际现状的保守国际主义者与强调对国际体系进行适度机制和规范化改造的自由国际主义者的共同支持。某种程度上，国际联盟可被理解为边沁设想的“国际议会”（体现为“国联大会”的设计）、“欧洲协调”（体现为由大国组成的国联理事会）以及“集体安全”三种观念折衷调和的产物；同时，它也体现出西方国际主义思潮演进的历史连续性与发展阶段性。譬如，国联理事会显然是“欧洲协调”经过重大修订的升级版本，纳入了权威和职权范围的法律定义、体制连续性、会议规律性以及大小国家代表的均衡构成等原则；国联大会实现了参加海牙和会的政治家对召开一次“世界议会”的希望和计划：定期举行会议，不依赖于单个国家的倡议，并有能力制定长期议事规则等。至于国联秘书处，则显然是在19世纪国际联合中涌现的“国际局”这一开创性概念在体制上的开花结果。^①

然而，这一时期国际生活的现实是，与经济领域空前增强的国际联系和相互依存相比，（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政治仍然固守着传统的均势与结盟外交：由于实行抢夺殖民地、划分排他性势力范围和以武力为后盾的外交政策，欧洲列强之间的全面总体竞争不断加剧，自由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对国际秩序的约束条件逐渐崩溃，近代外交手段的强权性质充分暴露出来，国际关系成为空前赤裸裸的实力政治争夺，直至跌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深渊。^② 作为对“帝国主义外交”浪潮的反弹，从19世纪后期开始，对极端民族主义、大国沙文主义和列强殖民主义的自由主义批评在大西洋两岸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和倾听。“自由贸易”“民选政府”与“国际合作”分别是自由主义批评家们对“帝国主义”“波拿巴主义”和“均势政治”在思想上的回应。^③

^① David Kennedy, “The Move to Institutions”, in *Cardozo Law Review*, Vol. 8, 1987, p. 857.

^② 俞沂暄：《国际秩序转变背景下的威尔逊主义：起源、政策和影响》，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年。

^③ Trygve Thrøntveit, “The Fable of the Fourteen Points: Woodrow Wilson and 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 in *Diplomatic History*, Vol. 35, No. 3, June 2011, p. 454; Casper Sylvest,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of Liberal Order”, in Tim Dunne and Trine Flockhart (eds.), *Liberal World Order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187. 例如，内战后的美国人发现，各国外交政策行为与自由主义愿景相距甚远，全球文明进程和国际关系越来越不协调。早在1865年，《国民报》驻巴黎记者抱怨说：“在以自由主义自豪的19世纪欧洲，霍布斯、马基雅维利、凯撒的公理和信条，就像被遗忘的幽灵一样复活了。”参见 Frank Ninkovich, *Global Dawn: The Cultural Foundation of American Internationalism, 1865-1890*,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263.

本来，受 19 世纪下半叶流行的进化论思想和自由主义关于人类永恒进步与世界趋向和平信念的影响，“一战”前的自由主义者近乎普遍地相信：西方社会大都发展到民主自由的“文明”阶段，人类理性、公众舆论以及国家间利益的天然和谐得到确立，“势力均衡”已不再可能构成缔造国际新秩序的组织原则。^①然而，1914 年“文明”的欧洲跌落到野蛮的战争深渊，给自由主义者关于人类道德良知和永恒进步的乐观信念带来了毁灭性冲击。作为对空前危机的回应，自由主义者本能的反应是：决意要把大战本身作为一次彻底清算和改造（欧洲）“旧式”国际体系的天赐良机，用伍德罗·威尔逊的话来说就是“结束一切战争的战争”。^②与保守的现实主义者动辄把大战的起源和责任归咎到德、奥等国的好战本性与邪恶动机不同，自由主义者却提出了更加激进的关于战争起源的解释——“一战”乃至于一更一般意义上战争的根源主要不在于敌国好战或邪恶的本性，而在于既有的国际关系体系存在某种根本性的结构缺陷。所以，在自由主义者对战争起源的探讨中，从对国家本身政治属性和政治家个体意识与心理动机的批判转向对主权国家体系层面的关注，这在客观上就为现代“制度国际主义”的兴起铺平了道路。1915 年有人提出，不是“国际主义”变得失效，而是旧式的马基雅维利主义外交出了故障。^③英国人罗伊斯·迪金森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最有代表性。他在 1916 年出版的划时代著作《欧洲无政府状态》中指出：战前的欧洲外交体系本质上是一种霍布斯式“国际无政府状态”。^④由于保守派和激进左派在国际事务中难以调和的观点，尽管并非所有人都接受“国际无政府状态”是战争与混乱的唯一解释，但显然他的分析在动员和支持国际联盟与集体安全原则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因为它是自由主义者在国际事务中寻求进步、秩序和正

^① James L. Richardson, *Contending Liberalisms in World Politics*, Lynne Rienner, 2001, p. 64.

^② “一战”期间，尽管威尔逊承认欧洲战争的规模已经威胁到美国的利益，超出了维持中立的范围，但他并没有得出这样的结论——美国将被迫在这个旧秩序中发挥自己的作用；相反，他认为战争提供了一个全面改革国际体系的绝佳机会，使之符合美国的理想即“一个基于广泛和普遍权利及正义原则的国际新秩序”，其通过国际联盟提供集体安全来改革世界秩序。Adam Quinn, *U. S. Foreign Policy in Context: National Ideology from the Founders to the Bush Doctrine*, Routledge, 2010, pp. 97 - 98; Thomas J. Knock, *To End all Wars: Woodrow Wilson and the Quest of a New World Order*,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③ John Culbert Faries, *The Rise of Internationalism*, New York, 1915, p. 5.

^④ G. Lowes Dickinson, *The European Anarchy*,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16.

义的核心制度支柱。^①

最后，从国际思想本身的演化进程看，20世纪上半叶以降，随着跨国关系发展和经济相互依存的增长，现代自由国际主义思潮的三个主要分支即立宪的、进化的与人道的自由国际主义分别衍生出来。立宪的自由国际主义致力于国际政治生活的法律化和组织化，由于需要应对两次世界大战引发的国际危机，其在20世纪早期占据主导地位，并直接促成了国际联盟与联合国体系的创立。进化的自由国际主义偏重经济与社会维度，在20世纪后期渐成主流，构成指导欧洲一体化等区域主义进程的思想基础——“功能主义”；由于主张通过跨国合作进行社会和经济改革，因而是自由国际主义更加社会化的版本。^②到“一战”前后，这两股思潮都与19世纪古典自由国际主义传统形成了某种背离，并与国际政治中国际主义思想的两种分析上可相互分离的模式相关。第一种是传统的道德论点，其基础是人类缓慢但逐渐进步的概念，并认为国际政治的秩序和正义将有机地发展——人类设计的法律和道德机制必须符合并尊重这些先决条件。因此，虽然传统的国际主义者普遍支持国际法的发展，但很多人认为，只有当人类的道德或理性得到改善时，法律规则才能发挥作用。第二种是现代的制度观点，其在20世纪早期变得更加普遍，并纠正了传统道德观点中肤浅的乐观主义，转而坚持“国际主义”的理想只能通过建立政治和法律制度来制约国际政治中无理性和不道德的行为来实现。自由国际主义作为普遍性国际组织（特别是国际联盟）理念助产士的关键作用，就是从这种思想中产生的。^③至于“人道的”自由国际主义，其在观念谱系上更多地与19世纪英国古典自由国际主义者的杰出代表J. S. 密尔，维多利亚时代英国自由主义的人格化身——威廉·格莱斯顿等的国际主义思想一脉相承。在观察到20世纪早期各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相互依存之后，自由主义者对国际社会的共同价值观念和集体责任有了全新认识。结果是一种“新”道德国际主义的复兴和发展，其最初强调西方“文明的”国际社会对“低等级”种族“监管”和“保护”的责任，在20世纪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和

^① Casper Sylvest,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of Liberal Order”, in Tim Dunne and Trine Flockhart (eds.), *Liberal World Order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189.

^② Carsten Holbraad, *Internationalism and Nationalism in European Political Thought*,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p. 45.

^③ Casper Sylvest,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of Liberal Order”, in Tim Dunne and Trine Flockhart (eds.), *Liberal World Order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179.

全球性反殖民主义运动之后，逐步演变为对普世人权的强调和尊重，这体现出了时代的进步。“冷战”后，人道主义干预思潮在西方重新抬头，作为其相对晚近的表现，如2005年联合国世界首脑会议提出关于“保护责任（R2P）”倡议等，背后都可以看到这种思潮或隐或显的线索及深远持久的影响。

二 自由国际主义的历史方位及悖论性困境

任何关于自由国际主义思想传统的研究最终都无可避免地回归到自由主义本身。作为最核心和普遍的西方政治理论和意识形态，自由主义的历史不仅承载着文明思维、政治实践和哲学伦理创新的重要遗产，也从根本上塑造和决定着自由国际主义的历史命运。

（一）历史方位

在国际关系史上，自由国际主义思想传统很大程度上是中产阶级的产物，其在过去几个世纪里出现在西欧—北美，并且大多是在自己的国家首先获得政治经验。从一开始，自由国际主义者就对国际政治有一个基本的诊断，即国际事务是一个由无序、强权、秘密及非理性定义和主导的政治领域，这些势力本身会危及“自由”，最直观的体现是贵族通过巨大象征性权力从事的秘密外交，当然也表现在战争的不定期重演中。^①从社会基础和思想根源看，自由国际主义反映了商人、资本家、知识分子和其他专业人士的利益与价值观念，其潜在的意识形态目的及手段均在于：人们对世界的理解倾向于以国内类比的概念为指导，根据国内类比世界（或至少是所在地理区域）的结构和过程，从而使后者变得更类似于国内社会，最终将秩序、正义和进步等国内社会的特征嫁接或移植到国际领域。^②

根本上，由于“国际化”自始至终是一个充满“矛盾和不均衡的进程”，因此，自由国际主义思想传统也可被理解为资本家及其中产阶级盟友等推动欧美现代世界历史进程的社会力量对这一动态进程中的非理性因素进行管理和控制的一种意识形态。不过，与当代美国化版本的自由国际主义逐渐退化为“价值中立”的解释性理论并为美西方霸权（帝国）主义进行保守性辩护

^① Casper Sylvest,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of Liberal Order”, in Tim Dunne and Trine Flockhart (eds.), *Liberal World Order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177.

^② 关于这个问题的最好研究，可参见 Hidemi Suganami, *The Domestic Analogy and World Order Proposal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不同，历史上的自由国际主义思想曾经发展出一种颇具锋芒的批判与规范性立场，其在推动各民族自决和反殖民化运动，倡导国际政治生活的制度化、民主化，强调市场开放和自由竞争，以及反对国家的军事主义倾向、鼓励大国合作和通过集体安全原则构建国际持久和平等方面均起过积极有益的作用。

最后，必须承认，尽管现代国际政治的很大一部分框架——从联合国等国际机构到人权制度——具有鲜明的自由主义特征，但这些特征已经内化为世界政治文明的一部分。还应看到，在历史的特定阶段（如“二战”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在民族主义的国内需求和资本主义获取全球资源和市场的外部需求之间，某种谦抑、衡平、中庸的自由国际主义版本或许是一种解决两者必要平衡的相对合理方式。^①此外，与历史上基于纯粹现实主义逻辑的国际秩序相比，自由国际秩序不仅为参与该体系的国家提供了程度不等的经济、政治和安全收益，而且为体系内国家间的互动提供了可预测性。^②或许，自由国际主义思想传统迄今所取得的历史成就可以用“欧洲之父”让·莫内的一句名言最好地加以概括——“没有人就没有可能；没有制度就没有持久性”。^③

（二）悖论性困境

作为一种源远流长的政治经济思想传统，自由主义本身充满张力和潜在的内部矛盾^④。相应地，当代的自由国际主义不仅存在难以克服的悖论和张力，同时也面临着深刻的困境：其在克服民族主义限制因素、美国的霸权控

^① David Steigerwald, “The Reclamation of Woodrow Wilson?” in *Diplomatic History*, Vol. 23, No. 1, January 1999, pp. 79–99. 约翰·鲁杰从国际经济秩序角度把这种相对衡平、中庸的自由国际主义称为“嵌入式自由主义”；杰里·辛普森则从国际法角度将强调包容与多元主义的“（联合国）宪章自由主义”与追求国际社会“同质普遍性”的“反多元主义的自由主义”进行了区分。参见 John Gerard Ruggie, “International Regimes, Transactions, and Change: Embedded Liberalism in the Postwar Economic Order”,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6, No. 2, Spring 1982, pp. 379–415; Gerry Simpson, “Two Liberalisms”, in *EJIL*, Vol. 12, No. 3, 2001, p. 537.

^② Rebecca Friedman Lissner and Mira Rapp-Hooper, “The Day after Trump: American Strategy for a New International Order”, in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41, No. 1, 2018, p. 12. 此外，尽管各国可能在事实和行动上存在分歧，但它们都同意，在一个权力不受管制的世界中，维持国际秩序既是唯一可行的政治战略，也是国际政治参与各方最大的共同利益。参见 Theodore Christov, “Liberal Internationalism Revisited: Grotius, Vattel, and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of States”, in *The European Legacy*, Vol. 10, No. 6, 2005, p. 564.

^③ Carsten Holbraad, *Internationalism and Nationalism in European Political Thought*,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p. 53.

^④ 当然，换一种角度看，这何尝不是其适应性与活力的源泉。参见 Stefano Guzzini,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in Tim Dunne and Trine Flockhart (eds.), *Liberal World Order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249.

制以及对主权国家的困惑立场等障碍中的至少一个时都遇到了问题。实质上，出于对国家主权和多元主义的尊重，以及同样坚持强调追求所谓普遍道德目标的双重承诺，自由国际主义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双刃剑概念。由此，它常常引起了不同的、有时甚至完全冲突的解释，这些解释在意识形态内容和其支持者关于应在自由国际主义的多元性和统一性承诺之间达成适当平衡的观点上都有所不同。理念层面，自由国际主义本质的模糊性决定了多元主义和统一主义之间悬而未决的紧张关系。^① 归纳起来，这些悖论性困境主要有如下几种表现。

一是关于主权与人权的“精神分裂”立场。从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开始、及至贯穿 19 世纪至 20 世纪欧亚非地区风起云涌的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的一条思想主线是：在国际上应用自由主义乃是为了支持民族自决和主权制度的普遍适用。然而，同样重要的是，在自由主义思想谱系中，不仅一个普遍而抽象的理性主义者个体始终被置于这种意识形态的中心，而且国家主权最终也来源于自然状态下的个人权利。^② 因此，自由国际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历史使命或伦理基础，在于消除国际层次上任何阻碍个体自由意志或行使自由的因素。早期自由主义者以迷信、宗教等作为攻击目标；当代新自由主义者认定对自由的主要威胁来自运转失灵或专制压迫的国家。在自由主义者看来，国家是一种必要的恶，通过建立民主体制对其施加限制，国家将被重新塑造——这个过程将受到那些从失败或专制国家以及从过时文化传统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个体的欢迎。于是，通过扎根于其普遍人类主体的世界性观念，继而以保护人权和促进民主的名义支持或使干预合理化，自由的国际主义却越来越强调废除作为现代世界体系基石的国家主权，自由国际秩序由此陷入“不断革命”的困境。^③

二是所谓“好国家”困境。历史上，从早期伟大的国际法理论家格老秀

^① Andrew Phillips, “The Wars on Terror, Duelling Internationalisms and the Clash of Purposes in a Post-unipolar World”,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50, 2013, pp. 91–93.

^② 由于这些权利是普遍的，如果看到其他国家人民的权利遭到侵犯，自由主义国家感到真的有责任代表他们进行干预。参见 [美] 约翰·米尔斯海默著，李泽译：《大幻想：自由主义之梦与国际现实》，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年，第 172 页。

^③ Toby Dodge, “Intervention and Dreams of Exogenous State-building: The Application of Liberal Peace-building in Afghanistan and Iraq”, i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39, 2013, pp. 1196–1197; Michael C. Desch, “America’s Liberal Illiberalism: 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Overreaction in U.S. Foreign Policy”,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2, No. 3, Winter 2007/2008, p. 13; 达巍：《“自由国际秩序”的前路与中国的战略机遇期》，载《全球秩序》，2018 年第 1 期，第 97 页。

斯到哲学家康德等，自由国际主义都假定某种“特殊”类型的国家具有本质上的优越性。^① 在格老秀斯那里，国际领域内成功的契约安排依赖于某个强国，如统一后的欧洲“低地国家”（荷兰）；康德的“永久和平”构想则依赖于一个国家体系（居于核心地位的是一个强大而开明的共和主义国家），其中每个国家都是根据道德上优越的共和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因此，在自由国际主义的思想体系中，全球秩序中的主权问题总是表现为试图首先在国家内部创建一个理想的政治共同体，然后将这个共同体的价值、权威、边界、文化或生产方式外化或投射到国际政体中去。^② 但是，一个“理想国家”的预设总是无可避免地播下了国际主义滑向“背叛”反面的种子。^③ 历史上，这种基于国家身份属性的二元划分不断为占优势的西方制造出一连串的“他者”，并可能为“好”国家不受约束地干预“坏”国家提供理据。将这种逻辑推衍到极致的后果是：最具“自由主义”身份属性国家的对外政策常常与傲慢粗暴的单边主义、干预主义和军国主义等“反自由主义”（illiberal）特征联系在一起。^④

三是对霸权与帝国等“反自由主义”历史力量的暧昧态度。一般而言，当且仅当与国际体系中最有力量的自由主义霸权国相结合，自由国际主义才可能从理论和思辨层面上升为一种塑造国家间互动方式的规范性因素。^⑤ 但很

① 在西方语境中，“好国家”系指开放、自由、民主的共和国。参见 Nicholas Greenwood Onuf, *The Republican Legacy in International Though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230.

② 多数自由主义者断言自由主义优于其他类型的政治秩序，并且认为如果只存在自由主义政权，世界会变得更美好，同时坚信只有基于自由价值观的社会模式才能在历史演变的竞争中取得胜利。自由主义中固有的优越感有时助长了对非自由群体和国家惊人的不宽容。参见 [美] 约翰·米尔斯海默著，李泽译：《大幻想：自由主义之梦与国际现实》，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69页，第143页；Adam Quinn, *U. S. Foreign Policy in Context: National Ideology from the Founders to the Bush Doctrine*, Routledge, 2010, p. 143.

③ Micheline R. Ishay, *Internationalism and Its Betrayal*,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5; Cecelia Lynch, “The Promise and Problems of Internationalism”, in *Global Governance*, Vol. 5, 1999, p. 87.

④ Adam Quinn, *U. S. Foreign Policy in Context: National Ideology from the Founders to the Bush Doctrine*, Routledge, 2010, p. 157; Gerry Simpson, “Two Liberalisms”, in *EJIL*, Vol. 12, No. 3, 2001, p. 542; Michael C. Desch, “America’s Liberal Illiberalism: 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Overreaction in U. S. Foreign Policy”,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2, No. 3, Winter 2007/2008.

⑤ 有学者认为，19世纪以来的所有国际体系之所以能够被定义为自由主义秩序，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体系中存在一个有能力管理和执行规则的支配性自由主义霸权国家。参见 Stefano Guzzini,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in Tim Dunne and Trine Flockhart (eds.), *Liberal World Order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250.

不幸，“一个具有自由主义属性的国家本身并不能保证良好的政治判断”^①。于是，当霸权主义或特定民族主义意识主导国际多边机构时，极可能违背国际主义的积极愿景和规范性目标——超越霸权国的自私自利并满足一个人道化世界的根本承诺。质言之，自由国际主义能否走出当前困境，取决于其能否发展出一种连贯和一致的针对主权国家特别是国际体系中最强大国家的公正立场。它始终面临根本性难题：能否超越民族国家的狭隘视域，尤其是超越霸权主义的武断干预。^② 不仅如此，历史上自由主义对帝国以及更广泛的国际正义持有何种立场，始终是存在巨大分歧的问题。有人宣称自由主义往往包含着一个帝国主义的内核：由于自由主义者对进步和法治构建孜孜不倦的坚持，已使得自由主义者们反复支持帝国主义的计划。另一些人认为，自由主义与生俱来就是反帝国主义的，这是考虑到自由主义对人类“平等”和“自治”的承诺。事实上在自由主义历史传统中，自由主义者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中曾跻身帝国主义最优秀的辩护者和最激进的批评者之列。^③

四是“精英主义”价值取向与诉诸“公众理性”的对立。在精神习性和价值偏好方面，自由国际主义的拥趸天然具有精英主义取向，但他们总以诉诸公众或普通人理性的形式出现，这经常表现为一种自相矛盾的态度。自由国际主义者从来相信通过人类理性、道德和国民性的提升来改革国际事务是可能的，然而，这种对个体和公众理性的信仰却一次又一次被对其潜在腐败的日益增强的担忧所抵消和冲淡。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譬如，当19世纪中叶克里米亚战争爆发后，科布登和他的国际主义支持者们就不得不直面推动政客们走向对抗的战争精神。由于他们历来倚重的媒体与公众的声音变得极具攻击性，科布登不由得发出了这样的灵魂拷问：“我们还是理性的、进步的物种吗？”^④ 20世纪初，诺曼·安吉尔指出，“公众判断的‘自然’倾向是极其不可靠和错误的”，然而，“长远来看，除了公众的判断之外，没有其他选

^① Antonio Franceschet, “One Powerful and Enlightened Nation: Kant and the Quest for a Global Rule of Law”, in Beate Jahn (ed.), *Classical Theor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75.

^② Cecelia Lynch, “The Promise and Problems of Internationalism”, in *Global Governance*, Vol. 5, 1999, pp. 87 - 97.

^③ [美] 珍妮弗·皮茨著，金毅等译：《转向帝国：英法帝国主义自由主义的兴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7页。

^④ [英] 马佐尔著，胡晓姣等译：《谁将主宰世界：支配世界的思想和权力》，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年，第38页。

择可作为政府的基础”。总之，尽管存在对大众政治中不可控因素的担忧，自由国际主义作为一种思想传统总是有一种诉诸普通人常识的张力。非但如此，这种对大众政治的焦虑也延伸到了其对主权国家和民族主义的矛盾观点。^①

五是主张多元平等的“普世主义”表面修辞与“西方中心主义”内在实质的张力。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是其普遍性，认为历史倾向于世界的社会和文化统一。^②相应地，自由国际主义思想（至少在理论层面）也提供了一个开放和基于（多边主义）规则体系的承诺：在一个以克制、互惠和主权平等为原则的合作性世界秩序体系中，各国通过贸易与合作实现互利共赢。^③然而，透过当代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纷繁复杂的表象，却不难辨识其“西方中心”甚至“盎格鲁—撒克逊”英语民族中心主义的本质属性。这是因为，在国际关系史上，尽管自由价值观仅仅是欧洲文明发展史上特定地点和事件刺激的偶然产物，但自由主义者却相信“自由、民主与自由企业的三位一体”构成国家成功的单一可持续模式，并坚称其对所有社会均真实、正确和一体适用^④。在更加抽象的理论层面，大多数情况下国际关系和国际理论展示了一个内置的世界政治的等级化概念，它是建立在文明标准的分析或规范性的西方中心概念和等级主权的全球制度之上的。本质上，国际理论始终在操纵一种伪装成普遍性的“地方性—分层级的”世界政治概念^⑤。

① 尽管自由主义总是在民族主义国家背景下运作，但它经常忽略身份和领土之间的联系，而这恰是民族主义的核心。乌黛·梅塔指出：“英美自由主义传统中的政治理论家在很大程度上不仅忽视了政治身份和领土之间的联系，而且还将前者概念化，至少含蓄地否定了后者的重要性和两者之间的联系。”参见 Casper Sylvest,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of Liberal Order”, in Tim Dunne and Trine Flockhart (eds.), *Liberal World Order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183; Uday Singh Mehta, *Liberalism and Empire: A Study in Nineteenth - Century British Liberal Though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9, pp. 117 - 118; [美] 约翰·米尔斯海默著，李泽译：《大幻想：自由主义之梦与国际现实》，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39 - 141页。

② Frank Ninkovich, *Global Dawn: The Cultural Foundation of American Internationalism, 1865 - 1890*,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137.

③ G. John Ikenberry, “The Three Faces of Liberal Internationalism”, in Alan S. Alexandroff and Andrew F. Cooper (eds.), *Rising States, Rising Institutions: Challenges for Global Governance*,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10, p. 19.

④ Adam Quinn, *U. S. Foreign Policy in Context: National Ideology from the Founders to the Bush Doctrine*, Routledge, 2010, pp. 140 - 161.

⑤ John M. Hobson, “The Twin Self - Delusions of IR: Why ‘Hierarchy’ and Not ‘Anarchy’ Is the Core Concept of IR”, in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42, No. 3, 2014, p. 558.

三 余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自由国际主义的历史命运

作为一种植根于西方文明并具有高度实践性及现实关怀的思想传统，自由国际主义必然反映西方社会的历史经验、知识传统与价值偏好，并投射其特定的政治目标和理想追求。因此，无论“自由国际主义”以何种“普世”“中立”面目加以表达，其背后总是或隐或显地浮现出某种基于发达的市民社会、科技与制度创新活力并具有强势扩张性海洋商业文明的影子——盎格鲁—撒克逊英语民族的自由主义霸权。^① 由此便不难理解，近代以来英美等自由主义霸权对世界体系特别是国际公共场域“开放性”“规则”和“普世价值”的强调，对相对超脱于欧亚大陆地缘纷争之外，因而有条件按照抽象原则建构理想化世界秩序的（英美）资本主义海洋商业强国来说，一个按照“自由国际主义”的国际关系哲学构建起来并且稳定可管理的国际体系是相对廉价与更为可取的。^② 这意味着它们既无须承担传统均势同盟体系下那种繁重的条约义务，又能保有最大限度的行动自由；其对以商业立国并具有强大综合竞争力的海洋国家在全球进行和平的商业扩张与意识形态渗透也是非常有利的。^③ 本质上，自由国际主义作为一种具有预设立场的思想传统，总是有意无意地试图淡化国际体系中的“主权”“战争”“均势”等构成性（政治）因素，将国际政治化约成去政治化的理性国际“公共空间”，继而方便自由主义

① 有美国学者将英美社会自17世纪以来开创的对资本主义和社会变迁等新理念持有的宽容和开放态度称为“盎格鲁—撒克逊态度”，结果是其在全球技术进步的浪潮中长期占据前沿和有利的优势地位。参见[美]沃尔特·拉塞尔·米德著，涂怡超等译：《上帝与黄金：英国、美国与现代世界的形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6-17页。然而，从历史上一系列“他者”立场观之，自由国际主义的立足点和最终归宿“总是在保障自由主义的主导权，让历史冻结在英美等霸权国倡导的自由主义时代，随后再按自由主义的形式重新书写和长久掌控世界秩序，进而为各国行为和领土疆域划定界限……真正的权力在于对制定规范准则的掌控，他们有权决定这些规则适用于何人何地。”参见[英]马佐尔著，胡晓姣等译：《谁将主宰世界：支配世界的思想和权力》，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年，第151-152页。

② 例如，1918年初威尔逊总统在与豪斯上校的一次谈话中说，他已决定，战后一般的和平条款应优先于具体的领土调整。换言之，与战后领土安排的具体细节相比，威尔逊对如何构建和平以防止未来战争的抽象原则更感兴趣。参见Joan Hoff, *A Faustian Foreign Policy from Woodrow Wilson to George W. Bush: Dreams of Perfectibili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50.

③ Colin Dueck, “Hegemony on the Cheap: Liberal Internationalism from Wilson to Bush”, in *World Policy Journal*, Vol. 20, No. 4, Winter2003/2004, pp. 1-11; Carsten Holbraad, *The Concert of Europe: A Study in German and British International Theory, 1815-1914*, New York: Barnes and Noble, 1971, p. 184.

霸权对其进行控制、管理和“征税”。

应当承认，“自由国际主义”具有高度的活力与适应性；所以，尽管当前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出现松动迹象，但断言自由国际秩序已经终结还言之过早^①。同时，客观而言，自由国际主义的思想传统既有阴暗面也有积极面，其中主张自由、开放、多元、理性、合作、平等的价值观念以及倡导多边主义、集体安全、贸易自由化与共同利益等政治原则具有进步性和普适性，这些是人类文明的共同遗产，因而可以构成中西交流、对话的前提和基础。在全球相互依存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时代，要真正摆脱“文明冲突论”魔咒和自我实现的预言，实现东西方文明相互镜鉴与共生共荣的积极愿景，只有某种既反映国际权势格局又能最大限度地凝聚各主要文明共识的新型国际主义，才是指引人类走出当前困局的唯一出路。长远看，虽然这种“国际主义”的具体内涵和表现形式尚难预料，但它必定具有某种衡平或中庸特征：海洋文明与大陆文明的平衡，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平衡，西方（个人主义）与东方（集体主义）的平衡，主权国家内政相对闭合性（国家治理独立）与国际体系开放性（全球准则统一）的平衡，以及效率与公平价值的平衡，等等。说到底是要摒弃霸权执念和民族中心主义，真正践行以平等、包容及协商为内核的多边主义。未来，随着中国等新兴国家在世界东方群体性崛起，以及现有国际体系在经历“去（西方）中心化”之后，将会衍生出何种内涵的“国际主义政治”及规范性承诺，其能否规避西方自由国际主义思想传统的悖论性困境，仍有待观察和检验。

（责任编辑 黄念）

^① 达巍：《“自由国际秩序”的前路与中国的战略机遇期》，载《全球秩序》，2018年第1期，第100页。

国际关系

拉美区域主义的特点及影响因素*

李德鹏 思特格奇

内容提要：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长期存在着多样的区域主义主张和行动，其实际成果如何则见仁见智。本文认为，拉美区域主义的特点在于“弱而不竭”“起伏不定”：拉美区域主义的发展是一个在相对固定、上限较低的区间内不断振荡的过程，同时具有稳定性和振荡性。为解释这一点，本文借助布罗代尔关于时间的历史理论作为分析框架，认为中长时段因素塑造了拉美区域主义稳定的一面，而短时段因素则造成了拉美区域主义发展的振荡。中长时段因素包括地理因素、人文因素和经济因素。这些因素对拉美区域主义的影响都有两面性，大体而言，地理因素和人文因素推动了区域主义发展，而经济因素则是阻碍区域主义取得进一步成果的主要因素，使其活动长期处在较低的水平。短时段因素指政府政策因素，取决于政府权力和意识形态的变化。这些因素在短期内变化很快，造成了拉美区域主义的不稳定性。本文以近年来南美区域主义为例，结合南美洲国家联盟和南美进步论坛的发展情况，说明了不同因素在拉美区域主义实践中的作用。

关键词：区域主义 一体化 南美洲 南美洲国家联盟 南美进步论坛

作者简介：李德鹏，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拉丁美洲研究系博士研究生；思特格奇，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非洲与拉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D81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649 (2022) 04-0047-28

* 本文得到国家留学基金、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创新工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与全球治理问题研究”项目的资助。

自独立以来，拉丁美洲国家从不缺乏种种区域主义的愿望与行动，但实际结果则往往十分复杂。从过程看，拉美区域主义的方向常常摇摆不定，整体进程也常大起大落；从结果看，相比欧洲一体化，拉美区域主义在深度、成果方面都较为有限。不过，学者奥利弗·达贝内（Oliver Dabéne）提出，拉美区域主义是“不稳定但持续的，有危机也有恢复力”^①。在他看来，尽管问题重重，但拉美区域主义的韧性也颇为可观。本文认同达贝内的观点，认为拉美区域主义长期处在一种“起伏不定、弱而不竭”的状态，既具有振荡性，同时这种振荡又是在一个较稳定的区间进行，既不会趋于消亡，又无法取得大的突破。本文将主要论述拉美区域主义同时表现出这些特点的原因，并结合近年来南美洲区域主义的代表南美洲国家联盟（Unasur）和南美进步论坛（Prosur）的兴衰说明这一点。

一 拉美区域主义的整体情况

本部分内容首先将明确本文所讨论的“拉美区域主义”的具体含义，并在之后结合拉美区域主义的发展史，说明拉美区域主义在整体上具有“起伏不定”“弱而不竭”的特点。

（一）“区域主义”/“一体化”的含义

本文中，“区域主义”（Regionalism，也译“地区主义”）和“一体化”（Integration）被用作同义词，有时交替使用。达贝内将区域一体化定义为“（次国家、国家、跨国）政治单元互动渐增的历史进程”^②，本文对区域主义/一体化的理解也大致如此。本文较为宽泛地界定这两个概念，认为它们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不同领域，同时认为既有的区域组织和制度、尝试构建区域组织和制度乃至加强区域国家间合作的实践都是区域主义/一体化的一部分。不过，本文主要研究的也是政府层面的实践，不讨论社会层面关于拉美区域主义思想和活动。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和部分学者对拉美区域主义/一体化的理解是不同的，部分学者对一体化的定义更窄。研究欧洲一体化的学者倾向仅从让渡主权的角度理解一体化，这样看一体化实际是区域主义的高级形式，比一般的

^{①②} Oliver Dabéne, *The Politics of Integration in Latin America: Theoretical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p. 5, p. 10.

区域合作更深入。或者说，区域合作是“政府间性”（intergovernmental）的，而一体化是“超国家”（supranational）的。^① 在持此观点的学者看来，拉美众多区域组织体现的应该仅仅是合作而非一体化。^② 但由于本文引用的很多学者并没有严格区分一体化和区域主义，甚至拉美区域组织的官方表述也会用到“integration/integración”一词，所以本文在行文中不再区别这两个术语，对一体化也采用最广义的概念，将其等同于区域主义。

从时间维度看，本文认为，拉美的区域主义/一体化可以追溯到拉美国家独立初期。不过，也有学者认为拉美区域主义源于二战后，与欧洲一体化进程基本同时开始。这实则也与概念的定义方式有关。例如，《牛津比较区域主义手册》将区域主义理解为“主要由国家主导的，在至少3个国家间建立和维持正式制度和组织的过程”。依据这种严格的定义，拉美一体化要自二战后算起。^③ 早期拉美区域主义的努力的确没有形成有较多现代意义的正式制度和组织，但尝试联合拉美各国的国家层面活动却是客观存在的。因此在本文看来，拉美区域主义是一个持续200年左右的长期历史现象。^④ 本文延展观察拉美一体化的时间长度，也是为了能考量一些作用于中长时段的影响因素，如地理、文化等因素。

在地理层面，“拉美”作为本文的研究对象泛指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加勒比地区的区域主义在本文中也偶有涉及。不过，加勒比国家都是小国，且基本都在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才独立，加勒比地区的区域主义的影响力更弱，历史也更短。整合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的区域主义组

① Detlef Nolte and Brigitte Weiffen, “Introduction: Regionalism under Stress”, in Thomas G. Weiss and Rorden Wilkinson (eds.), *Regionalism under Stress: Europe and Latin America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21, pp. 2–3.

② 参见 Oliver Dabène, *The Politics of Integration in Latin America: Theoretical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p. 10; 张凡:《拉美区域合作和一体化的国别基础、互补与竞争》,载《拉丁美洲研究》,2017年第5期,第93页。

③ Tanja A. Börzel and Thomas Risse, “Introduction: Framework of the Handbook and Conceptual Clarifications”, in Tanja A. Börzel and Thomas Risse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Region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 7.

④ 不少学者也倾向将拉美区域主义的源头追溯到其独立初期,参见 Salvador Rivera, *Latin American Unification: A History of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ntegration Efforts*, Rivera Jefferson NC: MacFarland, 2014, pp. 34–83; José Briceño – Ruiz and Andrés Rivarola Puntigliano, “Resilience and Acquis in Latin American Regionalism”, in José Briceño – Ruiz and Andrés Rivarola Puntigliano (eds.), *Regionalism in Latin America: Agents, Systems and Resilience*, Ox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21, pp. 13–30.

织——“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CELAC）则直到21世纪才出现。由于这些原因，本文所谈的拉美区域主义实际更多涉及西葡语国家间的区域主义。

本文所指的拉美区域主义不包含涉及美国和加拿大的区域主义。北美国家发起的一些区域主义实践确实也有拉美国家参与，但由于美国巨大的体量，拉美国家在参与这类区域主义活动时，客观上难免处于边缘乃至依附地位。此外，很多拉美一体化活动诞生的初衷即有区别于美国、抗衡美国的因素。因此，本文把美国在西半球营造的“泛美主义”国际组织体系及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等区域组织视为拉美区域主义的竞争对手，而非拉美一体化的某种形式。

（二）拉美一体化的“起伏不定”与“弱而不竭”

19世纪时，拉美一体化的倡议和行动主要出现在西语国家间，不同西语国家发起了一系列会议讨论彼此的联合。这些会议包括1826年玻利瓦尔发起的巴拿马会议、1847—1848年为针对厄瓜多尔总统引入欧洲君主的计划而由秘鲁发起的利马会议、1856—1857年智利发起的圣地亚哥会议、1864—1865年秘鲁与西班牙冲突引发的第二次利马会议，等等。这些会议往往以政治、军事联盟条约作为成果，只是所有条约都没有得到相应拉美政府的一致批准。^① 尽管在19世纪拉美也存在一些与一体化相反的分裂趋势，如大哥伦比亚共和国和中美洲联邦分别解体、拉美国家之间出现战争等，但大体上看，在19世纪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产生新的区域联合主张。从19世纪末到二战前，拉美国家的区域主义相对陷入低潮^②，只有20世纪初巴西、阿根廷、智利间曾在局部尝试建立联盟或缔结某种和平友好条约。这一时期，美国在美洲取

^① José Briceño Ruiz, “Autonomía y Desarrollo en el Pensamiento Integracionista Latinoamericano”, en José Briceño Ruiz, Andrés Rivarola Puntigliano y Ángel M. Casas Gragea (eds.), *Integración Latinoamericana y Caribeña: Política y Economía*, Madrid: FCE, 2012, pp. 29 - 33; Salvador Rivera, *Latin American Unification: A History of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ntegration Efforts*, Rivera Jefferson NC: MacFarland, 2014, pp. 34 - 83.

^② 本文主要讨论政府层面的区域主义，在这个层面上19世纪末及20世纪上半叶是拉美区域主义活动的低潮期。但在思想领域，何塞·恩里克·罗多（José Enrique Rodó）、曼努埃尔·乌加尔特（Manuel Ugarte）和萨尔瓦多·门迭塔（Salvador Mendieta）等思想家在这一时期大量阐发了主张拉美（或拉美的一些次地区）团结、一体化的思想。秘鲁的阿普拉党（APRA，亦称美洲人民革命联盟）、奥古斯托·塞萨尔·桑地诺（Augusto Cesar Sandino）等这一时期活跃的政治力量和人物也有关于拉美一体化的主张。

得独大的地位，通过侵略、干涉直接控制了一些中北美、加勒比小国，并开始推动创立以美洲共和国国际联盟（后更名“美洲国家组织”，OAS）为代表的泛美体系，这些都冲淡了拉美国家间区域合作的意味。二战后，拉美一体化更多以创立具体组织机制的方式推进，一体化整体的起伏也变得更频繁。很多学者都注意到拉美一体化在发展过程中常有方向和程度的变化，认为存在着几“波”一体化。例如，有观点认为在二战后拉美存在着4波一体化潮流，分别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发展主义的）、70年代至80年代（修正发展主义的）、90年代（新自由主义、开放的区域主义的）和21世纪初，分别被不同的思想主导。^①总体看，可以说拉美区域主义经历了19世纪的第一波“涨潮”与随后几十年的“落潮”，在近几十年中则每10~20年经历一番起伏。

本文无意具体探讨每一波一体化的具体特点及成因，回顾历史只是为了说明拉美区域主义有着“起伏不定”“弱而不竭”的特点。如学者们所说，拉美区域主义的形势往往呈“波浪状”，这说明拉美区域主义的实践是不稳定的、有其内在弱点的，但也有较强的恢复力。^②

拉美区域主义的不稳定性（“起伏不定”）体现在其高峰与低谷的落差。从不同时间截面看，拉美区域主义的景观是大为不同的。在一些时刻，能看到区域倡议或组织井喷式的涌现、各国对区域主义的高涨热情，而在另一些时刻，则只能见到区域主义的黯淡景象，此时区域组织碌碌无为乃至分崩离析，而区域各国则将注意力转向域外或国内。例如，20世纪60年代，人们见证了中美洲共同市场（CACM）、拉丁美洲自由贸易协会（LAFTA）、加勒比自由贸易协会（CARIFTA）、东加勒比共同市场（ECCM）、安第斯集团（AG）的纷纷成立。而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拉美国家整体陷入了债务危机，中美洲多国还陷入内战，区域大多数国家无暇顾及一体化。此时过去区域主义模式（倾向发展主义、与进口替代发展模式紧密相关）的弊端

^① Olivier Dabène, “Explaining Latin America’s Fourth Wave of Regionalism: Regional Integration of a Third Kind”, 2012. https://www.academia.edu/8680372/Explaining_Latin_Americas_fourth_wave_of_regionalism. [2021-11-23]

^② 何塞·鲁伊斯和安德烈·里瓦罗拉对“恢复力”（resilience）的概念有较多论述，认为在区域一体化层面，“恢复力”可以被理解为“区域一体化、合作进程中，从危机和挫折中恢复的能力”。参见 José Briceño-Ruiz and Andrés Rivarola Puntigliano, “Resilience and Acquis in Latin American Regionalism”, in José Briceño-Ruiz and Andrés Rivarola Puntigliano (eds.), *Regionalism in Latin America: Agents, Systems and Resilience*, Ox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pp. 13-16.

也逐渐显露，像拉丁美洲自由贸易协会这样的组织也没能实现最初消除域内贸易壁垒的初衷，也在80年代初以改组为拉美一体化协会（LAIA）告终。^①可以说，拉美区域主义活动呈现出发展的波动性，有其高点与低点、高峰与低谷。

拉美区域主义的脆弱性（“弱”）则在于其成就的有限。拉美区域主义所取得的总体成就并不令人满意，一直存在深度不足、流于表面的问题，很多区域组织的发展程度与其最初设想都有一定距离，与更成功的欧洲一体化在程度上不可同日而语。有学者用“象征性地区主义”来形容拉美和东亚地区的一体化进程，认为其实质是“借地区合作之名行巩固主权之实”。^②且不论拉美一体化实践的动机为何，但“象征性地区主义”这一称谓的确道出拉美一体化进程的虚弱一面。同时，拉美一体化也是高度分裂的。从一开始，旨在囊括全部拉美国家和仅覆盖某个次区域的一体化活动就同时存在，在功能上也往往重叠；近几十年中，指导思想对立的组织之间彼此竞争，造成一体化力量的内耗。如学者所言，“分化、重叠的区域项目的存在不是成功一体化的体现，而是反映出潜力的耗竭”^③，不同区域组织间的相互倾轧还常导致一体化整体进程的停滞与倒退。

但另一方面，拉美区域主义的重重问题却也没有让它彻底停滞，这就是其具有恢复力或“弱而不竭”的一面。一波区域主义浪潮可能会被否定或被新的区域主义形式和主张取代，但实现区域团结、整合的根本目标却很少遭到质疑。遭到否定的只是区域主义的具体外在形式，其内核精神尽管模糊、薄弱，却不会有消失的危险。在这个意义上，拉美区域主义也立于某种不败之地。很多时候，甚至曾被否定的元素也会卷土重来。例如20世纪90年代的“开放的区域主义”在21世纪初拉美左翼潮流中遭到批判，趋于式微，但2011年成立的太平洋联盟（PA）又多少复活了其倾向自由贸易、对外开放的精神。

^① María Esther Morales Fajardo, “Un Repaso a la Regionalización y el Regionalismo: Los Primeros Procesos de Integración Regional en América Latina”, en *CONfinés Relaciones Internacionales y Ciencia Política*, 2007, Vol. 3, No. 6, 2007, pp. 72-74.

^② 陈型颖、王衡：《象征性地区主义及其发生机制——以东亚和拉美为例》，载《国际论坛》，2020年第1期，第117页。

^③ Andrés Malamud and Gian Luca Gardini, “Has Regionalism Peaked? The Latin American Quagmire and its Lessons”, in *The International Spectator*, Vol. 47, No. 1, March 2012, p. 117.

总之，可以将拉美区域主义看作在特定区间内不断变化振荡的进程：拉美区域主义既难以取得突破性进展，不能与欧洲一体化比肩，但同时也不会消逝在历史中。这样一来，在振荡变化中，拉美区域主义也表现出某种不变稳定性：其存在是稳定的，其发展水平也已被大致框定。因此，本文认为拉美区域主义同时有着“起伏不定”“弱而不竭”的复杂面相。

二 对拉美区域主义特点的解释

本部分在对拉美区域主义发展特点的既有解释基础上，借用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的理论对影响拉美区域主义发展的因素进行了分类。之后，本文提出，拉美区域主义“起伏不定”“弱而不竭”的特点，是由地理、人文、经济等中长时段因素和政府物质权力、政府意识形态等短时段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基本框架

一些研究欧洲一体化的经典理论如功能主义、新功能主义、自由政府间主义、社会建构主义等关注了低政治领域功能外溢、政府（政治精英）作用、社会认同等要素对于一体化的影响。^① 尽管很多学者在研究拉美区域主义时不一定会会有意识地运用以上理论，但这些理论所关注的变量也都在拉美区域主义的相关研究中有所涉及。

或多或少地结合了欧洲一体化理论提出的观察角度，大量从事拉美区域研究的学者基于历史和现实，对影响拉美区域主义成败的因素做了细致的归纳。其中，大部分学者主要关注的是拉美区域主义较为失败的一面，认为后者可以归咎于拉美国家的民族主义情绪、对总统外交的过分依赖、区域内部贸易水平低、外部干涉、区域内部缺乏领导者、意识形态分歧、领土争端等因素。^② 关注拉美区域主义恢复力的学者则提出，对政治自主

^① 参见 Antje Wiener and Thomas Diez, *European Integration Theory*, Second Edi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6 - 11.

^② 参见 Carlos Malamud, “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Cooperation in Latin America: Diagnosis and Proposals”, in *Global Journal of Emerging Market Economies*, Vol. 7, No. 2, 2015, pp. 95 - 97; Salvador Rivera, *Latin American Unification: A History of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ntegration Efforts*, Rivera Jefferson NC: MacFarland, 2014, pp. 11 - 22; 温大琳:《当前拉美一体化进程中的主要制约因素》,载《拉丁美洲研究》,2013年第3期,第22-26页;周志伟:《当前拉美一体化现状及陷入困境的原因》,载《拉丁美洲研究》,2007年第5期,第42-46页。

和经济发展的追求、共同的文化和认同是驱动一体化长久不衰的基本要素。^①

本文认为，以上分析都有一定道理，但这些因素往往彼此有重叠之处，或分属于不同层次、维度，难以简单地并列。而且，既有研究往往更侧重于解释拉美一体化成功或失败的单一方面，但实际上拉美区域主义“起伏不定”“弱而不竭”的特点又同时辩证存在、彼此关联，需要一个统一的解释。本文希望对前人提出的种种变量加以进一步抽象、提炼，提出一个较简洁的分析框架，帮助厘清不同变量间的联系，说明拉美一体化“起伏不定”“弱而不竭”的原因。

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分析历史时使用了结合“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的方法，也被称为“长时段理论”或“三种时段理论”。这种历史观是本文想加以借鉴的。在《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一书中，布罗代尔将上述三种时段分别解释为地理时间、社会时间和个人时间，对应“人同周围环境的关系史”“群体和集团史”（经济、国家、社会、文明等）和“事件史”。^②布罗代尔对于历史时段的划分，有助于厘清拉美区域主义中不同影响因素的层次和作用。布罗代尔也提出，长时段的历史是“几乎静止的”、中时段的历史是“节奏缓慢”的，而短时段的事件史则是“短促迅速和动荡的”。^③在《历史学和社会科学》一文中，布罗代尔又提出“每一‘当前的事件’都聚合了不同起源、不同节奏的运动；今天的时间起源于昨天、前天和从前的时间。”^④布罗代尔认为，不同的历史时段有不同的节奏，不同节奏同时影响着当前事件，这对于理解拉美区域主义的“变”与“不变”是有帮助的。

本文认为，拉美区域主义同时呈现的稳定与不稳定，分别是相对恒定的因素和富于变化因素影响的结果。前者是布罗代尔所说的相对静态的中长时段因素，后者是动态变化的短时段因素。具体而言，中长时段的因素框定了

^① Andrés Rivarola Puntigliano and José Briceño - Ruiz, "Introduction: Regional Integration - Linking Past and Present", in Andrés Rivarola Puntigliano and José Briceño - Ruiz (eds.), *Resilience of Regionalism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Development and Autonomy*, Houndsmills, Basingstoke, Hampshire an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pp. 8 - 9.

^{②③} [法] 费尔南·布罗代尔著，唐家龙、曾培耿等译：《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第一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8-10页。

^④ [法] 费尔南·布罗代尔著，刘北成、周立红译：《论历史（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42页。

拉美区域主义的上限与下限，赋予其“弱而不竭”的特点，即拉美区域主义能取得的最高成就是有限的，但最惨淡时也不至于消亡；而一些短时段的因素，则令拉美区域主义起伏不定。本文对中长时段因素、短时段因素的界定和布罗代尔大同小异，但本文不再区分长时段因素和中时段因素，而是将拉美或西半球的地理条件、人文背景、经济结构（在全球体系的位置）都笼统视为“中长时段”因素。拉美内部的力量分配情况和各国的主导思潮、意识形态则往往受个人、单一政府的影响较大，属于布罗代尔所说的短时段因素。

（二）中长时段因素及其影响

如布罗代尔所说，地理因素从时间层面看是近乎静止的；而在本文研究的时段内（自拉美独立至今），拉美国家的人文景观大体也是稳定的：从独立至今，至少承载各国文化的官方语言文字没有较大变化，而这很大程度上是在殖民时期就已定型的。^① 地理因素和人文因素这两大中长期因素实际成为拉美一体化最主要的动力，它们共同催生了对拉丁美洲的认同。大西洋和太平洋将整个美洲大陆与世界其他地区分隔开，而由于整个美洲大陆土地广袤，很多拉美国家特别是南美国家与美国、加拿大也有遥远的距离。在文化层面，拉美的主要国家都经历了来自伊比利亚半岛的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统治，因而具有文化上的共性，而和盎格鲁—撒克逊美洲拉开了心理距离。即使很多加勒比岛国历史上主要受英国殖民，但种植园经济的历史传统和大量非洲裔的存在也让他们与两个北美国家文化迥异。正是地理因素和文化因素的综合作用构建了“拉丁美洲（和加勒比）”这一概念与认同，使得追求拉美团结成为区域人民一种天然的诉求。

当然，地理因素与人文因素对拉美一体化也有一定的负面影响。在地理上，墨西哥以及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国家确实离美国较近，难以逃脱美国的影响力。而拉美内部存在的一些自然屏障如安第斯山脉、亚马孙雨林、加勒比海等也增加了各国彼此之间联系的困难，将拉美划分为不同的次区域，从而分散了区域主义的力量。同样，诸多英语、荷兰语加勒比国

^① 也有些例外，如墨西哥独立后，由于推行西班牙语为官方语言的政策，西班牙语逐渐取代过去的印第安本土语言成为优势语言，但这实际也是对殖民时期传统趋势的延续。参见曹佳：《墨西哥民族整合进程中印第安人的国族认同研究》，载《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第2页。如今在一些国家，印第安本土语言的地位相比过去上升，但也没能取代欧洲语言的主体地位。

家与西语、葡语国家在文化上也存在较大差异，两类国家间的文化认同较弱，这也能解释为什么囊括除美国和加拿大以外全部西半球国家的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CELAC）要等到2011年才诞生。甚至讲葡语的巴西对其他西语国家的态度也一度是若即若离的，巴西并不总是像其在21世纪初那样积极支持一体化、拥抱邻国。著名学者莱斯利·贝瑟尔（Leslie Bethell）甚至认为巴西成为“拉美”的一部分更多是20世纪30年代之后的问题。^①

经济因素也是在中长期大体保持相对稳定的因素，其对拉美区域主义的影响也是根本性的。这里的经济因素是指这一情况：自独立以后，作为整体的拉美在世界经济体系中一直处于落后、边缘、依附的地位。应该承认，拉美国家在独立后经济发展的过程也充满起伏，不乏短期和局部的亮点，但从长远和全局看，拉美在近200年内一直没有缩小与西方国家在发展水平上的差距。数据显示，拉美整体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独立伊始就已远落后于美国。在之后的历史中，拉美各国具体情况有所不同，但在缩小与美国差距方面都成效有限，很多国家还逐渐被美国拉开了更大的距离。在20世纪以后，拉美（仅指西语、葡语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都低于美国的25%，自1960年以来，拉美最富裕的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要低于美国的一半。^②在经济表现长期低迷的背后，拉丁美洲国家一直未能实现产业、技术升级，一直未能从事“创新的机会窗口大、报酬递增和协同效应强”的生产活动^③，在全球经济中被锁定在一个较为不利的位置。这种情况也是自拉美国家独立以来就未曾根本改变的，无论是出口导向还是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尝试都未能找到实现经济高速稳定发展的道路。

这种情况也是拉美区域主义发展的主要阻力。经济因素的作用是本性的：很多学者们归纳的一体化不利因素也都源于拉美在世界经济中的弱势地

① 莱斯利·贝瑟尔：《从思想史和国际关系史的视角看巴西与拉丁美洲的关系》，载《拉丁美洲研究》，2017年第3期，第115页。也有观点认为，尽管巴西真正认同“拉丁美洲”这一具体概念较晚，但是与周边国家的交往比莱斯利·贝瑟尔的判断更密切、更积极。参见 José Briceño - Ruiz and Andrés Rivarola Puntigliano, *Brazil and Latin America: Between the Separation and Integration Paths*, Lanham · Boulder · New York · London: Lexington Books, 2017.

② [英] 维克托·布尔默—托马斯著，张森根、王萍译：《独立以来的拉丁美洲经济史》（第三版），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485-490页，第528页。

③ 王效云：《拉美国家的发展困境与出路——演化发展经济学的视角》，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论文，2020年5月，第147页。

位。正是由于拉美国家整体都有经济方面的困难，所以无法产生有能力为一体化提供稳定公共产品的领导者；由于拉美国家普遍在经济上处于弱势地位，所以彼此间互补性也很有限。根据联合国拉美经委会的数据，自1962年以来，拉美区域内部货物出口在全部货物出口中的占比也一直鲜有超过20%^①，导致拉美区域主义也就不能像欧洲那样通过低政治领域的进展逐步深化；拉美国家的保护主义、经济民族主义也同样源于各国经济的脆弱性，这类思想与行动也会阻碍一体化的深入。

当然，经济的落后也在一定程度上赋予了拉美区域主义动力。这是因为人们认为区域团结可能是改变经济不利地位的一种手段。在20世纪中叶，拉美区域主义的倡导者如普雷维什（Raúl Prebisch）等学者、技术专家认为，单一拉美国家市场狭小，希望通过区域主义提供更大市场以支持当时拉美国家普遍推行的进口替代战略。

总之，地理、文化、经济三个中长时段因素导致拉美区域长期的“弱而不竭”的命运。这三种因素的具体作用都是复杂的、双面的，但大体而言，地理、文化因素塑造了拉丁美洲的认同，从而提供了拉美区域主义最主要的动力，而经济上的不利地位则是拉美区域主义发展所面临种种障碍的最主要源头。这三个因素之间的互动使得拉美区域主义的动力和阻力实现了一种动态平衡，让拉美区域主义的波动局限于特定的水平，不会跌破下限也无法超越上限，落入“弱而不竭”的宿命。

（三）短时段因素及其影响

短时段因素则如布罗代尔所言，有更强的偶然性和变化性。布罗代尔认为短时段因素更多是“个人的”，影响拉美区域主义的短时段因素则是一系列单个政府的政策，包括拉美政府的政策和一些区域外部大国的政策。政府政策可以从物质和观念两个层面去观测：物质层面指单一政府推行某一政策时所具有的物质力量；政府的意识形态则作为观念，决定着政府对区域主义的态度，也就是决定着物质力量使用的方向。

从物质权力的角度看，独立以后拉美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位置大体没有变化，一直处在相对边缘、次要的位置，但短期内各国国力的变化是很频繁的，政府所能调动资源的多少也随之大幅涨跌。一些幸运的国家有可能

^① CEPALSTAT, “Exportaciones Intraregionales de Bienes por País de Origen”. <https://cepalstat-prod.cepal.org/cepalstat/tabulador/ConsultaIntegrada.asp?idIndicador=1925&idioma=e>. [2021-08-18]

在短期内因经济高速增长而国力大增，也可能因为短期的经济危机、革命、战争而实力剧减。国家权力的变化会影响到各政府对区域主义的投入程度。作为面积最大的西语国家，在19世纪的头几十年，墨西哥曾是很多西语国家政治联盟倡议的发起者，但因为国内内战和与美国、法国的战争，墨西哥的这种努力总是难以持续。^①与墨西哥相仿，南美大国的国力变化也是很有戏剧性的。例如，南美大国都有发展的黄金期，如阿根廷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巴西在20世纪60年代时都是如此；但阿根廷在20世纪中叶左右开始逐渐被各种政治、经济问题困扰，而80年代初和90年代末的债务与经济危机则都让巴、阿两国短期内元气大伤；21世纪初两国都随着经济的恢复、增长而国力上升，又都在近年来因经济萧条而再次把更多注意力转回国内。与此相应，相关区域主义进程也会随着这些区域大国国力的增减而进退不一。

当然，除了国家物质权力以外，政府在国内的政治地位决定了其能运用国家物质权力的程度。这两者并不总是等价的，所以，本文直接关注的也是政府具有的物质力量而非国家实力。有时尽管国家整体的物质力量强大，但由于国内政局的动荡，执政者也没有余力在区域层面投入精力。一些学者和项目在测评国家物质实力时，会把军队规模、军事投入作为一个指标（如国家实力综合指数，CINC）。^②这样一来，在国家处于内战、动荡的情况下，这些指标往往会随着军队的扩张而上升，但上述情况的出现其实意味着政府的脆弱。这种情况下，国家的物质能力或许是强大的，但政府能投入外交的力量其实是有限的。例如，哥伦比亚的内战就会限制该国对区域问题的关注。

与拉美区域主义相关的意识形态因素更加复杂。学者卡洛斯·马拉默德认为当前拉美各种政治、经济、社会行为体都不否定区域一体化的好处^③，而

^① Mario Vázquez Olivera and Fabián Campos Hernández, “Latin American Integration: A Mexican Perspective”, in José Briceño-Ruiz and Andrés Rivarola Puntigliano (eds.), *Regionalism in Latin America: Agents, Systems and Resilience*, Ox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21, pp. 183–206.

^② “National Material Capabilities (v6.0)”, The Correlates of War Project, 2021. <https://correlate.sofwar.org/data-sets/national-material-capabilities>. [2020-11-01]; J. David Singer, Stuart Bremer, and John Stuckey, “Capability Distribution, Uncertainty, and Major Power War, 1820–1965”, in Bruce Russett (ed.), *Peace, War, and Numbers*, Beverly Hills: Sage, 1972, pp. 19–48.

^③ Carlos Malamud, “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Cooperation in Latin America: Diagnosis and Proposals”, in *Global Journal of Emerging Market Economies*, Vol. 7, No. 2, 2015, p. 93.

萨尔瓦多·里维拉也提到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文献中都罕见反对一体化的言论。^① 不过，实际上也确实存在与拉美区域化有所抵牾的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强调本国主权、利益的民族主义或实用主义立场^②无疑就会有碍区域主义的推进。可以说，在拉美存在着不同层面的民族主义，拉美区域主义和将拉美整体视为“大祖国”（Patria Grande）的民族主义较为重合^③；而当以本国为中心的民族主义高涨，拉美国家间的摩擦常会增加，区域主义事业会由此被削弱。^④

支持一体化的意识形态彼此间也存在着观念上的对立。如前所述，拉美区域主义的不同潮流侧重不同，有偏重安全领域的、与进口替代战略紧密相连的发展主义的、偏向对外开放的，等等。不同意识形态主导的区域主义活动有着完全不同的目标和路径，彼此并不兼容。

这种情况下，区域主义的发展态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区域国家间是否存在支持区域主义的意识形态共识。如果区域国家政府都有较强的民族主义色彩，区域主义则难以推进。如 19 世纪时，拉美国家间的战争就让区域主义无从谈起。20 世纪 70 年代时，拉美的一些军政府都受到地缘政治思潮的影响，很多邻国间（如巴西与阿根廷）有很强的敌意，区域主义也难有进展。对不同区域主义路径的偏好或其他意识形态矛盾也会撕裂团体合作。例如，民主政权和非民主政权的矛盾使得智利皮诺切特政权在 1976 年退出了当时的安第斯条约组织，^⑤ 而 2006 年委内瑞拉查韦斯政府则因不满其他成员国与美国缔结自由贸易条约而退出了安第斯共同体。

以美国为代表的区域外大国对拉美区域主义的发展有很强的影响。美国如果直接对拉美部分国家进行占领和控制，这些国家无疑无法再参与拉美层

① Salvador Rivera, *Latin American Unification: A History of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ntegration Efforts*, Rivera Jefferson NC: MacFarland, 2014, p. 13.

② 一些力量如太平洋联盟提出在区域主义进程中要更加务实、弱化意识形态，但这种态度本身也可以视作一种意识形态主张。实用主义的立场有时倾向弱化拉美国家间情感认同对外交政策的影响，而主张加强与更能增进本国贸易利益的域外国家的联系，这无疑会削弱拉美区域主义。

③ 有学者将之称为“区域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与一些超国家的泛民族主义有些相似。参见李紫莹：《拉美区域民族主义的历史嬗变：民族认同与多元表达》，载《世界民族》，2016 年第 4 期，第 22 - 28 页。

④ 有时，区域主义和一国的民族主义也是重合的。很多理论家认为区域合作符合每个拉美国家的利益。这大体上是成立的，但是在具体实践中，总会有区域主义利益分配、成本分担等问题引发民族主义者的不满。

⑤ Salvador Rivera, *Latin American Unification: A History of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ntegration Efforts*, Rivera Jefferson NC: MacFarland, 2014, p. 182.

面的区域主义。而若美国等域外大国只是制造了尚未付诸实践的威胁，那么反而会激发拉美国家的团结，19世纪中诸多西语国家间的会议就是为应对域外大国干涉而召开的。同时，如果美国等域外大国对拉美更加关注，愿意给予拉美国家一些实惠，部分拉美国家也难免会疏远区域主义事业，转入以域外大国为中心的轨道。

域外大国对拉美的政策部分也取决于其执政者的对拉认识、对拉定位，这广义上可以视为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因此，域外大国的对拉政策也是高度变化的。美国尤其如此，尽管有些总统如西奥多·罗斯福、特朗普，会对拉美国家采取干涉、威胁或歧视性的政策，有些总统如小布什会忙于其他事务而忽视拉美，但是像富兰克林·罗斯福时期采取的“睦邻政策”、肯尼迪时期对拉美的“争取进步联盟”计划等都有拉美国家欢迎的因素，还有些总统如奥巴马至少在姿态上会做出尊重拉美国家、减少干涉的表示。不同美国总统迥异的对拉政策，对于拉美区域主义产生的作用无疑也是不同的，拉美区域主义的起伏有时也就和美国选举周期的变化相应。其他域外国家对拉美的政策相对稳定一些，对拉美区域主义一般都持同情立场，但也不乏变数。例如，2007年举行的巴西—欧盟首脑会议启动了巴西—欧盟战略伙伴关系，欧盟方面还赞誉了巴西的区域领导地位，直接引发了其他南美国家的不满，也影响了巴西与其邻国的关系。^①只能说，域外国家既有理由尊重拉美的整体性而将拉美作为谈判对手，也有强烈的动机为了短期更具现实性的利益而对拉美特定国家展开双边外交，从而客观上分化拉美国家。具体情况取决于当时的情境和决策者当时的认识，其选择是极不稳定的。

与物质权力因素相仿，意识形态因素的变化也是较为迅速、频繁的。意识形态的变化也有很强的个人色彩，与执政者的更迭直接相关，这种变化接近于布罗代尔所说的“事件”。拉美区域主义的“起伏不定”主要就是由物质权力和意识形态因素解释的。当然，它们的变化机制本身都是更为复杂的，受到国内、国际等不同层面因素的影响，两者间相互的影响也是存在的。本文对其变化机制的阐述无疑还不充分，但限于篇幅，也为了保持框架结构的简洁，本文不再对其做更多分析。

不同时段因素对拉美区域主义影响作用的时段、影响的方式和结果可见

^① Andrés Malamud, “Mercosur and the European Union: Comparative Regionalism and Interregionalism”, 2020, p. 16. https://www.academia.edu/42128622/Mercosur_and_the_European_Union_Comparative_Regionalism_and_Interregionalism. [2020-12-04]

表 1 的总结。

表 1 拉美区域主义的特点与背后影响因素

影响因素		影响时段	影响方向	影响结果	
经济弱势地位		中长时段	大体削弱区域主义实践；但激发区域主义愿望	主要使得拉美区域主义处于弱势状态	使得拉美区域主义“弱而不竭”
地理、文化			大体推动区域主义；对区域主义也有分化作用	主要使得拉美区域主义源源不竭	
拉美区域内外政府政策	政府物质力量、权力因素	短时段	方向不定	使得拉美区域主义“起伏不定”	
	政府意识形态因素		方向不定		

资料来源：笔者绘制。

三 案例解析：以近年南美洲区域主义为例

南美洲层面的区域主义是拉美区域主义史上的一个较新现象。进入 21 世纪，南美洲层面诞生了一个重要的区域组织南美洲国家联盟，南美洲国家联盟在诞生后经历了极富戏剧性的命运，一度由盛而衰直至濒于瓦解，但近年又显出些许东山再起之势。在南美洲国家联盟衰微之际，南美进步论坛则应运而生，但现在看来，这一新的组织想要彻底取代南美洲国家联盟也力有未逮。南美洲区域主义如今的局面混乱、缺乏确定性，很难简单地用“好”或“不好”来评价，称其为“起伏不定”“弱而不竭”却很贴切。本部分希望以南美洲国家联盟和南美进步论坛为代表的南美洲区域主义作案例，具体说明本文之前提出的拉美区域主义分析框架。

（一）21 世纪南美区域主义的变化

进入 21 世纪，拉美区域主义模式开始更加侧重政治、社会领域，同时突出国家的作用，对 20 世纪 90 年代区域流行的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则十分抗拒。在这一背景下，诞生了一系列新的区域组织，南美洲国家联盟也在其中。

最初，南美洲国家共同体（CSN）于 2004 年在秘鲁成立。2008 年 4 月，在委内瑞拉举行的南美能源会议上，各国首脑决定将这一组织更名为“南美

洲国家联盟”。南美洲国家联盟的目标高远而宽泛，从促进一体化、建立南美洲认同、建立南美洲的公民身份，到保护生态多样性、扫除文盲，等等。^①此外，在组织机构的安排上也能看出南美洲国家联盟的雄心：联盟设有自己的议会、银行，以及各个涉及社会、公共卫生、基础设施、经济金融等诸多领域的理事会。值得强调的是，联盟还设立了南美洲第一个区域性防务机制——南美防务理事会（SADC）。

在南美洲国家联盟兴盛期，在南美乃至中北美洲发生的很多重大事件中都能看到它的身影：联盟参与并帮助解决了2008年玻利维亚部分省份要求自治的政治危机和2010年厄瓜多尔警察骚乱引发的政治危机，对两国政府给予支持，这对维持两国当时的政治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②在维护民主方面，南美洲国家联盟还对2009年发生的洪都拉斯政变进行了批评，对2012年发生政变的巴拉圭进行了暂停成员国资格的制裁。南美洲国家联盟还致力于维护区域和平，对2010年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断交的矛盾进行了调解。在反对美国于哥伦比亚建立军事基地、支持海地灾后重建等问题上，南美洲国家联盟也都有积极行动。^③

不过，南美洲国家联盟的活跃主要也集中于其成立后若干年，活动领域则集中于上述的政治领域。随着21世纪初曾一度蓬勃发展的区域主义模式整体上遇到挑战，南美洲国家联盟也未能幸免。联盟在组织人事方面早就出现了危机。依据宪章性的《南美洲国家联盟组织条约》，作为组织最高决策机构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委员会应每年举行一次例会，轮值主席国还可在所有成员国同意的情况下召开特别首脑会议；联盟的秘书长由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委员会根据外长委员会提名来任命，秘书长任期两年，仅可连任一次。^④然而，联盟的最后一次首脑会议于2014年12月举行，之后再也没有召开，秘书长人选也一直拖延未决：上一任秘书长（也是哥伦比亚前总统）埃内斯

^① “Objetivos Específicos”，Unasur. <http://www.unasursg.org/>. [2020-12-20]

^② Javier Luciano Quispe Robles, “La Eficacia de Unasur para la Solución de Crisis Políticas en Sudamérica (2008-2013)”, en *Politai: Revista de Ciencia Política*, Vol. 8, No. 14, 2017, pp. 99-116.

^③ Edgar Romero, “¿Por Qué la Unasur Ha Perdido su Liderazgo en América Latina?”, 20 de abril, 2018. <https://actualidad.rt.com/actualidad/269152-unasur-perdido-liderazgo-america-latina>. [2020-01-19]; 李紫莹：《阿根廷外交政策演变与南美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载《国际经济合作》，2012年第2期，第80页。

^④ “Tratado Constitutivo de la Unión de Naciones Suramericanas”，Unasur, Artículo 6, Artículo 10, 2010. <https://www.unasursg.org/images/descargas>. [2020-01-21]

托·桑佩尔 (Ernesto Samper) 从 2014 年 8 月任职到 2017 年 1 月, 也就是他在完成一届任期后又额外工作了 5 个月, 之后一直没有产生新的秘书长。阿根廷、巴拉圭和秘鲁表示反对桑佩尔继续连任, 但当时的轮值主席国 (2017 年 4 月至 2018 年 4 月) 阿根廷推荐的人选何塞·奥克塔维奥·博尔东 (José Octavio Bordón) 则被委内瑞拉拒绝, 玻利维亚和苏里南也支持委内瑞拉的意见。^① 时任玻利维亚外长费尔南多·瓦纳库尼·马马尼 (Fernando Huanacuni Mamani) 给出的理由是秘书长迄今一直由成员国前元首或前外长担任, 而阿根廷推荐的人选不符合这一条件; 他还指责作为前任轮值主席国的阿根廷留下了悬而未决的问题。^② 秘书长人选的僵局导致巴西、阿根廷、哥伦比亚、智利、秘鲁和巴拉圭 6 国外长向轮值主席国玻利维亚 (2018 年 4 月至 2019 年 4 月) 递交信件表示暂时退出组织活动, 直到组织正常运行再重新参加。

之后, 委内瑞拉内部的危机与南美洲国家联盟成员对委内瑞拉局势态度的分歧直接造成联盟濒于瘫痪。自查韦斯总统执政后期以来, 委内瑞拉国内的经济形势不断恶化, 而在马杜罗总统接任总统后, 委内瑞拉政府和反对派的政治斗争趋于激化, 国家逐渐陷入了经济、政治、社会各领域的全面危机。2017 年 8 月, 一些反对马杜罗政府的美洲国家在利马召开会议, 组成“利马集团” (Lima Group), 其中包括南美洲国家联盟成员国的阿根廷、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巴拉圭和秘鲁, 圭亚那和玻利维亚后来也加入了这一集团。^③ 这些国家认为委内瑞拉政府违反民主、侵犯人权, 并否定委内瑞拉制宪大会和 2018 年委内瑞拉总统选举的合法性。2019 年 1 月, 委内瑞拉新任的国民会议主席胡安·瓜伊多 (Juan Guaidó) 宣布自己是委内瑞拉总统, 并得到当时除墨西哥外所有利马集团成员的承认。

一些成员国不满意南美洲国家联盟未能对委内瑞拉政府进行制裁, 采取了对联盟不利的行动。2018 年 8 月, 哥伦比亚总统杜克 (Iván Duque

^① “La Unasur Cumplirá Seis Meses sin Nombrar Nuevo Secretario General”, 26 de julio, 2017. <https://www.nodal.am/2017/07/la-unasur-cumplira-seis-meses-sin-nombrar-nuevo-secretario-general/>. [2020-01-23]

^② “Huanacuni Minimiza Crisis de la Usanur y Convoca a Cancilleres”, 23 de abril, 2018. <https://www.paginasiete.bo/nacional/2018/4/23/huanacuni-minimiza-crisis-de-la-usanur-convoca-cancilleres-177612.html>. [2020-01-24]

^③ 随着政权更迭, 截至 2021 年 10 月, 阿根廷、玻利维亚、秘鲁政府已经不再对马杜罗政府的合法性持否定态度, 甚至有些政府退出了这一组织。

Márquez) 宣布哥伦比亚正式退出南美洲国家联盟, 拉开了成员国退出的序幕。杜克曾直截了当地说: “我们不能继续再做一个已经成为委内瑞拉独裁统治最大帮凶的组织的一员。”^① 2019年1月, 杜克提出正在与智利等国协商建立新的组织取代南美洲国家联盟。同年3月23日, 除委内瑞拉以外的南美国家在智利圣地亚哥召开会议, 其中智利、阿根廷、巴西、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圭亚那、巴拉圭、秘鲁一起签署声明, 宣布开始筹建南美进步论坛, 以之作为南美洲国家联盟的替代品。而在会议前后, 巴拉圭(2019年3月)、阿根廷(2019年3月)、厄瓜多尔(2019年3月)、巴西(2019年4月)、智利(2019年6月)、乌拉圭(2020年3月)也相继宣布正式退出南美洲国家联盟。其中, 巴西甚至是在玻利维亚向其移交轮值主席国身份时退出的, 而厄瓜多尔则在退出时要求收回联盟设在厄瓜多尔的秘书处大楼。

然而, 近来也有一些利好于南美洲国家联盟的动向, 使得人们难以断言其“死亡”。2019年玻利维亚在莫拉莱斯总统被迫离职后, 新的临时政府改弦易辙, 曾表示将考虑退出南美洲国家联盟^②, 但2020年10月, 随着左翼“争取社会主义运动党”候选人阿尔塞(Luis Arce)当选, 玻利维亚的外交政策又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新政府表示重新恢复在一系列有左翼色彩的区域组织中的活动。^③ 此外, 阿根廷总统阿尔韦托·费尔南德斯、秘鲁总统卡斯蒂略在执政后, 也都有重返南美洲国家联盟的表示。这些情况也意味着南美洲国家联盟的确“弱而不竭”, 在瘫痪中存有生机。

与南美洲国家联盟相对应, 南美进步论坛也有着跨领域的目标, 但由于其产生时的背景, 该组织对民主政治、市场经济更为侧重, 本身反映的是拉美右翼的一体化偏好。^④ 南美进步论坛的命运也颇具戏剧性, 其诞生时便有了

^① “Colombia Se Retira de Unasur por Ser ‘Cómplice’ de la Dictadura de Maduro”, 29 de agosto, 2018. https://www.abc.es/internacional/abc-colombia-retira-unasur-complice-dictadura-maduro-201808290139_noticia.html. [2020-01-27]

^② “Canciller: Bolivia Abandonó el ALBA y Analiza su Desvinculación de Unasur”, 16 de noviembre, 2019. <https://www.bolivia.com/actualidad/nacionales/canciller-bolivia-abandono-el-alba-y-analiza-su-desvinculacion-de-unasur-247668>. [2020-12-27]

^③ “El Gobierno de Luis Arce Anuncia que Bolivia Volverá a participar en Unasur, Celac y Alba”, 20 de noviembre, 2020. <https://elintransigente.com/2020/11/el-gobierno-de-luis-arce-anuncia-que-bolivia-volvera-a-participar-en-unasur-celac-y-alba/>. [2020-12-27]

^④ “Declaración de los Ministros de Relaciones Exteriores de Prosur”, Prosur, 25 de septiembre, 2019. <https://foroprosur.org/wp-content/uploads/2020/09/Declaracion-de-Ministros-de-RREE-1.pdf>. [2020-08-27]

8 个成员国，但之后却很难再扩展，成员国间的分歧也逐渐上升。像阿尔韦托·费尔南德斯就任阿根廷总统后，在南美进步论坛官方网站记录的一些高层联署宣言、高层会议中都没有再见到阿根廷方面的参与。^① 尽管在新生时，南美进步论坛俨然有取代南美洲国家联盟的势头，但如今其优势除了能正常运转外，南美进步论坛在各方面的作为都有限。在这种情况下，南美洲一体化在整体上可以看做是分裂、混乱的，但也难言完全没有取得进一步发展的希望。

（二）宏观因素与南美区域主义的“弱而不竭”

前文认为，地理、文化、经济等宏观中长期因素，决定了拉美区域主义是“弱而不竭”的。南美区域主义，作为拉美区域主义的一部分，也依然是弱而不竭的，而这也主要是由上述宏观因素造成的。

相对其他的拉美次区域地区，南美洲区域主义诞生较晚。相对而言，在“南美”概念的建构过程中，地理因素比文化因素作用更大。从历史文化上看，位居南美大陆的圭亚那、苏里南分别在 20 世纪 70 年代从英国和荷兰获得独立，国内主要人口为印度裔、非洲裔，和其他拉美国家很不一样，更多被视为政治意义上的加勒比国家。巴西和其他拉美国家在语言文化上的差异也确实存在。因此，“南美洲”不是一个传统的历史文化实体，而如学者所言，很大程度上是巴西为投射自身影响力而划定的“地缘政治项目”或“发明”。^② 但从地理上看，南美洲的边界却非常清晰，以巴拿马运河为界与中美洲区分开来。相比中美洲和墨西哥，南美洲整体上距离美国更远，因此相对独立于美国的影响，使得作为政治集团的南美地区可以获得独立性。此外，巴西的领土面积将近占南美洲总面积的一半，又同时与南美洲其余 11 个国家中除智利和厄瓜多尔外的 9 国接壤，天然成为南美洲的中心。综合而言，地理因素使得南美洲可以成为一个相对独立又有（潜在）核心国家的政治群体。所以，南美地区的一体化一旦出现，就不会轻易地淡出历史舞台。批评南美洲国家联盟的国家却仍要构建以南美地区为区域主义框架的南美进步论坛，就说明了地理因素赋予南美区域主义的生命力。

地理因素也部分地决定了南美区域主义的弱势地位。南美洲北部的国家

^① “Noticias y Prensa”, Prosur. <https://foroprosur.org/prensa/>. [2021-08-27]

^② Susanne Gratius, “Brasil en las Américas: ¿Una Potencia Regional Pacificadora?”, *Working Paper*, Fundación para las Relaciones Internacionales y el Diálogo Exterior (FRIDE), No. 35, 2007.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 [2021-02-06]

临近中北美洲、南美洲东西两岸的差异，都在削弱着南美区域主义，使其出现内部分化。也就是说，美国甚至墨西哥的影响力容易延伸到南美洲北部，南美洲北部的大国也愿意向北拓展其外交空间；从东西轴线看，面向太平洋和面向大西洋的国家也有着不一样的对外航路。所以，哥伦比亚等南美洲北部国家与美国有紧密联系，委内瑞拉倡导的美洲玻利瓦尔联盟（ALBA）愿意吸纳更多加勒比岛国，太平洋沿岸的国家则倾向和墨西哥一起组成太平洋联盟。这些组织体现了域外大国在南美洲的影响或南美国家超越南美洲边界的地缘政治抱负，同时也削弱了南美洲的向心力。所以，地理因素在赋予南美区域主义不竭生命力的同时，也制造了其发展的天然障碍，拉低了其发展上限。

如其他拉美区域主义实践一样，南美区域主义一直处于某种“疲弱”状态，而这也更多由经济因素导致的。即使在南美洲国家联盟的鼎盛时期，其发展也存在问题。应该说，南美洲国家联盟的工作重心和成就主要在政治领域，在经济等其他领域和具体工作中该组织一直存在“跛脚”的现象。根据联盟基础设施与计划理事会（COSIPLAN）2016年的项目报告，截至当年的581个基础设施项目中，有123个仍处在计划阶段（Profiling），而其中90%早在2012年之前就处在这一阶段。^①由于南方银行发展不顺，联盟的一系列社会经济倡议得不到充足的资金支持。^②很多成员国在离开南美洲国家联盟时，也对该组织的工作表达了不满，智利外长罗伯托·安普埃罗（Roberto Ampuero）甚至曾批评道，“南美洲国家联盟毫无成绩，无助于区域一体化，也没有能力解决问题”，并抱怨智利每年向联盟投入大量资金。^③南美进步论坛为克服南美洲国家联盟的弊病，特别标榜组织机构的灵活性、精简和更少的官僚主义。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意味着南美进步论坛在目标上的有限性，从一开始该论坛的组织机构就未被赋予较大权力。另外，由于没有得到南美国家的一致认可，加上新冠疫情的蔓延影响其正常工作，南美进步论坛成立至今成果寥寥。

^① COSIPLAN, “Project Portfolio 2016”, UNASUR, 2017, pp. 31 – 34. <https://www.flipsnack.com/iirsa/cosiplan-project-portfolio-report-2016.html>. [2019-04-28]

^② Marcelo Saguier, “Social and Solidarity Economy in South American Regional Governance”, in *Global Social Policy*, Vol. 17, No. 3, 2017, p. 267.

^③ “Chile Considera que Unasur ‘no Conduce a Nada’”, 23 de abril, 2018. <https://www.elespectador.com/noticias/el-mundo/chile-considera-que-unasur-no-conduce-nada-articulo-751687>. [2019-04-30]

南美区域主义的低上限，也是南美国家整体经济的弱势地位造成的。初级产品长期是南美国家的主要出口产品，自 20 世纪 90 年代后尤其如此，此后“南美洲国家凭借初级产品专业化通常进入全球价值链的初级阶段”^①。尽管在 21 世纪第一个 10 年，很多南美国家经济增长势头迅猛，但这也是出现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和 21 世纪初的一系列经济危机之后，而且为期相对短暂。这种情况下，南美国家难以真正突破“发展中国家”身份的桎梏而取得长足发展，彼此经济的互补性也难免不足。弱势的经济地位使得南美各国对短期经济得失十分敏感；南美大国如巴西本身国内经济发展水平有限，对外援助受到民意的反对，无法大量提供公共产品^②；各个小国也有强烈的经济民族主义思想，一方面期待外来援助，另一方面又担心遭到外来资本的剥削。在南美洲国家联盟成立的 2008 年当年，厄瓜多尔总统就曾因与巴西建筑巨头奥德布雷希特（Odebrecht）的纠纷而拒绝偿还巴西贷款，引发了两国争端。南美国家的经济疲弱让这些国家无力、无意支付区域主义活动的预先成本，也就不能推动区域主义达到更高的高度。

（三）物质权力因素与南美洲区域主义的“起伏不定”

前文提到，政治享有物质权力情况的短期变化会导致区域主义的起伏。本部分会说明，南美区域国家（特别是大国）政府物质权力的变化，确实与南美洲国家联盟、南美进步论坛的兴衰密切关联。

在本文关注的时段内，在整个南美洲，巴西的综合实力遥遥领先，其人口（2017 年）、领土面积、经济总量（2017 年）等数据都是南美洲第二名的至少 3 倍以上。^③ 除巴西以外，一些学者指出南美洲也存在着一些“次级强国”（secondary powers），包括阿根廷、哥伦比亚、委内瑞拉、智利。^④ 总的来

^① 张勇、史沛然：《“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拉经贸合作机遇：全球价值链视角》，载《太平洋学报》，2018 年 12 月，第 37-38 页；[英] 维克托·布尔默—托马斯著，张森根、王萍译：《独立以来的拉丁美洲经济史》（第三版），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20 年，第 422-424 页。

^② Janina Onuki, Fernando Mouron and Francisco Urdinez, “Latin American Perceptions of Regional Identity and Leadership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in *Contexto Internacional*, Vol. 38, No 1, January/April 2016, pp. 433-465.

^③ 以上信息根据世界银行相关的数据计算得出，参见 <https://data.worldbank.org/cn/>. [2020-04-14]

^④ 参见 Javier Luciano Quispe Robles, “La Eficacia de Unasur para la Solución de Crisis Políticas en Sudamérica (2008-2013)”, en *Politai: Revista de Ciencia Política*, Vol. 8, No. 14, 2017, p. 104; Daniel Flandes and Leslie Wehner, “Drivers of Strategic Contestation: The Case of South America”, *Working Papers*, German Institute of Global and Area Studies, No. 207, 2012, pp. 163-164. 实际上，秘鲁在领土、人口等数据上的排名也较为靠前，但由于其经济总量和军费开支低于前述国家，本文未将其纳入讨论。

讲,上述4国在领土、人口、经济总量等数据上虽不能与巴西相比,也远超其他南美小国;这4国在不同方面各有优势,整体实力基本处于同一水平。可以说,巴西和这4国是南美地缘政治中最重要的棋手。进入21世纪后,这些国家在地区外交和军事力量发展上也显得更为积极。^①特别是委内瑞拉在21世纪初的活动格外活跃,在查韦斯总统执政时期,有利的石油价格大大提升了委内瑞拉当时的经济实力,委内瑞拉可以把大量资源投入到南美次区域和拉美地区的一体化事业中。

如学者所言,“巴西、委内瑞拉、阿根廷领导区域的雄心,催生了种种区域一体化组织,南美洲国家联盟也是其中之一。”^②也就是说,在“南美五强”中,有3个支持南美洲国家联盟,其中包括实力远超他国的巴西,其合力足以克服域内其他反对力量。尽管另两个次级强国智利、哥伦比亚对南美洲国家联盟的热情度有限甚至不无异议,但联盟的发展也有了基本的保证。

巴西很大程度上是南美洲国家联盟的首倡者。巴西在20世纪90年代就有整合南方共同市场和安第斯共同体两个区域组织的想法,自2000年起,巴西的卡多佐总统(1995—2002年执政)又发起了一系列南美国家首脑会议,开始讨论建立南美国家间的一体化组织。^③经过这一系列会议,南美洲国家共同体终于在2004年诞生。此后,随着委内瑞拉查韦斯政府执政权力的巩固,其对南美洲国家联盟的推动作用也日益明显,促成了南美洲国家共同体向南美洲国家联盟的转变。“南美洲国家联盟”这一名称就来自于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的提议。委内瑞拉及其盟友使得南美洲国家联盟相比过去的南美洲国家共同体更侧重政治、社会议题,拓展了南美洲国家联盟的目标。^④虽然联盟与巴西最初的设计并不完全一致,但此后巴西依然对其保持了热情,南美防务

^① 各国军事力量发展情况可参见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关于军费开支的数据库:<https://www.sipri.org/databases/milex>. [2020-04-14];不过也有学者指出,该数据过分低估了委内瑞拉的军费开支,近年来委内瑞拉也大大增强了自己的军事力量。参见 Jeff Colgan, “Venezuela and Military Expenditure Data”, in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48, Issue 4, 2011, pp. 547-556.

^② Javier Luciano Quispe Robles, “La Eficacia de Unasur para la Solución de Crisis Políticas en Sudamérica (2008-2013)”, en *Politai: Revista de Ciencia Política*, Vol. 8, No. 14, 2017, p. 104.

^③ Paul Kellogg, “Regional Integration in Latin America: Dawn of an Alternative to Neoliberalism?”, in *New Political Science*, Vol. 29, No. 2, June 2007, pp. 196-197.

^④ José Briceño-Ruiz, “From the South American Free Trade Area to the Union of South American Nations: The Transformations of a Rising Regional Process”, in *Latin American Policy*, Vol. 1, No. 2, 2010, pp. 217-226.

理事会的建立就是源自巴西的建议。巴西和委内瑞拉对联盟的设想有所不同，两国在联盟中也存在竞争，不过，“尽管存在这些分歧，委内瑞拉和巴西更愿意私下协商并在公开场合表现出一致”^①。在很多问题上，南美洲国家联盟折中了委内瑞拉和巴西的意志，体现了两国的合力。另外，阿根廷在基什内尔夫妇执政时期也对联盟做出了贡献。内斯托尔·基什内尔在其卸任阿根廷总统（其妻当选为新的阿根廷总统）后成为联盟的首任秘书长，在担任这一职务期间，他参与了对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争端的调停、斡旋，帮助促成了两国最终的和解，他的努力也得到了当事国的认可。^② 联盟在厄瓜多尔总部秘书处大楼也被命名为内斯托·基什内尔大楼（Edificio Néstor Kirchner），这也反映出阿根廷当时对这一组织的支持和影响力。

然而，进入 21 世纪第二个 10 年，巴西、委内瑞拉、阿根廷国内都发生了不小的变化。甚至在巴西、阿根廷的中右翼政府上台之前，左翼政府对区域一体化的支持力度就已经下降。

从整体上看，在 2008 年经济危机后，这 3 国的整体经济形势已不如从前，从 2010 年到 2016 年，3 国都在一些年份中出现经济衰退的情况。雪上加霜的是，巴西和委内瑞拉还因为内政中的矛盾进一步被分散了精力。在罗塞夫总统执政后期，国内反腐案引发了一系列政治危机，最终罗塞夫被弹劾下台。自 2014 年开始，委内瑞拉的经济开始严重恶化和衰退，国内也随之出现了社会、政治动荡，反对派一方面借助其主导的国会对抗政府，另一方面不断示威、对政府发起冲击。委内瑞拉政府的执政基础遭到削弱，无暇再对外投入。委内瑞拉政府自身的合法性问题还引来了域内右翼政府的批评和干涉，于是委内瑞拉反而成了南美洲国家联盟的争议焦点，直接诱发了联盟的崩解。

南美进步论坛最初是由智利和哥伦比亚两国发起的，这并非偶然，而是区域权力结构微妙变化的反映。在发起提议的 2019 年之前，尽管这两国经济增速并不是拉美最为突出的，但整体表现远好于巴西、阿根廷和委内瑞拉，且都在 2018 年经济表现优异。两国也确实存在对自身力量的乐观情绪，如哥

^① Rita Giacalo, “Venezuela en Unasur: Integración Regional y Discurso Político”, en *Desafíos*, Vol. 25, No. 1, 2013, p. 143.

^② “Chávez: Kirchner Jugó Rol Clave en la Paz entre Venezuela y Colombia”, 28 de octubre, 2010. <https://www.americaeconomia.com/politica-sociedad/politica/chavez-kirchner-jugo-rol-clave-en-la-paz-entre-venezuela-y-colombia>. [2022-01-24]

伦比亚一直在谋求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并终于在2020年如愿以偿；而智利领导人皮涅拉在2019年10月还骄傲地宣称智利是拉丁美洲的“绿洲”^①。两国在外交上表现得更加自信，开始愿意扮演区域领导的角色。^②不过，智利和哥伦比亚的愿望都没有实现，因为就在2019年年底，两国国内都发生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哥伦比亚政府与国内游击队的和解进程也再次出现新的波折。这让南美进步论坛的进一步发展在短期内丧失了两国的推动力。2020年，新冠疫情给南美主要国家都带来了巨大的打击，区域主义议题在近两年陷于沉寂。

总之，可以看到南美区域组织的兴衰和区域国家政府政策的变化彼此伴随。近年来，拉美国家政府权力和意识形态的变化、转换是相对迅速的，拉美区域主义波动的频率也随之加快。国内政治动荡、新冠疫情这样的不可控因素进一步加深了政府力量变化的意外性，也加剧了区域主义发展的波动性。

（四）意识形态因素与南美洲区域主义的“起伏不定”

总体而言，在21世纪，曾经导致拉美国家相互敌对而破坏区域主义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不再显著存在。如前所述，拉美国家的各政治力量原则上都是支持拉美一体化的，更多地把邻国视为伙伴而非竞争对手。像玻利维亚、秘鲁虽然和智利有领土或领海争端，但这些争端并不能从根本上阻碍这些国家对区域一体化的支持。当然，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并没有消失，它更多稳定地潜伏在拉美国家对主权的关注中，其作用是长期限制拉美区域主义所能达到的高度，而不是影响其短期表现。

在21世纪，在短期内导致拉美区域主义剧烈振荡的，还是左翼与右翼的意识形态竞争，这两种政治力量对于区域主义都有自己的理解和安排，因此在国内和区域层面都相互冲突。简单而言，在21世纪的拉美地区，左翼与右翼的分野主要与对新自由主义的态度密切相关。拉美左翼对新自由主义极度

^① Emilio Lara, “Piñera Califica a Chile como un ‘Oasis’ ante Convulsiones Económicas y Democráticas Latinoamericanas”, octubre 8, 2019. <https://www.biobiochile.cl/noticias/nacional/chile/2019/10/08.> [2021-11-10]

^② Fernando Alaya, “Chile Tres Cancilleres en Tres Años: La Política Exterior de Piñera (2018-2020)”, 5 de enero, 2021. <https://www.nodal.am/2021/01/chile-tres-cancilleres-en-tres-anos-la-politica-exterior-de-pinera-2018-2020-por-fernando-ayala/>. [2021-10-30]; Edgar Andrés Londoño Niño, “Iván Duque y la Búsqueda Errática de Liderazgo Regional”, 7 de octubre, 2019. <https://revistafal.com/ivan-duque-y-la-busqueda-erratica-de-liderazgo-regional/>. [2021-11-10]

排斥，认为新自由主义造成了拉美国家的经济灾难，而右翼一般则都继承了新自由主义对小政府、经济自由、贸易开放的推崇。这种差异也反映在两种政治力量的区域观中。

20世纪90年代时，拉美国家曾普遍接受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彼时流行的“开放的区域主义”也与此相对应，是亲市场、重贸易的。而在21世纪初，新的区域主义被称为“后自由主义”或“后霸权主义”，^①这时的区域主义更多由反对过度全球化、过分偏重经济自由的左翼政权推动，不再聚焦自由贸易，而是在政治、社会领域有更高的一体化目标。这种新的区域主义与20世纪90年代的区域主义是针锋相对的。就南美洲的区域主义而言，南美洲国家联盟属于“后自由主义”“后霸权主义”的区域主义潮流，而南美进步论坛则是对“开放的区域主义”的回归。

在南美洲国家联盟筹建之初，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成员间存在意识形态上的大致共识。在21世纪头10年南美洲国家联盟初建之时，正是左翼力量在这一地区蓬勃发展之际。^②暂且排除苏里南和圭亚那^③，从2007年到2016年年初，在南美洲10个讲西语、葡语的拉美国家中，每年都有7~8个由左翼执政国家，而剩下的2~3个国家也并非由强硬的右翼统治，如智利的皮涅拉政府（2010—2014年）和秘鲁的加西亚政府（2006—2011年）尽管不是左翼，但当时在意识形态上都相对温和务实，与众多左翼政府之间不存在严重

^① 参见 José Antonio Sanahuja, “Del ‘Regionalismo Abierto’ al ‘Regionalismo Post-liberal’. Crisis y Cambio en la Integración Regional en América Latina”, en Laneydi Martínez Alfonso, Lázaro Peña y Mariana Vazquez, *Anuario de la Integración Regional de América Latina y el Gran Caribe 2008 - 2009*, Buenos Aires: Coordinadora Regional de Investigaciones Económicas y Sociales (CRIES), 2008, pp. 11 - 54; José Briceño - Ruiz and Andrea Ribeiro Hoffmann, “Post-hegemonic Regionalism, UNASUR, and the Reconfiguration of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South America”, in *Canadian Journal of Latin American and Caribbean Studies*, 2015, pp. 4 - 7.

^② 关于这一时期拉美左翼政府的界定，参见徐世澄：《中国学者对拉美左翼政府的政策分析》，载《拉丁美洲研究》，2009年增刊2，第53页；苏振兴：《拉美左派崛起与左派政府的变革》，载《拉丁美洲研究》，2007年第6期，第4页。

^③ 这两国情况较为特殊，它们在地理上位于南美洲，但在文化、语言上不属于拉丁美洲，两国参与区域主义的情况也与其他南美国家很不相同。这两国的政治分野在传统上主要是族裔的而非意识形态的，两国国内意识形态的格局也和其他南美国家不同。圭亚那两大政党在历史上都受到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2010年当选苏里南总统的鲍特瑟（Dési Bouterse）在意识形态上基本属于左翼，与委内瑞拉等国交好。圭亚那在2019年加入南美进步论坛，更多是因长期与委内瑞拉有矛盾而非典型的意识形态原因。2021年，苏里南也对南美进步论坛表达了好感，此时接替鲍特瑟的单多吉（Chandrikapersad Santokhi）总统尽管属于中左翼，但和鲍特瑟矛盾很深，在外交政策上和前者完全不同。圭亚那、苏里南参与南美洲国家联盟的情况和意识形态更相关，但其退出南美洲国家联盟而接近南美进步论坛则不是单一的意识形态因素所能解释的。

的对立（不过，皮涅拉在2018年再次当选后，对区域左翼政府的态度则较为强硬）。这一时期只有哥伦比亚和巴拉圭的右翼政府与左翼政府不时产生摩擦，而哥伦比亚在桑托斯总统于2010年上任后也一度调整政策，缓和了与委内瑞拉、厄瓜多尔的关系，并尝试在南美洲国家联盟中扮演更积极的角色。无疑，在存在相互竞争的区域主义模式时，区域国家间的共识可以避免区域主义运动间的内耗，推动区域主义前行。

特别是在区域大国之间，意识形态共识也起到粘合剂的作用。如前所述，主要推动南美区域主义的巴西、阿根廷、委内瑞拉3国彼此之间也存在着竞争和发展目标的差异：巴西将南美洲视为自身能施加特殊影响的区域，希望成为南美洲的领导国；委内瑞拉在南美洲国家联盟之外，还推动着美洲玻利瓦尔联盟这样以自身为中心、不限于南美国家参与的区域组织建设，希望成为拉美地区左翼国家的领导；阿根廷在一些问题上会选择制衡巴西，如力推包含墨西哥等中北美洲国家参与的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CELAC），以此稀释巴西的影响力。此时，能在权力竞争中调和各国关系的正是3国领导人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帮助淡化了大国间的竞争色彩。很多学者认为在卢拉、罗塞夫等左翼领导人执政时，巴西在南美洲的权力是一种“共识性霸权”或“软权力”，这也说明了意识形态对于维系区域稳定的重要性。

然而，有利于区域主义的意识形态分布情况在之后几年间就快速发生了变化。首先，拉美的左翼政党接连失去政权，阿根廷在2015年，秘鲁、巴西在2016年，智利在2018年都出现了这种情况。此外，2017年厄瓜多尔上任的左翼总统莱宁·莫雷诺（Lenín Boltaire Moreno）在当选后也和国内左翼力量分道扬镳，诸多政策更为接近右翼。以上情况直接导致了区域政府间的左翼共识消失。其中，巴西、阿根廷的政权转换对区域左翼力量的削弱尤为严重。

这种情况下，一些原本之前可以平稳着陆的问题就酿成了区域组织的危机。2012年，巴拉圭的左翼政权被以有争议的方式弹劾下台，巴西、阿根廷等左翼执政的区域大国在达成共识后暂停了巴拉圭在南美洲国家联盟的成员资格，于是未给区域主义的发展本身造成很大影响。但随着左翼共识不再，类似的2017年洪都拉斯选举争议和2018年尼加拉瓜的政治危机等问题都引发了南美国家间的激烈争执，而委内瑞拉这一南美洲国家联盟重要成员国的危机则成为斗争的焦点，诱发南美洲国家联盟的崩解。成员

国在退出南美洲国家联盟时，往往也直接以意识形态为理由，如阿根廷对其最终退出组织所给出的理由除了秘书长人选长达两年的空缺、联盟近年行政管理的混乱外，还包括联盟的议程“含有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内容，偏离了最初的目标”^①。南美洲国家联盟的迅速瘫痪，也是近年内区域意识形态形势对比变化的结果。

南美进步论坛虽然在短期内崭露头角，但其随后发展略显平庸，反而是南美洲国家联盟重现生机，这也与地区政府意识形态更迭速度的加快有关。在除圭亚那、苏里南之外的拉美 10 国中，在南美进步论坛成立的 2019 年 3 月，有 7 国是由中右翼政府执政，左翼执政的主要地缘政治棋手只有委内瑞拉 1 国，在 2020 年时，中右翼执政的国家甚至还曾达到 8 个。而截止 2021 年 10 月，此时中右翼执政的国家虽然仍有 6 个，但左翼在委内瑞拉和阿根廷两个重要国家都取得了政权，右翼相对左翼的优势已不再突出。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区域意识形态格局就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也造成南美进步论坛如今的声势远不如初创之时，而南美洲国家联盟则意外地重获希望。^②

在本文关注的时间段，南美国家与美国的实力对比情况没有质的变化，此时影响美国对南美区域主义影响的因素主要是美国的具体对拉政策。总体而言，美国对南美洲的关注度是有限的，这也为南美洲国家联盟的兴起创造了一定条件。然而，在奥巴马政府后期特别是特朗普时期，美国政府对委内瑞拉的敌意逐步加深，采取了一系列敌视委内瑞拉等左翼政权的政策。美国的态度无疑对区域右翼力量有所鼓励，也为南美进步论坛的活跃创造了条件。^③ 美国等域外大国对南美的区域政策也常常随南美地区局势变换而有所调整，这也给南美区域主义在短期内的的发展增加变数。

四 结语与展望

总之，拉美区域主义发展的整体大势是由一些历史上相对稳定的情况塑

^① “La Argentina Se Retira de la UNASUR”, 12 de abril, 2019. <https://www.cancilleria.gob.ar/es/actualidad/noticias/la-argentina-se-retira-de-la-unasur>. [2020-04-14]

^② 不过，不同的区域左翼政权如今在对委内瑞拉、古巴等国政府的态度上也存在裂痕，因此区域左翼政权的重新风行是否意味着南美洲国家联盟走向复兴，还有待观察。

^③ 严谨：《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对拉美政策的调整及其影响》，载《拉丁美洲研究》，2020年第2期，第32页，第36页。

造的，但短期内又很容易受不稳定因素的影响而发生变化。这样看来，在短期内预测拉美区域主义的发展态势和方向相对困难，因为这需要预测各个拉美国家执政力量的变换和拉美国家短期内的力量发展情况。当然，由于新冠疫情因素在短期内难以消除，这很可能令拉美国家政府在短期内都境况窘迫，拉美区域主义也因而在此短时间内都难以取得大的进展。

放眼更长的未来，拉美区域主义大体也将保持现状。拉美国家的地理、人文情况基本是常量，而拉美国家特别是地区大国想要在经济领域真正突破在国际上的边缘地位也并非易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拉美区域主义仍将是拉美国际关系领域的重要主题，但仍难以取得质的飞跃。与此同时，虽然拉美不同派别政府的更迭与力量变化难以具体预测，但考虑到选举的周期性，至少政权变换依然会是普遍现象，拉美区域主义的“起伏不定”恐怕也将长期延续。

本文主要说明了拉美区域主义长期“弱而不竭”与具体时段中“起伏不定”现象产生的原因。不过，区域主义“起伏”的具体时间节点则并非本文可以解决的，这涉及到对政府政策这一短时段因素的细化分析，需要探讨政府力量和意识形态兴衰的具体原因及两者间的交互作用，这是未来研究可以展开的方向。

(责任编辑 王 帅)

习近平新时代大国外交思想研究

中美竞争背景下中拉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

黄乐平

内容提要：在中美竞争加剧的背景下，中国应加强与世界各国尤其是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扩大伙伴关系网络。近年来中国与拉美国家的经贸关系突飞猛进，中拉命运共同体已具备一定的物质基础。然而，当前中拉关系的本质仍是理性主义主导的复合相互依存关系，双方仍处于利益驱动的洛克文化中，合作的绝对收益带来的共赢并不能掩盖相对收益分配不平衡造成的冲突。此外，美国历来视拉美为其“后院”，对中国在拉美的一举一动十分敏感。中拉关系要克服其内在矛盾和外在不利条件，实现提质升级，就要超越纯粹理性主义的功利关系，由洛克文化向康德文化跨越。建构主义理论认为，无政府文化是国家造就的，是行为体互动和社会建构的结果。中国作为有影响力的大国，必须积极作为，利用国际机制与拉美国家开展更广泛、更深层次的互动，在现有共识基础上形成更多共有观念和群体认同，通过全球治理合作、产能合作和人文交流，互塑和建构新的集体身份和集体利益，构建真正共赢的命运共同体。

关键词：中美竞争 中拉命运共同体 复合相互依存 建构主义 康德文化

作者简介：黄乐平，经济学博士，深圳大学副教授。

中图分类号：D822.3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649 (2022) 04-0077-20

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当前中美竞争加剧成为大变局中最令世人瞩目之焦点。全球金融危机以来，随着中美相对实力的变化，美国开始通过亚太再平衡战略压制中国，进而通过贸易战、科技战、印太战略主动挑起中美竞争。拜登政府上台后更是利用涉港、涉疆、涉台等问题拉拢其盟友在意识形态领域对中国频频发难，在台海、南海制造军事威胁。这些都使得中国发展的国际经济和安全环境不断恶化。面对这样的局面，中国一方面要针锋相对，另一方面要保持战略定力、与其斗而不破，更重要的是要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加强与世界各国尤其是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团结国际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争取更广泛的国际支持，从而在中美竞争这场持久战中赢得主动。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以下简称“拉美”）作为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地区之一，历来是中国外交和对外合作的重要对象，是中国外交取得重要发展的标志，也是中国对外开放多元化的重要支点。21世纪以来中拉经贸关系飞速发展，全方位合作方兴未艾，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拉美领导人会晤中正式提出要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然而，美国历来视拉美为自己的“后院”，对域外势力进入拉美始终心存戒备，近20年来不断加强的中拉战略合作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作对其安全的威胁。在当前中美竞争不断加剧的背景下，“门罗主义”再次抬头，“中国威胁美国后院论”再次甚嚣尘上。相对于中国与亚非国家的合作，中拉合作和命运共同体构建面临来自美国更直接的挑战和干扰。

本文试图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视角探讨两个层面的问题：从理论层面看，当前中拉关系的实质是什么？未来中拉命运共同体的实质和内涵应是什么？该共同体如何为中国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贡献？从中拉关系实践的层面看，中拉合作如何克服来自内部和外部的挑战、实现稳步健康发展？以及如何夯实现有合作基础、阔步迈向新的阶段？

一 现有研究述评

国内外与本文主题有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首先是中拉关系和中拉命运共同体研究。关于中拉关系的发展阶段、战略定位和意义，国内有研究指出中拉关系已超越既往的“自然生长”方式，进入以双方主动构建为主要特点的新发展阶段；在战略定位上中国将拉美从对外关系格局里相对边缘的选项转化为显性“增量”，而拉美将中国作为其发

展战略中重要的外部合作选项之一，某些国家甚至将中国视为平衡西半球地缘政治格局和抵御北方大国霸权的重要砝码。^① 关于合作战略和路径，有研究认为中拉合作要借助“一带一路”倡议这个重要抓手，在“五通”领域中寻求共赢，促进中拉命运共同体的构建。^② 中拉应借助“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实现发展战略对接，使拉美成为中国发展的有力支撑。^③ 拉美学者也在探索未来中拉合作的路径。有研究指出在贸易、投资、基础设施和能源合作的基础上，中拉应在环保、科技、创新和社会发展等方面开创新的合作领域。^④ 然而有些拉美和欧美学者仍对中拉关系的本质存疑，认为中拉贸易互补貌似“完美婚姻”，但实质上依然是旧有的“中心—外围”关系，不利于拉美产业升级。^⑤ 而对未来中拉经贸合作的专门研究恰好有助于释疑。国内有研究指出中国的供给侧改革将为中拉经贸合作提供商品机遇和资本机遇，而“一带一路”倡议将在很大程度上满足拉美对能源、道路、通信、互联网等软硬件投资和工业经济升级的需求。^⑥ “一带一路”倡议有利于拉美参与全球价值链和攀升产业价值链，有利于解决其产业结构失衡、基础设施落后、区域一体化发展不足、营商环境不完善、创新能力不足等问题。^⑦ 然而有拉美学者对中国对拉投资领域和对象集中的问题表示担忧，同时指出随着中国经济减速和大宗商品价格走低，中国企业会在海外市场寻求新的投资领域，如服务业。^⑧

其次是中、美、拉三边关系研究。21世纪初，针对“中国加速进入美国‘后院’会损害美国利益、削弱其在美洲的影响力”的论调，有国内研究指出

① 张凡：《中拉关系及中国对拉战略研究的一种进路：进展与问题》，载《拉丁美洲研究》，2020年第1期，第26-27页。

② 江时学：《基于“一带一路”倡议的中国—拉美命运共同体探究》，载《社会科学战线》，2018年第7期，第70页。

③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美研究所课题组：《“一带一路”视角下提升中拉合作的战略思考》，载《拉丁美洲研究》，2018年第3期，第1页。

④ Cepal, *Explorando Nuevos Espacios de Cooperación entre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 y China*, Santiago de Chile: Cepal, 2018, pp. 3-6.

⑤ Ralf J. Leiteritz, “China and Latin America: A Marriage Made in Heaven?”, in *Colombia Internacional*, Vol. 75, No. 1, 2012, pp. 49-81; R. Jenkins, “Latin America and China – A New Dependency?”, in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33, No. 7, 2012, pp. 1337-1358.

⑥ 岳云霞：《中拉经贸合作：改革开放的动能、影响与导向》，载《海外投资与出口信贷》，2018年第6期，第29页。

⑦ 张勇、史沛然：《“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拉经贸合作机遇：全球价值链视角》，载《太平洋学报》，2018年第12期，第35页。

⑧ Miguel Pérez Ludeña, *Chinese Investments in Latin America: Opportunities for Growth and Diversification*, Santiago de Chile: Cepal, 2017, p. 5.

中拉关系秉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且中拉关系历史短、起点低、基础薄弱，同时美国对拉美的影响力无与伦比，而大多数拉美国家出于自身安全与政治经济利益的考虑，也将发展并巩固与美国的关系置于其对外战略的首位，因此中国无意也不可能威胁美国“后院”。^① 有美国学者也认为，中拉不太可能建立同盟来限制美国对拉美的影响，但美国应该警醒，重视与拉美的关系。^② 然而十余年后，美中在拉美地区存量与增量的优势差异矛盾与美拉之间“门罗主义”思维与拉美联合自强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使中、美、拉三角关系的动态格局呈现愈加复杂的变化趋势。^③ 对此，美国学界“鹰派”认为中国正在拉美“破坏性崛起”，因支持左派“民粹主义”政权和扶植“代理人”而逆转了拉美民主化进程，是美国主导的西半球秩序的挑战者和破坏者。^④ 但也有拉美和美国学者认为中拉关系的重点仍是经贸领域，中国并未在拉美寻求与美国霸权对抗，“新两极格局”和西半球“新冷战”的提法并不准确。然而，中拉关系升温的间接后果是拉美对美国逐渐疏离，美国对拉美的影响力逐渐减弱。随着中美关系不断紧张，拉美可能成为两国新的“竞技场”。^⑤

综上，现有文献广泛研究了中拉经贸合作的路径、“一带一路”对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的意义、中拉关系的发展阶段和战略定位，同时研究了中美拉三边关系的历史发展过程、美国学界和政界对中拉关系的定性和反应以及中国应采取的应对策略，然而此类研究仍然存在可进一步探讨和突破的空间，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现有文献学理性研究较少。如何用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分析和把握中美拉三边关系的实质和未来中拉命运共同体的内涵及构建路径，中拉如何超越纯粹理性主义的功利关系、在观念和文化上建立紧密的精神纽带和伙伴关系，值得进一步研究。其二，现有文献对新形势的关注较少。在当前新冠疫情全球肆虐、全球产业链遭受破坏并重构、中美竞争

① 吴洪英：《“拉美成为中国后院论”辨析》，载《现代国际关系》，2009年第3期，第36-42页。

② R. Roett and G. Paz, *China's Expansion into the Western Hemisphere: Implications for Latin America and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 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8, pp. 239-259.

③ 周志伟：《如何看待中美拉三角关系中的两组结构性矛盾》，载《当代世界》，2018年第4期，第31-34页。

④ E. Ellis, *China on the Ground in Latin America: Challenges for the Chinese and Impacts on the Regio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4, p. 8.

⑤ Detlef Nolte, "The Dragon in the Backyard: US Visions of China's Relations toward Latin America", in *Pap. Polít.*, Vol. 18, No. 2, 2013, pp. 587-598; José León-Manríquez and Luis F. Alvarez, "Mao's Steps in Monroe's Backyard: Towards a United States-China Hegemonic Struggle in Latin America?", in *Revista Brasileira de Política Internacional*, 57 (special edition), 2014, pp. 9-27.

全面升级、美国有可能通过产业链区域化和5G建设等问题逼迫拉美国家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的新形势下，中拉关系如何克服美国的干扰，在构建命运共同体目标的指引下，利用好“一带一路”这个重要抓手，加强中拉在产能等领域的合作，值得我们研究。

二 国际政治经济学主流理论梳理

作为国际关系学一个学科分支的国际政治经济学（IPE）滥觞于20世纪70年代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的论战。在二战和冷战前半期，强调权力和冲突的古典现实主义主导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其代表人物摩根索在1948年总结出现实主义的3个核心观点：国家是国际关系的主要行为体；国际政治的实质是权力政治；安全是世界政治的首要问题，军事是权力政治的核心。^①20世纪70年代，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越战结束，西方国家陷入滞胀。与此同时欧洲一体化的推进，使国际经济上升为“高层次政治”，国家间经济相互依存的趋势引发关注。在这一背景下，自由主义理论复兴，国际政治经济学兴起。自由主义学者基欧汉和奈提出“复合相互依存”理论，对现实主义上述3个观点提出质疑，认为非国家行为体（如跨国公司）亦可直接参与国际政治，各问题间无明确的等级区分，军事力量不是主要的政策工具。^②但其同时指出，相互依存并不意味着互利，而是包含代价（依存限制自主权）、伴随冲突（依存各方存在相对受益和相对受损）的；相互依存也包含竞争，并不必然“非零和”；不对称性是相互依存政治的核心，依赖性小可以是一种权力资源。^③那么，维持和管理这样一个相互依存的国际体系需要什么条件和前提？在20世纪70年代产生的霸权稳定论认为，霸权国的兴衰和国际政治关系在民族国家构成的国际体系中有重要意义，国际机制只不过是霸权国为维持国际体系稳定而提供的公共产品。如果霸权国承担的义务和成本超过其收益，就会走向衰落，并有可能与新兴国家爆发霸权战争，

^① [美] 汉斯·J. 摩根索著，徐昕等译：《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59-343页。

^② [美] 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著，门洪华译：《权力与相互依赖》（第四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2-33页。

^③ [美] 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著，门洪华译：《权力与相互依赖》（第四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0-15页；[美] 小约瑟夫·奈、[加拿大] 戴维·韦尔奇著，张小明译：《理解全球冲突与合作：理论与历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337页。

从而带来国际体系变革、新的霸权冲突和霸权更替。^① 而自由主义学者则认为国际机制是因国家间为降低交易成本、摆脱“囚徒困境”的需求而产生的，霸权国的衰落并不必然带来不稳定和冲突，因为各国有共同的利益，会通过维持现有国际机制和创造新的合作机制来实现合作。^②

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理论虽然相互争论，但基本都属于理性主义的范畴，因为它们或重视物质性因素对行为体的直接影响，或强调行为体为实现利益最大化而做出的理性选择。而20世纪80年代后期形成的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则强调物质因素的社会化和观念化，既坚持科学实在论的认识论，又坚持理念重于物质、观念决定利益、利益决定行为的本体论，希望在理性主义和各种反思主义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并通过在20世纪90年代与自由主义的论战使国际政治研究由理性主义转向建构主义。^③ 此次论战围绕国际制度为何能促成合作这一论题展开。自由主义认为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行为体的身份、利益/偏好都是先验的，面对国际制度，行为体会利用规则来进行理性选择，在合作中实现利益最大化。而建构主义则首先认为无政府状态不是先验的客观事实，而是国家造就的，是行为体互动和社会建构的结果，既可以形成霍布斯文化（每个人反对每个人），也可以形成洛克文化（承认相互生存权并竞争）和康德文化（构筑友善共同体）。^④ 此外，身份和利益也是后验、互动的结果，^⑤ 其基本逻辑为：行为体之间的互动（或相互学习）形成一定的文化及国际规范和观念，进而在现有或首创的制度中得到认同（形成共有知识和文化）并取得合法性，得到各成员认可，然后通过制度来建构行为体身份和利益，并最终决定其行为。^⑥ 建构主义代表人物温特认为，虽然各国在无政府状态下存在实力差异和竞争，但各国也追求平等，需要被承认；身份高度认同后会出现世界国家，到那时真正的世界治理才会实现。可见，建构主义是一种乐观的进化理论，它认为

① [美] 罗伯特·吉尔平著，宋新宁译：《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85-207页。

② Robert O. Keohane,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65-109.

③④ [美] 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译者前言VI-XXVII，第244-296页。

⑤ Alexander Wendt, "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s of I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litical Power", in *International Theory: Critical Investigation*,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135.

⑥ Friedrich V. Kratochwil, *Rules, Norms and Decisions: On the Conditions of Practical and Legal Reasoning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omestic Affair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56-88.

国际社会将朝着康德文化的方向发展，朝着世界政府和世界大同的方向发展。^①

然而，正是由于霍布斯结构、洛克结构和康德结构这三种政治文化都是由行为体互动建构的，因此在现实的社会建构过程中受规范内化等级不同的影响会形成不同的共有观念和政治文化。温特认为，行为体在遵循上述三种文化规范时的三种理由或曰规范得以内化的三种等级，分别是被迫遵守（武力）、利益驱使（代价）和承认规范的合法性，这三种理由基本上与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理念主义）关于规范在国际生活中的作用的理论相对应。只有在第三种内化等级即合法性上，行为体才真正被文化所“建构”。^② 同样的国家（行为体）之间因不同的互动和社会建构方式，会建构不同的观念、身份和利益，从而造就不同的无政府文化。例如，欧洲国家之间历史上曾处于霍布斯文化和洛克文化中，而二战后在北大西洋国家之间以及在欧盟国家之间，其行为体的互动和共有观念、身份和利益的建构处于规范内化的第三等级，因此超越洛克文化形成了较为明显的康德文化结构。与其形成对照的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与美国及西方国家之间的互动，及共有观念、身份和利益的建构过程，受到大国竞争博弈、缺乏政治与安全互信等现实主义及文化因素影响而并未发展为规范内化的第三等级，因此未形成康德文化，仍处在介于霍布斯文化和洛克文化之间的文化结构中。

三 中美拉三边关系的现状和挑战：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

上文梳理了国际政治经济学主流理论尤其是建构主义理论的主要观点，并总结了建构主义提出的国际体系三种无政府文化——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的特点。下面将从这一理论视角分析中美拉三边关系的现状和面临的挑战。

（一）中美拉三边关系的现状

当前中拉关系以及中美、美拉关系仍处于洛克文化中。洛克文化的特点是国家间的主要关系不是安全冲突而是经济相互依存和理性主义的竞争，但相互依存具有不对称性和对彼此不同程度的依赖性，以及存在因相对收益不均而产生的冲突。首先看中拉经贸关系。21世纪以来中拉经济相互依存度不

^① Alexander Wendt, "Why a World State Is Inevitable", in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9, No. 4, 2003, pp. 491-542.

^② [美] 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47页。

断加强。2020年中拉货物贸易总额为2002年数额的18倍，达到3201.2亿美元，占当年中国与世界货物贸易总额的6.9%；2020年中国对拉美直接投资净额为166.6亿美元，占当年中国对世界直接投资净额的10.8%，是对非洲投资的3.9倍、对美国投资的2.8倍。^①2018年1月，中国正式邀请拉美国家自愿加入“一带一路”倡议，截至2022年3月，已经先后有21个拉美国家同中国签署了“一带一路”共建协议。中拉经贸关系飞速发展得益于21世纪头十年里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世界经济处于繁荣周期以及中美关系相对稳定。再来看中美经贸关系。中美自1979年建交以来，走过40多年的曲折发展过程，美国始终希望“非自由”的中国向“自由”的美国靠拢，将中国纳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之中，^②因此将中国视为“有缺点的合作伙伴”。2020年中美货物贸易总额为5869.8亿美元，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净额为60.2亿美元，实际利用美国直接投资23亿美元。^③最后看美拉经贸关系。美国始终是拉美国家最重要的经贸伙伴。2021年美拉货物贸易总额为9640.3亿美元，是中拉货物贸易额的3倍（见图1）；2019年美国对拉美直接投资存量为9310.2亿美元，近年来有被中国赶超的趋势（见图2）。^④从对拉投资类型看，美国无论在跨国并购还是在新开工项目方面都具有绝对优势，但2020年在跨国并购方面被中国、西班牙等国超越（见图3、图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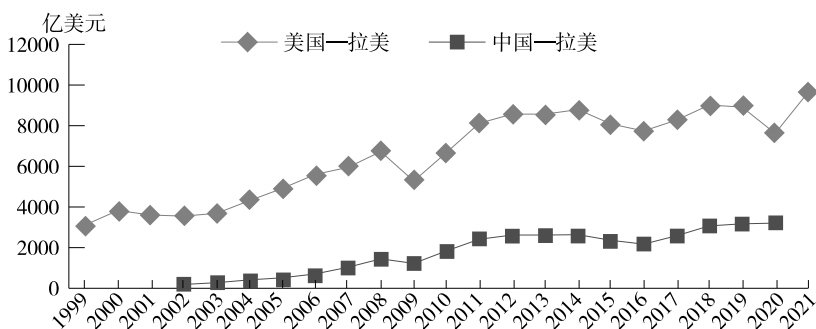


图1 美拉和中拉货物贸易额

资料来源：根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https://www.bea.gov>）和中国国家统计局（<http://www.stats.gov.cn/>）数据绘制。

① 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s://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2022-05-20]

② N. De Graaff and B. Van Apeldoorn, “US - China Relations and the Liberal World Order: Contending Elites, Colliding Visions?”,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94, No. 1, 2018, pp. 113 - 131.

③ 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s://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2022-05-20]

④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对拉投资主要为金融投资。例如，2020年中国对拉直接投资存量6298.1亿美元中有97%位于开曼群岛和英属维尔京群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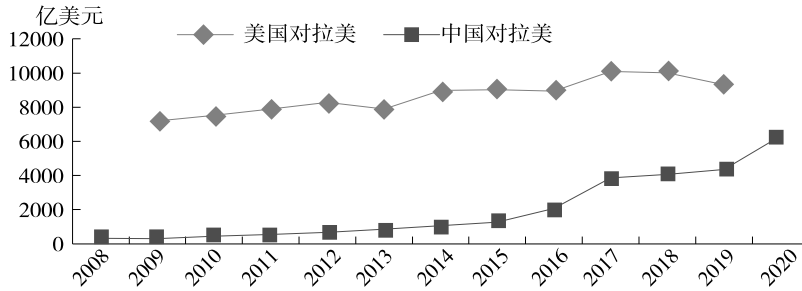


图2 美国对拉美地区和中国对拉美地区的直接投资存量

资料来源：根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 (<https://www.bea.gov>) 和中国国家统计局 (<http://www.stats.gov.cn/>) 数据绘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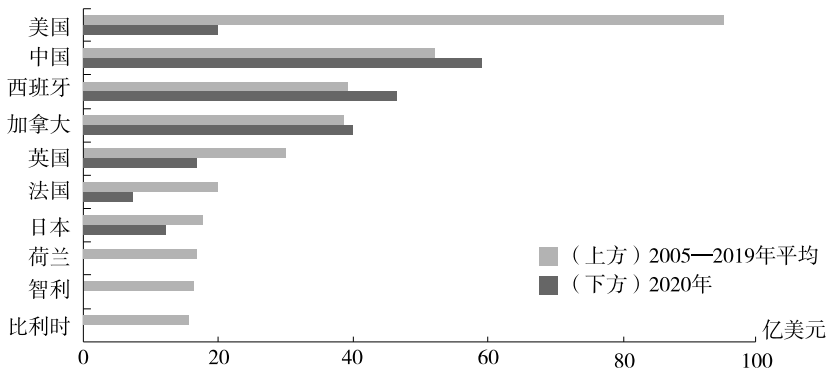


图3 世界部分国家在拉美的跨国并购投资

资料来源：Cepal, *La Inversión Extranjera Directa en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 Naciones Unidas, Santiago, 2021, p. 1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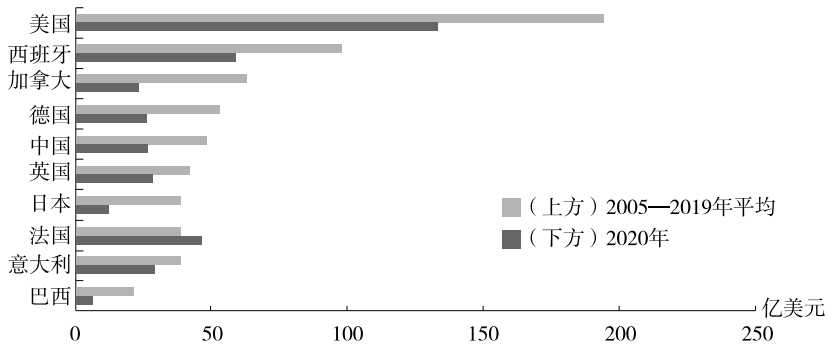


图4 世界部分国家在拉美的新开工项目投资

资料来源：Cepal, *La Inversión Extranjera Directa en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 Naciones Unidas, Santiago, 2021, p. 111.

自由主义学者米尔纳用新自由制度主义的4个要素阐述相互依存的国际体系的特征：跨国公司和非政府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成为世界政治的重要行为体；经济力量等因素成为除军事力量之外新的世界政治权力；相互依存成为国际体系的定义特征；世界政治中的合作是可能的。^① 美中两国作为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相互依存，和则两利，斗则两伤，合作是自建交40年来中美关系的基本共识。而中拉、美拉在经济合作共赢的目标驱动下，相互依存程度也不断加强。按照建构主义学者温特的观点，当今相互依存的世界其实大部分处于所谓的洛克文化之中，即国家间为竞争关系，相互承认生存和自由权利，尽量避免战争并将其控制在有限范围内，对合作产生的绝对收益更加看重。各国相互承认主权，其实就是共享一种制度，共有一个期望，共同维护一套国际法。所以说，国际法并不仅是一种物质力量，更是一种共有观念，其内涵是相互尊重和承认。相对于被强迫，当前中美拉各方形成洛克文化更多地是出于理性主义的利己动机，也就是说遵守共同的规范和制度符合其自身利益。^②

（二）中美拉三边关系面临的挑战

中拉关系经过反应式、顺势而为的自发发展和自主发展两个阶段，到21世纪第二个十年进入区域性、整体性、全面性合作新阶段，在利益需求驱动的基础上，双方合作更注重顶层设计、政策沟通、建立对话和合作机制，以及人文交流。^③ 然而恰恰是发展到这一阶段，中拉关系的一些深层次矛盾也开始逐渐显现出来，在很多领域进入“瓶颈”期，主要问题在于贸易结构不平衡导致拉美国家对中拉关系产生疑虑。据联合国拉美经委会（CEPAL）统计，2013年拉美对华出口中73%为初级产品，仅6%为制造产品，而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出口中这两个数字分别为41%和42%，同时中国对拉美出口中91%为制造产品。对此，有评论认为中拉贸易结构简言之就是制成品交换原材料。^④ 2017年拉美对中国贸易赤字达670亿美元。另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统计，1995—2013年期间，中国对南美洲国家的贸易互补性指数

^① Helen V. Milner and Andrew Moravcsik (eds.), *Power, Interdependence, and Nonstate Actors in World Politic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5-21.

^② [美] 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72-281页。

^③ 吴白乙主编：《面向新时代的中拉关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第1-5页。

^④ 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著：《第一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Celac）：与中国探索经贸和投资合作空间论坛》，智利圣地亚哥：联合国出版，2015年，第23页。

平均为 0.449，而南美洲国家对中国的该指数平均为 0.291，即中国的出口商品可满足南美洲国家 44.9% 的市场需求，而南美洲国家的出口商品只能满足中国 29.1% 的市场需求。^① 这说明拉美对中国的贸易依存度远高于中国对拉美的贸易依存度。这样的贸易结构和国际收支虽然是由中拉双方的比较优势和市场行为导致的自然结果，但似乎与拉美结构主义和依附论所描绘的“中心—外围”结构以及贸易比价恶化现象一致，因此容易引起一些拉美国家的不满，认为这样的贸易结构不仅不利于其债务的减少，更重要的是对拉美国家的制造业形成了强烈冲击，导致其经济脆弱性增加，患“荷兰病”的风险加剧，不利于其产业结构升级和扭转“去工业化”“大宗商品化”的趋势。^② 因此，有些人将中国在拉美的经济存在称为“新殖民主义”。另外，墨西哥等制造业相对发达的拉美国家时常对中国发起反倾销诉讼，贸易争端频发，并在美国等第三方市场与中国展开激烈竞争。正如上文中复合相互依存理论所指出的，相互依存并不必然“非零和”，也包含竞争并伴随着冲突。虽然合作为各方带来绝对收益，创造双赢，但相对收益分配不平衡会造成一定的政治冲突。^③

中拉相互依存不断加深，但这种相互依存是不对称的，在这一关系中，中国的依赖性低，脆弱性也较低，因此改变该相互依存体系结构（逃离体系或改变游戏规则）和政策调整的相对成本较低；但是中国的敏感性并不低，因为来自拉美的初级产品对中国的经济安全有很重要的意义，中国很重视同拉美的经贸合作。而拉美在中拉相互依存中的敏感性和脆弱性都较高。拉美历史上长期存在对欧美“中心国家”的经济依附。目前很多拉美国家虽然继续实行初级产品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但仍然希望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和提高工业化程度实现现代化和民族振兴，因此对中拉贸易对其经济结构的正负面效应及从中获得的相对收益非常敏感。中国是很多拉美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21 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率的变化甚至通过中拉贸易影响到拉美国家的经济走势，因此在中拉相互依存关系中，拉美的依赖性和脆弱性较高。可见，当前中拉关系仍处于理性主义的、利益驱动的、因相对收益不平衡会造成冲

^① G. D. Silva, M. F. M. Gomes y E. C. Teixeira, “Efecto Derrame del Crecimiento de China en América del Sur: Un Análisis Basado en el Comercio Internacional”, en *Revista de la CEPAL*, No. 126, 2018, pp. 57–58.

^② J. D. Lima y A. Pellandra, “La Irrupción de China y su Impacto sobre la Estructura Productiva y Comercial en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 en *Serie Comercio Internacional*, Santiago: Cepal, Naciones Unidas, 2017, p. 7.

^③ [美] 小约瑟夫·奈、[加拿大] 戴维·韦尔奇著，张小明译：《理解全球冲突与合作：理论与历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年，第 333–337 页。

突的复合相互依存阶段。虽然拉美因其高度敏感性往往成为冲突的发起方，但中拉双方都有跨越当前阶段、迈向更高层次合作阶段的愿望和动力。

影响中拉合作的两个重要外部变量——中美关系和美拉关系虽基本保持相互依存的基调，但近年来出现诸多不确定性，在地缘政治上为中拉合作带来挑战。首先，当前中美关系有从复合相互依存滑向现实主义的风险。霸权稳定论者认为霸权国和自由国际经济秩序之间存在一种“霸权困境”：霸权周期前期，霸权国更多追求绝对收益，愿意维持一个导致缩短与竞争者差距的自由国际经济秩序；霸权周期后期，霸权国更多看重相对收益，更倾向于执行重商主义政策，而这最终会导致自由国际经济秩序的衰退甚至崩溃。^① 在中国崛起和美国霸权衰落的背景下，美国开始注重中美战略地位的相对变化及其相对收益的变化，不惜背弃其维护多年的自由贸易原则而对中国发动大规模贸易战和科技战，甚至不惜发出新冷战威胁，以压制中国发展。另外，霸权稳定论者认为霸权更替将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发生。美国学者奈虽然认为只要不发生战略误判，中美之间的战争并不必然发生，^② 但随后又提出“金德尔伯格陷阱”理论，担心中国在崛起的同时不能提供足够的全球性公共产品，进而引发全球治理体系崩溃。^③ 其次，美国对拉美政策的霸权主义意图逐渐回归。为扭转小布什和奥巴马政府时期因反恐战争和重返亚太而与拉美关系相对疏远的趋势，以便重新控制拉美，阻止中国和俄罗斯等国“乘虚而入”，特朗普政府上台后调整对拉政策，具体为：以价值观为标准拉拢拉美右翼，打击左翼，遏制反美联盟，以解构其地区内部凝聚力和团结，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通过重新主导美洲国家组织等机构来弱化拉美国家自己主导的地区一体化进程，以加强对该地区的控制和影响力；重新强调门罗主义的价值，通过宣扬“中国威胁论”、推出与“一带一路”倡议针锋相对的对拉投资融资法案和“美洲增长”倡议、打击中拉整体合作最主要的平台——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CELAC）以达到阻挠中拉合作、排挤中国的目的。^④ 拜登政府

^① Arthur A. Stein, “The Hegemony’s Dilemma: Great Brita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8, No. 2, 1984, pp. 355–386.

^② Joseph S. Nye, Jr., “The Challenge of China”, in Stephen Van Evera (ed.), *How to Make America Safe: New Policies for National Security*, Cambridge, 2006, pp. 73–78.

^③ 杨增崇、杜成敏：《“金德尔伯格陷阱”的实质评析》，载《思想教育研究》，2018年第7期，第75页。

^④ 严瑾：《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对拉美政策的调整及其影响》，载《拉丁美洲研究》，2020年第2期，第22–39页。

上台后虽一改特朗普政府对拉强硬姿态，但通过“扶右打左”控制拉美的总方针不变。2021年，拜登政府推出“重建更好世界”计划（B3W）并将委内瑞拉等左翼政府执政的拉美国家排除在外，试图进一步巩固美国在拉美的主导地位。

综上，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看，当前中拉之间的主要关系是相互依存和理性主义的竞争，其相互依存具有不对称性和对彼此不同程度的依赖性，存在因相对收益不均而产生的冲突。因此，中拉关系仍处于洛克文化中，现阶段该文化实现的主要路径和规范内化的方式依然是利己，相互依存的主要驱动力依然是利益。影响中拉合作的两个重要外部变量——中美关系、美拉关系也处于相互依存的洛克文化中，而其现实主义风险在加剧。要使中拉关系增强抵抗内外部风险的能力，突破瓶颈、提质升级，就必须超越利益驱动的洛克文化，构建更高文化层次的中拉命运共同体。

四 未来中拉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建构主义的视角

上文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视角分析了中美拉三边关系的现状和面临的挑战，接下来将运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建构主义理论分析中拉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路径。

（一）康德文化：中拉命运共同体的一种构建逻辑

建构主义学者温特认为，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文化）是国家造就的，可以通过行为体互动和社会建构进行主动选择，即文化是自我实现的预言。行为体在互动过程中形成共有观念，再造施动者身份和利益，并在实践中促进了体系结构变化，实现洛克文化向康德文化跨越。康德文化以友谊的角色结构为基础（但友谊的概念只涉及国家安全，即互不发动战争，而在其他领域朋友之间也会有冲突），友谊在时间上无限制。更适合康德文化的规范化途径不是利己，而是合法性，即行为体发自内心地认为约束是合理的，从而心甘情愿地遵守相关规范和制度。^①虽然上述理论将康德文化的友谊概念限定在集体安全领域，但其国家身份和利益的建构逻辑为我们创建新型国际关系的进路提供了启示。我们可以将未来中拉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设定为一种康德

^① [美] 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72-310页。

文化友善共同体的建构进程：在现有基础上，中拉双方通过双边、多边交流和整体合作继续进行广泛而深入的互动，在中国的命运共同体理念和拉美国家的全球治理理念中寻求共识，形成更多的共有观念，通过现有或新的制度得到各方认同，进而建构全新的行为体身份和利益，减少利己身份的成分，建立更多的集体身份，在观念和文化上建立紧密的精神纽带和伙伴关系，形成基于友谊角色结构的友善共同体。

中拉形成这样的友善共同体已具备一定的基础。一是，中拉关系在物质层面已经打下坚实的基础。中拉经贸关系经过数十年的自发和自主发展，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已经日趋紧密。中拉货物和服务贸易额不断增加，中国已成为拉美地区第二大贸易伙伴国，仅次于美国，甚至已成为一些拉美国家的第一大贸易合作伙伴。中国已与智利、秘鲁和哥斯达黎加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并正在与更多的拉美国家进行自由贸易协定谈判。拉美成为中国海外投资第二大目的地，投资增量和存量不断增加，投资主体、对象和地域日益多元化。在此基础上，拉美成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自然延伸，越来越多的拉美国家与中国签订“一带一路”共建协议。此外，中国和巴西两个大国利用“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引领中拉合作，诸多拉美国家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加入美洲开发银行，中国建立中拉产能合作投资基金，一系列举措都助力中拉经贸、金融合作迈上新台阶。二是，中拉在观念层面已形成越来越多的共识。习近平就任国家主席以来4次访问拉美，中国先后发布两份对拉政策文件，中拉先后召开两次中拉论坛部长级会议，双方在国际政治事务、全球经济治理、全球化、自由贸易、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应对气候变化、网络安全等议题上有广泛共识，都认同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机制和全球治理制度的基本原则，在亚太经合组织、二十国集团（G20）等一些国际多边舞台上广泛合作。三是，中拉已拥有一定的集体身份和共同利益。20世纪下半叶，中拉共同拥有第三世界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集体身份，在国际事务中患难与共，在联合国等多边场合真诚合作，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自身发展的权益。当前，中拉作为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代表，都反对单边主义、霸凌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希望推动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维护双方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总之，中拉之间虽然存在一定的文化和价值观差异，不具备类似北大西洋国家或欧盟国家之间在文化和价值观方面所天然拥有的共有观念和集体身份，但中拉之间

有充分的政治互信，人民之间自古友谊深厚，基本不存在地缘政治矛盾和冲突，基本不存在任何一方因文化中心论导致的心理优越感，都认同“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都有着对经济发展和繁荣的渴望。此外，中拉双方有加强互动、形成集体身份和集体利益的共同愿望，相向而行，基本不存在一方积极主动而另一方消极或抵制的情况，因此具备构建命运共同体的条件。

（二）中拉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路径

如何将有限的洛克文化认同发展为充分的康德文化认同，扩大集体身份范畴？温特指出，文化具有保守性质，体系结构的变化非常困难。体系中的重要行为体（一般指大国）必须改变其行为，持之以恒地开展造就朋友的“亲社会”活动，才能打破维持体系稳定的内在根源（行为体自身对安全和秩序预期的需求）和外在根源（制度对行为的奖惩），导致文化的变化和集体身份的增加。^① 作为在世界上影响力不断提升的大国，中国近年来在中拉关系中积极作为，创造性地提出许多具有战略意义的构想和方案，在双方互动中表现出更多的主动性。2014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中拉应构建政治上真诚互信、经贸上合作共赢、人文上互学互鉴、国际事务中密切协作、整体合作和双边关系相互促进的中拉关系“五位一体”新格局，得到拉美国家的广泛认同。中国的积极行动已为中拉构建具有康德文化特点的命运共同体开辟了道路。未来，中国要继续与拉美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加强互动。首先在物质层面通过更高层次合作化解既有矛盾，构建更稳固的利益共同体，为建构共有观念创造物质条件；其次在文化层面加强交流互鉴，构建价值共同体，从而全方位建构共有观念、集体身份和集体利益。

第一，在全球治理上加强合作。在国际风云变幻、现实主义威胁不断增加、非传统风险加剧、全球化受挫的背景下，通过真诚互动明确和加深中拉构建命运共同体的共有观念，巩固和加强双方在国际政治上既有合作伙伴的集体身份和共同利益。中国在参与全球经济贸易分工、融入世界体系的过程中逐渐就自身对全球治理的责任和作用有了越来越明确的认识。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等事件导致“全球治理失灵”、新兴经济体力量上升导致全球权力转移、西方发达国家相对衰落并出现逆全球化趋势、全球治理规则改革滞后

^① [美] 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30-333页。

的情况下，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中国方案，号召各国妥善处理利益和观念冲突，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和世界共同利益。拉美有33个国家，在国际组织中拥有重要地位和议程设置能力，在全球治理多边场合有很高的集体谈判能力，因拥有西方文化传统和价值观而在现有国际体系中有更多话语权，同时积极为发展中国家发声。中国应借助拉美在全球治理领域的地位，将其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突破口，向拉美并进而向西方阐释中国的全球治理理念，利用现有国际机制使中国观念、中国方案获得合法性，争取更多共识，建构命运共同体的集体身份。

第二，实现更高层次的经济合作。通过“一带一路”平台加强中拉产能合作，建构产业链重塑者的新集体身份，在保证共赢和双方绝对收益的前提下化解相对收益分配不均带来的矛盾，建构国际价值链上共赢的新集体利益，拿出足够的诚意来交朋友，真正做到同呼吸、共命运。在中右翼主导拉美政治生态时期，很多国家希望通过加强与美国合作融入全球价值链。而特朗普政府提出“美国优先”、鼓励制造业回归、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重新就《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进行谈判等举措，使拉美国家只得对其国际合作取向重新调整，并将更多注意力投向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和产能合作倡议。虽然特朗普政府后期提出“美洲增长”倡议、拜登政府提出“重建更好世界”(B3W)倡议，但这两个倡议目前在拉美并未对“一带一路”倡议产生明显的冲击和替代效应，大部分拉美国家对中美两国的倡议和投资均持开放态度。当前，中拉在经贸领域的冲突主要来自贸易不平衡对拉美产业结构升级带来的负面影响。而中国提出将本国有竞争优势、适应东道国输入需求的产业整体输出，再发展到将企业生产价值链中各个生产环节进行全球重新布局，可以帮助东道国建立更完善的工业体系和制造能力。当前，全球产业链结构因新冠疫情冲击而面临调整和重组的可能，这为中拉产能合作提供了新的机遇。中拉应利用中国在资本要素、拉美在劳动力要素上的比较优势和供应互补性，以中国市场、拉美本土市场、第三方市场为导向在不同行业开展产能合作，同时做好法律法规等外部机制建设，从而在实现中国产业向高端制造发展的同时促进拉美国家产业转型升级，实现中拉在全球价值链上共同跃升和共赢。^①这一新集体身份和集体利益将有效减轻相对

^① 吴白乙主编：《面向新时代的中拉关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第36页，第144-189页。

收益分配不平衡，从而减少冲突、增进友谊。

第三，实现更有效的人文交流。通过互学互鉴，减少隔阂和误解，使中拉双方超越纯粹理性主义的功利关系，在观念和文化上建立紧密的精神纽带和伙伴关系。中拉在近现代有着相似的历史遭遇和命运，本就相互理解和同情，在主张捍卫人的尊严、追求平等和正义、主张文化多元主义和“去中心化”等方面均有共识。近年来中拉文化交流从文艺演出、展览、艺术节等传统合作领域扩展到文化产业、传媒、留学、学术交流等新型合作领域。然而据调查，拉美国家民众对中国形象持正面态度的比重虽高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但远低于非洲国家民众对华持正面态度的比重。此外，拉美国家民众对美国甚至日本的正面认知度都比对中国高。^① 这既显示出西方媒体不实报道和“新殖民主义”言论给拉美人带来的对中国的疑虑和误读，^② 也暴露了中国对外传播策略的问题。长期以来，中国将对外传播机制视为一种主体对客体的“独白”过程，希望依靠单方面“运动式”外宣来改善国际形象。而建构主义则强调主体间应进行持续互动和身份互塑，形成一种共有的理解和期望、一种共享的观念和关系文化。^③ 国家形象不是一个客观既定的个体实物和自我设计的产物，而是一种国家身份和国家间相互认同的关系，国家形象传播要通过国际社会互动实践建构正向身份和共有观念，寻求他国对本国的正向认知和正向认同。^④ 可见，未来中国应潜心研究如何真正以朋友的姿态走进拉美，想其所想、以心交心，这样才能使友谊超越利益，不惧考验。

大部分拉美国家对中国在各领域发起的互动给予积极回应，因为与中国加强合作显然符合其根本利益：经济上，利用“中国机遇”融入亚太地区产业链，促进自身“再工业化”进程，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政治上，借助与亚太地区（尤其是中国）的合作来强化外交多元化，增强其外交自主权，平抑美国在该地区的霸权。^⑤ 当前，拉美主要国家政治格局出现“左转”态势，

^① 吴白乙主编：《面向新时代的中拉关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第245页，第251页，第266页，第268页。

^② Osvaldo Rosales V., *El Sueño Chino: Cómo Se Ve China a sí misma y Cómo nos Equivocamos los Occidentales al Interpretarla*, Buenos Aires: Siglo XXI Editores Argentina, Santiago de Chile: Cepal, 2020, p. 13.

^③ 冯若谷：《“身份互塑”与“关系文化”——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视野下的对外传播观》，载《现代传播》，2015年第5期，第51-54页。

^④ 钟新、张超：《新时代中国大国形象的四个维度与两种传播路径——基于习近平相关论述的分析》，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0年第3期，第40页。

^⑤ 吴白乙主编：《面向新时代的中拉关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第32页。

我们应利用这一机遇，在巩固中拉利益共同体的基础上，加快构建价值共同体，将中拉合作推向新的高度。

（三）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面临的挑战

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在政治上面临来自美国的挑战。拉美和美国同属西方文化，有着相似的宗教信仰和价值观。自19世纪以来，美洲国家就内在凝聚在“西半球理念”周围，包括不干涉原则和代表性政府（人权）原则。^①从“门罗宣言”到“争取进步联盟”再到北美自由贸易区，虽经历曲折和反复，但美国对拉美的政治经济控制从未放松。^②相比之下，中国与拉美距离遥远，文化迥异，政治经济关系还有待发展。因此在对拉关系上，中美不具对等性。近年来美国鹰派认为中国积极同拉美发展政治经济关系是在挑战美国霸权，是在寻求对美国对华遏制政策和“重返亚太”战略进行对冲和反制，并利用中拉经济关系的“杠杆效应”迫使美国在亚洲事务上做出让步。^③鉴于此，美国对中国在拉美的存在进一步警惕。近期，随着中美技术竞争加剧，美国向巴西等国施压，促其放弃与中国华为公司在5G技术上的合作。另外，在新冠疫情暴露全球供应链脆弱性后，美国意图将其全球供应链的一部分向西半球收缩，这不但会促使墨西哥在现有基础上加强与美国的紧密经济合作，也为南美洲国家参与美国全球供应链提供了机会。美国或许会通过这些手段逼迫拉美国家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而中国要想经受住这一考验，在美国“后院”交朋友，首先还是要通过现有机制加强中拉整体合作，巩固共有观念；其次要灵活处理与不同拉美国家之间的双边关系，尽可能克服意识形态和政治理念分歧造成的障碍，利用经济合作和人文交流建构集体身份和集体利益，拉近心理距离。应当看到，大部分拉美国家自21世纪以来在国际关系和对外经贸关系上秉持务实态度，逐渐淡化意识形态色彩，在中国、美国、欧盟等各方之间寻求平衡，虽然在短期内不可能完全摆脱美国的影响，但在处理中美拉三边关系上会做出理性选择。

中拉文化差异造成双方不同程度的群体认同。中国文化强调集体利益和

^① Peter J. Katzenstein, *A World of Regions: Asia and Europe in the American Imperium*,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226.

^② José León-Manríquez and Luis F. Alvarez, “Mao’s Steps in Monroe’s Backyard: Towards a United States-China Hegemonic Struggle in Latin America?”, in *Revista Brasileira de Política Internacional*, 57 (spe.), 2014, p. 10.

^③ Daniel Morgan, “Expanding the Rebalance: Confronting China in Latin America”, in *Parameters*, Vol. 45, No. 3, 2015, pp. 103 - 104.

大局观念，而拉美所继承的西方文化强调个人利益和个体权利。2020年新冠病毒全球暴发，中国从大局出发，用强有力手段控制住疫情，并号召世界各国加强合作，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而许多拉美国家对疫情并不十分重视，不愿牺牲个人自由来换取群体利益。例如巴西总统博索纳罗消极对待疫情防控措施，质疑口罩的防病毒传播作用，公开表示自己不会接种疫苗，也不建议国民接种疫苗。^①温特指出，人们往往因害怕“非个体化”使自己被群体需要淹没而抵制文化的内化，而利己主义对国家的吸引力更大。因此，集体身份是分层次的，相较于共同安全，国家对责任分担、经济发展、文化独立表现出更小的群体认同张力。^②这种个体主义和自我保护意识还表现在中拉经济合作过程中拉美当地人充分强调其文化习俗和劳动法规，表现出强烈的权利意识和环保诉求。面对文化差异，中国应秉承求同存异的原则，努力挖掘双方文化中的一致性和共有理念来创造更多群体认同。我们一方面应向拉美阐释中国的“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的义利观和“以世界责任为己任”的天下观；另一方面也应阐释中华文化中自助与助人之间的“非零和”理念，即集体利益的实现并不必然以牺牲个体利益为代价，而是要在实现个体利益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与集体利益共赢，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推己及人”“美美与共”。

五 结论

当前，美国各界在将中国定位为竞争对手这一问题上已形成共识，未来中国在国际关系上必将受到来自美国越来越大的压力和挑战。为了给自身发展创造稳定良好的外部环境，中国必须广交朋友，扩大伙伴关系网络，而拉美对于中国创建新型国际关系有其独特的重要意义。

中拉同为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发展程度相似，经贸合作突飞猛进，有很好的合作基础，同时拉美的初级产品对中国的经济安全有重要意义。然而，现阶段中拉关系仍处于理性主义、利益驱动的洛克文化之中，其复合相互依存关系给双方带来的绝对收益并不能掩盖相对收益分配的不平衡。中拉

^① 参见《质疑口罩又不愿打疫苗？巴西总统放话：我不接种，巴西人也不需要》，腾讯网，2020年11月27日。<https://new.qq.com/omn/20201127/20201127A0EFQF00.html>。[2022-03-23]

^② [美]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96页。

贸易虽然互补性强,但贸易结构和合作模式中的不合理因素在客观上不利于拉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从而引发拉美国家对中拉合作的消极情绪。此外,美国历来视拉美为其“后院”,在中美竞争加剧的背景下更是对中国在拉美的一举一动十分敏感。因此,中拉关系的内在矛盾和外在不利条件使中拉命运共同体构建面临巨大挑战。如果中拉一方面能够超越纯粹理性主义的功利关系,实现洛克文化向康德文化的跨越,另一方面能够在美国霸权因素存在的条件下,使中拉关系提质升级,那么将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一个典范,必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重要贡献。

康德文化的无政府状态是国家造就的,是行为体互动和社会建构的结果。中国作为有影响力的大国,必须积极作为,利用国际多边机制和中拉双边及整体合作平台与拉美国家开展更广泛、更深层次的互动,在现有政治共识的基础上形成更多共有观念和群体认同,通过全球治理合作、产能合作和人文交流,互塑新的集体身份,建构新的集体利益。中拉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可以借鉴建构主义理论的逻辑,但同时我们应明确,建构主义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温特提出的康德文化友善共同体是以西方为中心向东方扩展,并且将友谊的概念限定在集体安全领域。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体现中国智慧的理念,直接以天下为分析单位,更具包容性,而且将集体利益的概念扩展到安全、政治、经济、可持续发展、文化等各个领域,是真正的命运共同体。

当前,我们正从相互依存的世界体系向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的全球政治经济一体化、国家间利益基本和谐、世界持久和平的全球共生体系发展,^①这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美国因素和中拉文化间的差异是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的主要挑战,而因疫情加剧的全球经济不景气也可能使国家利益的重要性暂时超越群体利益。因此,中拉关系将在理性主义的现实考量和建构主义的理想期望之间曲折发展。

(责任编辑 王 帅)

^① 夏立平:《全球共生系统理论与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载《美国研究》,2017年第1期,第28页。

习近平新时代大国外交思想研究

正确义利观视角下的中拉绿色合作： 进展、挑战及前景

邢伟

内容提要：正确义利观视角下的中拉绿色合作包含国家间合作谋求经济利益的意涵，更重要的是在追求经济利益的过程中充分考虑到环保理念、人文价值等方面的因素。正确义利观有助于开展高质量绿色合作，体现了可持续发展，促进多行为体参与到普惠包容的绿色合作中，并且对于构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具有促进作用。中拉绿色合作的进展包括，中拉绿色能源合作为拉美提供发展支撑，中拉绿色农业合作以高科技为底色，以义为先的企业社会责任促进“惠民生”和“心联通”，中拉在绿色金融、绿色贸易等领域的合作有待拓展。在中美博弈的战略背景下，中拉在绿色合作层面会面临一些挑战，如美国的介入、拉美国内政治、社会因素等方面的影响。在正确义利观的指导下，未来需要构建更加精细化的中拉绿色合作机制，从“惠民生”和“心联通”角度深化绿色合作，更加积极灵活应对美方介入拉美的行为。目前，克服新冠疫情对世界经济带来的冲击、努力恢复经济发展是各国面临的首要任务。中方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与正确义利观的核心思想吻合，对于中拉绿色合作具有指导作用。

关键词：正确义利观 绿色合作 中拉关系 “一带一路”
全球发展倡议

作者简介：邢伟，法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F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649(2022)04-0095-2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绿色发展,致力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丽家园”^①,“加快绿色低碳转型,实现绿色复苏发展。”^②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与拉美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及多层次建设,深化绿色合作。绿色合作体现了国家间合作谋求经济利益,更重要的是在追求经济利益的过程中充分考虑到环保理念、人文价值等方面的因素,需要正确义利观指导其发展。正确义利观把国家利益与国际道义、中国发展与世界共同发展、中国人民利益与人类共同利益统筹起来,倡导以义为先、义利兼顾,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展现了中国外交的国际主义胸怀和负责任大国担当。^③绿色合作、绿色发展的内涵中含有正确义利观的要义。本文旨在分析正确义利观对绿色合作指导意义基础上,研究中拉绿色合作的进展、面临的挑战,并对未来中拉绿色合作的发展前景进行展望。

一 正确义利观及其对绿色合作的指导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及正确义利观。正确义利观的内涵包括道义与利益的关系,指导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朝着互利共赢的方向发展,将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相结合,贯彻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则。当前,绿色发展理念为世界广泛接受,中国与拉美开展绿色合作也需要正确义利观作为指导,贯彻可持续发展理念,推动中拉双方经济协调发展、社会和谐与环境保护。

(一) 正确义利观的提出和基本内涵

2013年10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找到利益的共同点和交汇点,坚持正确义利观,有原则、讲情谊、讲道义,多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2014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接受拉美四国媒体采访时指出,“我们将更加积极有为地促进共同发展,坚持正确义利观,义利并举、以义为先,促进南北对话和南南合作,特别是帮助发展中国

^① 《习近平在第二十三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上的致辞》,新华社,2019年6月8日。
<http://news.cri.cn/20190608/7d74d877-e33d-8c94-262e-5c3d2489d87b.html>. [2022-02-14]

^② 《习近平出席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重要讲话》,新华社,2021年9月22日。
http://www.qstheory.cn/yaowen/2021-09/22/c_1127887210.htm. [2022-02-14]

^③ 吴志成、李佳轩:《习近平外交思想中的正确义利观》,载《国际问题研究》,2021年第3期,第23页。

家实现自主和可持续发展。”^① 2014年11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坚持正确义利观，做到义利兼顾……要切实落实好正确义利观，做好对外援助工作，真正做到弘义融利。”^② 2018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广大发展中国家是我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天然同盟军，要坚持正确义利观，做好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的大文章。”^③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指出，中国“秉持正确义利观和真实亲诚理念加强同广大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整体合作机制实现全覆盖。”^④ 正确义利观是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传承和转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外交理论、继承和总结中国外交实践经验、借鉴和扬弃国际关系规范准则的创造性理论结晶。^⑤ 正确义利观强调在国际交往中要讲求道义和公平正义，而不是只追求利益。特别是在同发展中国家交往的过程中，要坚持道义为先，重视和照顾其利益需求，多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⑥ 中国倡导的义利观既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又是对当今国际关系现状与中国国情的应对，本质上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外交理念，义利观突出了以义为先、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导向。^⑦ 正确义利观将道义与利益的关系具体化，以更加可行的方式提出处理“义”与“利”的关系。“以义为先”强调了道义的首要作用，国际合作中应将道义置于第一的位置；“义利并举”表明国际交往中要同样重视道义和利益的双重作用，尤其在经贸合作中道义与利益的关系需要正确把握；“义重于利”则意味着在需要对道义和利益进行权衡取舍的情况下，道义无疑是最重要的，这一点在开展绿色合作时尤其关键。正确义利观从道义和利益双重角度，阐释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中外开展合作的正确理念，为中国与拉美开展绿色合作提供了价值观方面的指导和理论依据。

① 《习近平接受拉美四国媒体联合采访》，新华网，2014年7月15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4-07/15/c_126752272.htm. [2022-02-12]

② 《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在京举行》，载《人民日报》2014年11月30日第01版。

③ 《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为指导 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载《人民日报》2018年06月24日第01版。

④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全文）》，中国政府网，2021年11月16日。http://www.gov.cn/zhengce/2021-11/16/content_5651269.htm. [2022-02-12]

⑤ 吴志成、李佳轩：《习近平外交思想中的正确义利观》，载《国际问题研究》，2021年第3期，第23页。

⑥ 李海龙：《论中国外交之正确义利观的内涵与实践》，载《理论学刊》，2016年第5期，第133页。

⑦ 李向阳：《“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义利观》，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9期，第7-8页。

(二) 正确义利观对绿色合作的指导意义

绿色发展、绿色经济已经成为当代社会发展的共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发起了绿色经济倡议,呼吁全球领导者及宏观经济、金融、贸易、环境等部门的政策制定者关注绿色投资对经济增长、增加就业和减贫的贡献。^①中国共产党在十八届五中全会上首次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必须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可持续发展,……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新贡献。……推动建立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产业体系。”^②正确义利观与中拉绿色合作具有共同的价值内涵,二者都体现了高质量、可持续、惠民生的发展目标,正确义利观在中拉绿色合作中将道义作为首要因素。中国和拉美国家同属发展中国家,双方在合作中并不是单纯追求利益,而是在遵循环保、可持续发展等“义”的前提下追求双方共赢的利益。中拉在绿色合作中,多层次行为体在谋求经济利益的同时,必须受到道义的约束。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人心,在正确义利观指导下,中国通过与拉美国家开展绿色合作,能够促进“一带一路”的纵深发展,并且为全球治理提供中国特色的参与范式。

第一,正确义利观对于开展高质量绿色合作具有促进作用,有利于推动绿色基础设施建设、绿色投资、绿色金融等领域的协调发展。绿色发展是人类社会经济新发展的新阶段,世界经历了三次绿色思潮,中国近年来也对绿色发展进行了深入反思,建设生态文明、实现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当今中国经济发展的主旋律。绿色发展理念适应了世界绿色发展的潮流,体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使命担当。^③中拉双方就绿色发展议题开展高质量合作,正确义利观要求更加关注环保、节能、创新等领域的发展提升。中方在境外开展绿色基础设施建设、绿色投资、绿色金融等活动时,都应遵循当地国家的发展规划,做好双方发展规划的对接。中方企业在关注利益增长点的同时,必须对绿色发展因素进行深度思考。海外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发展平衡度需要依靠正确义利观的引导。基础设施投资的建设周期长,但是直接关系到

^① 傅聪:《中欧绿色合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演进与面临的机遇挑战》,载《太平洋学报》,2021年第11期,第80页。

^② 《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在京举行》,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5年10月30日。<http://cpc.people.com.cn/n/2015/1030/c64094-27756155.html> [2022-02-20]

^③ 刘德海:《绿色发展理念的科学与价值取向》,载《江苏社会科学》,2017年第3期,第1-3页。

当地居民的生存状态，水电站、水库、公路、铁路的修建可以为当地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做出长期的贡献。这类基础设施投资往往在建设会中面临许多棘手的技术和环保问题，需要双方政府、企业等参与方以“义”作为前提，共同引导问题的解决，促进相关领域合作顺利进行。

第二，正确义利观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理念，有助于规范绿色合作中的行为。地区国家协调、均衡的发展以及公正合理的地区政治经济关系是绿色合作的重要目标。正确义利观要求中国在海外开展经贸、投资合作时，要遵循可持续发展的原则。正确义利观辩证看待道义与利益，从道义的角度来看，可持续发展考量各国利益的协调、均衡发展；发展不应以牺牲子孙后代的生存为代价，而应当在保护环境和不超出生态系统承载力的前提下发展经济。这体现了“以义为先”，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也要体现道义的要求，即“义利并举”。正确义利观引导国家和地区进入均衡、可持续的发展状态，有助于规范中拉经济合作中的行为。拉美地区具有生物多样性的特质，亚马孙雨林、安第斯山脉等都蕴含了该地区生物多样性的特质。中拉在开展绿色合作的同时，遵从正确的义利观，践行可持续发展，能够最大程度地保护当地的生态环境。通过绿色合作，拉美民众在获得经济发展成果的同时，其周边生态环境也会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这对于中拉双方都是共赢的结果。承认绿色合作中各方应得的利益，同时遵守道义方面的行为规范，对于绿色合作至关重要。

第三，正确义利观有助于多行为体参与到普惠包容的绿色合作中。开放多元、多边主义是双方合作的特点，最终有助于普惠包容的发展。中拉绿色合作需要政府主导推动。作为近年来新兴的经济合作领域，绿色合作在初期会面临一些难点，比如成本较高、社会认可度等问题。绿色合作贯彻全球发展倡议，遵循“一带一路”倡议，中方在初期推动绿色合作时，利用官方和半官方的渠道，向国外相关方面说明绿色合作的重要性及收益情况，这有助于外方增进对绿色合作的了解，进而加大与中方合作的可能性。这一过程中，政府的推动实质上也是对外阐明了正确义利观，绿色合作从道义和利益的角度对于中外双方都具有益处。绿色合作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主要依靠企业为主要承办方，开展低碳、减排、节能环保、可持续发展等领域的经贸合作，企业仍需要在合作中获取正常的收益。企业获得收益的前提是政府为绿色合作进行了前期的铺垫。践行正确的义利观有助于企业在海外开展绿色合作时，理性对待经济收益，减小企业获益行为与国家利益的偏离度。

第四，正确义利观有助于促进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构建。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表示，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正确义利观在新发展格局下的具体体现。2021年7月16日，中国正式启动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全国碳市场第一个履约周期纳入发电行业重点排放单位2162家，每年覆盖的碳排放量超过45亿吨，是全球覆盖温室气体排放量规模最大的碳市场。^①近年来，中方提出绿色、低碳的发展理念，并将其付诸行动，覆盖范围从国内拓展到了全球。2022年3月，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发布《关于推进共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的意见》，提出全面停止新建境外煤电项目，稳慎推进在建境外煤电项目。淘汰落后产能，促进产业结构提升，在提升产能的同时关注可持续安全与发展，体现了中方在绿色发展与合作中对于长期利益的重视。追求长期利益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在遵循、维护道义。以义为先的绿色合作有助于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良性发展。国际经贸合作中不合理的现象依然存在，其根本原因就是没有遵循正确义利观，其后果对于世界经济的长期健康稳定发展都是不利的。国际合作中需要贯彻正确的义利观，绿色、低碳的发展方式是促进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构建的重要路径。正确义利观对于绿色合作中多种合作项目的协调增益、可持续性和包容性发展、各参与主体协调成本与收益，以及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构建都具有引领作用。

二 中拉绿色合作的进展

2021年《中国-拉共体论坛第三届部长会议宣言》认为中方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将有助于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推动实现更加强劲、绿色、健康的全球发展”。^②中国和拉美虽然距离遥远，但是中拉对于绿色发展、绿色合作存在共同的认识。绿色合作蕴含着可持续发展的意涵，为后代预留发展空间也在诠释着正确义利观。拉美多国和地区主要合作组织已经对绿色发展有了较为深入的规划，中拉绿色合作在覆盖领域、发展动力

^① 徐卫星：《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一体推进迈出坚实步伐》，载《中国环境报》2022年01月07日第01版。

^② 《中国-拉共体论坛第三届部长会议通过〈中国-拉共体论坛第三届部长会议宣言〉》，新华社，2021年12月8日。http://www.gov.cn/xinwen/2021-12/08/content_5659408.htm。[2022-02-20]

等方面都能够体现出正确义利观的指导作用。

长久以来，对平衡与和谐状态的追求，是拉美各印第安民族宇宙观的哲学共识。在不损害他人和环境的前提下实现共赢的发展，是社会和谐的关键。^① 拉美多国、国际组织均制定了绿色合作、绿色发展的战略规划。2021年10月，巴西正式推出“国家绿色增长计划”，并成立“气候变化和绿色增长部际委员会”。该计划拟利用总规模约4000亿雷亚尔的国内外公共和私人资本实现降低碳排放、开展森林保护及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三大目标，以创造绿色就业、促进绿色增长。^② 阿根廷2021年7月颁布的行政决议正式通过绿色生产发展规划。此项规划旨在优化生产力、新增就业岗位、整合土地资源和发展出口等战略布局中融入环保理念。阿根廷将通过创新、生态设计和绿色经济发展促进生产力和产品差异化竞争，助力本国产业融入新兴市场。该规划将吸引100亿比索的投资，还将有助于阿根廷经济转型：一是有助于循环生产；二是促进可再生能源使用；三是助推中小微企业发展，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③ 2021年阿根廷可再生能源发电覆盖全国用电需求的13%，高出2020年水平的10%。阿根廷电力需求日益增长，可再生能源正在发挥关键作用。2021年阿根廷全国可再生能源供电总量中风能发电占比最高，为74%，其次是太阳能光伏发电13%、小型水力发电7%、生物能源发电为6%。阿根廷现有187个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总装机容量5181.74兆瓦。^④ 智利的氢能储备位居世界前列，智利计划在2025年成为拉美地区最大的绿氢投资目的地，氢电解和开发水平将达到5000兆瓦，每年将在两个绿氢地产出20万吨的绿氢。智利计划到2030年在出口绿氢及其衍生产品方面达到世界领先，其绿氢目标价格将达到低于1.5美元/每千克的世界较低水平，其电解绿氢年产能将达到25000兆瓦。^⑤ 在国际组织方面，拉共同体关注可持续发

① 韩晗：《“美好生活”：拉美左翼政党的行动》，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09月24日第05版。

② 《巴西政府正式推出“国家绿色增长计划”》，驻巴西共和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处，2021年10月28日。<http://br.mofcom.gov.cn/article/jmxw/202110/20211003212662.shtml>. [2022-02-19]

③ 《阿根廷政府正式出台绿色生产发展规划》，驻阿根廷共和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处，2021年7月13日。<http://ar.mofcom.gov.cn/article/jmxw/202107/20210703176941.shtml>. [2022-02-19]

④ 《2021年阿根廷可再生能源发电覆盖全国用电需求的13%》，驻阿根廷共和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处，2022年1月23日。<http://ar.mofcom.gov.cn/article/jmxw/202202/20220203278094.shtml>. [2022-02-21]

⑤ “National Green Hydrogen Strategy”, Ministry of Energy, Government of Chile, November 2020. https://energia.gob.cl/sites/default/files/national_green_hydrogen_strategy_-_chile.pdf. [2022-02-21]

展、绿色合作等议题目标，其2030规划中指出，为促进区域一体化、可持续发展，以及政治合作、区域一体化进程，将推动拉美参与世界事务，促进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组织的对话，促进区域和次区域机构之间的合作与沟通。^① 拉美地区的主要经济体和国际组织对于绿色合作的战略规划，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的原则，重视包容性增长，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结合，追求道义与利益的统一，符合正确义利观的要义。

2021年4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以视频方式出席领导人气候峰会时指出，中方将生态文明领域合作作为共建“一带一路”重点内容，发起了系列绿色行动倡议，采取绿色基建、绿色能源、绿色交通、绿色金融等一系列举措，持续造福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各国人民。^② 通过投资、贸易、技术合作的拉动，中国在拉美地区的绿色合作以正确义利观作为指导，为地区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环境提升、民心相通做出了贡献。中拉绿色合作的进展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中拉绿色能源合作为拉美提供发展支撑

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António Guterres）曾表示，“一带一路”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有着“内在联系”，尤其在为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性基础设施建设筹集资金方面。^③ 在正确义利观的指导下，中国在风能、光伏发电领域进行投资，国有企业和民营资本都参与其中，帮助拉美国家民众用上更安全、更实惠、更廉价的清洁能源，为降低拉美国家的碳排放做出了努力。2015年以来，中国在拉美的可再生能源投资逐渐增长。中国官方公布的15家投资拉美的中资公司项目中，约有57%的项目集中在太阳能发电。^④ 2020年5月，中国能建葛洲坝国际公司与巴拿马Panasolar公司通过视频连线，签署了巴拿马110兆瓦光伏项目设计采购施工合同，合同金额1.08亿美元。2020年8月，墨西哥尤卡坦半岛的普罗格雷索（Progreso）风电场正式投运。中国远景能源（Envision Energy）公司和墨西哥Vive能源公司组成的新公司承建此项目，绿色风能发电机组由中方设计生产，总装机容量达90兆

① “CELAC 2030 Plan”, CELAC. <https://celacinternational.org/celac-2-2/>. [2022-02-20]

② 《习近平：中方将生态文明领域合作作为共建“一带一路”重点内容》，新华社，2021年4月22日。 http://www.gov.cn/xinwen/2021-04/22/content_5601518.htm. [2022-03-01]

③ Robert Soutar, “How China Is Courting New Latin American Partners”, January 13, 2020. <https://www.americasquarterly.org/article>. [2022-02-27]

④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2021”, ECLAC, August 5, 2021. <https://www.cepal.org/en/pressreleases>. [2022-03-16]

瓦，每年能为当地电网提供 300 吉瓦时的电力。此项投资价值 1.55 亿美元，每年将减少 26.35 万吨碳排放，大概相当于 14.4 万辆汽车的年排放量。^① 普罗格雷索风电场项目为当地民众带来社会、经济和环境效益，不仅能够创造就业机会、提升员工专业技能，也为墨西哥绿色发展提供技术、政策和经验，通过新能源的使用帮助解决该地区能源供需不平衡问题。2020 年 9 月，由中国电建和上海电建共同建设的高查瑞（Cauchari）光伏电站项目已开始向阿根廷提供清洁电力，目前供电功率为 245 兆瓦，并将提升至 300 兆瓦。^② 2021 年 4 月 28 日，中国电建和上海电建联合体签署阿根廷高查瑞二期 200 兆瓦光伏项目总承包合同，包括新建 200 兆瓦光伏电站和扩建一座原有升压站。该项目系已投入商业运行的一期 300 兆瓦光伏电站的扩建项目，将为当地创造 600 个就业机会，进一步减少 1.295 亿吨二氧化碳年排放量，可为 17 万个家庭提供清洁能源。^③ 该项目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将生态文明领域合作作为共建‘一带一路’重点内容”后，中阿两国在绿色能源开发方面的再次合作，直接响应绿色低碳倡议及国际低碳环保共识，践行绿色基建、绿色能源开发，运用资本和技术以促进中拉绿色合作。

在光伏发电设备生产领域，已经有中国企业进入拉美光伏发电市场的成功案例。2016 年 12 月，中国阿特斯太阳能公司与外资公司合作斥资 8000 万雷亚尔建设的太阳能组件厂在巴西圣保罗落成，产能达到每年 400 兆瓦，是巴西最大的光伏组件制造厂之一。2017 年上半年，比亚迪公司位于巴西坎皮纳斯市的太阳能板厂建成投产。2017 年 11 月，中国光伏企业正信光电与巴西马托格罗索州立发展中心正式达成战略合作，合作建设太阳能电站、生产线，开发采矿业一体化光伏解决方案，项目总投资超 3.6 亿美元。^④ 光伏发电设备生产为清洁能源提供基础设施保证，助力中拉绿色合作。

在水电开发领域，中国与拉美国家同样实践了正确的义利观。2016 年 4

① “Wind Power in Yucatán: Wind Turbines Arrive for Progreso Wind Farm”, REVE, September 4, 2019. <https://www.evwind.es/2019/09/04/wind-power-in-yucatan-wind-turbines-arrive-for-progreso-wind-farm/70670>. [2022-02-27]

② 《高查瑞光伏电站项目并网发电》，驻阿根廷共和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处，2020 年 9 月 15 日。 <http://ar.mofcom.gov.cn/article/jmxw/202009/20200903002455.shtml>. [2022-02-20]

③ 《上海电建阿根廷高查瑞光伏项目获能源国际合作最佳实践案例》，驻阿根廷共和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处，2021 年 11 月 8 日。 <http://ar.mofcom.gov.cn/article/dt/202111/20211103215703.shtml>. [2022-02-16]

④ 张远南：《巴西光伏市场青睐中国企业》，人民网，2017 年 11 月 27 日。 <http://finance.people.com.cn/n1/2017/1127/c1004-29668742.html>. [2022-02-16]

月13日,中国电建集团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公司总承包的厄瓜多尔辛克雷水电站首批4台机组正式发电。该项目总装机1500兆瓦,共8台机组。全部发电后可使厄全国电力生产增加1/3,将有效改善该国依赖从国外购电的能源短缺现状,该国可再生能源占电力比重将超过90%。^①由中国三峡集团和葡萄牙电力公司(EDP Energias)组建的秘鲁环球水电投资公司(Hydro Global Peru),2016年11月获得了建造圣加旺三级水电站(San Gaban III)30年特许权。这是中方在拉美最大的可再生能源领域投资,项目价值4.38亿美元,由中国国家开发银行进行融资。^②中国与阿根廷联合开发的基塞(NK/JC)水电站建成后,年均发电量49.5亿千瓦时,可满足150万户家庭用电;中国与阿根廷还合作建设了孔拉(CC/LB)水电站,为当地生态旅游发展创造巨大机遇。据不完全统计,2000—2018年间,中国在拉美地区开展的水电合作项目共有23个,2个项目延迟或暂停施工,12个项目建设完毕或基本完工,其他项目都是在建状态。中拉在水电方面的合作发展趋势良好。^③中国与拉美国家积极拓展绿色合作的新方式,坚持可持续发展,投资绿色能源相关产业,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是正确义利观指导下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务实举措。

(二) 中拉绿色农业合作以高科技为底色

在中拉多领域合作持续深化背景下,双边科技互动更加频繁,为贸易、能源等产业合作提供了重要支撑。农业科技合作是中拉科技创新合作的重要一环,双方积极分享农业技术发展经验。^④绿色农业合作是中拉践行正确义利观的又一体现,农产品生产中坚持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保护、通过农业科技合作促进优产都是绿色合作的重点,合作以国家层面为主。至2021年12月底,中粮集团已实现对巴西大豆重要产区马托皮巴(巴西四个产豆州马拉尼昂州、皮奥伊州、托坎廷斯州、巴伊亚州的合称)所有直接采购大豆的完全可溯源,在巴西建立的可持续大豆供应链取得突破性进展。马托皮巴面积超过7300万公顷,位于巴西重要生态区塞拉多(Cerrado),近年来却因当地农民毁林开荒

^① 《我在厄瓜多尔承建最大水电站成功发电》,驻厄瓜多尔共和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处,2016年4月15日。<http://ec.mofcom.gov.cn/article/jmxw/201604/20160401296794.shtml>. [2022-02-18]

^②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2021”, ECLAC, August 5, 2021. <https://www.cepal.org/en/pressreleases>. [2022-03-16]

^③ Katherine Koleski and Alec Blivas, “China’s Engagement with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U.S. - 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October 17, 2018. <https://www.uscc.gov/research/chinas-engagement-latin-america-and-caribbean>. [2022-02-23]

^④ 姚明峰等:《中拉友好合作提质升级》,载《人民日报》2022年02月23日第03版。

而屡遭破坏。为解决此问题，2020年8月中粮集团与世界银行成员国际金融公司（IFC）启动合作，利用卫星图像和地理数据，对供应商的农场进行地图绘制和动态监测，确保这些农场符合一系列可持续发展标准，包括不涉及森林砍伐和植被破坏问题、没有位于环境保护区、不侵占土著人土地等。^①高科技使拉美农产品在生产中的可追溯性得到了保证，这体现了对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视。在智利，中智农业科技研发中心和示范农场为中智两国在种质资源交换、种质创新与品种改良等项目搭建了沟通合作平台。拉美的先进农业技术同样为中国的农业发展提供了帮助。40多年来，总部位于墨西哥的国际玉米小麦改良中心（CIMMYT）与中方科研机构开展了密切合作，该中心获得了中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中国引进自该中心的品种作亲本，培育了大量玉米和小麦品种。中拉双方通过农业领域的科技助力，为中拉农业合作加入了绿色的元素。高科技的运用促进了中拉绿色农业合作的深化发展。

（三）以义为先的企业社会责任促进“惠民生”和“心联通”

2021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第三次“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上强调，把基础设施“硬联通”作为重要方向，把规则标准“软联通”作为重要支撑，把同共建国家人民“心联通”作为重要基础，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②中拉在绿色合作的进程中，中方企业在当地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中方在保障民生、保护生物多样性、防污治污、文物传承等方面贯彻正确义利观，注重考量社会责任这一道义因素，通过履行社会责任促进民生水平提升，借此推动中国与拉美国家的民心相通。

在解决民众安居和就业方面，中企在拉美地区开展绿色合作的同时，重视将“义”作为重要的考量。中铝秘鲁矿业公司在矿区实施了大规模的迁建工程，斥资5000万美元用于城镇搬迁工作，在莫罗科查（Morococha）新城建造了1050套住宅以改善当地居民的居住环境。^③中企的做法超越了西方大型矿业集团，创立了社会责任的新标准，被秘鲁时任总统乌马拉称为“负责任

^① 《中粮在巴西建立可持续大豆供应链取得突破进展》，中粮集团，2022年1月10日。<http://www.cofco.com/cn/News/Allnews/Latest/2022/0110/51147.html>。[2022-02-28]

^② 《习近平在第三次“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上强调 以高标准可持续惠民生为目标 继续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韩正主持》，新华网，2021年11月19日。http://www.xinhuanet.com/2021-11/19/c_1128081486.htm。[2022-02-14]

^③ 《中铝公司在秘鲁建新城》，观察者网，2012年7月3日。https://www.guancha.cn/Business/2012_07_03_82453.shtml。[2022-03-01]

的矿业发展模式”。阿根廷高查瑞光伏园区项目从2018年4月正式开工以来，为当地村民提供就业机会，尤其在2019年4月进入施工高峰期后，为当地提供了约1500个就业岗位。该项目还将发电站运行和维护岗位用于吸收当地劳动力就业。项目投产后，每年为阿根廷带来超过5000万美元的财政收入。2021年6月，中国和阿根廷共建的阿根廷罗马布兰卡（Loma Blanca）六期风电场项目竣工并投入运营。中方团队积极实行本地化管理，累计提供就业岗位1500多个。改善居住条件和促进就业都是中方落实企业社会责任的体现。

中资企业在拉美投资兴业的同时，对当地的环境进行主动维护，在水污染防治、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文物保护等方面贯彻正确义利观。中铝秘鲁矿业公司先后投入5000多万美元建成金斯米尔（Kingsmill）污水处理厂，以解决当地多年以来形成的水污染问题。污水处理厂日处理污水11万吨，使当地河流水质得到明显改善，并解决了当地90万居民的用水安全。同时，污水经处理后约1/3供给特罗莫克（Toromocho）铜矿使用，补充了生产用水。^①为做好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中铝秘鲁矿业公司设立了约800公顷的生态保护区，并安装隐藏摄像头对生态环境进行持续监测，发现了多种珍稀保护动物，包括最重要的安第斯山虎猫、白腹抖尾地雀。中国三峡（巴西）公司在巴西南部卡诺阿斯河运营格利保吉（Garibaldi）水电站。在水电站建设阶段，工程队发掘出约1.3万件文物残片，其中既有约8000年前的石器，也有约2000年前的陶器和生产工具。为将这些历史文物妥善保管，2019年年底中国三峡（巴西）公司与西圣卡塔琳娜大学签署合作协议，共建西圣卡塔琳娜大学考古研究中心，最终交由校方全权管理。^②中企在拉美的绿色合作中履行社会责任，在工程建设过程中践行正确义利观，为当地民生水平提升、环境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提供了合作平台，拉动了“惠民生”和“心联通”的发展。

（四）中拉在绿色金融、绿色贸易等领域的合作有待拓展

在绿色金融合作方面，中国在与拉美国家的合作中，遵守拉美国家相关规定，在清洁能源开发领域重点实施了绿色金融合作。2014年中国银监会印发的《绿色信贷实施情况关键评价指标》有关境外项目管理的内容指出，银

^① 《中铝秘鲁矿业公司：中铝秘鲁矿业公司海外社区污水处理项目》，国务院国资委网站，2018年7月13日。<http://www.sasac.gov.cn/n4470048/n8456886/n9199431/n9199488/n9201718/c9239717/content.html>。[2022-03-06]

^② 刘旭霞、朱东君、颜欢：《为促进民心相通起到重要桥梁作用》，载《人民日报》2021年06月20日第03版。

行机构应加强对拟授信境外项目的环境和社会风险管理，确保项目发起人遵守项目所在国家或地区有关环保、土地、健康、安全等相关法律法规；对拟授信的境外项目公开承诺采用相关国际惯例或国际准则，确保对拟授信项目的操作与国际良好做法在实质上保持一致。^① 2007年至2014年间，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共向拉美国家提供了约70亿美元的绿色融资，约占拉美从11家主要开发银行获得绿色融资总额的12%。^② 中国在拉美地区开展绿色金融合作业务量的94%都集中于水电开发融资。^③ 未来，中国与拉美的绿色金融合作可以进一步拓展，领域应更加广泛。2022年，国家电网巴西控股公司对其所属的西尔瓦尼亚输变电项目发行了价值2.35亿雷亚尔的绿色债券。这是国家电网公司首次在巴西发行绿色债券。^④ 绿色产品在中拉双边贸易中所占比重较低，中方在拉美的绿色贸易对象高度集中，均为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大国，对巴西和墨西哥的出口占对拉美整体出口的50%以上；仅有少数拉美国家有能力向中国出口少量绿色产品。中方绿色产品出口潜力更多地取决于拉美地区的市场需求。^⑤ 中拉双方在绿色金融、绿色贸易等方面需在正确义利观的指导下，进一步在发展空间和业务领域等方面进行更加均衡的调整与拓展。

三 中拉绿色合作面临的挑战

正确义利观视角下的中拉绿色合作会面临美国介入、拉美国内政治、社会因素等方面的影响。在中美博弈的背景下，多方面因素对于中拉绿色合作会造成一定阻力。

^① 《绿色信贷实施情况关键评价指标》，中国银监会网站，2014年6月27日。<http://fgcx.bjcourt.gov.cn:4601/law?fn=chl401s691.txt>. [2022-02-23]

^② Fei Yuan and Kevin P. Gallagher, “Repositioning Chinese Development Finance in Latin America: Opportunities for Green Finance”, Boston University, August 2016. <https://www.bu.edu/pardeeschool/files/2016/05/ChineseDevelopmentBankingLAC.pdf>. [2022-02-23]

^③ Fei Yuan and Kevin P. Gallagher, “Greening Development Finance in the Americas”, Boston University’s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Initiative, December 2015. <https://www.thedialogue.org/wp-content/uploads/2015/11/GEGI-GreeningAmericas-Final.pdf>. [2022-02-23]

^④ Randolph De Souza, “State Grid Brazil Faz Primeira Emissão de Títulos Verdes”, Monitor Mercantil, 2 de Fevereiro de 2022. <https://monitormercantil.com.br>. [2022-02-23]

^⑤ 史沛然：《“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中拉绿色产品贸易：特征、比较优势与出口潜力》，载《企业经济》，2021年第1期，第135-143页。

（一）美国因素的影响

绿色合作是中国贯彻正确义利观的海外实践，美国的介入对于中拉开展绿色合作存在不利影响。拉美国家是美国的近邻，在中拉合作的议题领域容易受到美国的干扰。随着中美战略博弈加剧，近年来美国战略界人士纷纷指出，美国政府应该加大对西半球事务的关注。他们认为中国和俄罗斯对于拉美事务的参与已经影响到了美国的安全、导致美国在拉美的影响力下降，还渲染中拉“一带一路”合作对于拉美的威胁巨大。^①

中国的国内市场、金融资源、经济模式等对拉美国家具有较大的吸引力。根据中国海关统计的进出口贸易数据，2021年中拉双方的进出口贸易额达到了4515.91亿美元，同比2020年增加了41.1%。^②据美方统计，中国现在是拉美第二大贸易伙伴，已经超越美国成为拉美国家（除墨西哥）最大的出口目的地；中国也是巴西最重要的商业伙伴，中巴经贸规模相当于巴美经贸规模的两倍。尽管美国在与拉美贸易方面仍然具有领先优势，但这种优势自21世纪初以来一直在减弱。从2000年到2018年，拉美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占拉美所有出口的比重从58%下降到43%，而同期出口到中国的商品占拉美所有出口的比重从1.1%上升到了12.4%。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拉美国家（除墨西哥）最主要的出口目的地。在金融领域，拉美国家将中国视为一个有吸引力的融资来源，中国的商业贷款没有其他附加条件。从2005年到2020年，中国在西半球（包括美国）的投资和建设合同总额超过4400亿美元。^③目前拉美地区共有21国同中国签订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④“一带一路”及中拉经贸合作为双方的绿色合作提供了正确指导，确保在正确义利观的方向下进行合作。美国因此会对中国的发展模式产生抵触，并可能影响到中拉

^① Joe Bauer, “The United States Is Ignoring Latin America. China Isn’t”, The Thread Times, February 10, 2022. <https://thethreadtimes.com/the-united-states-is-ignoring-latin-america-china-isnt>; Ryan C. Berg and Hal Brands, “The Return of Geopolitics: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in an Era of Strategic Competition”, Florida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June 2021. <https://gordoninstitute.fiu.edu/research/publications/the-return-of-geopolitics.pdf>. [2022-03-01]

^② 《2021年12月进出口商品国别（地区）总值表（美元值）》，中国海关总署网站，2022年1月18日。 <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302249/zfxgk>. [2022-04-11]

^③ Ryan C. Berg and Hal Brands, “The Return of Geopolitics: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in an Era of Strategic Competition”, Florida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June 2021. <https://gordoninstitute.fiu.edu/research/publications/the-return-of-geopolitics.pdf>. [2022-03-01]

^④ 《已同中国签订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国家一览》，中国一带一路网，2022年2月7日。 <https://www.yidaiyilu.gov.cn/xwzx/roll/77298.htm>. [2022-03-03]

绿色合作。美国通过美洲国家联盟、“美洲增长”倡议及“重建美好世界”（B3W）等方式加大通过美国模式塑造拉美发展的力度，与中拉绿色合作、全球发展倡议等进行竞争。“美洲增长”倡议下来自美国的投资在一定程度上会取代“一带一路”倡议下来自中国的投资，使得拉美国家对于中国的投资需求有所减少。^①

近年来，美国在清洁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加大了与中方的竞争。美国在中美洲通过掌控液化天然气市场与中国争夺影响力，并意图将影响力逐步扩张至南美。液化天然气是美国具有比较优势的战略能源产品。美国爱依斯（AES）电力公司2000年就开始在多米尼加共和国引入天然气，由此减少了每年约400万吨的二氧化碳排放。2018年9月，AES投资兴建的巴拿马科隆市天然气热电厂开始运营。2019年10月，AES建成并运营科隆市的天然气储存设施，为天然气热电厂提供持续性原料，并吸收了2000多名巴拿马员工就业。美国也在注重本土化的运营战略，加大绿色清洁能源投资，并在投资中关注企业责任和民生问题，以此提升当地民众对美国的好感。美国通过建设液化天然气的储存设施，希望帮助巴拿马成为中美洲地区的天然气中心，同时也为美国能源找到了出口市场。巴拿马在运用清洁能源方面会更加依附于美国，中国在巴拿马的绿色能源发展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美国在巴拿马的能源拓展根本上是服务于美国的安全、经济发展战略。^②美国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并购方面也加强了与中方的竞争。2020年5月，AES巴拿马子公司从中国风力涡轮机制造商金风科技有限公司的金风美洲子公司购买了一座功率为55兆瓦的风力发电场。^③美国在多种场合对拉美绿色能源转型保持关注，并通过援助来提升拉美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进而拓展美国模式的治理范式。2021年9月8日，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约翰·克里在由阿根廷主办的视频会议中表示，美国计划扩大对拉美绿色产能的援助，争取到2030年拉美绿色产能比现在增加70%；美国通过减排、运用公共财政加大林业融资，以恢复

^① 宋海英、王敏慧：《“美洲增长”倡议对中拉共建“一带一路”的经济影响》，载《拉丁美洲研究》，2021年第6期，第98-104页。

^② “AES Commences Operations of New LNG Facility in Central America”，NS Energy Business，October 21，2019. <https://www.nsenerybusiness.com/news/aes-lng-facility/>. [2022-03-04]

^③ “Goldwind Sells 55-MW Wind Farm to AES Panama”，Renewables Now，May 14，2020. <https://renewablesnow.com/news/goldwind-sells-55-mw-wind-farm-to-aes-panama-698776/>. [2022-03-16]

拉美森林生态系统，应对地区气候变化。^① 2021年1月，美国国际发展金融公司（DFC）同意为厄瓜多尔基础设施项目提供28亿美元的资金，并称这笔资金可用于帮助厄瓜多尔偿还拖欠中国的债务。2021年4月，巴拿马运河管理局承诺到2030年年底前巴拿马成为碳中和的国家。2021年9月，美国向拉美部分国家派出了一个访问团，旨在听取对B3W的反应。在厄瓜多尔，美国国际发展金融公司宣布将继续对可持续发展的建设项目进行资金支持。在巴拿马，美巴双方讨论了促进巴拿马运河负碳目标的基础设施需求，B3W关注巴拿马的水资源获取、数字包容性和商业环境的透明度。^② 由此可见，美国介入拉美的绿色发展，对中拉绿色合作会形成长期竞争关系。

（二）拉美国内政治影响

拉美国家国内政治的变动也是影响中拉开展绿色合作的重要因素。拉美国家左右翼政府更迭变化，不同派别的政党对于绿色合作的认知存在差异，特别是在与中国合作的议题上，拉美国家国内政治因素会影响到不同党派政府与中方的合作。拉美国家对于绿色经济、绿色发展的持续态度值得关注。墨西哥2021年决定，将可再生能源提供家庭用电量达到35%这一目标的实现时间由原定2024年推迟至2030年，延期决定已通过总统令形式提交国家监管改进委员会（CONAMER）批准。^③ 中拉在进行绿色合作时，由于不同拉美国家在立法、治理、监管等方面的能力不同，如果面临风险或变数，加之民间舆论的影响，中拉绿色合作可能因此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拉美国家政治体制对外交政策也可能会产生影响。当前左翼政党的优势在拉美主要国家领导人选举中逐渐体现，但国内立法机构与行政机构对峙的局面也愈发激烈。在秘鲁，土著代表、左翼人士卡斯蒂略（Pedro Castillo）登上总统宝座，但右翼力量却成功控制国会。在墨西哥和阿根廷，反对派在议会及地方选举中都形成了对当局的强大反制力量。^④ 2021年11月阿根廷议会中期选举的结果显示，作为庇隆主义政党代表的全民阵线党（Todxs Front）

^① “US will Assist Latin America to Scale Up Green Energy Capacity to 70% by 2030, John Kerry Says”, Sputnik, September 8, 2021. <https://sputniknews.com/20210908>. [2022-03-08]

^② Hope Wilkinson, “Explainer: B3W vs BRI in Latin America”, Americas Society/Council of the Americas, December 14, 2021. <https://www.as-coa.org/articles/explainer-b3w-vs-bri-latin-america>. [2022-03-06]

^③ 《墨西哥将可再生能源利用目标期限推迟6年》，驻墨西哥合众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处，2021年9月30日。 <http://mx.mofcom.gov.cn/article/jmxw/202109/20210903203895.shtml>. [2022-03-08]

^④ 章婕妤：《中拉关系仍处在“战略机遇期”》，载《大众日报》2022年01月08日第04版。

失去参议院控制权，这是自 1983 年以来庇隆主义政党第一次失去参议院半数席位优势；众议院的选举结果也显示出执政党领先反对派的席位优势非常微弱。^① 拉美多国的领导人和立法机构均存在派别不一的现象，各派的政治力量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涉及中拉绿色合作的发展趋势仍需观察。拉美左翼政府的能源国有化具有经济政策和外交政策调整的双重性质，其恪守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原则，对外政策上带有很强的实用主义倾向，意识形态因素淡化，并具有一定的民族主义倾向，因此中拉在经贸合作方面的争端可能会加大。^② 尽管拉美国家普遍对于可持续发展较为认同，但政党轮替、立法与行政机构的关系对于中拉绿色合作会产生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影响。

（三）拉美社会因素的影响

拉美国家社会组织对国家政策会产生一定影响，如墨西哥的一些社会组织就曾批评墨西哥总统洛佩斯的一些重大举措，包括墨西哥城机场的部分在建项目和尤卡坦半岛旅游列车项目。2021 年以来，尼加拉瓜政府通过并实施了一系列法律，限制其境内社会组织的运作。拉美地区这些社会组织大都对政府的政策提出了反对意见，并受到美国的资金支持。^③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拉美国家对美国的依赖日益加深。很多拉美左翼政府虽然有反美立场，但不得不在某些方面与美国保持合作关系，采取斗而不破的策略。^④ 受到美国支持的拉美国家社会组织对本国经济发展产生影响，是中国在拉美开展绿色合作时应当注意的方面。另外，拉美国家的社会组织与政府的关系存在不确定的情况。相当多的环境社会组织对于外国投资影响自然环境的做法非常关注，甚至会进行抗议活动。如巴西国内很多地方都有强大的社会组织，这些组织强烈反对博索纳罗的环境和气候政策。同时，巴西一些市和州政府的领导人与博索纳罗领导的联邦政府意见不一，地方政府也希望在决策方面拥有

^① 《阿反对派赢得议会中期选举，庇隆主义党首次失去参议院控制权》，驻阿根廷共和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处，2021 年 11 月 16 日。http://ar.mofcom.gov.cn/article/jmxw/202111/20211103221523.shtml.[2022-03-05]

^② 孙洪波：《“拉美国家中左派上台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学术研讨会综述》，载《拉丁美洲研究》，2008 年第 2 期，第 75-76 页。

^③ “Mexican President Pressures US to Stop Aid for NGO”，AP News，May 20，2021。https://apnews.com/article.[2022-03-08]

^④ 贺双荣：《拉美左派执政对国际关系的影响》，载《学习月刊》，2008 年第 9 期，第 44-45 页。

更大的自主权。^① 中国在拉美地区的投资项目曾经因劳资纠纷和环保等问题遭遇罢工、社区抗议并导致项目受阻，在此情况下中资企业往往陷入与工会的漫长谈判，有时需付出大笔额外资金满足社区或环保组织的要求而拉高投资成本，很多大项目最终收益甚微甚至搁浅，给中国企业“走出去”造成了很大困扰，也不利于中国形象的塑造。^② 由于拉美各国政府的治理能力不均，治理理念与中国存在较大差异，社会因素对中拉绿色合作可能会产生不确定性的影响，这是中方需要关注的方面。

四 中拉绿色合作的前景

2021年9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以视频方式出席第76届联合国大会，在参加一般性辩论并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发展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并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一是坚持发展优先；二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三是坚持普惠包容；四是坚持创新驱动；五是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六是坚持行动导向。深入贯彻全球发展倡议，能够从正确的义利观角度推动中拉绿色合作走深走远。中拉发展合作对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将起到重要的推动和示范作用。拉美地区由于其自身发展的独特性，可以成为中国发展经验的实践平台，加深全球对发展问题的认识，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宝贵经验。^③ 绿色发展是未来世界经济前进的重要推动力量之一。中拉虽然远隔重洋，但是同属发展中国家的属性有助于中拉整体合作。在正确义利观的指导下，中拉绿色合作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拓展。

（一）构建更加精细化的中拉绿色合作机制

拉美地区是“一带一路”的自然延伸。《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一带一路”被描述为“当今世界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中拉合作符合双方需要和根本利益，是双方自主选择。中国在拉美没有任何地缘政治考虑，过去没有，将来也不

^① Adriana Erthal Abdenur et al., “What Railway Deals Taught Chinese and Brazilians in the Amazon”,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August 4, 2021.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2021/08/04>. [2022-03-08]

^② 吕洋：《中国对拉美投资的现状及问题》，载《国际研究参考》，2016年第11期，第10页。

^③ 赵晖、黄顺达：《专访：发展互鉴是中拉共同逐梦的基石——访中国社科院拉美所所长柴瑜》，新华社，2021年12月9日。<http://world.people.com.cn/gb/n1/2021/1209/c1002-32304040.html>. [2022-03-10]

会有。中方尊重拉美地区独特的历史渊源，乐见拉美国家同其他任何国家发展关系，愿在尊重地区国家意愿基础上探讨开展三方合作、多方合作，共同做大利益蛋糕，实现多赢、共赢。^①

从国家层面，更加精细化的绿色合作机制有助于促进中拉双方在正确义利观指引下开展合作。在开展绿色合作的同时，中方应当对拉美各国不同的经济社会情况进行分类，差异化开展绿色合作的机制化运作。在经济基础较好的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哥斯达黎加等国，双方应着力全方位开展绿色合作，中方企业、当地企业及第三方国家的企业都可以共同通过机制化的合作，例如共同设立合资公司等方式参与绿色合作，通过清洁能源设施建设、绿色农业、绿色金融等综合路径，在绿色农业、新能源开发等领域适当拓展绿色金融合作，打造中拉绿色合作示范区，协调发展绿色贸易与绿色投资。同时，由于每个国家具有自身相对独特的发展特色，一国一策和区域协同发展都应得到考量。另外，在次区域合作较为成熟的地区机制层面，例如南方共同市场、太平洋联盟，应针对不同的次区域合作机制开展针对性的绿色合作方案，通过合作机制拓展与一系列成员国的绿色合作。反之，中方也可以通过与某个成员国的合作促进与次区域合作机制的联系。如中国与乌拉圭进行自贸区谈判的做法会带动中国与南方共同市场的合作，中方看重的是与次区域整体的合作。^②这也是从整体性的角度理解正确义利观的方式，中拉在开展绿色合作时可以借鉴。在市场较为成熟的区域开展绿色合作时，随着东道国企业在绿色合作方面参与度的提升，中方的社会责任、环境保护等方面的义务也可以得到共同分担，能够减轻中方在责任与义务方面的压力。而在经济发展能力不突出的拉美国家，中拉双方合资设立公司的条件往往不成熟。中方与这类国家的绿色合作可以在拉共体等合作机制框架内开展，要更加仔细了解当地国家对于投资、贸易的规定，在双方合作中突出道义的作用，将双方绿色合作定位于长期利益，不能仅仅看重一时的合作成效。这类合作可以作为中方与地区其他国家拓展合作的先导力量，将道义为主的合作作为示范性力量，吸引中国与拉美更多的国家开展绿色合作。

^① 《王毅：中拉合作是双方自主自愿的选择》，中国外交部网站，2019年9月27日。https://www.mfa.gov.cn/web/wjzbhd/201909/t20190927_359701.shtml. [2022-02-12]

^② 贺双荣、佟亚维：《中国与乌拉圭共建“一带一路”：进展、驱动因素及挑战》，载《拉丁美洲研究》，2021年第6期，第87页。

（二）从“惠民生”和“心联通”角度发展绿色合作

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心联通”起到了润物细无声的作用，“心联通”是“硬联通”“软联通”的情感纽带，为共建“一带一路”奠定重要基础，成为共建国家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持久动力源。^①人文交流对于中拉绿色合作是积极的促进路径，绿色发展赋能中拉“心联通”，双方通过国家、民营、社会组织等多种行为体的参与，在基建、文教、健康、灾害防治等领域应注重营造绿色合作项目，打造人文交流平台。中国应推动中方主导的民营资本和国际非政府组织参与中拉绿色合作，因为它们具有灵活性强、贴近民众等特点，更能够深入当地民众的生活并得到民众理解。对于政府间或企业层面的绿色合作，应注重消除道德风险，注重环境生态保护，保证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能够因绿色合作而受益，大力推动实施当地民众能够获益的绿色合作项目，在建设使用过程中达到环保标准，尽可能避免合作项目成为拉美社会争议的焦点。

正确义利观体现了人文精神的精髓，中拉双方在各自的历史、社会和文化中体现了正确义利观，很多民间故事、历史典故都可以作为弘扬正确义利观的内容。中拉双方在教育、智库、人文等方面的交流中，应当加大正确义利观、绿色合作方面的交流互鉴，同时双方应在人才培养、技术交流、语言学习等诸多方面加大人文交流的力度。在疫情流行的背景下，中拉学术界、教育界可以加大视频交流的力度，采取灵活的交流形式。双方政府间应有意识地加大对绿色合作的探讨力度，在民间交流中碰撞出合作的意识，从基层的角度推动互信的建立。同时，对于双方绿色合作的重要成果，需要及时、准确、有效地向各国民众以各自熟悉的语言进行传播，应充分利用网络信息平台、广播电视媒介的渠道作用。绿色合作的成果需要以人文交流的形式进行扩散，增进双方民众的联系，借此缩短双方的距离。通过对合作理念的交流，中拉在绿色合作中能体现出正确义利观的指导作用。

（三）积极灵活应对美方介入拉美的行为

“美洲增长”倡议、“重建美好世界”（B3W）及“印太经济框架”等实质上都是美国霸权在全球和区域中的体现。自从“门罗主义”提出后，美国就将拉美地区公开视作其势力范围。在中美战略博弈日益加深的背景下，美

^① 李曾骥、王好心泓：《人类文明的宝贵遗产——丝路精神述评》，载《光明日报》2021年12月13日第05版。

国近年来通过多种方式不断深化对华竞争，拓展美国模式的治理范式。美国向包括拉美地区在内的世界各地扩散经贸合作的经验与技术，对中方开展“一带一路”合作造成了影响。美国对中国单独接触或者遏制战略都不奏效，关键是要在不引起冲突的前提下将二者结合。^① 因此在应对美国的压力时，一方面应当积极争取与美国进行谈判与协调，尽可能与更多的美国企业、地方政府等开展合作，避免中美在拉美地区的恶性竞争，必要时可以通过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形式进行共同开发。中美应在多层次的协调当中推动对绿色合作的认识，在绿色基础设施、绿色金融、绿色农业等方面探索合作的可能性，在合作当中同样要将正确的义利观一以贯之。在追求利益的同时，中方企业要坚持对道义第一性的要求，对就业、环保等民生因素的考量需要特别重视，同时在利益分配方面尽量使各方的主要利益能够得到满足。

另一方面，中方也应考虑到美方各类倡议对中拉合作的冲击，应谨慎、细致研判美方的行动对中拉绿色合作的影响。《中国—拉共体成员国重点领域合作共同行动计划（2022—2024年）》指出，要推动中拉产业智能化、数字化、绿色化发展。面对美方的打压和干扰，中方应避免在美拉优势合作领域进行竞争，积极应对和采取经济反制；应与合作基础较好的拉美国家通过国家间的战略合作做好规划，同时深化双方在绿色产业等方面的协作，利用双方各自优势领域，加大产业融合力度，将中拉双方绿色产业的发展前途统筹规划，增加合作的稳定性。同时，在进一步尽好企业责任的同时，中方对于“债务陷阱论”等美方不实宣传应给予及时驳斥，同时通过事实树立起中企在拉美遵守义利观的正面形象。

五 结语

正确义利观倡导“以义为先、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倡导高质量绿色合作、可持续发展，体现了真正的多边主义，并有助于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构建。新冠疫情使拉美经济复苏面临严重的脆弱性，从长期看，拉美应实施新发展模式，以促进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② 中国经济的发展为拉美国家提供

^① Gideon Rose,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Liberal Order”, in *Foreign Affairs*, Vol. 98, No. 1, January/February 2019, p. 20.

^② 袁勇：《拉美经济复苏具有明显脆弱性》，载《经济日报》2022年01月03日第04版。

了值得借鉴的方案，拉美经济长期稳定的发展离不开中拉经贸领域的合作，正确义利观指引下的中拉绿色合作对中拉经贸合作能够起到支撑和引领的作用。中拉绿色合作在绿色基础设施建设、绿色金融、绿色贸易、绿色农业合作等领域取得了较大进展，并且体现了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中拉在开展绿色合作的同时认真贯彻了正确义利观，较好地把握了利益与道义的关系，为中拉全面、整体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但同时也应看到，中拉绿色合作在遵循了正确义利观的同时，在中美全球博弈的大背景下，也面临着美国的介入干扰、拉美国家国内政治和社会因素的影响。美国通过 B3W 等倡议在全球范围内与“一带一路”开展竞争，意图以美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样板，妄图干扰中拉正常合作。安全和发展并不能轻易分开^①，当前克服新冠疫情对世界经济带来的冲击、努力恢复经济发展，维护和平与稳定是各国面临的首要任务。中方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与正确义利观的核心思想相符合，对于中拉绿色合作具有指导作用。中拉绿色合作是增强拉美经济韧性与活力的重要因素，未来双方应紧密合作，把握正确义利观，立足可持续发展，努力克服合作中的困难，以绿色合作带动经济社会全面进步，共同推动后疫情时代的全球发展与安全。

(责任编辑 黄念)

^① Keith Krause and Oliver Jütersonke, “Peace,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in Post – Conflict Environments”, in *Security Dialogue*, Vol. 36, No. 4, 2005, p. 445.

中拉关系

能源转型背景下中国与拉美 清洁能源合作探析

焦玉平 蔡 宇

内容提要：推动清洁能源国际合作是中国在能源转型背景下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实现自身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战略选择。拉美是中国清洁能源走出去的重点地区。从发展历程上看，中拉清洁能源合作经历了从水能到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以及核能多领域共同发展，从工程承包模式到“投融资+建设+运营”模式融合发展的转变。在政治、经济金融整体合作，资源与技术优势互补的基础上，中拉清洁能源合作进展顺利，实现了政策互通与供需对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动后疫情时代拉美经济复苏、实现拉美经济转型的现实要求为中拉清洁能源持续性合作提供了发展机遇。但是，中拉清洁能源合作仍面临诸多挑战，既有来自拉美内部的政治、经济风险，又有来源于美国的竞争挤压，以及源自中国本身的清洁能源制度建设困境和融资困境。展望未来，进一步拓展与中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合作、加大与发达国家第三方市场合作以及加强中国政府与企业的协调应对风险能力能够深化中国与拉美清洁能源合作前景。

关键词：能源转型 能源合作 清洁能源 气候变化 经济转型 第三方市场合作

作者简介：焦玉平，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蔡宇，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F4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649 (2022) 04-0117-19

助推能源转型、构建以清洁能源为主体的新型能源消费结构已经成为全球发展趋势。清洁能源在世界能源结构中的地位日益提升。从消费结构上看,2009—2019年间,清洁能源在全球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重从13.3%升至15.7%,其中非水可再生能源的比重更是从1.8%升至5%。从装机规模上看,2009—2019年间,全球太阳能、风能和地热能装机容量从182.6吉瓦跃升至1223.1吉瓦,累计增长669.8%。从发电量上看,同一时期,全球水能累计增长123%,非水可再生能源累计增长440.6%。^①由此可见,全球清洁能源,尤其是非水清洁能源发展势头迅猛。目前,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太阳能和风能生产国以及可再生能源境外投资国,是全球清洁能源的引领者。并且,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支持清洁能源的国内外发展将成为中国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和推进实现全人类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必由之路,也是实现自身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必然要求。^②

拉丁美洲与加勒比海地区(以下简称“拉美地区”)是全球清洁能源市场最活跃、清洁能源装置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2015年,巴西、墨西哥和智利就已经跻身全球十大可再生能源市场行列。^③拉美是“一带一路”的重要参与方,也是中国清洁能源走出去的重点区域,目前,中国与巴西、阿根廷、智利、厄瓜多尔等国已经开展了广泛的清洁能源合作。中拉清洁能源合作的具体现状如何?从既有成果上看,中拉能够实现清洁能源合作的合作动力是什么?在全球能源转型的大背景下,中拉清洁能源合作面临哪些机遇与挑战?本文旨在聚焦上述问题,从整体的视角出发窥探中拉清洁能源合作的全貌。

^① 由于BP公司数据区分统计了水能、核能和可再生能源的消费量、发电量以及装机容量,此处的清洁能源指的是水能、核能和可再生能源的加总,原始数据来源于BP数据统计,比重由笔者计算。参见BP,“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https://www.bp.com/en/global/corporate/energy-economics/statistical-review-of-world-energy.html>. [2021-06-28]

^② 2020年12月发布的《新时代的中国能源》白皮书以及2021年3月1日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都强调了推动能源转型、推进绿色能源体系建设和低碳经济建设的重要意义。参见《新时代的中国能源发展》,新华网,2020年12月21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20-12/21/c_1126887608.htm. [2021-04-10];《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新华网,2021年3月13日。http://www.xinhuanet.com/2021-03/13/c_1127205564.htm. [2021-04-10]

^③ International Renewable Energy Agency, *Renewable Energy Market Analysis (Latin America)*, November 2016. <https://www.irena.org/publications/2016/Nov/Renewable-Energy-Market-Analysis-Latin-America>. [2021-04-10]

一 中拉清洁能源合作的发展历程与现状

目前,学界对清洁能源的认知可分为三种。第一种观点认为,清洁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等同。^①根据国际能源署的定义,可再生能源指的是可循环再生、直接来自于太阳或者地球内部的能源,包括太阳能、风能、潮汐能、水能、生物质能、地热能以及由可再生资源产生的生物燃料和氢气等。^②第二种观点认为,清洁能源应包括可再生能源与非可再生能源。中国工程院院士张玉卓认为,将清洁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划等号的认知忽视了各类能源的资源整合、技术耦合与协同发展,实际上是局限了清洁能源的内涵。他认为清洁能源不仅包括可再生能源,还包括经过清洁处理以及污染较低的化石能源(如天然气和煤层气)。^③第三种观点认为,尽管较石油污染排放量低,但天然气和煤层气等在严格意义上仍属于传统化石能源,而核能尽管属于不可再生能源,但污染排放量低,应该纳入清洁能源的范畴。因此,清洁能源应该是可再生能源与核能的加总^④,本文所讨论的中拉清洁能源合作在第三种观点的认知下展开。

传统能源合作包括能源贸易、能源投资、能源工程承包和能源金融合作,其中能源贸易主要是指与东道国的石油、煤炭、天然气等贸易往来。与传统能源合作不同,清洁能源领域的合作较少涉及能源贸易,这是因为清洁能源贸易主要表现为区域内的跨境电力贸易。中国和拉美距离遥远,跨境电力贸易成本太高,资助拉美清洁能源发展、推动拉美内部电力贸易是合作的主要形式。由此,中拉清洁能源合作主要表现在能源投资、能源金融合作和能源工程承包三方面。

从时间上看,中拉清洁能源合作分为两个阶段。起步阶段的合作以中国

^① 张锐、寇静娜:《全球清洁能源治理的兴起:主体与议题》,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20年第2期,第183页。

^②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Renewable Energy Working Party*, October 2002. <https://library.um.edu.mo/ebooks/b1362376x.pdf>. [2021-04-10]

^③ 张玉卓:《中国清洁能源的战略研究及发展对策》,载《中国科学院院刊》,2014年第4期,第431页。

^④ 徐斌、陈宇芳、沈小波:《清洁能源发展、二氧化碳减排与区域经济增长》,载《经济研究》,2019年第7期,第189页;李昕蕾:《“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的清洁能源外交——契机、挑战与战略能力建设》,载《国际展望》,2017年第3期,第37页。

对外经济援助和能源工程承包，以及中拉双方技术交流为主，并主要在水电领域展开。1984年，在《经济技术和科学合作基础协定》和《贷款合作协定》的基础上，中国确立援建厄瓜多尔8座小型水电站项目，中方负责提供发电设备和技术指导。^①自20世纪90年代起，江泽民主席、李鹏总理、朱镕基副总理、中国的管理人员以及技术人员等多次参观考察伊泰普水电站，就三峡工程的筹建、生产、运营等方面问题向巴西“取经”。^②1998年，苏里南共和国的“波洛科庞多农村输配电工程”（该输配电网的电源取自阿福巴卡水电站）由中国国家电力公司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设计、江苏金坛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施工和中国友发国际工程咨询公司监理完成，并于1999年顺利并网送电。进入21世纪，中拉清洁能源合作随着“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有序拓展，国际工程承包仍是主流，但规模较20世纪有所扩大。例如，2003—2004年间，中国水电顾问工程集团公司参与了委内瑞拉博高诺托斯水电站和拉里维萨水电站的勘测设计；2003年，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以下简称“中国水电集团”）中标伯利兹恰里洛水电站建设项目，这是中国水电集团成立以来签约的第一个美洲地区项目，同年在伯利兹设立第一个代表处。但是，相较而言，此时中国水电项目走出去的目的地仍主要集中在非洲和中国周边，对拉美的合作十分有限。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及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中拉清洁能源合作提供了发展机遇，合作由此进入迅速发展阶段。从合作领域上看，中拉水能合作发展迅速，并逐渐拓展到风能、太阳能和核能等领域。2009—2020年间，中拉水能合作达到高潮。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研究中心的中国海外电力资产数据库（China's Global Power Database）数据显示^③，2009—2020年间，仅在巴西，中国企业在水能领域的投融资装机容量就高达15572兆瓦，占对拉美水能投融资总装机容量的77%。另外，中国国家开发银行

^① 中国援建厄瓜多尔的8座小型水电站分别是龙巴基、金萨洛马、埃尔埃斯塔多、安卡马尔卡、莫耶图罗、拉波尼塔、查乌查、印达格。参见常流、王波主编：《中国水力发电年鉴（1989—1991年）》，北京：水利电力出版社，1992年，第508页。

^② 韩琦：《拉美基础设施建设中的国际合作精神：以伊泰普水电站为例》，载《拉丁美洲研究》，2016年第6期，第18—19页。

^③ 中国海外电力资产数据库是一个交互式数据平台，展示有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和/或开发性金融机构（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参与的海外电厂信息（交易类型、装机容量、贷款方、能源类型、项目状态等）及其碳足迹估算。参见Kevin P. Gallagher et al., “China's Global Power Database”, Global Development Policy Center, Boston University. <https://www.bu.edu/cgp/?lang=zh>. [2021-04-11]

(以下简称“中国国开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也对厄瓜多尔、阿根廷等国的水电领域进行了融资。同一时期,中国企业和政策性银行对拉美的风能、生物质能和太阳能投融资的装机容量也分别高达 2765 兆瓦、788 兆瓦和 567 兆瓦。比如中国进出口银行对古巴太阳能和生物质能项目融资、中国国开行对智利太阳能项目融资、国家电网对巴西风电公司并购等。^①除了政策性银行外,其他类型的商业银行和信贷公司也对拉美地区的清洁能源进行了融资,所以其规模更大。例如在 2012 年,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融资参与了阿根廷罗马布兰卡(Loma Blanca)的风电项目,这也是中国公司在阿根廷参与的第一个清洁能源项目。2021 年 1 月 22 日,罗马布兰卡一期、三期项目正式并入阿根廷国家电网系统,总装机容量高达 100 兆瓦,可满足 10 万户居民用电。^②

从合作形式上看,中拉清洁能源合作从单一工程承包向“投融资+建设+运营”融合发展。自 20 世纪末以来,国际工程承包由“建设—融资分离”模式向“带资承包”模式转变,中国政府也大力支持中国电力公司的海外拓展向“建设—经营—转让”模式(BOT)和“带资承包”模式转变。^③2008 年金融危机后,西方国家投融资能力下降,中国企业、银行加大了海外“投棋布子”的步伐。2009—2020 年间,中国企业和政策性银行以并购、绿地投资和贷款的形式向拉美清洁能源领域投融资的总装机容量高达 24.3 吉瓦。目前,将投融资与工程承包、项目运营相结合的“投融资+建设+经营”模式逐渐成为中拉清洁能源合作主流。从制度建设上看,中拉双多边政策沟通机制和清洁能源制度建设为合作铺路架桥。首先,中拉清洁能源合作始终围绕整体合作展开,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拉在既有基础上不断深化双多边政策沟通机制。从双边上看,中拉积极推进双边对话机制,譬如中国—巴西高层协调与合作委员会、中国—阿根廷政府间常设委员会机制、中国—墨西哥战略对话机制等相继建立。^④从多边上,中共十八大以来,一大批中拉多边合作

^① 中国进出口银行对古巴 Zedm solar 项目和 Jesus Rabi Biomass Power Plant 项目融资,中国国开行对智利 Arica Solar 项目融资,国家电网对巴西圣克拉拉 CPFL 公司的并购等。关于更多中国政策性银行、企业对拉美风能、太阳能等领域投融资的案例参见 Kevin P. Gallagher et al., “China’s Global Power Database”, Global Development Policy Center, Boston University. <https://www.bu.edu/cgp/?lang=zh>. [2021-04-11].

^② 《中企投资承建的阿根廷最大风电项目群更多项目投运》,新华网,2021 年 1 月 25 日。http://www.xinhuanet.com/power/2021-01/25/c_1210993770.htm. [2021-04-10]

^③ 邴凤山主编:《中国水力发电年鉴(2004年)》,北京:中国电力出版社,2005年,第334页。

^④ 江时学:《“一带一路”延伸推动中拉合作进入新阶段》,载《当代世界》,2019年第6期,第25页。

机制纷纷建立。2014年7月,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领导人首次会晤通过了《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共同体领导人巴西利亚会晤联合声明》,宣布成立中国—拉共体论坛(简称“中拉论坛”)。在中拉论坛的引领下,包括中拉基础设施合作论坛、中拉科技创新论坛、中拉智库论坛等在内的合作机制纷纷成立,《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合作规划(2015—2019年)》《中国与拉共体成员国优先领域合作共同行动计划(2019—2021年)》《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特别声明》等合作文件也顺利达成,极大促进了中拉整体合作的进程。^①尤其是,随着拉美地区成为“一带一路”的自然延伸和不可或缺的重要参与方,“一带一路”制度框架成为实现双方战略发展对接的新动力。中拉多边合作机制高屋建瓴,成为中国在拉美推广清洁能源合作的政策制度保障。其次,中拉双方积极推进与清洁能源相关的制度建设。2010年,受双方政府委托,中国—巴西气候变化与能源技术创新研究中心(简称“中巴气候与能源中心”)在清华大学成立,旨在为中巴气候变化与能源技术创新合作牵线搭桥。2015年,在中巴气候与能源中心的基础上,中拉清洁能源与气候变化联合实验室在中国科技部的支持下成立,旨在促进中拉双方在清洁能源、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合作。2019年4月25日,“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正式成立,旨在推动共建绿色“一带一路”,助力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古巴和危地马拉是创始伙伴国。^②最后,从企业层面上看,中国企业积极为开拓拉美市场建构制度基础。比如在水电领域,2009年开始,中国水电集团先后在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哥斯达黎加、哥伦比亚等国建立了代表处和分公司,成为中拉水能工程合作的桥头堡。目前,拉美地区已经成为中国开展对外承包工程业务的第三大市场。2019年,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水电集团、中国水利水电第十一工程局有限公司、中国水利水电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等跻身中国在拉美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前三十企业排名。^③

从具体领域上看,水能是中拉清洁能源合作的重点。中国海外电力资产

^① 《中国—拉共体论坛》,外交部,2021年2月。http://infogate.fmprc.gov.cn/web/wjb_673085. [2021-06-28]

^② 《“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介绍》,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研究院。http://www.brigc.net/gwym/lmjs/202007/t20200726_102077.html. [2021-06-28]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发展报告(2019—2020年)》,2020年11月25日。<http://images.mofcom.gov.cn/am/202101/20210120014101403.pdf>. [2021-04-25]. 中国企业除了直接参与水电站、风电厂、太阳能电厂的建设外,还参与到输配电基础设施建设中,所以事实上的合作规模更大。

数据库的数据显示,2000—2020年间,中国企业和政策性银行在全球范围内水电领域投融资的总装机容量为34232兆瓦,在拉美地区为20174兆瓦,主要集中在巴西、厄瓜多尔、阿根廷和智利4国。其中,中国在巴西和智利水电装机容量分别为15572兆瓦和501兆瓦,以并购和绿地投资为主;在厄瓜多尔和阿根廷为2284兆瓦和1817兆瓦,均为中国国开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融资。在现有计划内,2021—2033年间中国在拉美水电投融资的装机容量将会再增234兆瓦(见图1)。除直接对水电站投融资外,中国还积极参与拉美当地的输配电建设,最典型的的就是中国国家电网对巴西美丽山水电站一二期输电工程的投资、建设与运营。该项目不仅促进了中国企业、中国技术走出去,更是有效解决了巴西南部用电难的问题,改善了当地民生福祉。^①

中国对拉美地区的风能、太阳能合作较水电晚,但近年来发展较快。巴西是最主要的合作对象,合作最典型的方式是投资。从形式上看,中国太阳能、风能企业率先以并购的方式进驻巴西市场,但从未来发展趋势上更倾向于绿地投资。根据中国海外电力资产数据库,2010—2020年间,中国企业在巴西太阳能和风能领域的投资项目绝大部分以并购的方式实现,而2020年后则出现了大量计划内绿地投资项目。除巴西外,中国在拉美其他国家也有太阳能和风能投资,但规模较小。例如,包括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晶科能源控股有限公司在内的中国太阳能企业预计对墨西哥的7个项目进行投资,总装机容量将高达942兆瓦。2018年,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投资了智利的蓬塔·塞拉(Punta Sierra)风电项目,总装机容量82兆瓦。中国的政策性银行也融资了拉美太阳能和风能行业,但规模较投资小。在风能领域,2000—2020年间,仅中国国开行向厄瓜多尔比洛纳科(Villonaco)风电站进行了融资,这也是该国的第一座风电站。在太阳能领域,阿根廷最大的太阳能项目——高查瑞(Cauchari)光伏园区一期二期均由中国进出口银行提供融资。除投融资外,中国企业还以国际工程承包的方式积极参与对拉美地区的风能、太阳能开发的合作。例如,阿根廷罗马布兰卡的4个风电项目由中国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投资、中国电建集团担任工程总承包商,建成后每年将为该国减少180万吨碳排放,极大地促进阿根廷的能源转型。^②

^① 《“美丽山”里的中国电力高速公路》,新华网,2016年2月12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6-02/12/c_1118024042.htm。[2021-06-28]

^② 《中国“大风车”助力阿根廷能源结构升级》,新华网,2019年4月8日。http://www.xinhuanet.com/power/2019-04/08/c_1210102409.htm。[2021-04-20]

近年来，中拉在生物质能和核能领域的合作力度也有所增强。中国海外电力资产数据库数据显示，中国企业在巴西参与投资的生物质能发电装机容量高达768兆瓦，其国家电网国际发展公司下属的巴西CPFL新能源公司控股多个项目。2018年，三峰环境下属三峰卡万塔公司签订巴西圣保罗州巴路里市垃圾发电项目焚烧炉及余热锅炉设备供货合同，成为中巴生物质能合作的代表性项目之一。^① 阿根廷是中拉核能合作的重点国家。2015年2月，中国和阿根廷签署了《关于在阿根廷合作建设压水堆核电站的协议》和《合作在阿根廷建设重水堆核电站的谅解备忘录》，标志着中国核电技术正式出口拉美地区。^② 目前，中国“华龙一号”技术已经成功运用到阿根廷核电站（例如阿图查3号）建设中去，开辟了中拉核能技术合作的新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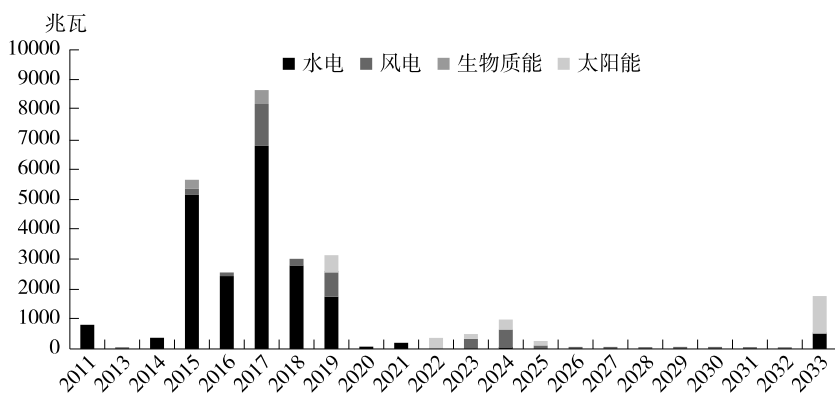


图1 中国对拉美清洁能源领域投融资总装机容量变迁 (2011—2033年)

资料来源：Kevin P. Gallagher et al., “China’s Global Power Database”, Global Development Policy Center, Boston University. <https://www.bu.edu/egp/?lang=zh>. [2021-04-20]

总的来说，2008年，尤其是2013年后，中拉清洁能源合作进展迅速。从领域上看，早期合作以水能为主，风能、太阳能、核能和生物质能合作在近10年内发展起来，成为中拉清洁能源合作的亮点。从合作对象上看，巴西、阿根廷等南美大国是主要合作国。从合作形式上看，合作早期以国际工程承包为主，但目前已经形成了“投融资+建设+运营”的融合发展模式。总的来说，中拉清洁能源合作在近10年内发展势头迅猛，拉美地区成为中国清洁

^① 《中巴可再生能源合作空间广阔》，新华网，2021年6月8日。<http://www.xinhuanet.com/energy/20210608/f58e406ee203411dacc9a968754970ec/c.html>. [2021-04-20]

^② 《华龙一号：原创三代核电技术引人注目（走进央企看创新）目前正在积极推进与多国的核能领域合作》，新华网，2016年6月11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6/11/c_129051028.htm. [2021-04-20]

能源走出去的重点区域之一。

二 中拉清洁能源合作的发展基础

从既有成果上看，中拉清洁能源合作与中拉政治、经贸、金融、传统能源合作并行互促，是中国清洁能源技术和实践优势与拉美清洁能源资源优势相结合的产物，具体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首先，中拉日益建立的政治互信和持续发展的经贸、金融关系是清洁能源合作顺利展开的根本保障。在政治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拉关系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低到高的发展历程。^① 目前，24个拉美国家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10个国家与中国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19个国家与中国签订了“一带一路”倡议合作文件。^② 中拉政府间的政治互信为中国企业、银行走进拉美清洁能源行业起到了指引作用。一方面，通过搭建中拉政策协调的平台，为中国企业、银行吃下规避政治风险的“定心丸”；另一方面，通过政府间协调，中方了解到拉美国家国内清洁能源市场发展诉求，中国政府能有的放矢推动企业走出去。经贸关系是中拉清洁能源合作的“压舱石”。在贸易领域，2000年中拉贸易额仅为100亿美元，2010年达1800亿美元，2019年首次超过3000亿美元，中国成为拉美第二大贸易伙伴国和第三大出口市场。在投资领域，根据中国政府统计，截至2019年中国对拉美的直接投资存量为4360.5亿美元，占中国海外投资总存量的19.8%，拉美地区成为中国海外投资的第二大目的地。^③ 在融资领域，中拉以双多边的形式展开务实合作。在双边形式上，中国政策性银行和商业性银行积极推动中拉开发性金融合作和人民币清算业务。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研究中心的中拉金融数据库数据显示，2000—2020年间

^① 崔守军：《中国和拉美关系转型的特征、动因与挑战》，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9年第3期，第98页。

^② 《已同中国签订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国家一览》，一带一路网，2021年3月12日。
<https://www.yidaiyilu.gov.cn/gbjg/gbgk/77073.htm>。[2021-04-20]

^③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201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国家统计局，2019年9月16日。
<http://images.mofcom.gov.cn/hzs/202010/20201029172027652.pdf>。注：王永中和徐沛原认为，中国官方统计的对拉直接投资总额将流向开曼群岛和英属维尔京群岛的金额也计算在内，导致在反映投资的国别（地区）分布方面存在明显的偏差和失真。他们根据 Dealogic、FDI 资讯和美国传统基金会的微观项目数据重新分析了中国对拉直接投资。结果显示，2016年，中国对拉美的真实直接投资存量为1070.5亿美元，是中国对外投资的第四大目的地。参见王永中、徐沛原：《中国对拉美直接投资的特征与风险》，载《拉丁美洲研究》，2018年第3期，第51页。

中国国开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累计向拉美地区融资 1360 亿美元，拉美成为中国政策性银行海外融资的主要目的地。^① 此外，包括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在内的商业银行也与智利、阿根廷等国开展了人民币清算业务，有力助推了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在多边形式上，一方面，阿根廷、巴西、厄瓜多尔积极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玻利维亚、智利、秘鲁、委内瑞拉也成为意向成员国。^② 另一方面，中国在 2019 年主导成立了“中拉开发性金融合作机制”，这是第一个中拉政府间的多边金融合作机制。中拉清洁能源合作是经贸、金融合作的有机组成部分，中拉双多边经贸、金融合作的达成和金融机制的建立有效促进了清洁能源合作。反之，中拉清洁能源合作也能够推动整体经贸、金融关系进一步发展。总的来说，中拉清洁能源合作始终在双方良好的政治、经贸、金融合作背景下展开。例如在融资领域，2000—2020 年间中国政策性银行分别在水能、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领域向厄瓜多尔、阿根廷、智利、古巴等国提供贷款（见图 2），而这些国家都与中国建立了良好的政治经济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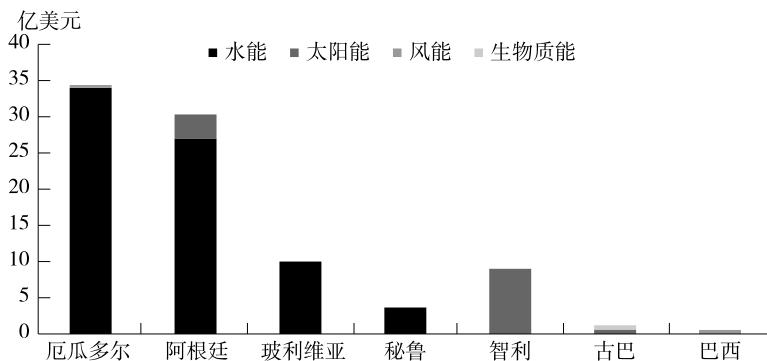


图 2 中国国开行与中国进出口银行对拉美各国
清洁能源融资状况（2000—2020 年）

资料来源：Kevin P. Gallagher, “China’s Global Energy Finance”, Global Development Policy Center, Boston University. <http://www.bu.edu/cgef/#/intro>. [2021-04-22]

其次，拉美丰富的清洁能源资源和对清洁能源的高度依赖性合作的前提。拉美具有丰沛的水能资源，亚马孙河是世界上流量最大、流域面积最广、支流最多的河流，流域面积内的巴西是世界上水能资源最丰富、水电利用率

^① Kevin P. Gallagher, Margaret Myers, “China – Latin America Finance Database”, Washington, Inter – American Dialogue. https://www.thedialogue.org/map_list/. [2021-04-22]

^② Asia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Members and Prospective Members of the Bank”. <https://www.aiib.org/en/about-aiib/governance/members-of-bank/index.html>. [2021-04-22]

最高的国家之一，巴西对水电的高度依赖是中巴在水电领域能够展开持续合作的重要原因。同时，拉美地区具有世界上最丰富的太阳能和风能资源。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全球有 20% 的人口生活在 70 个光伏发电条件优越的国家，长期日均光伏发电量（PVOUT）水平超过 4.5 千瓦时/天，阿根廷、智利、墨西哥、秘鲁位列其中。^① 例如智利北部地区的年平均日照时间达 4000 小时，辐射水平高，是拉美地区太阳能投资最活跃的地区之一。拉美地区还是全球风能潜力最大的地区，哥伦比亚、巴西、阿根廷南部拥有丰富的风能资源。同时，拉美地区对清洁能源的依赖度较高。2018 年，拉美地区一次能源供应中石油所占比重为 40%，生物能源为 22%，天然气为 20%，水能为 8%，煤炭为 7%，太阳能、风能为 2%，核能为 1%，清洁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超过 30%，远高于世界均值。^② 此外，从电力系统的角度上看，不少国家已经形成了全球碳排放量最少的电力系统。^③ 以水能为例，拉美地区是全球水力发电利用率最高的地区之一，该地区电力供应的一半以上为水电，其中巴西、巴拉圭、巴拿马、乌拉圭、委内瑞拉、哥伦比亚等国水力发电占本国总发电量的比重甚至超过了 60%。^④ 清洁能源在拉美既有能源消费格局中的重要地位成为中拉能够开展清洁能源合作的原因之一。

再次，中国具备与拉美展开清洁能源合作的技术基础和实践经验。中国的清洁能源技术在 2000 年后走向成熟，目前，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市场和设备制造国。在水能领域，中国拥有向全球出口水电设备的经验。新中国早期的对外援助中就有水电基础设施建设的身影。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中国政府以对外援助的形式与朝鲜、阿尔巴尼亚、几内亚、刚果等国合作修建水电站，在向广大发展中国家援助水电生产的同时积累了大量经验，为新时期中国开展国际水能合作夯实了基础。^⑤ 在太阳能领域，中国具有全球领先

^① The World Bank, *Global Photovoltaic Power Potential by Country*, June 2020. <http://documents1.worldbank.org/curated/en/466331592817725242/pdf>. [2021-04-22]

^② IEA, "Total Primary Energy Supply, 2018, Central & South America", July 2021. <https://www.iea.org/regions/central-south-america>. [2021-06-30]

^③ 张锐：《新冠疫情影响下的拉美能源转型》，载《拉丁美洲研究》，2021 年第 1 期，第 129 页。

^④ International Renewable Energy Agency, "Renewable Energy Market Analysis, Latin America", 2016. <https://www.irena.org/-/media/Files/IRENA/Agency/Publication/2016>. [2021-06-30]

^⑤ 中国政府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和朝鲜政府合作修复了水丰水电站，合资建设了云峰水电站、老虎哨（渭南）水电站和太平湾（新义州）水电站，并自 60 年代开始与非洲国家合作建立了几内亚金康水电站、刚果布昂扎水电站、赤道几内亚毕科莫水电站等。参见常流、陆钦侃、潘家铮主编：《中国水力发电年鉴（1949—1983 年）》，北京：水力发电杂志社，1985 年，第 543—547 页。

的技术和较为完备的产业链。从地理空间上看，全球太阳能技术中心呈现“美国—日本—中国”的转移现象，中国目前是太阳能专利活动最活跃的国家^①，“美国繁荣联盟”（CPA）首席经济学家杰夫·费里（Jeff Ferry）也声称，中国制造商在全球太阳能市场中处于主导地位。^②从产业链上看，与芯片不同，中国光伏产业在原材料市场、电池及其组建技术、市场占有率等方面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产业体系。^③其一，光伏产业最重要的原材料是晶体硅，中国是全球晶体硅的主要生产国。其二，全球排名前十的光伏组件企业中有7家是中国企业，全球光伏市场中超过70%的组件由中国制造。^④其三，中国在全球太阳能市场中处于领先地位，福布斯的报告显示，全球十大太阳能公司中，有8家是中国公司。^⑤中国风电产业也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发展历程，目前，中国风电装机规模和发电量均居世界第一位。^⑥尽管中国风电产业走出去的规模不如水能和太阳能，但已经具备了走出去的技术与实践。包括金风科技、远景能源等在内的中国风能企业已经在拉美市场顺利开展项目。

最后，中拉传统能源合作为清洁能源合作奠定了良好基础。中拉传统能源合作的历史可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1993年，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中标秘鲁塔拉拉油田，中拉油气合作由此拉开序幕。^⑦此后，中国与巴西、委内瑞拉、秘鲁、厄瓜多尔、哥伦比亚、墨西哥等国在贸易、投融资和工程承包等领域展开了广泛合作。在石油贸易领域，随着城市化、工业化逐步推进，中国对石油需求不断增长，中拉石油贸易也迅速发展起来，目前，巴西和委内瑞拉已经成为中国主要的原油来源国。^⑧中国与巴西、委内瑞拉等国达成的

① 栾春娟、宋博文：《全球太阳能技术中心转移及核心主题演进研究》，载《中国科技论坛》，2019年第12期，第68页。

② Jeff Ferry, “Reclaiming the US Solar Supply Chain from China”, March 2021. <https://prosperousamer.wpengine.com/wp-content/uploads/2021/03>. [2021-04-25]

③ 《国务院关于促进光伏产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2013年7月15日。http://www.nea.gov.cn/2013-07/15/c_132542911.htm. [2021-04-25]

④ 《国家能源局：中国光伏产业为全球市场供应了超过70%的组件》，新华网，2021年4月1日。http://www.xinhuanet.com/power/2021-04/01/c_1211093415.htm. [2021-04-25]

⑤ Kenneth Rapoza, “How China’s Solar Industry Is Set Up to Be the New Green OPEC”, in *Forbes*, March 14, 2021. <https://www.forbes.com/sites/kenrapoza/2021/03/14>. [2021-04-25]

⑥ 王恰：《中国风电产业40年发展成就与展望》，载《中国能源》，2020年第9期，第28页。

⑦ 张仕荣、张曙光：《新时期拉美结构主义与中拉能源合作的前景》，载《拉丁美洲研究》，2012年第6期，第20页。

⑧ 程中海、南楠、张亚如：《中国石油进口贸易的时空格局、发展困境与趋势展望》，载《经济地理》，2019年第2期，第7页。

“贷款换石油”模式一方面多元化了中国石油资源来源途径，另一方面也纾解了东道国的债务“瓶颈”，达成了互利双赢的良好局面。^①中国不仅是拉美石油开发的主要参与方，而且积极参与对拉油气基础设施建设。从2006年开始，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开始承建贯穿巴西东南—东北的卡塞内（Gasene）天然气管道工程。卡塞内项目全长1277公里，建成后年输气量为72亿立方米，堪称巴西的“西气东输”工程。在中石化的精心建设下，卡塞内项目圆满完工，不仅有效缓解了当地旱季水力发电站供电不足的紧张局面，而且为当地创造了约3万个就业岗位，产生了正外部效应。^②中拉油气合作与清洁能源合作并行互促。在巴西，中巴石油合作积攒了良好的信誉，为清洁能源合作打开了市场，目前，巴西不仅是中国化石能源主要伙伴国，更是中国清洁能源走出去的主要目的地。

三 中拉清洁能源合作的前景与挑战

在全球能源转型顺利进行、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复苏稳步推进的大背景下，中拉清洁能源合作优势互补、并行互促，合作前景广阔。具体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第一，维持气候稳定、实践能源转型的全球发展趋势为中拉清洁能源合作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在全球能源转型的大背景下，推动清洁能源持续发展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是中拉共同的战略选择。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讲话，承诺将为后疫情时代世界经济的“绿色复苏”贡献中国力量，二氧化碳排放量力争在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③2020年12月21日，中国政府发布了《新时代的中国能源发展》白皮书，强调推进绿色能源合作在持续贯彻“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中的重要性。^④为应对气候变化、兑

^① 部分西方学者将这种“贷款换石油”的模式恶意曲解为“新殖民主义”行为。事实上，这种“贷款换资源”的模式在全球金融发展史上是常见现象。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后，中日之间就逐步形成了“资源换贷款”的“双赢”模式——日本承诺提供技术、设备、建设器材以及基础设施融资支持，中国则同意以同等金额的原油和煤炭进行偿付。参见[美]黛博拉·布罗蒂加姆著，沈晓雷、高明秀译：《龙的礼物：中国在非洲的真实故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26-28页。

^② 《中巴两国石油建设者架起巴西“能源生命线”》，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2013年3月15日。http://www.gov.cn/jrzq/2013-03/15/content_2354603.htm。[2021-04-28]

^③ 《习近平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的讲话》，新华网，2020年9月22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20-09/22/c_1126527652.htm。[2021-05-10]

^④ 《新时代的中国能源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2020年12月21日。http://www.gov.cn/zhengce/2020-12/21/content_5571916.htm。[2021-05-10]

现《巴黎气候协定》承诺，拉美各国也分别制定了新的减排政策方案。2020年4月，智利宣布新的减排方案，致力于在2025年实现碳达峰，2050年实现碳中和。^①2020年12月9日，巴西环境部长里卡多·萨勒斯（Ricardo Salles）宣布到2030年实现43%的减排目标，到2060年实现碳中和。^②实现拉美地区的减排目标需要更多投融资。美洲开发银行的报告显示，仅在电力基础设施领域，拉美要实现2050年碳中和的目标就需要增加大约1000亿美元的投资。^③总的来说，中拉为应对气候变化所做出的共有承诺以及拉美为兑现减排目标所需要的资金需求为中拉清洁能源长期合作提供了发展机遇。

第二，拉美地区持续的电力需求是中拉清洁能源合作的先决条件。尽管拉美地区目前的获得电力指标值较高，但随着人口增长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求，其电力需求量仍将不断增长。美洲开发银行的报告显示，到2040年拉美地区的电力需求量将增至2970亿千瓦时，相当于2014年发电量的18倍，预计超过80%的电力需求来自于阿根廷、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墨西哥和委内瑞拉等国家，其中巴西和墨西哥占到一半以上（见表1）。一方面，水电作为拉丁美洲的主要用电构成，到2040年，为支持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减少能源部门的碳排放量，仍可能会保持潜在增长，中拉水能合作仍具备发展空间。另一方面，拉美国家希望达成水电与其他清洁能源平衡意识的加强为中拉非水清洁能源合作提供了发展机遇。例如，为改善能源结构，阿根廷政府提出到2025年实现可再生能源发电占比达20%，并给予了风电建设项目减税的优惠政策。

第三，中拉清洁能源合作能够助推拉美国家实现能源转型和经济转型。首先，拉美能源和经济转型具有必要性。拉美相当一部分国家石油资源丰富，尤其是巴西、委内瑞拉，作为世界主要石油生产国，经济严重依赖石油美元，想要实现能源和经济独立的唯一途径是向可再生能源转型，因为扩大清洁能源的利用率能够多元化能源来源途径，增加国家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灵活性和抗压性。其次，拉美能源和经济转型具有可行性。一方面，能源转型能够带来实在的经济利益。根据世界经济论坛的预计，在未来10年中，全球电力系统

^① John Bartlett, "Chile Charts Path to Greener, Fairer Future After Coronavirus", Reuters, April 14, 2020.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 [2021-05-10]

^② Mauricio Angelo, "Brazil's Updated Climate Plan Seen Lacking Credibility as Forests Shrink", Reuters, December 10, 2020.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 [2021-05-10]

^③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Getting to Net-Zero Emissions: Lessons from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2019. https://publications.iadb.org/publications/english/document/Getting_to_Net-Zero_Emissions_Lessons_from_Latin_America_and_the_Caribbean_Executive_Summary.pdf. [2021-05-10]

表 1 拉美地区电力需求量预计增长情况 (单位: 亿千瓦时)

国家(地区)			总增长率 (%)
	2013 年	2040 年	
阿根廷	139	213	52.7
巴西	570	1120	96.4
智利	73	175	139.5
哥伦比亚	65	159	145.8
墨西哥	297	556	87.2
委内瑞拉	118	191	61.4
其他	290	556	91.7
拉美地区	1553	2970	91.2

资料来源: Lenin H. Balza, Ramón Espinasa, and Tomas Serebrisky, *Energy Needs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to 2040*,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2016. <https://publications.iadb.org/publications/english/document>. [2021-05-10]

的转型可能带来超过 2.4 万亿美元的净经济收益。^① 根据预测, 每年用太阳能和风能取代 500 吉瓦的煤炭发电将会削减高达 230 亿美元的成本, 并产生价值 9400 亿美元的经济刺激。^② 美洲开发银行与国际劳工组织的报告也显示, 到 2030 年拉美向零碳经济转变将会导致与化石燃料工业、动物性食品加工等相关的 750 万个工作岗位消失, 但同时, 2250 万个新工作岗位将会随着可再生能源、林业等低碳产业的发展而产生。也就是说, 抵消化石能源的岗位流失后, 还有 1500 万个新岗位将会随着低碳经济的发展而产生。^③ 另一方面, 清洁能源, 尤其是非水清洁能源发电成本持续降低, 为拉美由化石能源向清洁能源转型提供了发展机遇。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 (IRENA) 的数据显示, 全球太阳能和风能成本一直呈现下降趋势。2010—2019 年间, 全球太阳能光伏 (PV) 成本下降幅度达 82%, 聚光太阳能 (CSP) 成本下降 47%, 陆上风电和海上风电成本分别下降 40% 和 29%。^④ 最后, 中国不仅在清洁能源领域

① Juan Carlos Castilla - Rubio, Joisa Saraiva, "Here's How to Unleash Brazil's Energy Revolution", World Economic Forum, March 14, 2018.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18/03>. [2021-05-10]

② International Renewable Energy Agency, "Renewable Power Generation Costs in 2019", June 2020. <https://www.irena.org/publications/2020/Jun/Renewable-Power-Generation-Costs-in-2019>. [2021-05-10]

③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Jobs in a Net-zero Emissions Future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2020.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 [2021-05-10]

④ International Renewable Energy Agency, "Renewable Power Generation Costs in 2019", June 2020. <https://www.irena.org/publications/2020/Jun/Renewable-Power-Generation-Costs-in-2019>. [2021-05-12]

已经具备了技术优势，更是具有对清洁能源进行持续技术创新的优势。国际能源署的报告认为，中国擅长将快速成型技术（RP 技术）、公共采购、廉价融资和内部市场部署相融合，在清洁能源技术创新上的试错容忍度较高，是中国清洁能源发展的独特优势。^① 中国在清洁能源方面的既有优势和持续的技术创新优势将成为拉美经济结构转型的催化剂。

第四，后疫情时代，清洁能源成为刺激拉美经济复苏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冠疫情（COVID-19）的复合效应使得拉美整体经济形势和就业市场更为严峻。联合国拉美经委会的报告显示，拉美地区是受 COVID-19 危机影响最严重的地区，2020 年，其年均经济收缩 7.7%，为 120 年来之最。^② 并且，COVID-19 大流行引发的经济动荡严重影响了拉美地区的劳动力市场，尤其导致劳动密集型的服务消费大幅降低，数以百万计的拉美工人失业。^③ 作为一套完整的产业链，清洁能源本身能够吸纳新投融资和就业，但相当一部分拉美国家的电力部门在新冠疫情影响下债务负担持续加重，本身几乎没有新建项目的能力。^④ 中国虽然也遭受了新冠疫情冲击，但良好的恢复状况、充足的外汇储备以及优良的清洁能源技术为后疫情时代的中拉清洁能源持续合作提供了动力。

尽管中拉清洁能源合作前景广阔，但仍面临挑战，具体表现在以下三方面。第一，从第三方的视角上看，中拉清洁能源合作面临西方大国，尤其是来自于美国的挑战。西班牙《国家报》（*El País*）的报告声称，如果说大国之间的斗争首先是商贸，其次是技术，那么未来几十年的关键战场将是气候，在应对气候变化中掌握清洁能源技术的国家将是 21 世纪经济的主导者。因此，争夺清洁能源投融资、技术的主导权将会成为未来大国博弈的关键。^⑤ 气

①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Energy Technology Perspectives 2020: Special Report on Clean Energy Innovation Accelerating Technology Progress for a Sustainable Future*, July 2020. <https://webstore.iea.org/download/direct>. [2021-05-12]

②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Preliminary Overview of the Economies of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2020”, February 2021. <https://www.cepal.org/en/publications>. [2021-05-12]

③ Takuji Komatsuzaki et al., *Latin American Labor Markets during COVID-19*,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October 2020. file: <http://Users/spring/Downloads/Labor.pdf>. [2021-05-12] 经合组织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导致 270 万家拉美公司关闭，850 万个工作岗位流失，其中大多数是微型企业，参见 OECD, *Latin American Economic Outlook 2020: Digital Transformation for Building Back Better*, October 2020. <https://www.oecd-ilibrary.org/docserver>. [2021-05-12]

④ 张锐：《新冠疫情影响下的拉美能源转型》，载《拉丁美洲研究》，2021 年第 1 期，第 123 页。

⑤ Óscar Granados, “La Batalla Climática Determinará Quién Lidera La Economía Mundial”, *El País*, March 27, 2021. <https://elpais.com/economia/2021-03-28>. [2021-05-15]

候问题以及与气候密切相关的清洁能源已经成为新的地缘政治竞争角力场，中美作为气候地缘政治的中心，必将展开新的技术与市场竞争。^① 拜登政府在竞选初期就提出了雄心勃勃的气候计划，力图通过可持续发展基础设施和清洁能源投资实现 2035 年无碳污染发电和 2050 年零排放。^② 在上台后不仅重启“绿色新政”，将其作为应对气候挑战、实践经济复苏的关键思维框架^③，还将应对气候变化确定为美国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重视与发展中国家开展清洁能源国际合作，并提出了包括“承诺 10 年内将太阳能成本削减 60%、投资 1740 亿美元支持电动车制造业发展”等具体政策支持清洁能源行业发展。拉美一直是拜登重点关注地区。在担任副总统时期，拜登就曾 16 次访问拉美，环境问题是其关注的核心之一。^④ 在 2021 年 4 月举行的气候峰会上，美国国务院宣布扩大对拉美可再生能源倡议的技术援助，将与美洲开发银行、拉美能源组织和全球电力系统转型联盟合作促进拉美可再生能源产能。^⑤ 可以预见，中美在清洁能源领域有可能形成新一轮的竞争与合作。鉴于拉美在美国地缘政治中的传统地位，中国在拉美清洁能源领域影响力的上升势必引发美国的顾虑与猜忌，未来中美在拉美地区清洁能源领域的竞争趋势有可能会加剧。

第二，从东道国的视角上看，国家治理的不确定性和社会治理的差异性构成了中拉清洁能源长期合作的障碍。^⑥ 从国家层面上看，拉美政治经济政策的不连续性和不稳定性将会影响到中拉清洁能源合作的持续性。无论是从投资、融资还是工程承包上看，长期性是能源合作的重要特征之一。例如在水电行业，一个项目的投融资、建设以及运营管理耗时长达数年，甚至数十年，

^① Scott Moore, “The New Geopolitics of Climate Change”, in *The Diplomat*, December 1, 2020. <https://thediplomat.com/2020/12/the-new-geopolitics-of-climate-change/>. [2021-05-15]

^② Peggy Otum and Shannon Morrissey, “What a Biden Administration will Mean for US Climate Change Policy”, November 9, 2020. <https://www.wilmerhale.com/en/insights/client-alerts>. [2021-05-15]

^③ 李坤泽、戚凯：《拜登政府“绿色新政”与民主党绿色转型》，载《国际论坛》，2021年第3期，第119页。

^④ Benjamin N. Gedan, “Biden Should Pursue an Environmental Treaty for the Western Hemisphere”, in *Foreign Policy*, June 2, 2021.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1/06/02/biden-environment-treaty-western-hemisphere-climate-change-diplomacy/>. [2021-06-30]

^⑤ The White House, “President Biden’s Leaders Summit on Climate”, April 23, 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04/23/>. [2021-05-15]

^⑥ 陈涛涛等人认为，中国与拉美在国家、行业和企业层面均存在诸多差异，这些差异构成了中国企业投资拉美基建领域的挑战。参见陈涛涛、徐润、金莹、顾凌骏：《拉美基础设施投资环境和中國基建企业的投资能力与挑战》，载《拉丁美洲研究》，2017年第3期，第36页。

因此，东道国长期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是进行投融资的关键考量。拉美地区政治局势复杂、政党更迭频繁、经济政策变幻莫测都是影响中拉清洁能源持续合作的不确定因素。从社会治理上看，中拉在劳工法案、环境条例等方面的差异构成了中拉清洁能源合作的阻碍。^①例如，阿根廷的孔多尔克利夫（Condor Cliff）和拉巴—兰库萨（La Barrancosa）水电站最初由中国政策性银行提供融资建设，但由于其环境影响评估不符合当地环保条例，导致阿根廷最高法院下令暂停该项目。^②

第三，从国内的视角上看，中拉清洁能源合作面临制度建设尚未健全、行业规范不统一、融资难的困境。其一，中国清洁能源走出去仍处于起步阶段，因此在制度建设、行业规范上仍处于摸索阶段，对中拉清洁能源持续合作构成了挑战。从制度建设上看，一方面，中拉清洁能源合作过程中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契合度仍有待提升，一条以企业竞争为主、政府引导为辅的国际化新路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另一方面，当前许多清洁能源合作还处于摸索阶段，一些中国企业在投标竞争、项目建设过程、移交管理中都面临困境，中国清洁能源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仍需不断完善自身制度化建设。从行业规范上看，不同清洁能源中资企业间的标准、中资企业与东道国企业间标准难以统一，导致中资企业与东道国企业存在沟通障碍。其二，中拉清洁能源合作面临融资难的困境。能源融资具有融资金额大、融资周期长的特点，以中国国开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为主体的政策性银行因具备国家信用、拥有巨额国家储蓄作为支撑而成为中国传统能源海外融资的主体。但是，目前中国非水清洁能源融资主要是由民营企业提供^③，在拉美也是如此，中国海外电力资产数据库的数据显示，2000—2020年间中国政策性银行对拉美清洁能源融资的绝大部分集中在水能领域，对非水清洁能源领域的融资较少（见表1）。^④由于民营企业资产规模较小，经常面临资金短缺的困境，为解决融资困境，加

^① Rebecca Ray et al., "China in Latin America: Lessons for South-South Cooper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oston University: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Initiative, April 2015. <https://www.bu.edu/gdp/files/2015/04>. [2021-05-15]; 李紫莹:《中国企业在拉美投资的政治风险及其对策》,载《国际经济合作》,2011年第3期,第22页。

^② Tais Gadea Lara, "New Argentina Government Reactivates Controversial Patagonia Dams", in *Dialogo Chino*, February 25, 2020. <https://dialogochino.net/en/climate-energy>. [2021-05-20]

^③ 马天杰:《中国可再生能源“走出去”的融资挑战》,中外对话,2020年4月9日。<https://chinadialogue.org.cn/zh/4/44396/>. [2021-05-20]

^④ Kevin P. Gallagher et al., "China's Global Power Database", Global Development Policy Center, Boston University. <https://www.bu.edu/cgp/?lang=zh>. [2021-05-20]

大政策性银行的参与具有必要性。

四 结语

中拉清洁能源合作在优势互补的基础上取得良好进展，为中国在其他地区开展清洁能源国际合作提供了示范意义。首先，中拉清洁能源合作的顺利进行是因地制宜、互利共赢的结果。清洁能源国际合作顺利展开要求中国政府、企业加强对东道国国情调研，平衡与东道国政府、企业间的利益分配，实现合作双方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其次，中拉清洁能源合作善于利用中国国家储蓄和外汇储蓄的资本优势和清洁能源领域的技术优势助力中国清洁能源企业走出国门，树立了中拉清洁能源国际合作的新风向。最后，中拉清洁能源合作重视投融资形式创新，形成了政策性银行、企业并购、绿地投资融合发展的多样化投融资方式。中拉清洁能源合作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中国践行南南合作的试验田，也为中国清洁能源企业深化“走出去”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在新的发展阶段，中国政府与企业可从如下三方面进一步拓宽对拉合作空间。首先，加强与中美洲国家清洁能源合作。目前，中拉清洁能源合作项目大部分集中在南美地区，与中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合作规模仍有限。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美洲和加勒比国家通过“双多边电力互联”、鼓励公共和私人投资竞争等方式在电力供应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但仍有数百万人不能获得电力供应。因此，中国可利用自身优势援建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中低收入国家电力系统，比如树立模范项目来获得地区国家的肯定，通过重视与区域内外部发展援助机构的合作实现竞争最小化等。其次，加强与发达国家的第三方市场合作。欧美发达国家在清洁能源国际合作的行业规范、咨询、运营管理等方面具有比较优势，中国具备国际清洁能源合作的技术和经验优势。因此，展望未来，在对拉清洁能源合作的过程中把握第三方市场合作机遇能够充分发挥各自优势，提高合作效率。最后，强化企业与政府沟通机制。目前，中国清洁能源，尤其是非水清洁能源国际化过程中的民营企业参与程度更高，但民营企业本身在走出去的过程中面临资金不足、信用缺乏的困境，建立健全政府与民营企业常态化沟通机制，继续以开发性金融助力中拉清洁能源合作尤为重要。

(责任编辑 高 涵)

巴西黑人奴隶家庭的组织模式 及其特点^{*}

焦 健

内容提要：巴西奴隶制时期黑人奴隶多数不能以法律认可的方式结婚，他们婚姻的合法性大多不被承认。但由于黑人奴隶有组建家庭的强烈愿望，且具备必要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组建家庭的客观因素，奴隶们在各种制约和限制下仍然建立了自己的家庭。黑人奴隶在非洲传统文化习俗的影响下，适应了巴西奴隶制社会的现实环境，形成了部族内婚制、种植园内婚制和外婚制等奴隶所特有的择偶模式，并在组建家庭的过程中形成了核心家庭、单亲家庭和扩大家庭等独特的家庭结构。相较于美洲实行奴隶制的其他地区，巴西黑人奴隶的家庭构成相对稳定，家庭关系中存在特殊的干亲关系，尤以教父教母关系最为典型和独特。黑人奴隶家庭组织模式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特殊性，不仅反映了奴隶制特殊历史条件下黑人奴隶对现实社会环境的妥协与适应，而且体现了奴隶对非洲传统文化习俗的沿袭和创新。黑人奴隶家庭客观上延长了奴隶制在巴西的存续时间，同时对非洲黑人文化的代际传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媒介作用。

关键词：巴西黑人 婚姻 择偶模式 家庭结构 奴隶制 非洲文化

作者简介：焦健，南开大学拉丁美洲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K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 - 6649 (2022) 04 - 0136 - 18

^{*}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课题“独立以来拉丁美洲的社会转型”（编号：19JJD770007）的阶段性成果。

家庭是人类社会的基本单元。古往今来，对于各种肤色的人来说，家庭的重要性都是相似的。家庭作为巴西社会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一直受西方学者重视和关注，尤其在奴隶制时期，黑人奴隶这一受到压迫和虐待的特殊群体是否存在家庭，一直是学界存在争议的问题。20世纪70年代之前，西方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普遍认为巴西奴隶制时期黑人奴隶并无家庭生活可言。然而，随着对巴西奴隶制问题研究的不断深入，学者们依据种植园奴隶名单、财产清单、人口普查资料和教区的相关记录，修正了过去有关巴西黑人奴隶日常生活和具体处境的一系列观点。史学家们逐渐认识到奴隶组建家庭尽管受到种种客观条件的制约，但仍有相当一部分黑人奴隶能够建立家庭或与他人共同组成大家庭。^①近年来，多数黑人奴隶生活在家庭中并拥有一定的家庭生活已逐渐成为西方学界的共识。^②

相较于国外对该领域的研究，国内史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比较匮乏，尚有许多有待探究与思考的方面。巴西作为近代黑人奴隶制存续时间最长、蓄奴人口最多的地区，这里的黑人奴隶组建家庭所面临的制约因素、奴隶家庭的关系和功能、奴隶的婚姻家庭伦理和奴隶家庭的稳定性等问题，值得我们进行探讨和开拓性研究。鉴于此，本文尝试通过梳理黑人奴隶家庭存在的条件和择偶模式的具体形式，对奴隶家庭的结构和特点进行分析，深化对巴西奴隶制时期黑人家庭问题的认识和理解。

一 黑人奴隶家庭存在的条件

家庭作为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是由婚姻、血缘或收养关系组成的。^③家庭的形成通常要经过婚姻形式中的法律程序，即以法律认可的方式结婚才能建立家庭。然而，在巴西以法律认可的方式合法地组成家庭，对于黑人奴隶来说是非常困难的。

一方面，多数奴隶主反对奴隶通过合法的方式结婚。在奴隶制时期，尽管天主教会承认并认可黑人奴隶通过婚姻组建家庭，但这意味着奴隶的结合

^① Flávio dos Santos Gomes, "Africans and Slave Marriages in Eighteenth-century Rio de Janeiro", in *The Americas*, Vol. 67, No. 2, 2010, p. 153.

^② Alida C. Metcalf, "Searching for The Slave Family in Colonial Brazil: A Reconstruction from São Paulo", in *Journal of Family History*, Vol. 16, No. 3, 1991, p. 283.

^③ 《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第102页。

一旦得到教会的认可，便受到教会的保护，奴隶主不得随意拆散或卖掉奴隶夫妻中的一方而致婚姻不能得以延续，这其实是对奴隶主利益的一种限制和制约。^① 大多数情况下当奴隶们请求主人同意他们的婚事时，主人会严禁其奴隶依天主教习俗合法地结为夫妻。因为在主人看来，被教会认可的合法婚姻，婚姻本身及婚生子女均有合法地位，受到法律和教会的保护。未经教会认可的奴隶婚姻，就是非法的，可随意拆散。即便奴隶有了夫妻之实，奴隶主还是可以将男女奴隶分别出售或转让。^② 出于这些因素的考量，为了防止黑人奴隶和他们的子女以法律和教会规章为由反对随意拆散他们的家庭，大多数奴隶主都不会批准奴隶以合法的方式结婚。学者通过对相关统计资料进行研究后发现，在1841年、1842年和1847年，整个里约热内卢的合法奴隶婚姻数量仅为11桩^③，这充分说明在拥有数万奴隶的里约热内卢，黑人以合法方式结婚的困难性。

另一方面，多数黑人奴隶并未按照法律认可的方式成婚。由于文化差异和语言障碍，大多数通过奴隶贸易被贩卖到巴西的黑人奴隶从未真正皈依天主教，他们并不认同以天主教的方式结婚。同时，天主教神父出于宗教上的狭隘以及对黑人奴隶的偏见和歧视，普遍拒绝为奴隶们举行天主教的婚礼。在整个里约热内卢的教区资料中，19世纪40年代被记录下来的奴隶婚姻只有67桩，各个教区的奴隶婚姻记录数量基本都是个位数，有的教区更是没有一桩奴隶婚姻被记录下来，这充分反映了教会对奴隶婚姻的漠视和阻挠。^④

鉴于这种情况，奴隶们更愿意按照非洲的仪式举办婚礼，或者不举办婚礼仪式直接生活在一起。当然多数情况下，黑人奴隶会依照自己的意愿，以非洲传统的婚礼习俗举行庆祝活动，并通过这种形式使他们的婚姻获得人们的认可。但这种婚姻方式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并不受法律认可，没有相应的法律地位。

因此，仅以合法婚姻作为判定黑人奴隶家庭存续的必要条件，极易片面地认为奴隶婚姻和奴隶家庭是不存在的。^⑤ 家庭作为初级社会群体，是社会的

^① Flávio dos Santos Gomes, "Africans and Slave Marriages in Eighteenth-century Rio de Janeiro", in *The Americas*, Vol. 67, No. 2, 2010, pp. 154-155.

^{②③④} Mary C. Karasch, *Slave Life in Rio de Janeiro 1808-1850*,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287-291, p. 289, p. 290.

^⑤ Stuart B. Schwartz, *Sugar Plantations in the Formation of Brazilian Society: Bahia, 1550-1835*,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 385-394.

自然产物。在家庭中，自然的血缘关系和世代关系是维系家庭存在的重要纽带，生育子女、繁衍后代、增加新的家庭成员，也是在自然状况下发生的。家庭的形成，虽然要经过婚姻形式中的法律程序，有人为因素，但却是以自然形成为条件的。^① 因此，除婚姻合法性因素外，需要更加全面地对巴西黑人奴隶建立家庭的主客观因素进行综合分析，才能客观地判断黑人奴隶家庭是否真实存在。

首先，黑人奴隶有组建家庭的强烈愿望。黑人奴隶作为有血有肉的人，与不同肤色其他民族的人们有着相同的情感诉求，他们也对建立家庭充满了渴望。在传统非洲黑人文化中，广义上的家庭和家族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是人与人之间彼此联系的纽带。个人只有在家庭中才能获得群体归属感，并找到自己在族群中的位置。对于远离非洲故土漂泊无根的巴西黑人奴隶来说，家庭在日常生活中有着更加重要的作用，它使得黑人奴隶们在巴西陌生的环境中找到了生存的希望和意义，并在奴隶制的艰难环境下得以抱团取暖。因此，从建立家庭的主体角度分析，黑人奴隶有着组建家庭的现实意愿和具体动机，一定会为争取这一基本权利而努力。

其次，黑人奴隶组建家庭具备必要的物质生活条件。在社会学领域，家庭是通过血缘关系结成的以分享共同生活场域为最主要特征的初级社会群体。^② 基本的居所和相对独立的生活空间，是建立家庭最重要的物质条件。巴西种植园的黑人奴隶大多集中住在主人安排的排房或主人房间门外的走廊地板上^③，共同的居住空间使得男女黑人奴隶有了组建家庭的可能。在一些小种植园或建有围墙的区域，奴隶被允许建造独立的棚屋，这些按非洲传统建造的屋舍使得黑人奴隶有了必要的家庭居所。尽管这些棚屋只是简单的容身之所，空间小、私密性差，但就在这些屋舍中，黑人奴隶传承和发展着非洲传统的家庭模式和家庭观念。^④

再次，相当数量的女性黑人奴隶使得黑人奴隶组建家庭成为可能。非洲有重女轻男的文化传统。在非洲许多地区，女性除了是从事农业生产的主要

^① 邓伟志、徐新著：《家庭社会学导论》，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0页。

^② 赵孟营著：《新家庭社会学》，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页。

^③ Mary C. Karasch, *Slave Life in Rio de Janeiro 1808-1850*,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295.

^④ John Candler and Wilson Burgess, *Narrative of a Recent Visit to Brazil*, London: E. Newman Printer, 1853, p. 38.

劳动力外，还是延续家族血脉、维系家族关系的重要纽带，在社会生活中有着极高的地位。黑人女性多数情况下不会被卖往美洲。^①而奴隶制早期美洲种植园和矿山的生产又对精壮劳动力有着持续的需求，这导致通过大西洋奴隶贸易被贩卖到美洲的黑人奴隶多以男性为主。这造成了奴隶在性别上男女比例的严重失调，男性约占奴隶总数的65%以上。^②这使得一半以上的男性黑人奴隶很难找到配偶，很多黑人奴隶终其一生都没有机会娶妻生子。到了奴隶制后期，奴隶贩子发现贩卖黑人女奴有利可图，大量女性黑奴被贩卖到美洲。^③与此同时，巴西土生女性黑人的数量也在逐渐增多，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黑人奴隶性别比例严重失衡的问题。在一些规模较大的种植园，由于其所拥有的奴隶人口基数大，相应的女性黑人奴隶的数量也相对较多，奴隶大多能够找到合适的伴侣组建家庭。^④

最后，奴隶主态度和观念上的变化影响了奴隶家庭的建立。奴隶主在不同历史时期，对于奴隶组建家庭的态度有着很大的差别。在16—17世纪，黑人奴隶间的婚姻常常不被奴隶主允许，或者因被主人拆散而难以为继。^⑤而奴隶所生的孩子更是被奴隶主看作是一种负担，因为从婴儿到可以用作生产的劳动力，需要经过许多年的时间，从经济成本考虑，不如直接购买从非洲贩运而来的黑人奴隶更划算。因此，在17世纪到19世纪初大西洋奴隶贸易蓬勃发展的时期，奴隶主虽然无法彻底阻止奴隶间的结合，但大多主观上不鼓励奴隶结婚生育。但19世纪中期后，随着大西洋奴隶贸易的终结，为了保证奴隶人口的稳定，壮大种植园黑人奴隶的数量，平衡种植园奴隶性别比例，保障潜在的经济收益，巴西的种植园主们普遍重视和鼓励奴隶们组成家庭，并保证其家庭构成的稳定。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黑人奴隶家庭的建立。

综上所述，黑人奴隶组建家庭尽管受诸多因素共同影响，但由于具备必

① Herbert S. Klein, "African Women in the Atlantic Slave Trade", in Claire C. Robertson and Martin A. Klein (eds.), *Women and Slavery in Africa*,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3, pp. 29–38.

② Herbert S. Klein and Francisco Vidal Luna, *Slavery in Brazil*,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162.

③ James E. Blackwell, *The Black Community: Diversity and Unity*,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 Inc., 1975, p. 36.

④ Linda Wimmer, "Ethnicity and Family Formation Among Slaves on Tobacco Farms in the Bahian Recôncavo, 1698–1820", in José C. Curto and Paul E. Lovejoy (eds.), *Enslaving Connections: Changing Cultures of Africa and Brazil During the Era of Slavery*, New York: Humanity Books, 2003, p. 155.

⑤ Mark A. Burkholder, *Encyclopedia of Latin America (Volume II): From Colonies to Independent Nations (1550s to 1820s)*, New York: Facts on File, Inc., 2010, p. 281.

要的主观和客观条件，因此在奴隶制时期巴西黑人奴隶群体中较为普遍地存在着奴隶家庭。

二 黑人奴隶的择偶模式

择偶是指社会成员结合一定的社会文化因素与个人条件选择异性作为丈夫和妻子（即生活伴侣）的过程^①，它是一种生理的、心理的、社会的、文化的现象。择偶动机和标准更多地为当时的政治、经济状况以及社会风俗、价值取向所制约，被烙上时代的印记。^②在巴西奴隶制时期，尽管黑人奴隶在建立家庭时受到了种种限制和制约，但在非洲传统文化习俗的影响下，奴隶们积极适应着奴隶制社会的现实环境，形成了奴隶所特有的择偶观念。

通常情况下，黑人奴隶在选择结婚对象和性伴侣的时候，受“同类婚”观念的影响，趋向于与来自非洲同一文化群体的人结婚。当然，这种同一的文化群体并不单局限于同一部族之内，它所涵盖的范围更广，包括地域相近、语言文化相通的人。这种在婚姻伴侣的选择上对非洲文化属性和族群身份的重视，反映了奴隶对非洲传统黑人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③斯威特（James Sweet）在其研究中指出，来自非洲的黑人奴隶在择偶上所遵循的同类性原则是“在美洲重建非洲社会和文化的的第一步”。^④奴隶们在巴西奴隶制社会背景下，形成了多种不同的择偶模式。

（一）部族内婚制

巴西黑人奴隶在择偶时，更多地会选择与自己有着相同非洲文化背景的人作为终生伴侣。^⑤他们对伴侣的考量，更为看重其部族背景和非洲出生地。^⑥通常情况下，奴隶们愿意选择来自同一部族的人组成家庭，当没有来自同一部

^① 王水珍：《改革开放30年与青年择偶观念的变迁》，载《中国青年研究》，2008年第1期，第8页。

^② 李克玉、张静：《婚姻家庭社会学》，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第20页。

^③ Gwendolyn Midlo Hall, *Slavery and African Ethnicities in the Americas: Restoring the Links*,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5, p. 52.

^④ James H. Sweet, *Recreating Africa: Culture, Kinship and Religion in the African - Portuguese World, 1441-1770*, Chapel Hill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3, p. 47.

^⑤ Walter Hawthorne, *From Africa to Brazil: Culture, Identity, and an Atlantic Slave Trade, 1600-1830*,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207.

^⑥ Stuart B. Schwartz, *Sugar Plantations in the Formation of Brazilian Society: Bahia, 1550-1835*,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392.

族的合适对象时，来自非洲相近地区的其他部族的人，也是理想的结婚对象。

在所有有记录可查的巴西黑人奴隶婚姻中，绝大多数奴隶会在来自同一非洲部族的异性中选择自己的另一半。在巴伊亚和里约热内卢的黑人奴隶婚姻中，就明显存在着基于部族属性的内婚制模式。例如在18世纪上半叶里约热内卢登记结婚的253对非洲黑人奴隶的合法婚姻中，绝大多数的黑人奴隶都选择了与同一族属的异性相结合。^① 其中在里约热内卢沿海安格拉—多斯雷斯（Angra dos Reis）地区有记录的黑人奴隶婚姻中，75%的黑人奴隶婚姻有着共同的非洲部族文化背景。^② 在18世纪巴伊亚雷孔卡沃（Recôncavo）地区的160宗黑人奴隶婚姻中，41%的黑人奴隶选择了与来自非洲同一语族的人结婚。^③ 而在米纳斯吉拉斯的巴尔巴塞纳（Barbacena）地区，1721—1781年的488份婚姻记录中，黑人奴隶的部族内婚率也很高，96%的奴隶会选择来自同一民族或讲同种语言的人作为自己的伴侣。^④

巴西黑人奴隶在择偶上所体现出的这种群体偏好源自非洲的部族内婚制传统。在非洲，不同部族的人通常情况下会在同部族或同村庄中寻找伴侣，实行部族内婚制。黑人奴隶经由大西洋奴隶贸易被贩卖到巴西后，沿袭了非洲的内婚制，但其内婚制所包含的意义更为广泛。奴隶的择偶范围已不再单纯局限在同一部族之中，来自共同文化区的黑人也是普遍被考虑的择偶对象。这种更广泛意义上的区域性部族内婚制使得黑人奴隶的非洲民族属性得以延续，而奴隶的部族归属和部族间的隔阂则逐渐变得模糊。巴西黑人奴隶对择偶对象的地区性偏好，在来自上几内亚地区和米纳湾（今贝宁）地区黑人奴隶群体中尤为明显和突出。^⑤ 据1767—1832年的档案资料记录所示，来自上几内亚沿海地区黑人女性有65%的人选择与上几内亚地区的男子组建家

① Mariza Soares, *Devotos da Cor: Identidade Etnica, Religiosidade e Escravidão no Rio de Janeiro, Século XVIII*, Rio de Janeiro: Civilização Brasileira, 2000, p. 125.

② Marcia Cristina Roma de Vasconcellos, *Famílias Escravas em Angra dos Reis, 1801-1888*, Tese de Doutorado, São Paulo: Universidade de São Paulo, 2006, p. 127.

③ Luis Nicolau Parés, “O Processo de Crioulização no Recôncavo Baiano (1750-1800)”, em *Afro-Ásia*, No. 33, 2005, p. 114.

④ Herbert S. Klein and Francisco Vidal Luna, *Slavery in Brazil*,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221.

⑤ Linda Wimmer, “Ethnicity and Family Formation Among Slaves on Tobacco Farms in the Bahian Recôncavo, 1698-1820”, in José C. Curto and Paul E. Lovejoy (eds.), *Enslaving Connections: Changing Cultures of Africa and Brazil During the Era of Slavery*, New York: Humanity Books, 2003, pp. 149-163; Stuart B. Schwartz, *Sugar Plantations in the Formation of Brazilian Society: Bahia, 1550-1835*,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 391-392.

庭，而来自上几内亚内陆地区的黑人女性也有 67% 的人选择了与上几内亚地区的男子结合。而来自米纳湾地区的黑人女性的择偶状况也与之类似，超过 42% 的人选择了与来自同地区的黑人建立家庭。^①

（二）种植园内婚制

鉴于奴隶建立家庭需要得到主人的首肯，并且奴隶们在所劳作的种植园中终其一生所能接触到的异性数量有限，因此可供选择的婚配对象并不多，这就意味着奴隶们大多仅限从所在种植园的奴隶中选择伴侣。^② 由于存在奴隶在婚姻选择上的这些限制，因此绝大多数奴隶会在同一奴隶主所拥有的奴隶群体中选择自己的终身伴侣，这导致在巴西黑人奴隶群体中出现了种植园内婚制这一特殊的择偶模式。

黑人奴隶种植园内婚制广泛存在于巴西各个地区的种植园中。在米纳斯吉拉斯的卡塔斯阿尔塔斯—杜马托登特罗（Catás Altas do Mato Dentro）地区，1742—1834 年同属一个主人的黑人奴隶间的结合占黑人奴隶婚姻总数的 98%。^③ 这种情况在 17—18 世纪里约热内卢绝大多数奴隶家庭中也较为常见。^④ 到了 19 世纪，里约热内卢沿海地区和圣保罗地区的奴隶结合也大多为种植园内婚制。^⑤

由于绝大多数黑人奴隶只能在同一种植园中选择自己的伴侣，因此奴隶在择偶上受种植园规模和同一种植园中适龄婚配奴隶数量的限制。一般来说，种植园的规模与适婚奴隶的数量往往成正比。从实际情况来看，往往种植园规模越大，黑人奴隶的家庭数量越多。^⑥ 在 18—19 世纪米纳斯吉拉斯、里约

① Walter Hawthorne, *From Africa to Brazil: Culture, Identity, and an Atlantic Slave Trade, 1600–1830*,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181.

② Stuart B. Schwartz, *Sugar Plantations in the Formation of Brazilian Society: Bahia, 1550–1835*,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358.

③ Tarcísio Rodrigues Botelho, “Família Escrava em Catás Altas do Mato Dentro (MG) no Século XVIII”, em *Anais da V Jornada Setecentista*, 2003, p. 691.

④ Herbert S. Klein and Francisco Vidal Luna, *Slavery in Brazil*,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225.

⑤ Alida C. Metcalf, *Family and Frontier in Colonial Brazil: Santana de Parnaíba, 1580–1822*,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p. 165; Marcia Cristina Roma de Vasconcellos, *Famílias Escravas em Angra dos Reis, 1801–1888*, Tese de Doutorado, São Paulo: Universidade de São Paulo, 2006, p. 116.

⑥ Renato Leite Marcondes e José Flávio Motta, “A Família Escrava em Lorena e Cruzeiro (1874)”, em ABEP, *Anais do XII Encontro Nacional de Estudos Populacionais*, 2000, pp. 10–11; Francisco Vidal Luna, “Observações Sobre Casamento de Escravos em Treze Localidades de São Paulo (1776, 1804 e 1829)”, em ABEP/SEADE, *Anais do Congresso sobre História da População da América Latina*, São Paulo, 1989, p. 14.

热内卢和圣保罗地区种植园保留的大量资料中，可以清晰地看出奴隶们在大种植园中组成家庭生活情况要明显多于小种植园。例如，根据1829年圣保罗州人口普查和1872年巴西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可以清晰地看出，圣保罗坎皮纳斯（Campinas）地区蓄奴规模超过10人的甘蔗或咖啡种植园中的奴隶家庭数量，是蓄奴规模小于10人种植园的两倍。^①另外，在对1775—1850年圣保罗州20万黑人奴隶的人口普查资料进行分析后，能够发现随着种植园规模的扩大，奴隶家庭的数量也在明显增多。只有一个奴隶的小奴隶主，他们的男性奴隶记录成家率仅为6%，女性奴隶的记录成家率则更低，仅为4%。反观拥有40名奴隶以上的大奴隶主，他们的男性奴隶记录成家率为21%，女性奴隶的记录成家率则高达39%。^②

（三）外婚制

与黑人奴隶在同一种植园或同一族群选择伴侣的内婚制相对应，在巴西城市地区和农村的小种植园中，由于奴隶主所拥有的奴隶数量较少，奴隶很难以同类性原则的择偶标准在同一奴隶群体内找到合适的对象，因此部分黑人奴隶会在种植园以外或其他族属的奴隶中寻找自己的伴侣。而在这种情况下，黑人奴隶的择偶对象大多与自己有着不同的身份地位和族群文化背景。

在巴西各地的文献资料中都有关于并非同一种植园的黑人奴隶组建家庭的记录，而且多数这类结合突破了奴隶与自由人身份地位的界限。在18世纪以及19世纪早期欧鲁普雷图维拉利卡（Vila Rica）的米内罗镇，约有20%的黑人奴隶与释奴组成了家庭。^③在1726—1820年圣安娜·德巴纳伊巴（Santana de Parnaíba）的边陲小镇保利斯塔，总共569桩奴隶婚姻记录中，除了70%的婚姻是黑人奴隶之间的结合外，有52桩为黑人奴隶与印第安人的婚姻，还有117桩是奴隶与自由有色种人的结合。^④在里约热内卢的蔗糖产区坎波斯·多斯戈伊塔卡塞斯（Campos dos Goitacases），4507桩奴隶婚姻中有60桩为奴隶与自由人的结合，另有102桩是奴隶和释奴之间的婚姻。在这60桩奴隶与自由人的

^① Herbert S. Klein and Francisco Vidal Luna, *Slavery in Brazil*,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225.

^② Francisco Vidal Luna and Herbert S. Klein, *Slavery and Economy of São Paulo 1750–1850*,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148.

^③ Herbert S. Klein and Francisco Vidal Luna, *Slavery in Brazil*,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225.

^④ Alida C. Metcalf, *Family and Frontier in Colonial Brazil: Santana de Parnaíba, 1580–1822*,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p. 167

婚姻中，多为女性黑人奴隶嫁给了自由平民（占这类婚姻的72%），而奴隶与释奴的婚姻则多为男性黑奴娶了女性释奴（占这类婚姻的61%）。^①与黑人奴隶结婚的自由人多为最贫穷的穆拉托人和印第安人，鲜有白人会与黑人奴隶结婚。

当然自由人之所以会选择与奴隶组建家庭，主要是受自由人的经济状况所决定。一般来说，这些自由人的经济状况普遍堪忧，养活自己尚有难度，供养家庭则显得更加吃力。但如果选择与奴隶组成家庭，可以使他们无需供养另一半，因为奴隶的主人大多替他们承担了这笔花销，这可以大大减轻其经济压力。在这类家庭中，由于奴隶主承担了奴隶家庭的一半花销，因此奴隶夫妇无论自由与否，都对主人负有相应的义务，夫妻双方都需要为主人进行劳动。^②

此外，非洲黑人奴隶与巴西土生黑人奴隶之间的结合，也是奴隶外婚制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在巴西殖民地时期很长一段时间内，由于非洲黑人奴隶与巴西土生黑人奴隶之间在语言、习俗和族群认同感上存在着很大的文化差异，导致这两个奴隶群体间极少存在相互通婚的现象。最初非洲黑人与巴西土生黑人的结合只出现在小种植园中，因为小种植园主受经济实力所限，购买的奴隶数量相对较少，他们大多只购入男性黑奴直接从事生产劳动，这使得小种植园中自非洲贩运而来的黑人奴隶在性别比例上出现严重的不平衡。与之相对，巴西土生黑人的性别比更为均衡，黑人女性也更多，因此男性黑奴只能选择巴西土生黑人女性作为结婚对象。然而，即便如此，二者在文化上的隔阂也使得非洲黑人与巴西土生黑人的结合在奴隶婚姻总数中只占极少数。

当然，在“非洲—巴西土生”黑人奴隶家庭中，几乎没有黑人奴隶与肤色较浅的穆拉托人（黑白混血种人）结合的情况。^③因为在巴西的肤色等级制下，肤色较浅的穆拉托人在择偶时只会选择肤色浅的人作为自己的伴侣，而不会垂青那些肤色黝黑或直接运自非洲的黑人。^④这种依肤色等级选择伴侣的择偶模式，对巴西后来的种族融合和种族民主进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今，巴西社会仍然普遍存在以肤色深浅作为选择结婚对象最重要标准的现象，其根源即是脱胎于奴隶制时期按不同肤色等级选择婚配对象的择偶模式。

^① Herbert S. Klein and Francisco Vidal Luna, *Slavery in Brazil*,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226.

^② Sheila Siqueira de Castro Faria, “Legitimidade, Estratégias Familiares e Condição Feminina no Brasil Escravista”, em ABEP, *Anais do VIII Encontro de Estudos Populacionais*, 1992, p. 300.

^{③④} Stuart B. Schwartz, *Sugar Plantations in the Formation of Brazilian Society: Bahia, 1550-1835*,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349, p. 392.

综上，巴西奴隶制时期，黑人奴隶的择偶观念受文化、社会、经济、地域和制度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择偶模式。

三 巴西黑人奴隶的家庭结构

学者们对巴西黑人奴隶日常生活的相关研究表明，成年黑人奴隶及其子女大多生活在家庭中。^①几乎所有的种植园资料中都记录了奴隶家庭的情况，这些记录中黑人奴隶的家庭结构在巴西有着其独特的表现形式。奴隶制下的巴西黑人奴隶家庭普遍存在三种类型的家庭结构：核心家庭、单亲家庭和扩大家庭。

（一）核心家庭

在巴西奴隶人口中，核心家庭是最常见的奴隶家庭类型。在社会学与人类学层面，核心家庭通常是指由父、母、子女组成的家庭模式。^②在巴西黑人奴隶的观念中，由丈夫、妻子和孩子共同组成的核心家庭是最主要的奴隶家庭形态，奴隶父母带着子女共同生活的情况最为普遍。在非洲黑人的传统观念中，并没有婚后才能发生性关系的观念和禁忌，因此黑人男女婚前发生性行为的现象非常普遍。多数研究表明，在巴西黑人奴隶的恋爱过程中普遍存在着试婚阶段，许多奴隶“夫妇”会在有了1~2个孩子后才最终按照非洲的传统婚礼习俗正式组建家庭，他们在婚后大多与所生育子女共同组成核心家庭。^③生活在核心家庭的黑人奴隶大多将家庭成员限定在父母与子女的范围。^④

黑人奴隶核心家庭的数量和稳定性通常与所属奴隶主的经济实力直接相关。相较于经济实力有限的奴隶主，大种植园主或大地产主所属的奴隶们更容易长期维持核心家庭的存续。在18世纪巴纳伊巴（Parnaíba）地区规模最大的3个庄园中，有88.8%的黑人奴隶家庭符合核心家庭的评判标准，生活在这些核心家庭中的黑人奴隶占3个庄园黑人奴隶总数的74%。^⑤在19世纪

^① Juliana Garavazo, “Relações Familiares e Estabilidade Da Família Escrava: Batatais (1850-1888)”, in ABEP, *Anais de XIV Encontro Nacional de Estudos Populacionais*, 1987, p. 6.

^② 潘允康著：《社会变迁中的家庭：家庭社会学》，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第185页。

^③ Alida C. Metcalf, “Searching for The Slave Family in Colonial Brazil: A Reconstruction from São Paulo”, *Journal of Family History*, Vol. 16, No. 3, 1991, p. 289.

^④ Katia M. De Queirós Mattoso, *To Be a Slave in Brazil, 1550-1888*, Arthur Goldhammer (trans.), New Jersey: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109.

^⑤ Alida C. Metcalf, “Searching for the Slave Family in Colonial Brazil: A Reconstruction from São Paulo”, in *Journal of Family History*, Vol. 16, No. 3, 1991, p. 290.

坎皮纳斯 (Campinas) 地区的大种植园中, 奴隶的核心家庭构成也普遍较为稳定, 大多数黑人小孩能够在双亲的抚育下长大。^①

(二) 单亲家庭

除了核心家庭外, 单亲家庭是巴西黑人奴隶另一种常见的家庭结构。通常情况下, 这样的家庭只有母亲和子女, 没有父亲。之所以在奴隶群体中会大量产生这种特殊的家庭结构, 最主要的原因可以归纳为以下两点。其一, 由于作为主要劳动力的男性黑奴死亡率高, 被出售或转让的可能性大, 因此成年黑人男性奴隶在成为父亲后, 被奴隶主贩卖或转让而不得被迫离开原种植园远赴异地, 从此与妻儿人各一方, 终生难得再见的并不在少数。而那些不堪劳役或身染疾病不幸亡故的男性黑奴, 则只能留下孤儿寡母独自生活。其二, 奴隶子女的生父是白人男子。以欧洲人的标准来看, 在 19 世纪前受天主教影响下的拉美社会中, 很少有像巴西这样, 白人与黑人女奴发生婚外恋和生养非婚生子女的比率如此之高的情况。即便对于巴西白人精英阶层来说, 虽然合法婚姻有着极其重要的政治和经济意义, 但婚外恋和私生子也远多于其他欧洲国家的殖民地。在萨尔瓦多关于新生儿的教区资料记录中, 1830—1874 年超过 9000 名新生儿中有 62% 的非婚生子女, 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白人与黑人奴隶的私生子。^② 这些白人与黑人女奴的私生子, 在奴隶制社会条件下作为白人统治阶级无法公开承认的存在, 其社会阶级属性和地位较为模糊。^③

显然, 造成这一类单亲家庭产生的主要原因无疑是白人奴隶主对黑人女性奴隶的性剥削。在巴西奴隶制社会, 由于白人奴隶主具有绝对的权威, 因此他们与女性黑人奴隶强行发生性关系不受任何约束和限制。弗雷尔 (Gilberto Freyre) 曾将这种不对等的性强制描述为“葡萄牙人与黑人和印第安人进行融合的最直接方式”^④。当白人男子意欲强行与女奴发生性关系时, 女奴无论愿意与否只能被迫接受。因为主人意图寻欢之时, 一切反抗都只会是徒劳, 如果因反抗致主人扫兴或受伤, 甚至还可能招来严厉的报复和严酷的

^① Robert W. Slenes, “Escravidão e Família: Padrões de Casamento e Estabilidade Familiar numa Comunidade Escrava (Campinas, Século XIX)”, em *Estudos Econômicos*, Vol. 17, No. 2, 1987, pp. 217–227.

^② Herbert S. Klein and Francisco Vidal Luna, *Slavery in Brazil*,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222.

^③ Alida C. Metcalf, “Searching for the Slave Family in Colonial Brazil: A Reconstruction from São Paulo”, in *Journal of Family History*, Vol. 16, No. 3, 1991, p. 290.

^④ Gilberto Freyre, *The Masters and the Slaves: A Study in the Development of Brazilian Civilization*, Samuel Putnam (trans.),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p. 84.

惩罚，因此黑人女性只能屈从于这种令人厌恶的性关系中。女性黑人奴隶是这种不正当性关系中的主要受害者，她们只是白人奴隶主发泄欲望的工具。尽管白人奴隶主会与她们发生性关系，甚至还跟她们有了孩子，但真正娶了她们的却几乎没有。因为在巴西奴隶制社会，跨种族跨阶级的婚姻是不被社会所接纳的。^① 因此，对于在这种畸形婚姻模式中饱受折磨的黑人女奴来说，她们只是奴隶主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玩物，她们不可能得到正式的名分，她们只能在人们的白眼和排斥下独自抚养子女长大。^②

（三）扩大家庭

扩大家庭也是常见的黑人奴隶家庭结构。扩大家庭通常是指核心家庭与非直系亲属所共同组成的家庭。^③ 通常情况下，黑人受非洲部族观念影响，会把亲缘关系看作保持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主要途径。亲缘关系所涵盖的范围较为广泛，部族中的每个人都或多或少与其他人沾亲带故，因此来自同一族群的人皆被视为兄弟。^④ 黑人奴隶在来到巴西后，也将这种广义上的大家族观念继承和延续了下来，并成为他们在奴隶制下维持社会群体感的一种重要手段。在1872年圣保罗巴纳纳尔（Bananal）地区的雷斯加特（Resgate）咖啡种植园，436名奴隶中将近90%与他人存在亲属关系。^⑤ 奴隶们通过婚姻，建立了不同家庭之间的联系，促成了奴隶大家族体系的建立。

在奴隶大家族中，各个家庭结成了相互联系的血亲关系。在这些大家族中奴隶们普遍遵循共同的婚姻禁忌，例如禁止近亲结婚、反对旁系血亲间的结合等。同时奴隶大家族中有着共同的子女命名规则、财产继承制度。新婚夫妇是单独生活还是与其中一方的父母一起生活，也需家族共同商议决定。奴隶大家族还会通过相应的机制保障家庭关系的相对稳定。作风败坏或不负责任的个人会受到家族成员的谴责和强制，促使其遵守道德、承担对家庭的相应义务，强制的方式主要包括对其施加压力、施以巫术或采用暴力手段使

^① Mary C. Karasch, *Slave Life in Rio de Janeiro 1808-1850*,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291.

^② Walter Hawthorne, *From Africa to Brazil: Culture, Identity, and an Atlantic Slave Trade, 1600-1830*,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193.

^③ 邓伟志、徐新著：《家庭社会学导论》，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3页。

^④ Katia M. De Queirós Mattoso, *To Be a Slave in Brazil, 1550-1888*, Arthur Goldhammer (trans.), New Jersey: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108-109.

^⑤ Herbert S. Klein and Francisco Vidal Luna, *Slavery in Brazil*,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238.

其屈服等。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奴隶大家族对奴隶家庭进行监督和约束的重要作用。^①此外，当出现上文所述黑人奴隶夫妻双方因一人生病、死亡或被出售而导致家庭生活难以为继的情况出现时，大家族中的其他成员通常会在抚养婴儿和帮助料理家务方面，给予他们较多的关怀和照拂。

四 黑人奴隶家庭的独特性

在奴隶制度下，巴西黑人奴隶一方面传承和延续着非洲的婚姻家庭传统，另一方面也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形成了与奴隶制社会相适应的特殊家庭生活方式。与实行奴隶制的美洲其他地区相比较，巴西黑人奴隶的家庭存在以下两点独特之处。

（一）黑人奴隶特有的干亲关系

在巴西黑人奴隶的家庭关系中，除了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亲戚外，还有非血缘关系的干亲关系，其中教父教母关系是最为典型的干亲关系。尽管多数奴隶婚姻不为教会所承认，但每个奴隶新生儿都会被教会要求拥有教父或教母。根据罗马天主教的教义规定，教父和教母对教导孩子的成长至关重要。教父教母与教子之间的关系等同于亲生父母与子女的关系。这种血缘关系之外的教父教母关系使得人与人之间多了一层可以互相支持和依靠的紧密联系。^②它使得教父教母与孩子形成了一生的亲缘和联系。教父教母既可以是孩子的良师益友，也可以在孩子亲生父母死后成为他们的继父母。教父教母对孩子的成长负有义务，当孩子成为孤儿时，教父教母有责任将他们纳入自己的家庭进行抚养。这种教父教母关系对于孩子的亲生父母也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孩子的教父教母与亲生父母间可以籍此形成相互扶持、互相帮助的非血缘亲情关系。^③

在巴西，教父教母的选择有其独特之处。奴隶父母在给孩子选择教父教母时，多以彼此间深厚的友谊和相互敬重为前提，教父教母通常是孩子亲生

^① Herbert S. Klein and Francisco Vidal Luna, *Slavery in Brazil*,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235.

^② Stuart B. Schwartz, *Sugar Plantations in the Formation of Brazilian Society: Bahia, 1550-1835*,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 63-65.

^③ Stuart B. Schwartz, *Slaves, Peasants, and Rebels: Reconsidering Brazilian Slavery*, Urbana 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2, pp. 137-160.

父母的至交或奴隶社群中德高望重的长者。由于黑人奴隶处于社会最底层，他们通常会倾向于让拥有更高社会地位的人作孩子的教父教母，以寻求孩子得到更好的抚养和保护。1838—1887年，根据在米纳斯吉拉斯地区一个种植园中的1970名黑人奴隶儿童的受洗资料显示，有69%的孩子的教父是自由有色种人，有62%的孩子的教母有着自由人的身份。一般来说，教父教母是奴隶的，多与教子同在一个种植园中。^①但教父教母是自由人的，则无需与教子在同一种植园。^②这种教父教母多为自由人的情况，在巴伊亚地区较为常见。^③

教父教母自由与否和是否来自同一个种植园，在巴西不同地区有着很大的差别，与巴伊亚地区不同，1817—1842年在里约热内卢伊尼奥马（Inhaúma）教区受洗的1557名黑人儿童中，他们的教父只有1/3是自由人，有64%的教父与教子来自同一种植园，而自由人做教父的也大多是释奴。教母有78%是奴隶，其中72%也与教子来自同一种植园。^④

尽管教父教母的情况在不同地区存在很大差异，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奴隶主基本不会成为奴隶的教父教母。在巴西，由于身份和地位的巨大差异以及种族与文化的隔阂，使得奴隶主与奴隶之间通常不具有教父教母这种关系。当然，尽管奴隶主不能成为奴隶的教父教母，但奴隶却可以是自由释奴子女的教父或教母。在米纳斯吉拉斯的一个教区，979名拥有自由人身份的新生儿有教父，其中约有35%的教父是奴隶。另外，拥有教母的907名新生儿中，有超过43%的人的教母是奴隶。^⑤由此可以看出，奴隶与释奴间的友情并未因身份地位的差异而有所改变，而是进一步形成了以教父教母关系为特征的干亲关系。

教父教母关系是巴西黑人奴隶重要的亲缘关系，一定程度上也是黑人奴隶相互扶持、互相帮助的扩大家庭的一种表现形式，是巴西黑人奴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干亲关系加深了奴隶间的友谊，增进了奴隶社群间日常生活中的紧密联系。

^① Jonis Freire, “Compadrio em uma Freguesia Escravista: Senhor Bom Jesus do Rio Pardo (MG) (1838–1888)”, em ABEP, *Anais de XIV Encontro Nacional de Estudos Populacionais*, 2004, pp. 11–19.

^② Stuart B. Schwartz, *Slaves, Peasants, and Rebels: Reconsidering Brazilian Slavery*, Urbana 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2, pp. 148–151.

^③ Stuart B. Schwartz, *Sugar Plantations in the Formation of Brazilian Society: Bahia, 1550–1835*,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409.

^④ Herbert S. Klein and Francisco Vidal Luna, *Slavery in Brazil*,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241.

^⑤ Jonis Freire, “Compadrio em uma Freguesia Escravista: Senhor Bom Jesus do Rio Pardo (MG) (1838–1888)”, em ABEP, *Anais de XIV Encontro Nacional de Estudos Populacionais*, 2004, pp. 20–21.

（二）黑人奴隶的家庭构成相对稳定

通常情况下，人们认为巴西黑人奴隶的家庭也同北美和古巴等美洲蓄奴地区的黑人奴隶家庭一样，受家庭成员被出售或转让、夫妻双方一人死亡和主人强行拆散等因素共同影响，黑人奴隶的家庭极易解体。但学者们通过研究后发现，巴西多数地区的奴隶家庭结构并非如人们所认为的那样脆弱。相反，黑人奴隶的家庭存续时间普遍都很长。即便在奴隶死亡率最高的圣保罗坎皮纳斯地区，1872年蓄奴规模在10人以上的甘蔗和咖啡种植园中，年龄在35~44岁的黑人奴隶夫妻的平均婚龄也长达16年8个月，而年龄在二三十岁的年轻黑人奴隶中，更是约有60%的奴隶夫妻的平均婚龄为11年以上。这些奴隶家庭的稳定性令人惊讶，多数核心家庭并未遭遇主人的强制拆散，只是因奴隶夫妻中的一方去世才最终走向解体。^①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巴塔泰斯（Batatais）地区，这里的奴隶家庭存续时间普遍也在10年以上。^②克莱因（Herbert S. Klein）指出，奴隶主去世对黑人奴隶家庭的稳定性影响并不大，奴隶家庭的稳定性始终很高。老奴隶主去世后，新奴隶主会尽量设法维持其治下黑人奴隶家庭的完整，避免出现因分别继承而导致奴隶家庭成员的离散。1850—1888年巴塔泰斯的112个奴隶家庭中只有5个因财产继承而被拆散。1790—1835年里约热内卢的奴隶家庭中，只有19%的奴隶家庭因主人离世而导致家庭成员被分别继承。

一般来说，大种植园中的黑人奴隶家庭的稳定性较之小种植园更高，奴隶家庭多数不会由主人强行拆散。在这些奴隶家庭长大的孩子多数可以与父母共同生活至接近成年，这进一步突显了奴隶家庭所具有的稳定性。^③

当然，巴西黑人奴隶的死亡率常年居高不下也是不争的事实。马克思曾说：“在奴隶输入国，管理奴隶的格言是‘最有效的经济’，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从当牛马的人身上榨出最多的劳动。在种植热带作物的地方，种植园的年利润往往与总资本相等，正是在这些地方，黑人的生命被视同草芥”^④。巴西种植园的情况与马克思的论断相一致，奴隶主为了在短时间内快速收回成本并让资本增殖，往往视黑人奴隶的生命为草芥，长时间高强度的劳动往往

^① Herbert S. Klein and Francisco Vidal Luna, *Slavery in Brazil*,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236.

^② Juliana Garavazo, “Relações Familiares e Estabilidade Da Família Escrava: Batatais (1850-1888)”, em ABEP, *Anais de XIV Encontro Nacional de Estudos Populacionais*, 2004, p. 13.

^③ Herbert S. Klein and Francisco Vidal Luna, *Slavery in Brazil*,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236.

^④ 马克思著：《资本论》（第1卷），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96页。

导致黑人奴隶的死亡率常年保持在极高水平。这也是必须持续进口黑人奴隶以满足劳动力需求的主要原因。^①

但奴隶的高死亡率却并未对黑人奴隶家庭的稳定性产生决定性的负面影响，其主要原因为以下三点：首先，从非洲被贩运来的黑人奴隶，在到达巴西后会直接被投入到种植园和矿山的生产劳动中，在这里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很快就因不适应严苛的工作环境和恶劣的生存条件而丧命，根本没有机会组建家庭；其次，有幸组建家庭的黑人奴隶大多适应了巴西的环境，并在繁重的劳动中得以幸存，他们的适应能力和生存技能使得他们在组建家庭后很少因不堪劳苦而过早死去；第三，黑人奴隶所掌握技能以及其在种植园中的身份地位，也影响了其组成家庭的可能性。男性奴隶监工较之于普通奴隶，拥有家庭的几率普遍更高。^② 这些奴隶的身份使得他们不致因残酷且严苛的奴役而过早死去，他们的家庭也多不会遭遇主人的强制拆散。

综上所述，巴西黑人奴隶的家庭构成相对来说较为稳定。巴西黑人奴隶整体上的高死亡率并未对奴隶家庭的稳定性产生影响。奴隶所属种植园蓄奴规模越大，奴隶被出售或转让而导致家庭被拆散的可能越小。奴隶主离世后的财产分割继承对奴隶家庭的完整性和稳定性也较少产生影响。

五 结语

在巴西奴隶制社会，黑人奴隶在结婚和组建家庭上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很难得到法律上的认可，但即便如此，家庭仍然是黑人奴隶日常生活的重要部分。黑人奴隶依照非洲的文化传统组建属于自己的家庭，并在奴隶制的特殊社会条件下创造属于自己的择偶模式和家庭结构。他们通过组建家庭构建亲情和人际关系网，形成了专属于黑人奴隶群体的特殊家庭组织模式。这种巴西黑人奴隶所特有的家庭既与非洲传统不同，又与欧洲人的家庭模式有所区别。它一方面是黑人奴隶在继承和延续非洲传统和风俗习惯的基础上，对巴西奴隶制社会环境进行妥协和适应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在巴西奴隶制特殊历史时期和人文环境下，黑人奴隶对家庭组织模式所进行的创新，这种家

^① Philip D. Curtin,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Plantation Complex: Essays in Atlantic History* (Second Edi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17.

^② Walter Hawthorne, *From Africa to Brazil: Culture, Identity, and an Atlantic Slave Trade, 1600-1830*,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187.

庭组织模式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特殊性。

黑人奴隶家庭客观上延长了奴隶制在巴西的存续时间。巴西黑人奴隶家庭作为奴隶制时期社会的基本单元，一方面便于奴隶主对黑人奴隶进行统治和约束，另一方面其所具有的生育和生产功能不仅对黑人奴隶人口的增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还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奴隶制经济再生产的需要。这一点在1807年3月英国议会通过《废除奴隶贸易法》、宣布彻底禁止奴隶贸易后尤为突出。19世纪中后期，英国凭借强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通过缔结条约、派遣海军武力清剿等手段，强行取缔了持续几个世纪的大西洋奴隶贸易。^① 迫于英国压力，巴西也于1850年宣布禁止奴隶贸易，但直至1888年才彻底废除奴隶制，成为西半球最后一个废除奴隶制的国家。漫长的废奴过程既是巴西国内政治社会势力相互斗争与妥协的体现，也是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但不可否认，黑人奴隶家庭对黑人人口增殖的重要作用，保证了黑人奴隶人口的相对稳定，确保了奴隶制社会经济在失去非洲劳动力补充的情况下得以继续运转，对巴西奴隶制长时间的苟延残喘具有重要的影响。

黑人奴隶家庭是非洲黑人文化重要的传承媒介。如前文所述，黑人奴隶在择偶时，大多会选择来自非洲同一族群或来自非洲同一地区的黑人作为伴侣。这就意味着黑人奴隶的结合通常发生在同一文化群体中。通过这种结合，黑人奴隶能够将大洋彼岸的非洲文化传承给巴西出生的下一代。在家庭中，父母会给予子女讲述非洲先祖的传说和家族的故事，并将非洲的语言、音乐、舞蹈和宗教习俗等教给他们，使他们从小就对自己的非洲文化背景有着最直观的感受，进而理解非洲传统文化中一些重要的精神追求和价值取向。在家庭氛围的影响下，黑人小孩深受其父母文化传统的熏陶，继承了其父辈所带来的非洲文化。^② 这不仅使非洲黑人文化得以进行代际传播，而且令非洲的文化传统也能够历经几个世纪奴隶制的摧残和打压，始终固化于巴西黑人族群之中，即便是巴西土生黑人奴隶也保持了与祖先在文化上的一致性。如今，在巴西日常生活和当代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非非洲文化元素，追本溯源皆有赖于奴隶制时期黑人奴隶家庭对非洲文化的传播和继承。

（责任编辑 徐 睿）

^① Matthew Mason, "Keeping up Appearances: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Slave Trade Abolition in the Nineteenth-Century Atlantic World", in *The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Vol. 66, No. 4, 2009, pp. 809-832.

^② Walter Hawthorne, *From Africa to Brazil: Culture, Identity, and an Atlantic Slave Trade, 1600-1830*,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174.

Abstracts

- 1 Indigenou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 Latin America: Review of the Autonomy Theories
Zhao Hui

Abstract: The Autonomy Theory is a native Latin Americ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born in the 1970s and developed by the Brazilian scholar Helio Jaguaribe and the Argentine scholar Juan Carlos Puig respectively. The Autonomy Theory takes Latin American developmentalism and dependency theory as the source of thought, it breaks away from the established framework of mainstream West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ies, and focuses on the “autonomy” as the core concern of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regarding peripheral countries as “subjects” rather than “object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tudy. The theory argues that sovereign equality and international anarchy cover up international power inequality and hierarchical order of states with varying degrees of autonomy respectively, and emphasizes that domestic elites of peripheral countries are critical to maintaining or changing dependency status. In response to the problem of the way-out for peripheral countries, the theory proposes that, in addition to the well discussed options of dependence and revolution, peripheral countries have a third solution, which is autonomy that can be formulated and implemen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ir own interests by creatively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manoeuvring room provided by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It helps to reduce the dependence on core countries and achieve the independent development. Connecting autonomy and integration, the theory advocates like-minded peripheral countries to implement a common integration strategy to form a coherent and cohesive system, expand resources and market base, increase production scale, promote the endogenous development, and improve collective bargaining power at the international level.

Key words: autonomy theory, peripheral countries, developmentalism, dependency theory, integration

- 22 The Traditional Western Liberal Internationalism: Its Origin, Logic and Dilemma
Fu Wenguang

Abstract: As the mainstream western ideological tradition, liberal internationalism has always been an important ideological factor influencing and shaping the modern international order. Throughout history,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ist tradition has gone through three stages of development. In the age of Enlightenment, thinkers such as Grotius, Crucé and Kant, systematically put forward the propositions of “international

peace by law”, “peace by commerce and trade” and “peace by republicanism”, so that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liberal internationalism was initially formed. In the 19th century, with the combination of liberal thought and British hegemony, classical liberal internationalism was born in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From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to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taking the occasions of the two International Peace Conference in Hague, particularly through reflection on the outbreak of the First World War,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classical (moral) liberal internationalism to modern (institutional) liberal internationalism accelerated, and the basic pattern of western liberal internationalism tended to be finalized. The tradition of liberal internationalism contains plausible elements such as rationality, cooperation, collective security and multilateralism. It has progressive significance in promoting the democratization and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maintaining the openness of international system. Meanwhile, there are also paradoxical dilemmas in aspects such as weighing between the value of sovereignty and human rights, coping with the tangle of American–Western centralism and universal multilateralism, reconciling the Apollonian factors such as universalism, rationalism, peace appeal and elite orientation with the Dionysian factors such as nationalism, imperialism, war and conflict and mass politic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Key words: liberal internationalism, international security, multilateralism, ideology, ethics, institutions

47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atin American Regionalism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Li Depeng, Sitegeqi

Abstract: In Latin America and Caribbean Countries, there has always been a coexistence of various initiatives and activities of regionalism, while no consensus has been reached on how to evaluate their performance.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regionalism of Latin America is characterized by being weak and volatile. It is a progress that vibrates within a relatively unchangeable interval with a relatively low upper limit, showing its stability and instability simultaneously. The historical idea of time from Fernand Braudel is used here as a framework to explain this paradox: Factors of long and medium duration shape the stability of the progress of Latin American regionalism, while its ups and downs are caused by factors of short duration. Factors of long and medium duration refer to geographical, cultural and economic ones, which have complicated impact on regionalism. Generally speaking, geographic and cultural factors are impetus for the progress of regionalism in Latin America, while economic factor often impedes it from gaining more successes, leaving it operating in a superficial and low-level way. Policies of different governments belong to factors of short duration, which depend on the power and ideology of specific government. These factors can change rapidly in a short period, contributing to the high volatility of the regionalism. The paper takes case of the South American regionalism, especially that of UNASUR and PROSUR, to illustrate how different factors function in practice.

Key words: regionalism, integration, South America,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Unasur, Prosur

- 77 The China–U. S. Competi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Latin Americ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through the IPE Perspective

Huang Leping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intensified competi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should strengthen cooperation with other countries, especially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expand its partnership network. In recent years, the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have made rapid progress, laying the material foundation for the China–Latin Americ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However, the essence of the current China–Latin American relationship is still a complex interdependence dominated by rationalism. Both sides are still in the Lockean culture. The joint gains cannot cover up the imbalance of relative gains. In addition, the United States regards Latin America as its “backyard” and is very sensitive to China’s presence in this region. In order to overcome the internal contradictions and external unfavorable conditions, it is necessary to cross over Lockean culture and move toward Kantian culture. The theory of constructivism holds that 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China must take active action to carry out wider and deeper interaction with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form more shared ideas, and construct new collective identity and interests through channels like global governance cooperation, production capacity cooperation and people–to–people exchanges, so as to build a truly win–win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China should adhere to the principle of seeking common ground while reserving differences, and strive to explore the consistency and shared ideas in both cultures to enhance their collective identity. However, this goal faces political challenge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as well as cultural challenges from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a and Latin America. In addition, the global economic downturn exacerbated by the epidemic may also temporarily override the importance of national interests over group interests. As a result, Sino–Latin American relations may zigzag between rationalist realistic considerations and constructivist idealistic expectations in future.

Key words: China–U. S. competition, China–Latin Americ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interdependence, constructivism, Kantian culture

- 95 China–Latin America Green Cooper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ight Approach to Justice and Pursuit of Interests: Progresses, Challenges and Prospects

Xing Wei

Abstract: China–Latin America green cooper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right approach to justice and the pursuit of interests includes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countries to pursue economic interests. More importantly, in the process of pursuing economic interests, the factors such a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humanistic value should be fully considered. The right approach to justice and the pursuit of interests can promote high–quality green cooperation, reflect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help multiple actors participate in inclusive green cooperation, and boost the new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der. The progress of China–Latin America green cooperation include green energy cooperation providing support for this region, green agricultural cooperation highlighted

with high technology,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borne to benefit local inhabitants' livelihood and enhance people-to-people bond. However, China-Latin America cooperation in the fields of green finance and green trade needs further expansion.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U.S.-China rivalry, China and Latin America face some challenges in green cooperation, such as the influence of the U.S. interventions, domestic political uncertainties and social instability of regional countries, and so on.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right approach to justice and the pursuit of interests, a more refined China-Latin America green cooperation mechanism should be established in future, so as to deepen green cooperation while benefiting local people and enhancing people-to-people bond, and respond flexibly to the U.S. interventions. At present, overcoming the adverse impact of COVID-19 on world economy and trying to restore economic development are the primary tasks faced by all countries. The Global Development Initiative proposed by China is consistent with the core value of the right approach to justice and the pursuit of interests, and plays a guiding role in China-Latin America green cooperation.

Key words: right approach to justice and pursuit of interests, green cooperation, China-Latin America relation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Global Development Initiative

- 117 China-Latin America Clean Energy Cooper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Energy Transition
Jiao Yuping, Cai Yu

Abstract: Promoting international clean energy cooperation is the strategic choice for China to respond to global climate change and enhance domestic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under the energy transition scenario. Latin America is a key area for China's strategy of clean energy global development. The field of energy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Latin America has been diversified from mainly hydropower to include multiple types of energy production, including solar energy, wind energy, biomass energy, and nuclear energy. The mode of cooperation has transformed from "engineering procurement construction" to "financing + construction + operation".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have become the highlights in recent bilateral cooperation. The rapid progress of China-Latin America clean energy cooperation benefits from the high-level consensus of political & financial framework, and the complementarity in resource endowment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gap between the two sides. The global climate change, economic recovery in the post COVID-19 era, and the transition of economic structure in regional countries create opportunities for sustainable clean energy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Latin America. However, there are various challenges in the China-Latin America clean energy cooperation, including domestic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isks faced by regional countries, the external competition from the US, and the problems in construction & financing of clean energy projects. Looking to the future, the prospects of bilateral clean energy cooperation can be improved by expanding cooperation with the Central American and Caribbean countries, seeking third-party cooperation with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strengthening state-enterprises coordination to cope with risks.

Key words: energy transition, energy cooperation, clean energy, climate change,

economic transition, third-party cooperation

136 On the Organizational Model and Characteristics of Black Slave Families in Brazil

Jiao Jian

Abstract: During the period of slavery in Brazil, most of the black slaves could not marry in the way recognized by law. However, black slaves generally had strong desires as well as necessary material living conditions to enter into marriage, thus they formed their own families albeit various constraints and restriction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African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customs, black slaves adapted to the realistic environment of slavery society in Brazil and formed the unique mate selection mode of slaves, such as tribal endogamy, plantation endogamy and exogamy. In the process of forming families appeared three kinds of family structures, i. e., nuclear family, single-parent family, and extended family. Compared with other regions in the Americas where slavery was practiced, the family composition of black slaves in Brazil was relatively stable. There are special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in the family relations of black Brazilian slaves, and that between slaves and their godfather or godmother is the most typical and unique. The organization model of black slave family has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which not only reflects the adaptation of black slaves to the realistic social environment under the special historical conditions of slavery, but also reflects both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f African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customs. The black slave family objectively prolonged the existence of slavery in Brazil, and played a crucial role in mediating the intergenerational inheritance of African culture.

Key words: Afro-Brazilian, marriage, mate selection mode, family structure, slavery, African culture

(译审 黄念)